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丛书

Publication Series: MOE Supported Projects of Key Research Institute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Universities

历史学类 History

中国道教考古

张勋燎 白彬 著

5

线装书局

张勋 燎彬
白 彬

著

中国道教考古

5



綫裝書局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2002~2003年度重大项目

教育部“九五”人文社会科学
博士点基金项目

本书出版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
专项经费资助



拾陆 重庆云阳云安盐场明代玄天 宫遗址和四川地区与盐业有 关的道教遗迹

川东、川西地区历史上都曾有过不少与盐业生产有关的道教遗迹。这些遗迹，在古文献中多有比较明确的记载，其中有的记载已为考古调查所证实。尽管过去学者们对四川盐业、四川道教所作的研究相当不少，但此类遗迹却始终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系统的考古调查工作尚待开展，有关研究尚处于一片空白。本文主要依据文献记载的有关遗迹材料，结合笔者所作的实地考察，拟对四川盐业与道教及巴僚少数民族之关系作一初步分析和探讨。

一

川东地区（今大部已划归重庆市）与盐业有关的道教遗迹目前主要集中在云阳县。嘉靖《云阳县志》卷下，外志云：

玄天宫，在盐场铁礬山。盐场累有火灾，嘉靖十七年居民修建以压之。盖取五德相胜之说，果无火患。

《云阳县志》所记用以压镇云安盐场火患之“玄天宫”遗址迄今犹存，1995年8月，笔者还曾作过实地考察。遗址位于今云阳县云安镇汤溪河西岸铁檠山北端山顶上，东距云安盐场约一公里。玄天宫解放初期保存尚好，在1951、1952年为当地群众所拆毁。从残存的基址看，玄天宫遗址坐北朝南，平面略呈方形，系由正殿和侧室两间并排的长条形房子组成。侧室位于正殿以东，长20.4、宽3.6米，为厨房和厕所之所在；正殿位于侧室以西，长20.4、宽16.8米。仅以一墙相隔的正殿和侧室皆因石为基，基石西面保存稍差，其余三面保存均较完好。基石以外随处可见砖、瓦等建筑构件，另有少量粗白瓷片。砖、瓦皆青灰色，光素无纹。正殿前尚有石碑两件，其中一件碑首有“万古不朽”四个大字，系民国十四年（1925）张福林、范铸等所刻；另一件则系捐资者人名录，文字多已湮漫不清，年月不详。

玄天宫“正殿竖真武祖师神像，因名其庙曰玄天宫”^{〔1〕}。真武即玄武，真武祖师又称真武大帝、真武帝君，是道教尊奉的职掌北方天界的重要神祇，因此，玄天宫应是一道教性质的宫观。民国《云阳县志》卷五，山水下：“（汤溪河）又左过汉城山（一名铁檠山）……旧志云：汉高曾访扶嘉，驻蹕于此，遗民德汉，因以名山。唐方士翟法言、杨云外相继焚修升仙而去，段成式所称天师翟乾祐者也。山顶有老子之宫玄天宫。”亦说明玄天宫系一道教性质的建筑。

玄天宫的始建年代，古文献中有相当明确的记载。笔者在对该遗址进行实地考察时，亦未发现任何比明代更早的遗物，因此嘉靖《云阳县志》云其始建于明世宗嘉靖十七年（1538）应是可信的。前述文字多已湮漫不清的人名碑，当是云安民众共同捐资修建玄天宫之物证，其年代应与玄天宫同时，很可能亦是在明嘉靖年间。

明代建造供奉玄天大帝真武神之玄天宫于云安盐场以压火灾，说明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玄武神自宋以来在道教神系中的地位大大提高，至明代而达于极盛，成祖屡派内庭重臣至湖北武当山，组织大量的人力，耗巨资修建玄天大帝宫观铜像。又于两京兴建大型真武庙，重加祀典。万历年间重修《大明会典》卷九十三，京都祀典之首即为“北极佑圣宫”。载云：“北极佑圣宫，即真武庙，开国靖难，神多效灵，故祀之。每岁元旦、圣旦、三月二日、九月九日，每月朔、望日，俱用素馐，遣太常寺堂上官行礼。国有大

〔1〕 见该遗址民国14年石刻。

事，则告。”^{〔1〕}于是真武宫、玄天宫之建遍及全国各地。嘉靖皇帝佞道，清人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有《世宗崇道教》专卷述之。玄帝之供奉，更远及边陲。如嘉靖十三年（1534）《十代靖江王供奉玄帝纪》石刻述广西桂林独秀山开西洞事云：“开岩之时，意犹未决，尝祷于玄帝，拜求灵签，得荷允许，始敢开辟。遂发诚心，欲立圣像于中……爰命口使秦文而量其市铜募工，铸造圣像一尊……供奉，期以永镇藩邦……或者乃曰：‘玄帝之神在天上也，神之宫阙在武当也……顾兹地之榛芜，岩之幽僻……’予曰不然，神之灵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是则人心之所在，即神之所在也。”^{〔2〕}二是玄武为北方之神，属水。《淮南子·天文训》：“北方水也……其神为辰星，其兽玄武。”元至元七年（1270）徐世隆《元创建真武庙灵应记》：“按《文耀钩》云：‘北宫黑帝，其精玄武，实北方之神也。’我国家肇基北方，盛德在水。”^{〔3〕}建玄天宫以止盐场火灾，取以水压火之义。其三，企图以宗教手段解决盐场火灾问题，不建佛寺而建道教宫观，结合所在的具体地望情况考虑，则应与古代四川地区道教和盐业生产二者之间的特殊关系有关。以下，我们主要从最后一个方面进行考察。

云阳云安盐场与道教发生关系，并不是明代才新出现的一个现象，从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五，怪术云：

云安井，自大江溯别流，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镜，舟楫无虞。江十五里，皆滩石险恶，难于沿溯。天师翟乾祐，念商旅之劳，于汉城山上，结坛考召，追命群龙。凡一十四处，皆化为老人，应召而至。乾祐以滩波之险，害物劳人，使皆平之。一夕之间，风雷轰击，一十四里尽为平潭矣，唯有一滩仍旧，龙亦不至。乾祐复严敕神吏追之。又三日，有一女子至焉，因责其不伏应召之意。女子曰：“某所以不来者，欲助天师广济物之功耳。且富商大贾，力皆有余；而佣力负运者，皆不足。云安之贫民，自江口负财货至近井潭，以给衣食者众矣。余若车舟利涉，平江无虞，即邑之贫民，无佣负之所，绝衣食之路，所以困者多矣。余宁险滩波以贍

〔1〕 万历重修《大明会典》，530页。

〔2〕 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1279页。

〔3〕 《玄天上帝启圣灵异录》卷一，《道藏》十九册，641页。

佣负，不可利舟楫以安富商，所以不至者，理在此也。”乾祐善其言，因使诸龙皆复其故，风雷顷刻，而长滩如旧。天宝中，诏赴上京，恩遇隆厚。岁余，还故山，寻得道而去。^{〔1〕}

“云安井”即今之云安盐场。汤溪河自西北向东南流经云安，是云安井盐外销的必经之路，但石险滩多，水流湍急，于盐业运输颇为不便，故有道士翟乾祐在运盐河降龙的故事和传说。唐末五代著名道教学者杜光庭《太上洞玄灵宝素灵真符序》称：“素灵符者，天师翟乾祐乾元中自黄鹤山溯流入蜀，至巫山峡……南至清江，北及上庸，周旋千里……一夕，梦真人长丈余，素衣华冠，立于层崖之上，俯而视之，若有所命。君翌日登天尊峰，瞻仰礼谒，果见真人也。俄于天尊手中，得丹书一轴，拜而受之，即素灵符也。按而书用，蠲痾疗疾，征魔制灵，驱役鬼神，回尸起死，召置风雨，鞭策虎狼。三峡之人，大享其惠。天宝中，诏入内殿，顺风问道，复还仙都山。其后平昌段成式与当时朝彦荆郢帅臣，咸师奉之，累年乃得道而去……余天复丙寅岁请经于平都山，复得其本，编入三洞藏中。”^{〔2〕}由此可知翟乾祐的确到过三峡地区，云安显然应在他的活动范围以内，而段成式本人又师事过翟天师，所以《酉阳杂俎》一书言翟氏降龙事当有所本。《太平广记》卷三十，神仙，“翟乾祐”条引《仙传拾遗》云：“翟乾祐，云安人也。庞眉广颡，巨目方颐。身長六尺，手大尺余，每揖人，手过胸前。尝于黄鹤山师事来天师，尽得其道。能行气丹篆，陆制虎豹，水伏蛟龙，卧常虚枕，往往言将来之事，言无不验。”作为云阳人氏的翟乾祐天师既“能行气丹篆，陆制虎豹，水伏蛟龙”，故而在运盐河“设坛考召，追命群龙”，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川西地区亦有不少与盐业有关的道教遗迹。今四川仁寿县境内有陵井，该井相传即为张道陵所凿。《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三，剑南道下，陵州：“陵井者，本沛国张道陵所开，故以陵为号。晋太元中，刺史毛璩乃于东西两山筑城，置主将防卫之。后废陵井，更开狼毒井，今之煮井是也，居人承旧名，犹曰陵井，其实非也。”^{〔3〕}《太平寰宇记》卷八十五，剑南东道四，陵

〔1〕（唐）段成式：《酉阳杂俎》，57页；又见《太平广记》卷三十，神仙，“翟乾祐”条。

〔2〕《道藏》六册，343页。

〔3〕《元和郡县志》，861～862页。

州，仁寿县：“陵井本狼毒井，今名陵井。按《郡国志》云：‘昔张道陵于此得盐井，因被纸排车，引役人唱排车乐，愿心齐力，祀玉女于井内。玉女无夫，后每年取一少年掷盐井中，若不送，水即竭。’……始因张道陵，谓之陵井。”《舆地广记》卷三十，成都府：“仁寿县……有陵井，东汉张道陵所开。有毒龙藏井中及盐神十二玉女为祟，天师以道力驱出毒龙，禁玉女于井下，然后人获咸泉之利。”张道陵在四川特别是在仁寿开盐井之说由来已久。元延祐三年（1316）虞集《成都路正一宫碑》：“汉正一天师张陵，遗迹几遍西南，事最著。其兴利若盐井之属，至于今赖之。”〔1〕《舆地纪胜》卷一百五十，成都府路，隆州：“张天师，名道陵，沛国人。天师以后汉建武十年生于吴之天目山。天师平西蜀，妖鬼不复为人害……过阳山，见白气属天，指其下有咸泉。因逐去毒龙，而咸泉始露。誓玉女，使不复出，付以煮海之法。”〔2〕宋贾善翔《犹龙传》序曰：张道陵天师往西蜀修炼，“化地作咸泉”。同书卷五“度汉天师”条引《南斗经序》云：张道陵在蜀“与六天鬼魔战，夺二十四治，改为福庭，名之化宇，降其帅为阴官，择道者令焚修。于是幽明异职，人鬼殊途。又于仁寿县降十二天游玉女，化地作咸泉，烹以为盐。”〔3〕在诸多文献记载中，以杜光庭《道教灵验记》所述最为详细、具体。该书卷八，“陵州天师井验”条载：

陵州天师井。本传云：天师经行山中，有十二玉女来谒天师，愿奉箕帚。天师知其地下阴神也，谓之曰：“汝等何以为献？将观汝心愿厚薄，选而纳焉。”玉女各持一玉环，径皆数寸。天师曰：“所献一般，不可并纳。吾化此十二环令作一环，投之入地，有得之者，即纳之焉。”遂合十二环为一大环，径余一尺，投于地中，随即深陷，已成井矣！玉女皆脱衣入井，以探玉环，竟不能得。天师取其衣，藏石匱中，玉女至今只在井内。今陵州盐井直下五百七十尺，透两重大石方及咸水。每年一度淘洗其中，须歌唱喧聒，然后入井。不然，必见玉女裸居井中，见者多所不利。井既深，不可数入，或絙索断损，皮囊坠落，唯于天师前烟香良久，玉女自与挂之，依旧不失。顷年井属东川，有张填常侍主其盐务，于事稍怠，

〔1〕（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十七。

〔2〕杜光庭《录异记》卷五亦有类似的记载，《道藏》十册，875页。

〔3〕《道藏》十八册，324页。

盐课不登，欠数千斤。交替之后，糜留填纳，未得解去。替人素亦崇道，因与虔告天师云：“张填所欠之盐，家资已尽，空此留滞，益恐困穷，于三五日之内，愿借神力，增加所出，为其填纳。”与张俱拜，祈诉恳切。自是每日所煎，水数四五十函如常，而盐数美益，五六日内，填之课足。此后一如旧数，无复增减矣！十二玉女，戌、亥二人在天，唯十人在井，所煎盐至戌、亥二时亦歇。天师初以兹地荒梗，无人安居，山川亦贫不可耕植，化盐井以救穷民。民聚居井旁，户口日众，遂置州统之，以天师名，故曰陵州。天师誓曰：“我所化井，以养贫民，若官夺其利，千年外井当陷矣！”今诸井皆有天师、玉女之像焉。^{〔1〕}

以上材料说明，张道陵在仁寿开盐井之说起源甚早，远在北宋仁宗文同之前，至迟亦当不晚于唐五代时期。北宋文学家文同通过《奏为乞改陵州州名状》、《奏为乞免陵州井纳柴状》、《祭玉女文》、《祭法师（张道陵）文》^{〔2〕}等，把有关传说加以集中，其来有自。

陵井的历史甚为悠久。《东坡志林》卷四，井河，“筒井用水鞴法”条：“蜀去海远，取盐于井。陵州井最古，涪井、富顺盐亦久矣。唯邛州蒲江县井，乃祥符中民王鸾所开，利入至厚”^{〔3〕}。陵井的规模在整个西蜀地区也是数一数二的。《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三：“陵井，纵广三十丈，深八十余丈。益部盐井甚多，此井最大。”陵州亦因境内有陵井而得名。明人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六十六，方物记八，盐谱、川西井引《陵井监图经》：“汉时有山神号十二玉女，为道人张道陵指陵上开盐井，因此陵上有井，改名陵州”^{〔4〕}。南宋谢守灏《混元圣记》卷七：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天师纳赵升为弟子，又降十二神女，化咸泉为盐井，后因名郡为陵，以旌其功（后改为仙井监，今为陵州也）”^{〔5〕}。陵州之设众说不一，有人认为是西魏。文同《丹渊集》卷三十四《奏为乞改陵州州名状》云：“臣自到本州，求州之所以得名之由。据地志云：自秦至齐本犍为与蜀二郡之地，在梁常为怀仁郡，西魏时始改为陵州，因境内有陵井，故名焉。陵井始后汉张陵开

〔1〕《道藏》十册，827、828页。

〔2〕（宋）文同：《丹渊集》卷三十四、三十五。

〔3〕（宋）苏轼：《东坡志林》，77页。

〔4〕《舆地纪胜》卷一百五十，亦有同样的记载。

〔5〕《道藏》十七册，847页。

兴，因陵名遂以名井，后复因井名以名其州。”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是北周。《輿地广记》卷三十，仙井监：“秦属蜀郡二，汉属犍为郡，晋及宋齐皆因之。梁置怀仁郡，后周置陵州，取陵井为名。”《旧唐书·地理志》，剑南道，陵州：“仁寿，汉武阳县东境，属犍为郡。晋置西城戍以为井防。后魏平蜀，改为普宁县。后周置陵州。以州南陵井为名。”《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三云：“晋孝武帝太元中，益州刺史毛璩置西城戍以防盐井，周闵帝元年又于此置陵州，因陵井以为名。”《周书·闵帝纪》：“元年春正月景寅，于剑南陵井置陵州。”陵州之设既是在北周，陵井之兴则当远在北周闵帝宇文觉之前，亦可能如文献记载所言早至东汉。

考陵井之得名，或曰系张道陵所凿；或谓张道陵于陵上所开；或云“陵井之得名，非谓井由张道陵开凿，盖自张道陵始独占此盐井之利耳”^{〔1〕}。总之皆与张道陵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陵井又名天师井。《輿地纪胜》卷一百五十，成都府路，隆州，景物下：“天师井。《广记》：‘因天师治井。’《晏公类要》云：‘本狼毒井。’按郡东此山侧，因名。”“天师井。《广记》：‘因天师浴丹。’《晏公类要》云：‘在仁寿县南二里。’《郡国志》云：‘昔东汉张道陵所开，有毒龙藏井中及盐神玉女十二为祟，天师以道力驱出毒龙，禁玉女于井下，然后人获咸泉之利。’”陵井又名仙井。《輿地广记》卷三十：仁寿县“有陵井，东汉张道陵所开……皇朝不欲斥天师名，故改陵井为仙井。”“皇朝熙宁五年废（陵州）为陵井监，政和三年改为仙井。”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财赋一，蜀中官盐：“蜀州官盐，有隆州之仙井，邛州之蒲江……大宁、富顺之井监……长宁军之涪井，皆大井也……仙井，岁产盐二百余万斤，隶转运司；蒲江亚之，隶总领所；大宁盐二百五十余万斤，岁取其四分，计值九万余缗，亦隶总领所；涪井盐四十余万斤，岁取其赢五万余缗，为军食之用。”^{〔2〕}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蜀食井盐，如仙井、大宁犹是大穴，若荣州则井绝小，仅容一竹筒。”^{〔3〕}放翁此谓之“仙井”所言不明，不过联系前述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的记载看，应是仁寿陵井。陵井名仙井之说在《宋史·徽宗纪》、《蜀中广记》卷八中亦有载。“天师”指的是张道陵，“仙”乃道教之别称，盐井称陵井、天师井、仙井，皆仁寿盐业与道教有关之证也。

〔1〕 王仲萃：《北周地理志》，257页。

〔2〕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300～301页。

〔3〕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67页。

张道陵于仁寿井盐的开发出力尤多，被尊为井神，与玉女盐神一样同为当地民众供奉和祭祀之主要对象。前述《道教灵验记》说唐五代时仁寿诸盐井皆供有天师、玉女像。在每年一度的清淤之前，必于“天师前炷香良久，玉女自与挂之”，然后方可入井。同书卷八，“皇甫洽事天师验”条又云：“成都皇甫洽，常崇玄教，精奉香灯，往来陵州，图写天师真，旦夕供奉。”说明陵州诸盐井供奉的天师像影响还不小，以至有的奉道弟子将其视为张天师的真容专门从外地赶来摹写。陵井旁还建有专门的张道陵祠、玉女祠。《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三，剑南道下，陵州：“张道陵祠，在县西南百步。陵开凿盐井，人得其利，故为立祠。陵即张鲁之祖父，学道鹤鸣山，人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时人号米贼，亦曰五斗米道。”《輿地纪胜》卷一百五十，成都府路，陵州：“中女祠。《元和郡县志》云：‘中女祠，盖井神张道陵祠，在仁寿县西一百步。’”《太平寰宇记》卷八十五，剑南东道四，陵州，陵井监：“按《图经》，汉时有山神号十二玉女，为道人张道陵指陵上开盐井，因此陵上有井名陵井。今井上有玉女庙，甚灵，监司奉之。若以火坠井中，即雷吼沸涌，烟气上冲，溅泥漂石，甚可畏也。或云井泉旁通江海，微有败船木浮出。其井煎水为盐，历代因之。”《輿地纪胜》卷一百五十：“玉女祠。祀玉女于井内，即盐井也。《輿地广记》：‘在仁寿县。’今名灵真夫人。”《蜀中广记》卷六十六亦有类似的记载。在五代，还举行过祭祀盐神玉女的活动。《十国春秋》卷三十五，前蜀高祖本纪：天复七年（907），“是岁，遣官祭盐井玉女之神。其神出半面而享之。初帝见裸体妇于盐井，告曰：‘若当为吾国土地主，富贵至矣。’故有是命。”天复年间所祭之盐神为女神，与前述仁寿盐业之天师玉女盐神道教传说是完全吻合的。

井研亦有陵井。《太平寰宇记》卷八十五在叙述陵井监（即陵州）诸盐井时首先讲到陵井，说井旁有玉女庙，“雍熙元年春冬日收盐三千八百一十七斤，秋夏日收三千四百四十七斤。”紧接着又云：

又仁寿县界别有五井，二井见在……五井废。

又：

井研县二十一井，五井在……陵井在州南一百九里。唐时官私日收盐五斗五斤。龙朔元年坏，上元元年重开，伪蜀栈塞。至国朝乾德三年重开，日收盐三十斤一十两……一十六井废。

又：

始建县七井，一井见在，六井废。

又：

贵平县一井。

又：

右陵州盐井计十井，日收盐四千三百二十斤。

乐史在这里明确讲到陵州南一百九里有井研陵井，该陵井是宋初陵州尚存为数不多的十口盐井之一，“日收盐三十斤一十两”，看来规模并不大，系一小型盐井。“又仁寿县界别有五井”，说明文中首先提到的陵井是仁寿陵井，该陵井在仁寿县南二里，《舆地纪胜》卷一百五十引《晏公类要》所载甚明。《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三说张道陵祠在仁寿县西南百步，亦说明仁寿陵井就在州城仁寿附近。仁寿陵井旁建有张道陵祠、玉女祠等祭祀性建筑，日产盐三千余斤，是一特大型盐井。陵州诸盐井中既有仁寿陵井，又有井研陵井，乐氏交待甚为清楚。过去有的方志往往把仁寿陵井与井研陵井混为一谈，甚至误将井研陵井指为仁寿陵井。嘉庆《补纂仁寿县志》卷一：“陵井，在陵州南一百九里。”此之谓陵井，显系指仁寿陵井。古文献中从未有仁寿陵井在陵州南一百九里之说，位于州南一百九里之陵井应该而且只能是井研陵井。嘉庆《补纂仁寿县志》卷一又云：“仙井者，张道陵所开之井也，井研志以其县为仙井，大误。”说明井研盐井中除有名陵井者外，尚有称仙井的。

与盐业有关的道教遗迹在富顺县亦有分布。《旧唐书·地理志》：

隋富世县。贞观二十三年改为富义县。界有富世盐井，井深二百五十尺，以达盐泉，俗呼玉女泉。以其井盐最多，人获厚利，故云富世。

《太平寰宇记》卷八十八，剑南东道七，富顺监：

富顺监，晋富世县，以县下有盐井，人获厚利，故曰富世。唐贞观二十三年改为富义县。按井深二十五尺（按当为二百五十尺之误），凿石以达盐泉，俗谓之玉女泉。

《輿地纪胜》卷一百六十七，富顺监，古迹：

富义井，《元和郡县志》：在富义县西南五十步，月出盐三千六百六十石，剑南盐井，唯此最大。《寰宇记》云：“井深二百五十尺，凿石以达咸泉，世俗谓之玉女泉。”

如前所述，张道陵于西蜀陵州等地开盐井，井中有玉女盐神司之，因此有天师降玉女、化地作咸泉的传说。作为早期著名盐井的富顺井，其名与玉女相联，应是受这一传说影响的结果。

王纯五近年来在对天师道二十四治逐一进行实地考察后曾经指出：

二十四治多有盐井。彭州阳平治下有盐井沟，鹤鸣神山太上治有天国山盐井沟，（彭州）葛瓚治下八角井（今八角村）产盐，（金堂）昌利治东北有盐井乡，（蒲江）主簿治响水洞下有盐井岩，什邡后城治、公慕治旁有盐井，（德阳）涌泉治附近有华池盐井，（彭山）北平治近旁有永通盐井，等等。^{〔1〕}

这一情况说明，与盐业有关的道教遗迹在四川彭州、大邑、金堂、蒲江、什邡、德阳、彭山诸县市亦有发现。

四川盐业兴起甚早，有的远在东汉之前，其中有一部分盐井的开凿应与道教的影响有关。

二

道教与四川盐井、盐业发生联系，应是巴人崇奉五斗米道而与巴人原有

〔1〕 王纯五：《天师道二十四治考》，32页。

之盐水女神传说相结合的产物。

《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賸人敬信。”《晋书·李特载记》：“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賸人敬信巫覡，多往奉之。”“鬼道”，即张陵于蜀中所传之五斗米道，“賸人”就是巴人。巴人奉道早已为学术界所普遍公认。《道教灵验记》卷八，“谢贞见天师授符箓”条载：“鹄鸣诸山无天师真像，陵州井中所塑，又非世代所传之真。贞忽于青城山遇峡中贾客，修斋有天师小幘供养，乃是应见之真耳。”〔1〕巴人奉道由来已久，以至唐五代时期峡江地区的商贾中尚保留着供奉天师像的传统，足见道教对巴地影响之深。

巴人自来就有盐水女神的传说。《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

巴氏子务相……因共立之，是为廩君。乃乘土船自夷水至盐阳（《荆州图》曰：副夷县西有温泉，古老相传，此泉原出盐，于今水有盐气。县西一独山，有石穴，二大石并立穴中，相去可一丈，俗名为阴阳石，阴石常湿，阳石常燥。盛弘之《荆州记》曰：昔廩君浮夷水，射盐神于阳石之上。案今施州清江县水一名盐水，源出清江县西都亭山……）。盐水有女神，谓廩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廩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天明。廩君于是君乎夷城。

章怀太子李贤注曰，以上范氏之文，“并见《世本》”。类似的文字又见于《太平御览》，然其所述远不若范书之详，不过亦讲到盐神系女神，且与巴人有关。该书卷九四四引《世本》云：

廩君乘土船至盐场，盐水神女子止廩君。廩君不听，盐神为飞虫，诸神从而飞蔽，日为之晦，廩君不知东西所当，七日七夜。使人以青缕遗盐神曰：“纓此与尔俱生。”盐神受缕而纓之，廩君应青缕所射，盐神死，天则大开。〔2〕

〔1〕《道藏》十册，829页。

〔2〕《太平御览》，4192页。

盐水女神传说在《蜀中广记》卷六十六中亦有载。观《后汉书》等文献所载巴人首领廩君遇盐水女神“愿留共居”、“暮辄来取宿”，事与前述盐井玉女自荐天师、“愿奉箕帚”之传说如出一辙，两相比较，不难发现四川盐业中的天师玉女盐神崇拜与早期巴人的盐水女神传说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

巴人在历史上确实与制盐业关系异常密切。任乃强先生曾经指出：“巴人善于架独木舟，溯水而上，销盐至溪河上游部分。整个四川盆地，都有他们行盐人脚迹。”巴东一带本多盐泉，但多“是从河水底下涌出的，不易为原始人类发现和利用。唯独习于行水的巴人能首先发现它……（并）设法圈隔咸淡水，汲以煮盐”^{〔1〕}。巴人既长于行盐，亦擅于煎盐，盐业与渔业一样同为巴人赖以生存之重要手段。从《后汉书·巴郡南郡蛮传》的记载看，巴人对居地的选择很大程度上亦以是否出产盐、鱼为前提。与制盐业关系密切的巴人自来随产盐地搬迁，他们中的一支后沿长江西上来到四川，其原有的盐水女神传说亦随之传入川东、川西一带。东汉末年，张道陵于蜀中创五斗米道，“賸人敬信”，为巴人所崇奉，盐水女神传说又和五斗米道融合起来，这样，在四川地区特别是在川西地区的早期盐井、盐业中便出现了许多有关天师玉女盐神的传说。

四川盐井本少数民族所开，这点有的学者早就注意到了^{〔2〕}。著名的富顺盐井，相传即是一梅姓夷人开凿的。《輿地纪胜》卷一百六十七，富顺监，古迹，金川庙：“《九域志》云：盖盐井神也，伪蜀封为金川王。《图经》云：惠泽庙在监郭下井，地主金川神姓王，井主梅泽神姓梅。梅本夷人，在太康元年因猎见石上有泉，饮之而咸，遂凿石至三百尺，咸泉涌出，煎之成盐，居人赖焉。梅死，官为立祠。”同书卷一百六十六，长宁军，景物上，盐井云：著名的古盐井涌井，“在盐城北，井之咸脉有二：一自对溪报恩山趾度溪而入，曾夜有光如虹，乱流而济，直至井所。一自宝屏随山而入，谓之雌雄水，古老相传以为井。初隶夷人罗氏，汉人黄姓者与议刻竹为牌，浮大溪流，约得之者以井归之。汉人得牌，闻之于官，井遂为汉有，今盐中立庙祀人。”长宁涌井最早亦为夷人罗氏所开。光绪《盐源县志》卷十说盐源盐井系由一个叫“开山姥姥”（开山娘娘）的少数民族妇女所开。值得注意

〔1〕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注图补》，53～55页。

〔2〕 自贡市档案馆、北京经济学院、四川大学合编：《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1732—1949），29、30页。

的是四川早期盐井不少是僚人所开凿的。《太平寰宇记》卷八十五云：北宋初已废之仁寿盐井中有名“赖宾”、“赖因”者；井研已废之十六井中，有名“獠母”、“赖郎”、“赖伦”者；始建已废之六井中，有名“赖胡儒”、“赖子”、“赖洩”者。著名古井陵井，又名“狼毒井”。井名前冠以“赖”、“獠”、“狼”等，此皆盐井为僚人所开之证。六朝时期，僚人在陵州一带活动相当频繁。《周书·獠传》：“獠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川洞之间，在所皆有之。”“魏恭帝三年，陵州木笼獠反，诏开府陆腾讨破之，俘斩万五千人。”又《陆腾传》：“魏恭帝三年……陵州木笼獠恃险粗犷，每行抄劫，诏腾讨之。”仁寿、井研、始建皆为陵州之属县，故其盐井多系僚人所凿。前述富顺盐脉的发现者梅泽其实也是僚人。《輿地纪胜》卷一百六十七，富顺监，景物上，土僚：“监之西隅赖牛、赖易两镇乃夷人聚落。在天圣初，赤崖斗郎春犯命，族即讨平，纳降而归，今之夷人多其子孙。其俗尚多不巾而髻近后，服青布，刺绣纹，呼为‘土僚’”。富顺所居之夷人被称为“土僚”，其所居之地名前冠有“赖”字，也表明他们就是僚人或僚人之后裔。宋代，僚人仍广泛散布于包括长宁在内的川南一带。《宋史·泸州蛮》：“自黔、恭以西，至涪、泸、嘉、叙，自阶又折而东，南至威、茂、黎、雅，被边十余郡，绵亘数千里，刚夷恶獠，殆千万计。”因此长宁盐井的开凿者罗氏亦可能是僚人。

蜀中之僚本多巴人后裔，我们过去曾有专文考说^{〔1〕}，陵州之木笼僚、富顺之土僚等亦当如此，其治盐业，仍传盐神玉女之说，又其奉道而与张道陵扯上了关系。

理清了四川盐业与五斗米道以及巴僚少数民族的关系，对于四川盐业史和四川道教史的研究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今后四川地区的考古工作中，应重视和加强对此类遗迹的考古调查、勘探及研究。

〔1〕 张勋燎：《古代巴人的起源及其与蜀人、僚人的关系》，《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拾柒 江西、四川明墓出土的 道教冥途路引之研究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国内有关刊物曾先后发表过几批在江西和四川明代墓葬中出土的纸质明器“冥途路引”，有的保存完好，有的残破不堪，有的原器腐朽而仅见随葬器物清单录目，大部经科学发掘清理，少数系建设工程掘土偶然发现。过去虽知其属道教用品，往往以其“内容雷同”而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报道一般甚为简略，引文内容亦罕见记录，专门研究文章不多，尤乏全面系统之作。四川大学石硕教授，1982 年于本校考古专业毕业后曾分配至江西省博物馆工作，得见此种器物原件数纸，承蒙抄录寄赠以资研究。今结合已发表之有关资料和文献记载，论述如下。

一、冥途路引材料的发现和释文句读

1. 1963 年发掘江西广丰县城东南 25 公里横山乡万历四十三年（1615）四月初九日入葬的郑云梅墓出土“路引二张，已烂，仅知上书死者故籍。”据同出墓志记载，郑云梅生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曾任奉直大夫官职，死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十一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三岁。同墓出土之物，除墓志而外，尚有笔、墨、砚、镜、折扇、木梳（2 件）、道服、朱书买地券等物。最值得注意的还出土了“券一片，执于死者左手，很薄，宽 2.5、长 7 厘米，券尖上端书‘玉帝’二字，其下两旁分别写两行字，其右为‘一片真香朝’；其左为‘两个环券谒阎君’，背面印盖符篆，唯字迹已无

法辨认。”又“公据一张，叠成长方形，长 21、宽 12.5 厘米，内装纸钱，封后上书‘西方公据一道’六字。”^{〔1〕}至少可以确定其中的道袍、券片和“西方公据”为道教用品。券头上端“玉帝”二字，当与右旁“一片真香朝”相接成“一片真香朝玉帝”，与左旁之“两个环券谒阎君”相对成联语。盖道士书及教中高级神祇皆需提行另写以示尊崇，否则视为不敬。

2. 1964 年清理江西南城县城南 10 公里原株良公社明益藩罗川王族人墓，出土万历二十一年（1593）六月随葬器物清单一纸，其中与道教有关者有“冥途路引一张”、“白云布道袍一件”、“宝钱七文”、“宝钞七”。路引实物已腐烂无存，“宝钱”完好，银质七枚，直径 4.5 厘米，分别铸出篆书之牛、危、壁、女、觜、室（？）等二十八宿中之星名，唯七星名非单属四方中之一方，而四方混杂，盖整个七星代表北斗，二十八宿皆隶属北斗管辖者也。道教重北斗，以为人之生死寿夭祸福所系，所谓“中斗大魁，总监众灵”者。“宝钱七”，其义并同。^{〔2〕}

3. 1962 年 4 月清理江西玉山县原群力公社嘉湖山嘉靖四十年（1561）广西参政夏浚墓，出土“路引一张，纸质，木刻印刷，长 0.54、宽 0.49 米。”另有衣物疏与路引同置于死者腰部，但路引名目未录入衣物疏中，对路引文字内容简报亦未作具体报道^{〔3〕}。据石硕提供该引录文，参考他引文字，校录如下：

灵宝大法司（以上隶书大字）

天师门下：谨据江西广信府玉山县招善乡吴田里良田社居奉道故官浚词称，本命丁丑年二月初九日申时建生，发心投词告给路引照证事。恭遇太上老君圣诞大会，诸天仙众，天师真君同赴庆筵，证盟普照。因见阳间男子女人，生居人世，造业无边，不修善果，亿劫漂沉。人生难得，中土难生，假使得生，正法难遇，多迷真道，多入邪宗，多恣淫杀，巧诈群情，贫富长短，寿夭等类，作福者少，造恶者多。一日无常拘系冥司，冤家债主，俱在目前，搜诸冤对，拷入阴司，受诸苦恼，无有出期。吾体太上好生之德，广发慈悲，仗施道力，出给路引，普救众生，离诸地狱。若有善男信女

〔1〕 秦光杰等：《江西广丰发掘郑云梅墓》，《考古》1965 年 6 期。

〔2〕 薛尧：《江南城明墓出土文物》，《考古》1965 年 6 期。

〔3〕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玉山、临川和永修县明墓》，《考古》1973 年 5 期。

发心请给，填写乡贯年月，随给前去，转念太乙救苦天尊四万声，于路救拔，亦作盘缠，限满天年，随身赍带官引，前到阴司。如遇关津把隘去处，即便放行，不许拦截。但有诸司牛头狱卒刁蹬留难，阻滞信人，冥途不见超生，吾合奏上天帝，急差神兵，前到阴司拿捉，押送酆都，照依女青天律问罪不恕。需至出给官引为照者。

（绘头项背光之太乙救苦天尊立像） 太乙救苦天尊（字大而疏）

右冥途路引，给付信官夏浚收执，准此为照。（持引人姓名系用笔填写，余为刻印大字）

嘉靖四十年岁次辛酉七月十五日给（此行细字用笔填写）

祖师三天扶教辅元体道大法天师张证盟（此行刻印大字）

在首行“灵宝大法司”之下，刻印道教七宝图案纹饰，金钱二，一觚角居二钱之间，与《道藏》页面常见者相同。

4. 1971年发掘江西清江樟树镇隆庆二年（1568）周隆贞墓出土白棉纸冥途路引一张，长52、宽47厘米，木刻版印，四边饰以流云纹图案。发表有图版^{〔1〕}，但过分缩小，无法释读。今据石硕寄赠材料校录如下：

酆都山冥途路引（大字）

大明国江西道临江府清江县清江镇中和坊居住奉道给引信女周氏隆贞，自述本命前乙巳年十月二十四日戌时建生，上属北斗武曲星君主照，以投词告给路引事。伏闻道祖太上老君，商武丁辛丑年二月十五日庆诞之辰，凡诸天仙众，同赴降筵。普照阳间，男子女人，生居尘世，天寿不齐，善果不修，沉沦多坠。不思人生难得，中土难生，假使得生，正法难遇，多迷真性，误入邪宗，多恣淫杀，巧诈群情，以致贫富贵贱等类，福少罪多，无常难免，入冥府，罪业无边。今体太上好生之德，广发道力，出给路引，普救众生，离诸地狱。若有善男信女发心请给路引，唵念太乙救苦天尊四万声，随身佩奉诸司照证，荡涤罪愆，超仙境界。一切关隘处所，即便放行。如是刁蹬，时有玄天上帝巡游三界，急差神兵，押赴酆

〔1〕 余家棟：《戎清江发现的酆都山冥途路引》，《江西历史文物》1978年6期。

都问罪施行。须至

引者。

右给付信女周氏隆贞随身照证

太乙救苦天尊（此行大字）

皇明隆庆二年戊辰岁十二月初五日（二字押）

祖师万法教主玄天上帝金阙化身天尊（此行大字）

5. 1979年12月发掘江西南城县原岳口公社游家巷大队万历年间益宣王朱翊钊及其二妃李英姑、孙氏墓，在长妃李英姑墓室出土“路引一件。绵纸质，出於盖被之上，保存完好。装於葛布袋中一毛边纸封套内。封套已朽，尚见墨书一‘封’字，上有一方朱红印。葛布袋内满装烧纸灰。路引为木版印刷，用墨书填写死者的姓名、籍贯、出生年月和填发路引的日期。文内盖有相同的符印三方，印文为篆体符号三行大字，右下方空隙处亦印有几种道教的杂宝符号，左上方刻绘太上老君图像。路引宽0.55、高0.69米。此类路引过去在我省明墓中亦出土过，其内容雷同”。《文物》简报未附录文而有图版（图版拾柒：1）^{〔1〕}。此简报最先发表在《江西历史文物》1980年3期，除照片图版外附有录文，可资利用。该录文未加标点，识读亦间有误。今参以石硕寄赠录文校读如下：

灵宝大法司（隶书大字）

天师门下：今为江西建昌崇仁府居奉道信女崇仁府长孙夫人李氏乳名英姑称，本命乙未年九月初七日午时建生，投词告给路引照证事。恭遇太上老君庆诞大会，诸天仙众、天师真君，同赴庆筵，证盟普照，因见阳间男子女人，生居尘世，造业无边，不修善果，亿劫漂沉。不念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多迷真道，多入邪宗，多恣淫杀，巧（此字原误录作考）诈群情，贫富长短、寿夭等类，作福者少，造恶者多。一日无常拘系冥司，冤家债主，俱在目前，搜（此字原误识作披）诸冤对，拷入阴司，受诸苦恼，无有出期。吾体太上好生之德，广发慈悲，仗施道力，出给路引，普救众生，离诸地狱。若有善男信女发心请给，填写乡贯年月，随即前

〔1〕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钊夫妇合葬墓》，《文物》1982年8期，21页，图一二。



图版拾柒：1

去，转念太乙救苦天尊四万声。於路救拔（此字原误识作援），亦作盘缠。限满天年，随身赍带关引前到阴司。如遇关津把隘去处，即便放行，不许拦截。但有诸司牛头狱卒刁蹬留难，阻滞信人，冥途不见超生，吾合奏上天帝，急差神兵前到阴司拿捉，押送酆都，照依女青天律问罪不恕。需至出给关引者。

（太乙救苦天尊像）太乙救苦天尊（此行大字）

冥途路引给付崇仁府长孙夫人李氏英姑收执，准此为照。（本行除引主姓名里贯封爵用笔细字填写外，余为版印大字）

嘉靖三十五年二月初十日给（此行用笔细字填写）

三天扶教辅元体道大法天师张证盟（此行大字版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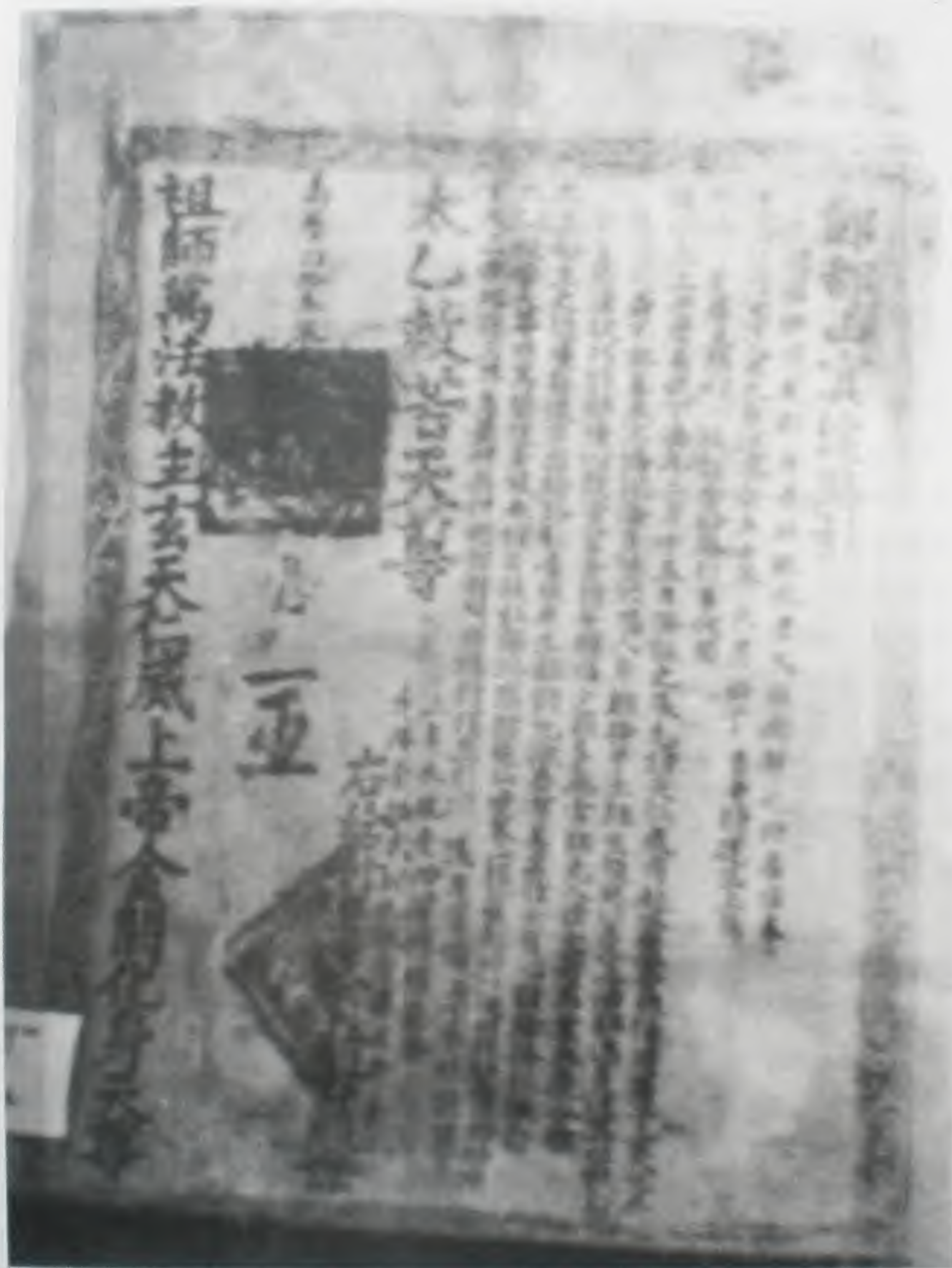
6. 1988年四川省博物馆举办全省文物普查成果展览，在展柜中陈列出井研明墓出土冥途路引一纸，我们师生二人一同前往参观，引起注意，当即摄影录文（图版拾柒：2）^{〔1〕}。其后江玉祥在《四川文物》和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辑上发表专文介绍讨论^{〔2〕}，知引纸系从盗墓者手中缴获，引纸出土情况不详。引纸保存完好，横长66、宽51厘米。江文附有路引录文和局部照片图版，录文未加标点，並间有脱误。今据当年所见原件所作释读如下：

酆都山冥途路引（大字楷书刻印）

大明国四川成都府井研县化里大西街解元坊居住奉道给引信女宜人周氏，自述本命庚午年六月初十日申时建生，上属北斗星君主照，以投词告给引事。伏闻道祖太上老君商武丁丑年二月十五日降诞之辰，凡诸天仙众，同赴降筵，普照阳间男子女人，生居尘世，天寿不齐，善果不修，沉沦多坠。不思人身难得，中土难生，假使得生，正法难遇，多迷真性，误（江文误录为故）入邪宗，多恣淫欲，巧诈群情，以致贫富贵贱等类，福少罪多，无常难免，入兹冥府，罪业无边。今体太上好生之德，广发道力，出给路引，普救众生，离诸地狱。若有善男信女发心请给路引，唵念太乙救苦天尊四

〔1〕 自藏照片。

〔2〕 江玉祥：《一张新出土的明代酆都冥途路引》，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图版拾柒：2

万声，随身佩奉诸司照证，荡涤罪愆，超仙境界。一切关隘处所，即便放行。如是刁蹬，时有玄天上帝，巡游三界，急差神兵押赴酆都问罪施行。须至引者。随身穿带上下衣服，计开：

太乙救苦天尊（大字刻印） 上身衣服壹拾肆件、裙柒条、寿纸壹拾贰封、包袱壹件、雨伞壹把。右给付信女宜人周氏（以上用笔填写）随身照证。

万历四十三年四月初四日给（二大押字。此行用笔填写）

祖师万法教主玄天仁威上帝金阙化身天尊（此行字形甚大）

在衣物文字与倒数第二行给引年月处各钤一朱印，印文未能看清。

以上六批材料，共计七件，六件实物，一件仅见于目录。在六件实物中，保存完好者四件。除一件出自四川而外，其余六件也都出在江西省境内。从时间上看，都在明代晚期嘉靖至万历年间，计嘉靖二件，隆庆一件，万历四件。最早的是嘉靖三十五年（1556），最晚的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四川地区仅见的一件时代最晚。

二、路引文字重点内容考释

明墓出土的冥途路引文字，过去学界虽有人引用文献就其中某些部分作过考释，但大多比较一般化，不仅许多重要内容完全没有涉及，作为一种道教文物考古材料研究所引用的文献如不以道书为主，难免隔膜，许多问题很难深入了解。本此精神，作择要考释。

“道主太上老君商武丁丑年二月十五日庆诞之辰” “道主太上老君”即道教教主老子李耳。“庆诞之辰”指老子生日。唐僖宗中和四年（884）乐朋龟作《西川青羊宫碑铭》：“太上金阙玄元天皇大帝……殷高宗御极之际，周文王演《易》之初，神光流入于琼胎，瑞形结成於金谷，不坼不副，诞迓于八十余龄，降瑞降祥，过期于二万余昼。”^{〔1〕}宋《太上老君金书内序》：“老君尚道之宗，体于自然，在乎三清之前，象帝之先，为玉皇帝……遂托于元君玉身琼府。元君在太清金阙昼寝，梦日精大如流星，飞入口中，嚙觉有娠，下界八十一年，殷武丁三年庚辰，二月十五日……元君从左腋降诞老君……生而白发，故号老子。降诞其时，神仙、虚皇上帝，朝礼空中，称十

〔1〕《道藏》十九册，680页。

号：一曰玉皇，二曰元圣，三曰元始天尊，四曰无上尊，五曰道君，六曰无名君，七曰高上虚皇君，八曰太上，九曰老君，十曰帝师。”^{〔1〕}南宋绍熙二年（1191）观复大师谢守灏《混元圣纪》卷一：商之阳甲“十七年庚申，老君自太清境分神化气，托孕于玄妙玉女”。武丁“九年庚辰二月建寅十五日，老君诞生。自阳甲十七年托孕，至此八十一年。”^{〔2〕}谢守灏编、李敏道校正《太上老君年谱要略》摘上书之文而注曰：“自殷朝第十八王阳甲庚申之岁，自太清仙境分光化气，乘日精，驾九龙，化为五色流珠，托胎于玄妙玉女天水尹氏。已而孕。历八十一年，当殷二十二王武丁庚辰岁二月十五日，降诞于亳之苦县濂乡曲仁里，即今太清宫也。殷以建丑为岁首，殷之二月十五日，即今之上元节也。”^{〔3〕}宋人贾善翔《犹龙传序》：“老氏姓李讳耳字伯阳，谥曰聃，当商十八王阳甲之十七年岁在庚申，其母昼寝，梦太阳化流珠入口，因吞而有娠，凡八十一年，极太阴九九之数，母氏因逍遥于李树之下，由左腋而生。既生，皓首而能言，指李曰：‘此吾姓也’。一云：父姓李名灵飞，母尹氏名益寿，即商二十二王武丁之九年，岁在庚辰，二月十五日卯时生于楚国苦县厉乡（一作赖）曲仁里涡水之阴。”^{〔4〕}又同书卷二“为帝师”章：“太上以商王阳甲十八年庚申之岁，驭九龙分身下降于楚亳之地苦县濂乡曲仁里，寄胎于玄妙玉女凡八十一年，以武丁九年庚辰岁二月十五日降生。因指李而为姓。既生，能行复能言，而又白首，故号老子。”^{〔5〕}自此而后，以商武丁庚辰年二月十五日为老君诞辰，遂成定说。唯庚辰或作庚申。明人朱权《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卷一“道教源流”章云：“老子名耳，一名聃，字伯阳父，真人李灵飞之子也……按商史，灵飞谓老子楚人也。当殷阳甲十七年庚申，始示诞生之迹，自太清道境乘太阳日精，化五色玄黄之珠，大如弹丸，玉女昼寝，流入口中，吞之有孕。怀八十一岁，至武丁九年庚辰，自玉女左腋而生。生皓首，号曰老子。生于李树之下，即行数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三界之内，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故唯道独尊。’指李树曰：‘此吾姓也’。遂名耳字伯阳。自武丁九年庚辰下生，厥后大阐其道。后世见其道之大，遂亦一以为‘太上老君’之称。君者帝圣之称，子者男子之通称，盖老子所阐之道，即老君之道也。……又以老

〔1〕《道藏》十七册，888～889页。

〔2〕《道藏》十七册，785页。

〔3〕《道藏》十七册，885页。

〔4〕《道藏》十八册，1页。

〔5〕《道藏》十八册，11页。

子为教主矣。所以后之宗其教者，亦称之为老君也。”〔1〕而同书卷七“朝修吉辰”章亦曰：“（二月）十五日真元节，三教宗师太上老君混元道德皇帝诞生。”〔2〕冥引老君生年干支作丁丑，与道书所载作庚辰或庚申者不同，值得注意。

“人生难得，中土难生，假使得生，正法难遇，多迷真道，多入邪宗，多恣淫杀，巧诈群情”。此说道书最早见于梁人陶弘景《真诰》卷六《甄命授二》云：

西城王君告曰：夫人离三恶道，得为人难也。既得为人，去女为男难也。既得为男，六情四体完具难也。六情既具，得生中国难也。既处中国，值有道父母、国君难也。既得值有道之君，生学道之家，有慈仁善心难也。善心既发，信道德长生者难也。既信道德长生，值太平壬辰之运为难也。可不勸哉。〔3〕

所谓“三恶道”者，即生为鸟、兽、虫、畜而不得为人也。唐末宋初人所编《北斗本命延生经》载：

老君告天师曰：人生难得，中土难生，假使得生，正法难遇，多迷真道，多入邪宗，多种罪根，多肆巧诈，多肆淫杀，多好群情，多纵贪嗔，多沉地狱，多失人身。如此等缘，众生不悟，不知正道，迷惑者多。〔4〕

元人徐道龄注曰：“按《四十二章经》：佛言人离恶道得为人难。既得为人，生中国难。既处中国，遇道者难。”又宋人贾善翔《太上出家传度仪》云：

谨按经云：人生难得，中土难生，假使得生，正法难遇，多迷真道，多入邪宗，多种罪根，多诸巧诈，多恣淫杀，多好群情，多爱贪嗔，多沉地狱，多失人身。如此等缘，众生不悟，不知正道，

〔1〕《道藏》三十六册，364页。

〔2〕《道藏》三十六册，426页。

〔3〕《道藏》二十册，523页。

〔4〕徐道龄：《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注》卷一，《道藏》十七册，8～9页。

迷惑者多。我今哀见此等众生，故垂教法，为说良缘。^{〔1〕}

路引文字与《延生经》并同，贾善翔所谓之“经云”，当指《北斗本命延生真经》。盖其书自宋以来，即流传极广也。然其说自《真诰》以来，即已受佛教轮迴转生之说影响。《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卷九十五，科仪立成品（青玄黄箓斋用），炼度醮仪，说偈曰：

我闻元始天尊昔在香林园内，与无极圣众演说玄一，了达希微，于九色微妙光明，照十方无极世界上下，洞彻琉璃。乃见九幽地狱受苦众生，倏忽之间，万生不死，报尽轮回，化形畜生。或得为人，身相不具，奴婢下贱，孤露贫寒，亿劫不休，实堪慈悯。时有法解真人，上白天尊言：如此罪魂，受苦无已，前生今世，何因何缘。天尊答曰：世末时讹，人民浇伪，为善者少，为恶者多，营造罪根，结诸恶业，自作自受，如响应声。终劫说之，亦难句尽。略举其要，名曰三途、五苦、八难。此等罪趣，出离最难，非我法门，无由超度。三途者，一曰地狱考对前非，二曰畜生偿酬往业，三曰饿鬼，苦对最深，渴饮火精，饥食灰炭。五苦者，一曰刀山，二曰剑树，三曰铜柱，四曰镬汤，五曰涟汲溟波。八难者，一曰得生人道难，二曰去女为男难，三曰形骸完全难，四曰得生中土难，五曰值有道君父难，六曰禀性慈善难，七曰值国太平难，八曰与三宝相遇难。如此诸苦，流浪不还，展（辗）转漂沉，与道长隔，耽淫五浊，执滞六情，外触内侵，殃缠祸染，一失人路，堕地狱中，长夜冥冥，无由解脱。过此境界，东极天中，有寻声救苦天尊，大慈仁者，发弘誓愿，普救众生。^{〔2〕}

徐道龄引《四十二章经》证说，是也。又陆道和《全真清规·朗然子家书》云：“夫人生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幸莫大焉。”^{〔3〕}是全真道亦信此说。

“酆都山” 酆都原在北方，本无固定的具体地点，《真诰》谓在“北方

〔1〕《道藏》三十二册，162页。

〔2〕《道藏》七册，451页。

〔3〕《道藏》三十二册，160页。

癸地”是也。南宋洪迈《夷坚志》癸集卷五“酆都观事”条记载说：“忠州酆都县五里外有酆都观，其山曰盘龙山，之址即道家所称北极地狱之所。”学界多引以证今重庆酆都县“这个自汉晋以来号为道教福地的酆都县（隋以前名平都县）便成了名闻遐迩的鬼都、阎罗天子的京师”^{〔1〕}。实际上，南宋时期南方地区的酆都山并非^{〔2〕}只有重庆的酆都县一处。周必大于乾道三年（1167）“九月乙丑朔”游历道教名山江苏茅山，作《游茅山录》云：历茅山积金峰楚王东涧之梅真观，“由小径历酆都山，山骨皆石。或云旧闻治狱声，因创太乙救苦天尊殿，有博州人王若宁守之”^{〔3〕}。《夷坚志》系洪迈（1123～1202）晚年所作，成书晚于周必大《游茅山记》。可以肯定，从北方搬到南方有确定地点的冥府酆都，最初应是在江苏茅山，把重庆酆都县与冥府酆都山联系在一起，当是更为晚出之说。看来在南宋中叶以后一段时间，曾经出现过冥府酆都忠州说与茅山说两说并存的情况，茅山说在早期阶段可能更为流行，后来才改变为专指忠州者而言。因为洪迈只说重庆的酆都县有酆都观，虽然也提到其“即道家所称北极地狱之所”，却特地注明“其山曰盘龙山”，并没有直接把当地叫作“酆都山”。而茅山者不仅迳名曰“酆都山”，并且还说“旧闻治狱声，因创太乙救苦天尊殿”。所谓“治狱”，当然是指治地狱，与冥府酆都山地狱之说最相吻合。至于这种转换的具体时间和有关情形，目前尚不清楚。又陕西南部之洋县亦有酆都山。明景泰二年（1451）《丰都山景图碑》一石，原竖于洋县丰都山崇道观，今存洋县文物博物馆，高178厘米，宽75厘米，分上下两段，上段高104厘米，刻绘丰都山与观景图，横额“北阴丰都名山仙境之图”。下段高70厘米，刻题《重修玉皇三官殿记》。《记》文记载：“夫洋川者，是古梁雍之地也……距邑之西北二十五里许，有山曰丰都，其形之耸拔蹲伏……诚亦奇异哉……昔人睹此之奇丽，于上建立琳宫，妥安圣众，诚一方之胜境，真仙家之福地也。建三清之殿居乎中，丰都之神与天王、四圣列于右，玉皇及天、地、水三官之神在乎左焉。去岁，道士李道岩者，乃本山之住持也，目睹其殿宇摧毁，神像剥落，慨然欲重修之。值乡之耆民李景先以董其工，道士李道安、白洞云募其缘。既而鸠工集匠，协力经营，甫一载而殿宇落成，方于旧式，侈而不靡，

〔1〕 江玉祥：《一张新出土的明代酆都冥途路引》，《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辑。

〔2〕 《古今图书集成》方輿彙编，山川典卷八十三，茅山部，艺文。

〔3〕 《古今图书集成》方輿彙编，山川典卷八十三，茅山部，艺文。

吻合乎古人之制矣……住持者恐泯其迹，遂命工绘其山与观之图，刊之于石”〔1〕。此石过去未见著录，是研究道教丰都山历史的重要材料。此丰都山之得名及道观之初建起于何时，已难考订，但根据碑文记载，景泰二年（1451）住持道士李道岩所见之洋县丰都山崇道观，已是“殿宇摧毁，神像剥落”。碑额称其山曰“北阴丰都名山”，文中完全没有提到重庆和江苏的“丰都山”材料，而所在道观供奉道像已有“丰都之神”，与早期丰都原在“北方癸地”之说相合。是洋县之有道家丰都山当远在景泰二年（1451）之前，其始早于重庆和江苏两地的材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无常难免”，“诸司牛头狱卒” 这里的“诸司”，指酆都地狱所属各阴司机构。无常与牛头狱卒，均属酆都鬼吏兵卒，无常与牛头，举以为酆都吏兵的代表。王契真《上清灵宝大法》卷六十四，章法斋奏门，《牒酆都司命司录诸君》文云：

灵宝大法司 当司……右牒上酆都司命、司录、司功、司杀君，四明真公，五岳掾吏，牛头狱吏……请照应火急，互相关照冥曹幽狱，应干去处，上承太上慧光，开奉泉扃，停酸息苦，咸禀赦恩，根刷所荐亡魂及幽囚苦爽，并与落灭罪根，拔出沉滞，交付泰山神吏，部领前来，祇承斋功，克期超度。〔2〕

牛头狱吏之说，亦见南宋中叶洪迈《夷坚丙志》卷十三《张鬼子》条云：有人名张鬼子，似鬼，人以之扮作冥司阴吏以恐洪州（今江西南昌）学正张某。夜间见张某，谓“奉阎王牒追君”，给伪诈冥司牒文读之。“鬼子露其巾，有两角横其首。张老惊号，即死。鬼子出，立于庭，曰：‘吾真牛头狱卒，昨奉命追此老，吾渡水失符，至今二十年，惧不敢归……今弄假似真矣。’”〔3〕明人冯梦龙《古今小说》卷三十一《游阴司司马貌断狱》，托言东汉灵帝时士人司马貌因故惹得玉皇大帝生气，下令阎罗王逮之权代其职，审理酆都冥案。“阎君得旨，便差无常小鬼，将重湘勾到地府。”〔4〕又同书卷三十二《游酆都胡母迪吟诗》，假说元代成都人胡母迪被阎罗王遣冥吏召引

〔1〕 陈显远编著：《汉中碑石》（《陕西金石文献汇集》之一种），144～145页。

〔2〕 《道藏》三十一册，322页。

〔3〕 （宋）洪迈《夷坚志》，478页。

〔4〕 （明）冯梦龙：《古今小说》，461页。

至酆都森罗殿，阎王上坐，左右执文簿神吏六人而外，“阶下侍立百余人，有牛头马面，长喙朱发，狰狞可畏。”^{〔1〕}明末周清源编《西湖二集》卷二十四《认回禄东岳帝种须》假说南宋周必大事云：“一日梦到东岳天齐帝之处，左右判官小鬼，牛头马面，列于两旁，鬼使拿的人披枷带锁者，不计其数，东岳帝君冕旒端坐上面拷鬼，号叫之声，所不忍闻……又见牛头鬼使勾到一人，却是周必大榜进士赵正卿。”“东岳天齐圣帝者，乃天帝之孙，群灵之祖……执掌四大部州……辖管三天宰属。天道、地道、人道、鬼道，莫不由其变通；胎生、卵生、湿生、化生，一切凭其鼓铸。”“果是‘千年铁树开花易，一入酆都出世难’。”^{〔2〕}“牛头狱卒”，乃东岳大帝所主酆都地属狱下之鬼吏兵卒。明人谢肇淛《五杂俎》卷四：“有死而后有生，故泰山之有蒿里山也，皆为受生而设也。余窃以为东方主生，西方主杀，各有司存，岂宜并用。酆都业在西方，则受死之籍，当归金天。”^{〔3〕}亦以为酆都应在西方而不在南方的重庆或其他什么地方，与泰山地之狱说相合。南宋以来，酆都无常、牛头狱卒之说在民间流行极为广泛，说者多以为与佛教地狱之说有关，这是不错的。但它们在有些明墓出土的冥途路引中出现，和引中前述“人生难得，中土难生”等文字一样，都是道教受佛教地狱轮回论影响后的结果。

刘宋时人刘义庆著《幽冥录》记载，晋代巴州巫师舒礼死而复生，云死后至阴司太山府君处，“见一物牛头人身，捉铁叉义礼著熬上宛转，身体焦烂，求死不死，一宿二日……牛头复以铁叉义礼著熬边。府君曰：‘命遣卿归……’礼乃还活”^{〔4〕}。是太山府君下属狱卒有牛头，其来甚早，至少在南北朝初年就已存在了。

“本命庚午年六月初十月申时建生，上属北斗星君主照”。“本命前乙巳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戌时建生，上属北斗武曲星君主照”。按道教之说，如王契真《上清灵宝大法》卷二十四所称，“本命者，乃本生造化之日，诸天所重。”^{〔5〕}本命一般是指一个人出生当年的年份干支。元人徐道龄集注、徐道玄校正《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注》卷二，经文：“凡夫在世……不知身属北斗，命由天府”，“上至帝王，下及庶人，尊卑虽则殊途，命分俱无差

〔1〕（明）冯梦龙：《古今小说》，480页。

〔2〕（明）周清源编：《西湖二集》，400—401页。

〔3〕（明）谢肇淛：《五杂俎》，128页。

〔4〕台北新兴书局《笔记小说大观》三十一编，七册，4036页。

〔5〕《道藏》三十册，870页。

别”^{〔1〕}。注谓：“经云：凡人之生，皆是天气。正北位居中，一气生水，万物皆由水而生，故北斗居中天而旋回四方，主一切人民生死祸福。北斗第一贪狼星为东斗，主算。第二巨门星为西斗，记名。第三辅第一，第四辅第二。第六武曲星正居本位，中斗大魁，总监众灵。凡一切万物生死，皆属北斗。”^{〔2〕}北斗，一般仅言七星，即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实为九星，以上七星之外，另有辅、弼二星，多未顾及。又诸星皆各另有异名，以阳明、阴精、真人、玄冥、丹元、北极、天冲、洞明、隐光为常见。人之身属北斗，各人按本命年干支之不同分属一星主管，子生人属贪狼，丑、亥生人属巨门，寅、戌生人属禄存，卯、酉生人属文曲，辰、申生人属廉贞，巳、未生人属武曲，午生人属破军，见该书卷三^{〔3〕}。又《北帝七元紫庭延生秘诀》文意并同^{〔4〕}。周隆贞本命乙巳年建生，故云“上属北斗武曲星君主照”。井研宜人周氏本命庚午年建生，应属北斗破军星君主照，文云“上属北斗星君主照”，统言之也。

“灵宝大法司” “法司”本为人间执掌司法刑狱的官府机构，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八“刑部”诸条言之甚详。道士将之移於本教，惩处鬼神及人违反教规事宜，亦假法司理董。云“灵宝大法司”，则出自灵宝道派可知。有关材料，宋明以来道书记载甚多。如王契真纂《上清灵宝大法》卷四十，斋法符篆门，告文式所载，凡诸告文之首，皆以“灵宝大法司”冠之^{〔5〕}。又同书卷四十四，斋法符篆门之《申天枢院进奏表》、《牒州县城隍》等诸行法所用状奏文移亦然^{〔6〕}。而同书卷二十七，印篆轨范门，论用法印云：“凡一切申奏、符檄、帖牒，则用‘灵宝大法司印’。”^{〔7〕}又“论用本法合用印篆”云：“师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出法以救其弊，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灵宝大法，古来止用‘三天门下南曹印’。近世……依本法用‘灵宝大法司印’。今既进品洞玄，佩中盟箓，行

〔1〕《道藏》十七册，19、18页。

〔2〕《道藏》十七册，20页。

〔3〕《道藏》十七册，20～22页。唯亥属字泐脱，北宋初傅洞真《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注》文全，在该书卷中，《道藏》十七册，75页，据以补之。

〔4〕《道藏》三十二册，550页。

〔5〕《道藏》三十一册，51页。

〔6〕《道藏》三十一册，262页。

〔7〕《道藏》三十册，904页。

灵宝法，则职位已重，除拜章外，上面奏牒，下面关申，牒帖行移，告文符箓，三界十方之曹局，九州四海之冥司，九地重阴，洞天仙治，幽显所隶，并用‘灵宝大法司印’铃印，实本职执法之信也。”而“灵宝大法司印说”一条，文载印之大小尺寸外，并附“真篆”之“灵宝大法司印”铃印^{〔1〕}。《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卷三百一十八，文檄发放品（传度用），奏给职印，职印名凡二十品，第一品即为“灵宝大法司印”^{〔2〕}。金允中编《上清灵宝大法》序称：“如箓进洞玄之品，法以灵宝为职。旧仪只称‘三天门下南曹’，又以‘灵宝大法司’为曹局，故以其印而发文移，是本局之信记也。”^{〔3〕}留用光传、蒋叔舆编《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卷四十四，符告门“茭龙驿吏关”文，文首曰：“灵宝大法司 当司令据乡贯某乙乞就某处崇建无上黄箓大斋（正荐亡某，普荐亡某），旁及六道四生苦魂罪魂，迁升福境。”^{〔4〕}出土冥途路引引首有“灵宝大法司”字样，而李英姑引“文内盖有相同的符印三方”，印文当系“灵宝大法司印”无疑。盖冥途路引为行於阴司超度墓主亡魂之文移，合《大法》所云法印用於“九州四海之冥司”“关申牒帖，行移告文”之义。

“转念太乙救苦天尊四万声” 太乙救苦天尊为道教多种救苦天尊之一，念其名而能救灾救难解冥司地狱之苦，唐末五代以来，道书文献记载甚多。除江玉祥文已引及之杜光庭《道教灵验记》而外，王契真纂《上清灵宝大法》卷十，三界所治门，“玄穹主宰”章载：

太一救苦天尊，乃始青一气元始分形，九圣九仙之师，掌度生气之元，曰“东极青宫长乐世界青玄上帝太乙元皇救苦天尊”是也。次政十方，亿劫应化，修证品位。尊人盖元始上帝之皇裔，玄气神化之分形也。治青玄左府。^{〔5〕}

同书卷六十一，申奏门，申天枢院进奏状：

灵宝大法司 本司昨据斋主某乞就某处崇建无上黄箓大斋，追

〔1〕《道藏》三十册，900～901页。

〔2〕《道藏》八册，797页。

〔3〕《道藏》三十一册，346页。

〔4〕《道藏》十六册，201页。

〔5〕《道藏》三十册，730页。

荐亡某等魂泊下元幽爽同遂生方事。本司已于某月某日预奏帝庭，取旨颁行……今发奏状函，重封印全，须至关申下项：昊天玉皇上帝陛下，紫微中宫北极大帝陛下，东极太乙救苦天尊御前……〔1〕

同书卷六十二，正奏门“申天枢院正奏状”，所奏道神亦有“东极太乙救苦天尊”，而抬头则写“灵宝大法司”〔2〕。《灵宝领教济度金书》记载太乙救苦天尊文字甚多，如卷九十五，科仪立成品，炼度醮仪，在行仪过程中，不仅所列上奏诸神有“太乙救苦天尊”之名，“超度颂”、“焚青玄建水池符”、“焚青玄建火池符”、“焚普度水官拔亡炼形符”、“焚溥度炎帝度亡炼形符”、“奉戒颂”、“引幡诣监察司命司”、“引魂诣领魂录功司”、“引幡诣通游移籍司”、“引幡诣仙魂司”、“引幡诣专度曲度普度司”后，皆需念“太乙救苦天尊”，“宣告亡灵皈依青玄救苦太乙天尊”〔3〕。又卷九十六至卷一百，此类文字极多，在此不复多引。唯卷九十六有专门之“请太乙”仪，于“焚降真召灵符”后，需念“太乙救苦天尊一百声”〔4〕。与冥引所示尤为接近。卷一百青玄救苦斋仪“请称法位”排列诸神次序为：太上无极大道虚无自然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东极青玄老君、太乙救苦天尊（其后尚有近三十位神省录），而“北阴玄天酆都大帝”尚远在其后。是太乙救苦天尊后来地位甚高，有时仅次于三清矣。“太乙”又写作“太一”。《正统道藏》收有《太一救苦天尊说拔度血湖宝忏》，文曰：“尔时救苦天尊坐九色莲台，威光遍满十方，诸大天尊、救苦尊人、一切仙众，说诸血湖……因縁。时有妙行尊人出班长跪，告天尊曰：‘臣今下观欲界酆都罗山诸狱异名，九幽之狱，次有二十四狱、三十六狱、阿鼻地狱……八万四千幽狱。凡遇赦恩，皆准仁慈，普沾大泽……’”“尔时天尊，为众生演说太上真符……是以太乙救苦天尊，放九色毫光，遍照诸狱，赦宥罪魂”〔5〕。又《青玄救苦宝忏》志心朝礼太乙救苦天尊凡九种，则又分别冠以“妙道真身”、“大圣大慈”等号者〔6〕。总的说来，太乙（一）救苦天尊虽然似乎并不专属某一大道派，但特为灵宝派所推尊，为主管酆都地狱诸冥司超度亡人的主要神祇，道书文献记载和冥

〔1〕《道藏》三十一册，272～273页。

〔2〕《道藏》三十一册，282页。

〔3〕《道藏》七册，447～454页。

〔4〕《道藏》七册，455～463页。

〔5〕《道藏》九册，892～893页。

〔6〕《道藏》九册，897～900页。

途路引所反映的情况是一致的。

“祖师三天扶教辅元体道大法天师张证盟” “张”是指正一道创始人张陵。据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撰、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删定之《汉天师世家》记载，张陵所加封号屡经变更。唐天宝七载赠“太师”，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师”，北宋熙宁加号“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大观二年称“汉天师正一真人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正一靖应真君”，元成宗时加号“三天扶教辅元大法师正一冲玄神化静应显祐真君”^{〔1〕}。王契真《上清灵宝大法》卷六十三，正申门，“申天师”状文，称“状申三天扶教辅元体道大法天师真君”，但“申都省划一状”则又称“三天大法天师正一静应真君”^{〔2〕}。张陵封号，在南宋初同一书中可有两种不同的叫法。而冥途路引之“祖师三天扶教辅元体道大法天师”，与王契真书之“三天扶教辅元体道大法天师真君”基本上是相同的，虽微有差异，较之他书诸称则更为接近，或许说明冥引受王契真书直接影响的可能性更大。又明初朱元璋曾明令革去张陵“天师”封号，后其令渐弛，嘉靖帝妄道，“天师”之号自然复行，于道陵历代封号中选取其一，教中人略加变通而用之，而无所谓统一之正规叫法，当为情理中事，非其时皇令所加之封号也。

“祖师万法教祖玄天上帝金阙化身天尊”、“祖师万法教祖玄天仁威上帝金阙化身天尊”、“玄天上帝巡游三界” “玄天上帝”和“玄天仁威上帝”，都是真武（玄武）神的称号。有关问题比较复杂，我们把它放到后面去作专门讨论，这里暂不多说。

“照依女青天律问罪” “女青”是一种道神的名称，“女青天律”乃道士假托太玄女青真人所传按天帝意旨编成针对人神妖鬼之奖惩律令条文。《太上太玄女青三元品诚拔罪妙经》云：“太玄女青曰：……太玄女青上元明真曹仙官……太玄女青上元监临曹仙官，右三十六曹仙官，则太玄女青真人所掌”。“太上虚皇道君女青曰：若大千世界之内，十方国土之中，一切善恶男子女人，生死罪福轻重，寿考年月日限之数，各各分别青黑二簿，列奏上宫。若复善功满足，应合仙者，言明紫微之宫。若复崇奉玄元大法者，言于太极左宫，书名金策，刻字仙曹，当敕地官侍卫，录简上宫，三界营护，所有一切罪魔，无复干扰。一如女青之律！”“太玄女青”除别称“太上虚皇道

〔1〕《道藏》三十四册，821～822页。

〔2〕《道藏》三十一册，288、291页。

君女青”之外，多省称“女青”^{〔1〕}。书称“玄元无上大法”、“正一法王”，当属正一派内容。《太真玉帝四极明科经》有“高圣太玄四极明科百二十条律”，每条律文之后，有“玄都上（下、左、右、中）宫女青律文，受者明慎奉行”之语^{〔2〕}。《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卷一百九十八，科仪立成品，土府醮仪，奏章文末皆称“一如太上玄都女青律令”^{〔3〕}。又卷三百一十三，文檄发放品，禁坛牒，告上清灵宝行司、正一天师，“速送雷霆，依玄都女青鬼律治罪，以明天宪”。亦有称“一如女青诏书抽魂律令”者^{〔4〕}。《正统道藏》收有《女青鬼律》六卷之书。该书卷一称：“（天皇）二年七月七日日中时，下此《鬼律》八卷，纪天下鬼神姓名，吉凶之术，以敕天师张道陵，使敕鬼神，不得妄转东西南北。”卷四云：“天师稽首，敢承先王之道，制民敕鬼，今当以正一盟威之气女青鬼律，役使天下邪魅妖祥。”卷五云：“天师曰：大道垂律，女青所传”^{〔5〕}。《道法会元》卷二百五十一、二百五十二有《太上混洞赤文女青诏书天律》录文，分正神、土地、灶神、门丞户尉、人死鬼、邪神、山神、井神、厕神、六畜神、精怪、山魃、木客、水司官、龙王、地司官、天曹案吏、堰堤神、苗稼神、树木神、碓砦神、守尸神、吊丧神、雷神、风部神、雨师、神吏、符使、生民、仙官、法官、五雷使院等二十九类鬼神，条载量罪惩处之律文^{〔6〕}。引文所称“押送酆都照依女青天律问罪”，系针对阻滞刁难信道持引之墓主使不得超度之冥司牛头卒狢而言，当属地司官一类。律云：“诸地司官妄以亡人无罪为有罪，无仇为有仇，无执对为执对，无冤枉为冤枉，无宿业为有宿业，及有善以为无。如此之类者，并各分形。故意拘留，希求财利，加一等。”^{〔7〕}与此大略相符。我国南方地区古代墓葬出土奉道者之冥司买地券，自东晋以来，券尾多有“急急如女青诏书律令”、“急急如太上女青诏书律令”、“急急如五帝主者（使者）诏书律令”之语，以警地府冥吏、邪神鬼魅，使无侵忤墓主茔域者。如1983年江西瑞昌出土南宋咸淳八年（1272）杨梦斗妻黄氏石券文云：“丘丞墓伯，谨肃界畔，道路将军，齐整阡陌。若辄干（忤）犯呵禁，将军亭长，收付河

〔1〕《道藏》一册，83～837页。

〔2〕《道藏》三册，417～439页。

〔3〕《道藏》八册，17～18页。

〔4〕《道藏》八册，743、746页。

〔5〕《道藏》十八册，239、246、249页。

〔6〕《道藏》三十册，537～555页。

〔7〕《道藏》三十册，543页。

伯……若违此约，地府主吏，自当其咎……急急如五帝主者女青律令！”〔1〕1988年江西鄱阳明墓出土景泰五年（1454）“奉道孝孙信官周源等”为亡祖周宽所立石券文云：“自葬之后，仰烦东岳城隍、本境里社土地，长（？）风水龙神，无得阻当穴道等因。如有此等，仰周宽、田氏妙真宜人，一同执此地契碑牌，经（径）赴三天门下陈告，依女青天律施行。须至出给者……先天太上敕旨。”〔2〕四川出土者，如20世纪50年代发掘成都北郊羊子山五代后蜀广政十九年（956）周公石券，文曰：“丘承（丞）墓伯，封步界畔，道路将军，整齐阡陌……呵禁之者，将军停（亭）长，收付河伯……若违此约，地府主吏，自当其祸……急急如五帝使者女青律令！”〔3〕1973年简阳县城西南宋墓出土端平三年（1236）邓荣仲砖券，文曰：“丘承（丞）墓伯，封步界畔，道路将军，整齐阡陌……故气邪精，不得干（忤）犯……急急一如太上女青盟文律令！”〔4〕成都南郊青羊宫附近明墓出土万历四十年道士曹冲寿石券，文曰：“故气邪精，不得奸悖（忤犯）……急急如太上五帝使者女青律令！”〔5〕此等材料不胜枚举，皆与冥途路引中文字相合。拟别撰《女青律令考》专文详论，兹不多赘。

至如引中“投词告给”；“关津把隘去所，即便放行”等语，皆道中人套用阳世实用牒移文书词汇而为之，为道书文字所常见。如王契真《上清灵宝大法》卷六十一，审奏门“奏昊天”、“奏北极”、“奏北斗”等，皆有“具位姓某，昨据斋某投词，乞就处崇建无上黄箓大斋，追荐某亡等魂”之语，且“抬头”多作“灵宝大法司”〔6〕。又同书卷六十四，斋法章奏门，“牒州县城隍”文云：“灵宝大法司牒上某州县城隍主者：当司……牒候到请详事理，移文管内神祠去处……知委其本坛受度亡魂。中间或系部封，咸准赦恩释放，仍关报水陆关津，次第护送前来……”〔7〕凡此皆可反映冥途路引文字与道书文献记载之关系。此类文字，其义易明，无庸多论。又酆都二引，正文叙述末尾“押赴酆都问罪施行”句后有“须至引者”之语，初觉语意模糊，不易确解。其后对照二灵宝引之“须至出给关引为照者”文字，方知其

〔1〕陈柏泉：《江西出土墓志选编》，577页。

〔2〕陈柏泉：《江西出土墓志选编》，586～587页。

〔3〕自藏原石拓片。

〔4〕方建国：《简阳县发现南宋纪年墓》，《四川文物》1987年3期。

〔5〕自藏原石拓片。

〔6〕《道藏》三十一册，267页前后。

〔7〕《道藏》三十一册，304～305页。

为后者之省书，乃谓前此诸文所言内容必须传达给持引者。也就是说应当让持引者本人了解冥引的用途意义，以便按规定范围使用。此系结束整个冥引正文的总括之词，盖冥引系模仿阳世实用路引之制而为之也。现存嘉靖三十六年（1557）朱鉴等三人出公差使用的路引实物，有文云：“工部主事沈为公务事除外，今差各役前往北直等处公干，经天津即便放行，无得在途迁延取究者。须至批者。”^{〔1〕}此中之“须至批者”相当于前述引文之意，“批者”即已批之引文持有人。

三、“玄天上帝”及有关诸问题

前面提到引中“祖师万法教主玄天上帝金阙化身天尊”和“祖师万法教主玄天仁威上帝金阙化身天尊”之文，在不同引文中的称谓大同中亦有小异，问题比较复杂，需于此作专门讨论。

玄天上帝简称“玄帝”，原为古代传统民间代表方位诸神中的北方之玄武神，后来被道教吸收成为道神之一，传至北宋，因避讳改称“真武”。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道教史》第六编，神仙谱系，有《真武大帝》专目对道教玄武神的发展变化历史进行考述。说：自赵宋以来，玄武神备受尊崇，宋代称“真君”，前有“翊圣保德”、“佑圣真武灵应”、“佑圣助顺真武更应”等号。“元代皇帝将真武之‘真君’号升格为‘帝’，《续文献通考》卷七十九，《群祀三》云：‘元大德七年十二月，加封真武为“元圣仁威元天上帝”。’”^{〔2〕}此中之“元天上帝”，实应为“玄天上帝”。盖清人避康熙帝玄烨讳，凡遇玄字皆改写作元。引者所据当系清代刻本（包括影印本），故其文如此，读者需当注意，以免在玄天上帝之外又弄出一个“元天上帝”来。实际上，道教本身将玄武神称为“帝”、“玄帝”，也并非始于元代大德七年（1303）。《万历续道藏》收有《玄天上帝百字圣号》一书，书首文载玄天上帝全称作“混元六天传法教主修真悟道济度群迷普度众生消除灾障八十二化三教祖师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三元都总管九天游奕使左天罡北极右垣大将军镇天助顺真武灵应福德衍庆仁慈正烈协运真君治世福神玉虚师相玄天上帝金阙化身荡魔天尊”^{〔3〕}，不仅有了“玄天上帝”之称，同时也有了“传法教主”、

〔1〕 杨其民：《两张新发现的明代文件——牙帖和路引》，《文物》1994年4期。

〔2〕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第三卷，33页。

〔3〕 《道藏》三十六册，337页。

“三教祖师”和“金阙化身荡魔天尊”名号。“玄天上帝感应灵籤”与“祈籤祝文”为全书之主要内容。百字圣号之后有“仁宗皇帝御赞”，此“仁宗”即北宋朝之仁宗。序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之林下洞阳道人刘道明集《武当福地总真集》三卷，不仅以“玄帝”称玄武神，序文还说：“玄帝事实，有自来矣。玄帝圣踪，备具仙传。”卷下《宋封圣号》，一称“北极镇天真武佑圣助顺灵应福德仁济正烈协运辅化真君”，凡二十四字。^{〔1〕}又引《玄帝传记》云：“昔宋嘉祐二年天中节，三界万真上朝元始上帝，会三宝宸尊。昊天上帝出万天素威功过玉历，敕侍中司马大神……：唯太玄元帅镇天玄武大将军三元都总管九天游奕使左天罡北极右垣三界大都督神仙鬼神公事判玄都右胜（圣）府事领元和迁校府事紫皇天一天君（玄帝名）……可特授‘玉虚师相玄天上帝领九天采访使’。”^{〔2〕}又在《宋封玄帝圣号》之前另有《天封玄帝圣号》专目引《仙传》云：“圣号‘元帅镇天玄武大将军三元都总管九天游奕使左天罡北极右垣三界大都督神仙鬼神公事判玄都右圣府事紫皇天一天君玉虚师相玄天上帝’。”^{〔3〕}《太上说玄天大圣真武本传神咒妙经》载紫微大帝言：“玄元圣祖八十一一次显为老君”。又有“仰启玄天大圣者，北方壬癸至灵神，金阙真尊应化身”之语。^{〔4〕}又《玄天上帝报父母恩重经》云：“志心皈命……玄天上帝金阙化身天尊，昔太清大帝八十二次化身，托圣父静乐国王、圣母妙祥天主降生为太子，才七岁即为亲去国，潜身入太和山中修道，历四十二年，功成轻举，位镇北方，为玄天上帝。”^{〔5〕}元末明初人撰《玄天上帝启圣录》卷一，首目即为《金阙化身》。又《玉京効功》条称：元始上帝於真化四年正月十五日降诏，玄武大将军“上尊号特拜玉虚师相玄天上帝领九天采访使”^{〔6〕}。“万法教主”、“祖师”本为道教推崇至圣老子太上老君的称号，上引诸书既云玄帝为太上老君第八十二次变化之身，故玄帝亦得此二称。是明墓出土冥途路引文末所署“祖师万法教主玄天上帝……金阙化身天尊”，皆系玄帝一神称号，而非“祖师万法教主”为太上老君，“玄天上帝”为玄武神也。唯诸书所载玄帝附加诸称号不尽相同，又始封“帝”号的时间和来历也各说不一。“天封玄帝”一语泄漏天机，最初玄武神升格为

〔1〕《道藏》十九册，665页。

〔2〕《道藏》十九册，661～662页。

〔3〕《道藏》十九册，658页。

〔4〕《道藏》十八册，38页。

〔5〕《道藏》十一册，473页。

〔6〕《道藏》十九册，571、576～577页。

帝，当系道教中人自发为之，假“天封”以神其说，实际上是来历不明后来逐渐被人们普遍接受，其时当在北宋，具体年份虽不可确指，至迟不会晚于仁宗嘉祐二年（1057），这点大概可以肯定，玄武神不可能晚到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才开始升格为帝。

四、冥途路引的类型和文字异同

冥途路引，过去学界多以“其内容雷同”一笔带过。但经仔细观察比较发现，实际上不同个体之间虽然内容大体相同，却也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有的差别甚大，可以分出不同的类型，牵涉到道教发展史上一些重要问题。

纵观文字保存比较完整的四件冥途路引实物，按引首标题“灵宝大法司”和“酆都山冥途路引”之不同，可分为“灵宝引”与“酆都引”两个类型。两种类型的冥引，不仅具体名称不同，从字数的多少到文字内容、年代范围，都有明显的差别。在同一类型之中，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较小，其中除个别内容之外，一般不涉及实质性问题，影响不大。以下先就江西境内所出两类不同的冥引文字列表揭出其异点。灵宝引以嘉靖四十年（1561）夏浚引为例，酆都引以隆庆二年（1568）周隆贞引为例。

灵宝引	酆都引
总字数：425	总字数：340
“灵宝大法司”（隶书）	“酆都山冥途路引”（楷书）
“居奉道”	“居住奉道”
“天师门下谨据”	
“发心投词告给路引照证事。恭遇太上老君庆诞大会，诸天仙众、天师真君同赴庆筵，证盟普照。因见阳间男子女人，生居人世，造业（孽）无边，不修善果，亿劫漂沉。”	“上属北斗武曲星君主照，以投词告给路引事。伏闻道祖太上老君，商武丁辛丑年二月十五日庆诞之辰，凡诸天仙众，同赴降筵。普照阳间，男子女人，生居尘世，天寿不齐，善果不修，沉沦多坠”。
“多迷真道，多入邪宗”。	“多迷真性，误入邪宗”。
“富贵长短，寿夭等类，作福者少，造恶者多。一日无常拘系阴司，冤家债主，俱在目前，搜诸冤对，拷入阴司，受诸苦恼，无有出期。”	“以致贫富贵贱等类，福少罪多，无常难免”。
“吾体太上好生之德，广发慈悲，仗施道力”。	“今体太上好生之德，广发道力”。
“发心请给，填写乡贯年月，随即前去，转念太乙救苦天尊四万声”。	“发心请给路引，唵念太乙救苦天尊四万声”。

灵宝引	酆都引
“于路救拔，亦作盘缠，限满天年，随身赍带关引，前到阴司。如遇关津把隘去处，即便放行，不许拦截。但有牛头、狱卒刁蹬留难，阻滞信人，冥途不见超生，吾合奏上天帝，急差神兵，前到阴司拿捉，押送酆都，照依女青天律问罪不想。须至出给关引为照者。”	“随身佩奉诸司照证，荡涤罪愆，超仙境界。一切关隘处所，即便放行。如是刁蹬，时有玄天上帝巡游三界，急差神兵，押赴酆都问罪施行。须至引者。”
“右冥途路引，给付△△收执，准此为照。”	“右给付△△随身照证”
“△△日给”	“△△日（押）”
“祖师三天扶教辅元体道大法天师张证盟”	“祖师万法教主玄天上帝金阙化身天尊”
倒数第四行大字“太乙救苦天尊”六字上方有太乙救苦天尊像	在“太乙救苦天尊”六大字行上端别无天尊之像

以上所列，为灵宝引与酆都引文字之主要差别。此外，四川井研宜人周氏酆都引第十行末“须至引者”以下刻印之“随身穿带上下衣服计开”十字，及后面用笔填写的“上身衣服壹拾肆件、裙柒条、寿纸壹拾贰封、包袱壹件、雨伞壹把”等二十五字，不仅为今见江西二灵宝引所未有，亦为江西清江周隆贞酆都引所无，不知是否属于灵宝引与酆都引异点之一，有待今后更多出土材料的证明。

至于同一类型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属灵宝引者，如夏浚引“天师門下谨据”，李英姑引作“天师門下今为”；“△△词称”，英姑引作“△△称”；“发心投词告给”，英姑引作“投词告给”；“右冥途路引给付”，英姑引作“冥途路引给付”；“祖师三天扶教辅元体道大法天师”，英姑引未书“祖师”二字。属酆都引者，如周隆贞引之“北斗武曲星君”，宜人周氏引作“北斗星君”；“入冥府”，周氏引作“入兹冥府”；“玄天上帝”，周氏引作“玄天仁威上帝”。凡此皆一二字之多少有无，属文词繁简之别，无伤文义，除了证明印版非出一时一地而外，如“玄天上帝”与“玄天仁威上帝”之差异，说明某些道神在明代似无法定之称号，于文献有征即可。至于周氏引有关随身穿带衣物用品名数文字之不见于他引，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当于后论之，暂不多赘。

从总的情况看，灵宝引文字除少数内容外皆较酆都引为详，据统计，一为425，一为340字，两者相差80余字，颇能说明问题。以具体文字而言，引首一称“灵宝大法司”，“天师门下”，一称“酆都山冥途路引”而无“天师”文字。引尾证盟者署衔，一为“三天扶教辅元体道大法天师张”，一作“祖师万法教主玄天上帝金阙化身天尊”或“祖师万法教主玄天仁威上帝金阙化身天尊”，这种差别是两种不同类型冥引最大不同之处，具有极为重要

的关键性意义。几个不同称号的含义，上文已作详考。引文说明，灵宝引按东汉以来的传统，奉张陵为教主，而又与灵宝派有关。而酆都引以玄天上帝为“万法教主”及“祖师”，通篇引文不见天师张陵材料。两类不同的冥引，如果不是出自两个不同的教派，也应反映一种重大的历史变化。现在不妨姑且把酆都引看作是“玄帝派”所传，而灵宝引出自与灵宝派关系更为密切的另一道派之物来加以考虑。从年代方面考察，灵宝二引出于嘉靖三十五年（1556）与嘉靖四十年（1561），酆都二引出自隆庆二年（1568）与万历四十三年（1615）。由此可知，明代的冥途路引是从世宗嘉靖年间开始出现的，最初在“灵宝派”中流行，到了穆宗以后，发行权则由“灵宝派”转入了玄帝派之手，由灵宝引改行酆都引。从地域上看，目前出土冥途路引的除了江西之外仅在四川发现一件。从这一件四川的材料看，时代最晚，系酆都引而非灵宝引，与江西境内两类冥引发展的时代序列完全吻合。明代四川的冥途路引传入的年代是否从万历年间开始？今后四川是否还会有更早的冥途路引发现？已知这件蜀地出土的酆都引是本地印制还是由江西输入？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证明的问题。

冥途路引乃死者灵魂在冥世使用之通行证，是知会冥司酆都牛头、狱卒诸神吏兵，凡遇关津渡口盘查过往鬼魂时，见引放行，赦其罪恶，不得刁难阻挡。否则，即由在天上、人间、冥世三界巡视的玄天上帝派遣神兵，将主事者捉拿押赴酆都冥司问罪。元人所撰《新编连相搜神广记·玄天上帝》引《元洞玉历记》云：殷代末年，元始天尊命玉皇大帝传诏，“以周武王伐纣，平治社稷。阴则以玄天上帝收魔，间分人鬼……玄帝……统御六丁六甲，下降凡世，与六天魔王战于洞阴之野……锁鬼于酆都大洞。人民治安，宇宙清肃。”〔1〕是真武（玄武）玄天上帝专主阴司酆都鬼事，故冥引以之为主神也。王契真纂《上清灵宝大法》卷八十三，正申门，有《申酆都》状文云：“谨具状申北阴酆都玄天大帝圣前，伏望圣慈特赐圣旨，下酆都内外洞宫，四方诸天大地狱，五岳九地大冥曹，诸囚系去处照应，咸使太上慈光，掣彼昏衢，拔过亡过某等，照神吏各去姓名，不以孽报拘囚，尽行根刷。及万劫罪魂滞爽，并与释放，交付太山神吏，同神虎官将管领。”〔2〕是玄天上帝主管酆都鬼神事宜，又称“北阴酆都玄天大帝”者。同书卷六十四，斋法章奏

〔1〕《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外二种）》，33～35页，《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玄天上帝》所载并同。

〔2〕《道藏》三十一册，301页。

门，有《牒冥官幽路主者》云：

灵宝大法司 牒上冥关幽路主者：当司今据同都城隍牒，至甲牒真司外，须至专牒者。牒候到，请关报冥关诸路水陆桥梁津渡，应干去处，咸遵敕旨，乘太上慧光，烛破幽暗，拔度所荐亡魂及五道幽魂苦爽，急速开通冥路，逐界传递，发放前来赴坛，承功超化。凡沿路经由所至，不请(?)稽留，恐妨斋事。牒至，准玄科律令奉行。谨牒。^{〔1〕}

文中所及之《都城隍牒》见本卷首牒。此外，尚有《牒十方道》、《牒五道大神》、《牒泰山沿路土地》等牒，内容大体相同，均以“灵宝大法司”起首，似示牒文由该司发放。《牒五道大神》牒尾称：“或有猖獗强梁，邪道阻遏，仰摄付近狱，依律治罪。牒至，准令火急奉行。”云云，尤与冥引文字相类。唯路引与牒告毕竟用处不同，牒告用於斋坛，冥引用于随身携带照验，故文亦有异者。

五、冥途路引与明代通行路引制之关系及其他相关问题

前面已经讲到，冥途路引是模仿明代实际通行的路引制度加以宗教化的产物，这是过去学术界大家也都公认的看法。除了已有的论述之外，这里我们还可以作一些补充证说。明代通行的路引是由户部统一制版，有普通引和盐引、茶引之类的商引之分，部分内容由持引人根据用途性质和个人姓名、所携带货物品种数量临时用毛笔填写。明人编辑《昭代王章》卷四，便用新式，具呈类，“给引照”云：“给引便照事，身带资本，前往某处经商，旅途往还，不无关津盘诘，告给文引，以便照验，庶奸细不致混淆，客路不遭留难。”^{〔2〕}明人朱国禎《湧幢小品》卷十二，“神断”条载：“陈琰字公信，江都人，贡生。尝按云南，每出入则凝视院东民家烟楼。人莫知其故。一日，召其家长，闭诸后堂，复遣人诣其家文书匣检阅，有江西贩客路引。乃呼家长出，讯曰：‘汝于灶所谋害江西客人某，因取其货，汝罪当死。’即伏

〔1〕《道藏》三十一册，306页。

〔2〕（明）佚名：《昭代王章》。

罪。”^{〔1〕}此应属商引性质的材料。路引因系印制，故又称“印票”。《明穆宗隆庆实录》卷三十二载，隆庆二年（1568）五月丁未“户部奏：‘南京盐引铜版，岁久文不可辨，引目增多，印给失时，乞加数铸造。’报可。”《明神宗万历实录》卷一百六十四载：万历十三年（1565）八月一日，“改铸南京户部铜版，盐引者十有三，茶引者三，新旧并藏于库。”《明怀宗崇祯实录》卷四载：崇祯四年（1631）四月己未，叛民首领神一魁降于杨鹤，“其协从多绥德、清涧、米脂饥民，各给印票回籍。”盐茶商引为铜版，普通民引版用何材料制作，未见具体记载，大概也是铜版。冥途路引用版印制，与通行路引相同，但毕竟系宗教用品，一般不会使用铜版而为木版，已为明墓出土实物所证明。四川井研万历周氏冥引刻印“随身穿带上下衣服，计开”，并用毛笔填写死者随葬之衣裙、雨伞、包袱、纸钱等物名数，为他引所无，当系道徒无知者混淆商引与普通路引制式内容有关。

明代的路引制明初就存在，何以冥途路引要晚到嘉靖年间才开始出现呢？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认为，这种情况的形成，主要与明代的道界自身的腐化、封建政府加重对民众的剥削和官吏的贪污腐败发展历史两方面的原因有关。

从明代道教发展的历史看，虽然封建统治者一直都把道教作为巩固政权的工具加以利用，但最初并未受到太大的重视，朱元璋曾下令革去张陵及其子孙“天师”尊号，是有意削弱道教的地位和影响。这种情况，后来才逐渐有了改变。嘉靖皇帝独尊道教，在他当政期间，道教的地位空前提高，进入了明代道教登峰造极的时期。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释道，“僧道异恩”条载：

成化十七年，传升道策司右至灵邓常恩为太常卿。盖自永乐间升右善世姚广孝为太子少师，及全真邱常卿为太常卿，后来未有异典。然姚系佐命元勋，邱曾为监察御史，常恩不过以房中术得之……盖宪宗于释道二教，俱极崇信如此。后孝宗登极，夺常恩官，正其罪。领“占竺”者，亦降号称“国师”……至十五年，又召之来，命居大慈恩寺。盖此时置道教不谈，而佛氏为中宫及大珰所信向，孝宗亦不能自异矣。至正德间，上亲习西番梵呗，与西番演唱於禁中，至自称“大庆法王”，给印赐下院……直至嘉靖中叶，上

〔1〕（明）朱国祯：《湧幢小品》，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笔记小说大观》十三册。

居西内，躬行斋醮，邵、陶辈宠冠古今，有非王仔昔、徐知常所敢望。又用羽流言，焚弃佛牙头骨几尽，而佛氏之不振极矣。^{〔1〕}

同书《补遗》卷四，释道，“道家两府”条称：嘉靖时道士封号之隆，“至陶仲文于‘真人’之外，加至‘少师’，兼‘少傅少保’，并拜三孤，带‘礼部尚书’，封‘恭诚伯’。则文武极品矣”。仲文子“比执政受京堂荫”，次子世昌为国子生。“封父母并妻，给诰命……而其妻封诰，乃得一品夫人，不称‘元君’。”凡此种种，都超过了过去以妄道著称的宋代道君皇帝赵佶时之林灵素^{〔2〕}。又同书正编卷二十七，释道，“道士直入内庭”条载：“道士龚中佩者……因人真人陶仲文名下，得交撰青词诸人。其人愚憨好酒，乃羽人之下劣者。然幼熟道书，尽知诸神名号，入直诸老，时从考问诸神位业。遂为婚娶，荐为太常博士，驯至太常少卿。上命入内庭教习诸宫人科仪。”又“乐工道士之横”条称：“伶官之盛莫过正德，道流之盛莫过嘉靖……嘉靖间，道士徐可诚亦至礼部尚书。”^{〔3〕}故谷应泰作《明史纪事本末》，辟《世宗崇道教》专章以叙其事。嘉靖十五年（1536），“以皇嗣生，录致真人邵元吉功，加授礼部尚书，给一品服俸，赐白金、文绮、宝冠、法服、貂裘。授其徒邵启为等禄秩有差”。十八年（1539），元吉死，“帝驻驂裕州，闻之恻，手诏行在礼部赠谥，命中官锦衣护其丧。丧还，敕有司营葬，恤典如伯爵例”。元吉死后，陶仲文继之，事多如前述沈德符所记者。至嘉靖时，对江西龙虎山张陵后嗣，更是倍加恩宠。初年，张彦頔入朝，“加封‘正一嗣教真人’，赐金冠玉带、蟒衣、银币”。后其道宫为火所焚，上命“为作治”。十七年（1538），“命建金箓大斋于皇坛……赏赉天师张彦頔有加。”彦頔卒，“诏如列侯例，赐恤典。‘天师永绪’，上所命名也。”朱元璋所废除的张陵后嗣“天师”名号，至此才算是正式得到了恢复，张陵在道教中的地位再度显赫起来。从三十一年（1553）开始，又“诏修太和山玄帝宫”。三十五年（1556），“上睿皇帝道号‘三天金阙无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献皇后‘三天金阙无上玉堂总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孝烈皇后号‘九天金阙玉堂辅圣天后掌仙妙化元君’。上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加号‘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恩

〔1〕（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684页。

〔2〕（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914页。

〔3〕（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700页。

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玄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再号‘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至昭灵统三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正如四十四年（1565）海瑞上言所说，嘉靖之世，“谬谓长生可得，一意修玄，二十余年，不视朝政”。直到四十五年（1566）临死之前，始下诏悔称：“只缘多病，过求长生，遂致奸人诳惑”。穆宗即位，始逮道流方士陶世恩等处以极刑^{〔1〕}。嘉靖皇帝妄道，大力扶持道教，明代道教在经过长期曲折起伏的过程之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为道教创造了广泛的自由活动的有利条件。应该说，这就是冥途路引在嘉靖年间开始出现的主要社会背景和政治原因。从经济因素考虑，明代与严格户籍管理制度相联系的通行证路引虽然是由户部制版，但具体审批发放权却是操在地方官吏手中，持引人申办路引，是要交纳相当数目“手续费”的。《明宪宗成化实录》卷二百五十九载：成化二十年（1484）十一月己未，“守备仪真指挥宣事宋纲奏：今西北二方，兵事方殷，内帑告乏，而四方郡县，尚有赃罚金银、路引钱钞诸物，宜括以充调度”。《明孝宗弘治实录》卷二百载：弘治十六年（1503）五月乙未，“巡抚江西都御史林俊奏：宁王累乞用琉璃瓦盖造宫殿。有旨，于各府县路引钱内支二万两给换”。又同书卷一百三载：弘治八年（1495）八月辛未，“工科给事中童瑞以灾异呈六事：……各处流寓人民，窝妻生子，买田买产，终身不回。盖由奸狡之辈，虽在异乡，而文引一年一换，有司贪取引钱，一概妄给……乞谕所司，今后不得听人代给文引”。各地贪官污吏藉路引以敛财，发放路引成了一种弄钱的手段。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曾记其游历道教名山武当山所见情形云：登天柱峰顶至太和宫，有“金殿峙其上，中奉玄帝及四将，炉案俱具，悉以金为之。督以一千户、一提点，需索香金，不啻御夺。”^{〔2〕}道士贪财弄巧，利用各种名义以行聚敛，仿阳世路引而创为冥途路引骗取道教信众引钱，自是情理中事。我们认为，嘉靖年间冥途路引的产生，应当与此有关。

引尾证盟者署名，嘉靖年间者为“祖师三天扶教辅元体道大法天师张”或“三天扶教辅元体道大法天师张”，即祖庭设在江西贵溪龙虎山的天师道创始人张道陵。而隆庆年间以后二引，则为“祖师万法教主玄天上帝金阙化身天尊”或“祖师万法教主玄天仁威上帝金阙化身天尊”，即真武神。不以张陵而以真武神为道教教主，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情况。不知是否如前所

〔1〕（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783～791页。

〔2〕《徐霞客游记》卷一下。

说，明代道教曾经在灵宝派之外另有一个“玄帝派”存在。如果不是，这种变化至少说明了在此期间张陵在道教中的地位有明显的下降，教主的身份也遭到了否定，而真武神的地位则大大提高，取代张陵而成了教主。这很可能和嘉靖妄道，天师道给明代统治造成了负面影响，隆庆帝有意贬低以张陵后裔为首的天师道一事有关。明王世贞于万历三年（1575）畅游武当山^{〔1〕}，所见所知，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不胜感慨之至。后来写了好几篇文章，收在《弇州四部稿》中。除了《玄岳太和山赋并序》（卷一）之外，《自均州由玉虚宿紫霞宫记》云：“规均州城而半之，则皆真武宫也……延袤不下帝者居矣。真武者，玄武神也。自文皇帝尊宠之，而道家神其说，以为修道于武当之山，而宫其观。山之胜既以甲天下，而神亦遂赫奕，为世所慕趣。”“山初不以岳名，按酈道元《水经注》云：武当山一曰太和，一曰参上，又曰仙室。《荊州图副》曰：晋……曰谢罗山。而文皇帝特赐名曰太岳。至世宗复尊称曰玄岳，以冠五岳。谓武当者，非真武不得当也。”《由紫霄登太和绝顶记》云：山之天柱峰顶玉虚宫有金殿，“殿以铜为之，而塗以黄金。中为真武像者一，为列将像者四，凡几座供御，皆金饰也。”《自南崖历五龙出玉虚记》云：“王子曰：……夫物显晦，则有时哉。彼夫禅主络绎者七十二，柴望之礼，称岳镇者各五，而兹山固泯泯也。一旦遇真主惟疑似之迹，而膺特拜，遂超五岳而帝之。宫殿大者拟建章，小者凌祈年、望仙，道流非耕蚕而衣食者以万计。奔走四海之士女，争先而恐失，号泣鼓舞，望之若慕，即之若素。”^{〔2〕}又另详为考论云：“今天下所最崇重者，太岳太和山真武及岱岳碧霞元君。当永乐中建真武庙于太和，几竭天子之府库，放大珙及藩司守之。而二庙岁入香资亦以万计。每至春时，中国焚香者倾城顷邑。真武号百字，有‘混元六天传法教主修真悟道济度群迷普为众生消除灾障八十二化三界祖师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三元都总管九天游奕使左天罡北极右垣大将军镇天助顺真武灵应福德衍庆仁慈正烈协运真君治世福神玉虚师相玄天上帝金阙化身荡魔天尊’。叙其得道之由，以为在此山。然大略掇拾佛氏修行之迹而已。真武盖北方玄武之神，以避宋宣祖讳，故名真武。龟蛇亦取北方像耳，而加之以‘大将军’号。”^{〔3〕}洪武年间以后，明成祖起于北方，以燕王身份挥兵

〔1〕 据《弇州四部稿》卷一《玄岳太和山赋并序》称，文作于“旃蒙大渊獻春三月”，即乙亥年之三月。查王世贞生于嘉靖五年，卒于万历十八年，其间仅万历三年干支为乙亥。

〔2〕 （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七十三。

〔3〕 （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七十四。

南下金陵，夺得帝位。玄武乃镇北方之神，遂以为得其祐助所致，遂竭力抬高其地位，封武当山为玄岳，位列五岳之上，派内廷重臣经理，耗巨资大修武当宫观，铜殿金像，旷绝古今。永乐帝大修武当山玄帝宫观事，弘治年间所修《大岳太和山志》有详细的具体记载。当时奉命经办其事的官员，除湖广都司部政司都指挥、参政、知府、府州同知、通判等各级地方官员之外，尚有驸马都尉、礼部尚书、工部郎中及其他京官。“永乐十年，太宗文皇帝作玄天上帝有阴翊皇度福国裕民之功，特敕大臣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昕等，率领官员军夫人将二十余万，敕建宫观三十三处。”〔1〕据永乐二十一年（1423）钦差礼部左侍郎胡莹等奏，建成之太和山三十三处大小宫观，凡“殿堂房宇一千八百余间”〔2〕。“永乐十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玄天玉虚宫提点任自垣于奉天门奏：龙虎山、茅山、阁皂山，洪武年间都有印信管领，今武当山天下第一名山，提点有了，未有印。奉圣旨：礼部铸了印，着人送去。钦此。”〔3〕由于玄武神地位的陡然上升，武当山开始成了凌驾于龙虎山、茅山和阁皂山之上的道教第一大名山。以天柱峰玉虚宫一处为例，“永乐十年奉敕冶铜为殿，重檐叠拱，翬飞瓦立，饰以黄金，范玄帝金像，左右灵官，玉女捧剑，执旗天将，供案香炉花瓶，亦以金饬之。殿外台以青石为之，下层紫石为之。上层栏干阶级，并以紫石为之。又以青石为城，四面石为楼……其胜概如此，则亘古未之有也。”〔4〕“永乐十年，特敕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昕、礼部尚书金纯、工部侍郎郭进等，率领官员军夫人匠二十余万，创建玄帝大殿，山门廊庑，东西圣旨碑亭，神厨神库，方丈斋堂，厨房仓库，道众寮室，浴堂井亭，云堂钵堂，圆堂客堂。山门外，左右真官二祠，东岳庙，祭祀坛。宫之左，圣师殿，祖师殿，仙楼，仙衣殿，仙衣库，西道院。宫之右，涧东有东道院，计五百三十四间。其宫外，复设东天门、西天门、北天门，俱有道院。（太上尊像、五祖仙像，俱于仙楼供奉，全真杨道中焚修）赐额为‘玄天玉虚宫’。钦选道士一百二十人，焚修香火。钦除道录司玄义、任自垣，龙虎山上清法师邵庆芳，高道周惟中，湖广荆州府江陵县玄妙观法师张道览为提点，龙虎山法师林子良为副官，赐六品印，统

〔1〕（明）《（弘治）大岳太和山志》，《藏外道书》三十二册，892页。

〔2〕（明）《（弘治）大岳太和山志》，《藏外道书》三十二册，832页。

〔3〕（明）《（弘治）大岳太和山志》，《藏外道书》三十二册，830页。

〔4〕（明）《（弘治）大岳太和山志》卷四《括神区篇》，《藏外道书》三十二册，894页。

领宫事。”^{〔1〕}如果再加上其余三十多处，其规模之宏伟壮观，在道教发展历史上说它是亘古未有，实在不算过分。嘉靖帝虽亦重之，不过因其名已重而已。而隆庆帝则意在利用这一特殊材料，把它变成了贬低龙虎山张陵嫡系势力的工具，性质有所不同。我们看到在这段时期的冥途路引特别突出真武神作为“上帝”和“万法教主”的身份，以此署名完全取代了过去张陵的位置，显然正是这样一种历史变化情况的反映。不过，根据《民俗》杂志第七十八期刊登的一张近代印造的冥途路引图版资料看，冥引文字和明墓出土之灵宝引几乎完全一样，引首仍著“灵宝大法司 天师门下谨按元始天尊科典”字样，引尾署名“三天扶教辅玄体道静应显祐高明大法天师张真君”，并特地在引框顶端横栏大字刻印“福地龙虎山冥途路引”九字之引名，标出印发道观所在地。此材料似可证明，明墓出土之灵宝引属江西龙虎山张陵系统教派所印造，在隆庆年间，这种情况虽然曾经一度发生变化，到万历年间以后，随着张陵在道教中地位的恢复，冥途路引的主要印造地点又转归了龙虎山和属龙虎山教派系统的其他道观。此外，明代的路引制度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而冥途路引却只在南方地区出土，迄今尚无北方地区的材料发现，除了作为一种地方性的民俗因素之外，和道教本身不同教派在不同地区流行的情况不同也不无关系。看来，明代的天师道（正一派）主要流行于南方长江流域一带，过去原属于灵宝派的内容已融入本派之中。在北方黄河流域地区，大概是以全真道和其他非龙虎山系统的教派活动为主，天师道的影响不是太大。但以上所论，都只是有待进一步证明的一些推测。

《道法会元》卷二百五十《太上天坛玉格（下）》：“凡诸奏状，当用真字。关引文移之类，亦合真书。奏不真，即不达；俗书，鬼神即不受。”^{〔2〕}冥途路引属正一符箓派遗存，而整个引面无符箓，正是因为它是一种关引文移性质的材料所致，这也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又江玉祥文中提到近代由佛寺印制的“西方路引”，并附有四川大邑县收集的实物照片图版一幅。文中对此种带“西方公据”字样的佛教用品和道教冥途路引之间的关系，未作具体论说。我们认为，这种东西应该是受道教的影响，模仿道教冥途路引蜕变而成者，它开始出现的时间远较道教冥途路引为晚，本身就是很好的说明。江文所附四川大邑“西方路引”，引文简短，

〔1〕（明）《（弘治）大岳太和山志》卷六《采真遊篇》，《藏外道书》三十二册，933～934页。

〔2〕《道藏》三十册，532页。

远逊于道教冥引。白彬从其老家四川南部之江安县夕家山民俗博物馆得见“西方路引”一件，不仅顶端横栏内大字刻印“西方路引”四字，每字分别用圆圈圈住，与大邑所出之作“西方公据”者不同，以下正文直行左行，内容亦较大邑所出者更为繁多。从整个材料看，本件与道教冥途路引更为接近，尤能体现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今附录其文于后，以为研究佛、道关系史者之参考。

西方路引（横栏大字标题自名）

大觉利生 行坛 为出给途引事。尝闻西方有佛，号曰弥陀，昔在国中，发弘誓愿，若有东土众生亡没之后，一称其名，千劫离苦，万罪消灭。有斯利益，故乃称扬，面礼弥陀，亲蒙受记。今据大中国四川省下南道佛具诚请给途引，信元命生于（以下空两行备填）。窃念冥邦迥远，夜境深沉，若无文凭，何由前往。于是请给佛教文引一角，呈请法王台上，熏香传给。俟至天年限满，亲坟（执？）文引，经过地府诸司，城隍幽局，悉开赦宥，注牒生方，冥途不致刁难阻截。不许强魂野鬼，强夺钱文付（衣？）物等件。如遇关津路口把隘去处，钦遵佛教，验宝放行。须至路引者。

右给付信生身佩受。计开。

太岁 年 月 日，传秉如来门下传度法师 给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四十八愿度无量接引导师阿弥陀佛，金光接引。

拾捌 墓葬出土道教代人的 “木人”和“石真”

在我国北方和南方地区东晋十六国北朝至唐宋时期的墓葬中，曾先后发现有用特殊的木人和石、陶质“墓主人像”随葬的习俗。见于器物文字者，以质地之不同，有“木人”、“桐人”、“松人”、“柏人”、“石人”、“石真”等几种不同的名称。几种材料也都有文字或器物出土，有的文字墨书在“人俑”身上，有的文字不著于人体而另自书、刻在陶瓶或木、砖、石板之类的其他相关器物上，有的器物与文字并存，有的则仅见实物而无文字或仅见文字而无实物材料保存下来。后面两种情况，大抵与墓葬年久，水浸土蚀，盗扰或葬家后来有意毁坏，器物腐朽散失有关。过去由于对说明文字内容不能正确理解，不识文字与器物之间的关系，对器物本身的性质意义不明了，发表材料时多未作句读或释文，或至判断错误。几种材料的形制内容看起来虽然往往存在着种种差异，时代和南北地域的分布情况也有不同，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却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表现出明显的渊源关系。它们都是道教解墓注、绝呼讼代人用品在不同时代和地域的蜕变，从时代、地域分布和形制的发展演变，可以反映出古人从事道教活动的一些具体情况，是我们研究古代道教发展历史极其宝贵的实物史料。

第一章 材料的类型和器文校读

以下，先将有关材料按木人与石人（石真）两大类加以鉴别叙录，校读文字，略加考释，然后综合进行分析考察。

第一节 木人类

此类材料开始出现的时代较早，南方和北方地区也都有发现。但总的说来，北方地区与南方地区相比，不仅种类不尽相同，时代也要早得多。

一、北方地区

北方地区墓葬出土的特殊木人材料，从东晋十六国开始，主要分布在甘肃的武威、敦煌一带。在中原地区，则仅有少数北魏年间的材料发现。

1. 敦煌新店台出土前凉建兴九年（321）朱书陶瓶文。甘肃省考古研究所何双全提供 1987 年发掘敦煌新店台 M156 出土前凉建兴九年（321）朱书陶瓶文曰：

建兴九年三月庚寅朔，廿五日甲申，直除，大女张雪光今_因死。重复之日，生者软（_谋？）议负担，谨以桐人、铅人，广肩大背，可以自代。天注以解，不得相注_件。如律令！

乃谓女子张雪光在建兴九年（321）三月二十五日直除那天死去，家中生人害怕张雪光死后在幽冥世界受到谪罚，蒙受担沙负石之类的劳役之苦，不能忍耐，变作注鬼，又在以后某年的三月二十五日甲申直除这个相同的日子回到家中找寻替代，注害生人，让人重复死去。因此经过商议，在坟墓的过

程中，特地放入分别用桐木和铅制成宽肩大背的人形作为张雪光和家中生人的替身，铅人代张雪光应承劳役谪罚，使她不要变成注鬼重复注害家中生人。万一张雪光不幸变成了注鬼，则用桐人代替生人承当注殃。这样，一切天灾注殃，都可以避免了。这是迄今发现纪年明确年代最早的墓葬出土宗教性质代人系统的木人材料，文字简短，叙述清晰。除了上述陶文之外，当年应另有代人的铅人和桐木人随葬。仅将说明文字写在另外的解注陶器上，没有写在木人身上或专门的券版上，是其特点。

2.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甘肃武威磨咀子出土前凉张骏建兴二十八年即东晋成帝咸康六年（340）松人解注木牍一枚，近日霍巍教授从香港中文大学带回该校文物馆编著的《三十年入藏文物选粹》，得见该器大型彩色图版（图版拾捌：1）^{〔1〕}，图文并茂，字数甚多，内容特殊，极富研究价值。饶宗颐先生等曾撰文考说，有不少可商之处。我们将于后专章详论，在此仅列其目，暂不作具体校录。

3. 1972年发掘甘肃嘉峪关市 M8 西晋壁画墓出土残存上半身的“木俑”6枚（图版拾捌：2）^{〔2〕}，也应该是道教代人所用之木人。

4. 20世纪80年代发掘河南偃师县杏园村 YDM4031 号北魏墓，出土朱书近百字的北魏正始五年（508）陶“镇墓瓶”，据发表的残文摹本材料辨识，除“正始五年六月廿日未时”纪年文字外，尚有“今□生□魂入墓”。“□代敢告天之神”；“□重为鬼”；“魂今送移（？）木人命还魂”；“以解咎（祸？）”；“付木人”；“如律令”等，清晰可见（图版叁：4、5）^{〔3〕}。“□重为鬼”当释“囗重为鬼”，意即复重之注鬼。“魂今送移（？）木人命还魂”，当读为“……魂。今送移（？）木人，命还魂……”，意思是说以木人为生人之替代随葬墓中，使生人灵魂还归本体，以免家中生人受注而遭疾病祸殃。这里的“木人”，也就相当于甘肃晋墓出土的“桐人”、“柏人”和“松人”，只是没有标出具体的木材品种罢了。其情况与上述敦煌新店台前凉建兴九年（321）朱书张雪光陶瓶文相类。

此外，在新疆地区十六国北凉和相当于北朝和唐代早期的高昌时期墓葬中，也出土了一部分道教代人材料，在王育成《中国古代人形方术及其对日

〔1〕 林业强主编：《（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三十年入藏文物选粹》，141页。

〔2〕 甘肃省文物队等：《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图版九，2。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县杏园村的四座北魏墓》，《考古》，1991年9期。



图版拾捌：1



图版拾捌：2

本的影响》^{〔1〕} 和本书第一卷已有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以上四批材料出自西北黄河流域，有的情况我们在本书上卷《中原和西北地区魏晋南北朝墓葬出土解注器文研究》中已经谈到了，这里我们再度把它们列录出来，是从不同时代不同地域范围内同类性质材料作综合考察的角度出发考虑，这是需要说明的。

二、南方地区

根据目前所知，南方长江流域墓葬出土代人材料，属于东汉魏晋时期的铅人继续流行。东汉时期者，有四川资阳崖墓双人连体铅人。西晋者，20世纪50年代中发掘成都北门外羊子山土台 M23 西晋前、中、后三室券顶砖墓，在后室（棺室）出土薄片形铅人一件，仅存头部，刻出五官胡须，顶戴小帽，长3厘米，宽2.5厘米，厚0.2厘米（图版拾捌：3）^{〔2〕}。1988年发掘湖北老河口市西晋泰始九年（273）砖墓，出土铜俑5件，“形制相同。M1：36，用厚0.12厘米铜片鑿成人体形，面部阴刻出眉、眼、鼻、嘴，高3.87厘米”^{〔3〕}。其质地虽为铜质，形制与常见墓葬解注代人铅人别无二致，当属同样性质无疑。1965年发掘江苏南京北郊人台山 M2 东晋咸康七年（341）王兴之夫妇单室合葬砖墓，出土薄片形直立铅人一件，头著发髻，面部刻出五官，双腿分开，两手向下，保存较完整，长12.3厘米，宽4.4厘米，厚0.1厘米（图版拾捌：4）^{〔4〕}（图版拾捌：5）^{〔5〕}。20世纪50年代发掘广东广州郊区马棚岗3号南朝砖墓，也有残铅人出土^{〔6〕}，形制和件数简报虽未加说明，无疑也应属同样性质的材料。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质地的代人器物发现。到了唐宋阶段，代人材料的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一些地区木

〔1〕 王育成：《中国古代人形方术及其对日本的影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7年1期。

〔2〕 沈仲常：《成都扬子山的晋代砖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7期，100页，图十。

〔3〕 老河口市博物馆：《湖北老河口市李楼西晋纪年墓》，《考古》1998年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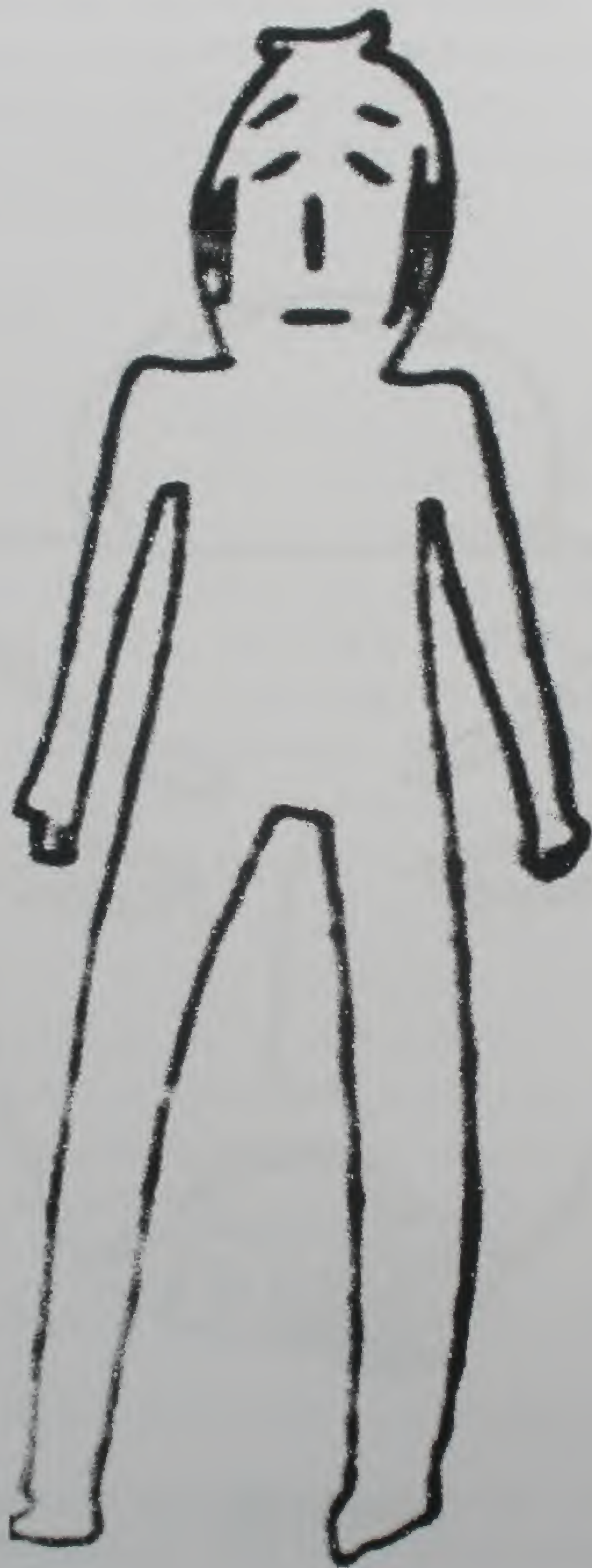
〔4〕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人台山东晋兴之夫妇墓发掘报告》，《文物》1965年6期，29页，图九，1。

〔5〕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人台山东晋兴之夫妇墓发掘报告》，《文物》1965年6期，29页，图版壹，10。

〔6〕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六朝砖室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3期。



图版拾捌：3



图版拾捌：4



图版拾捌：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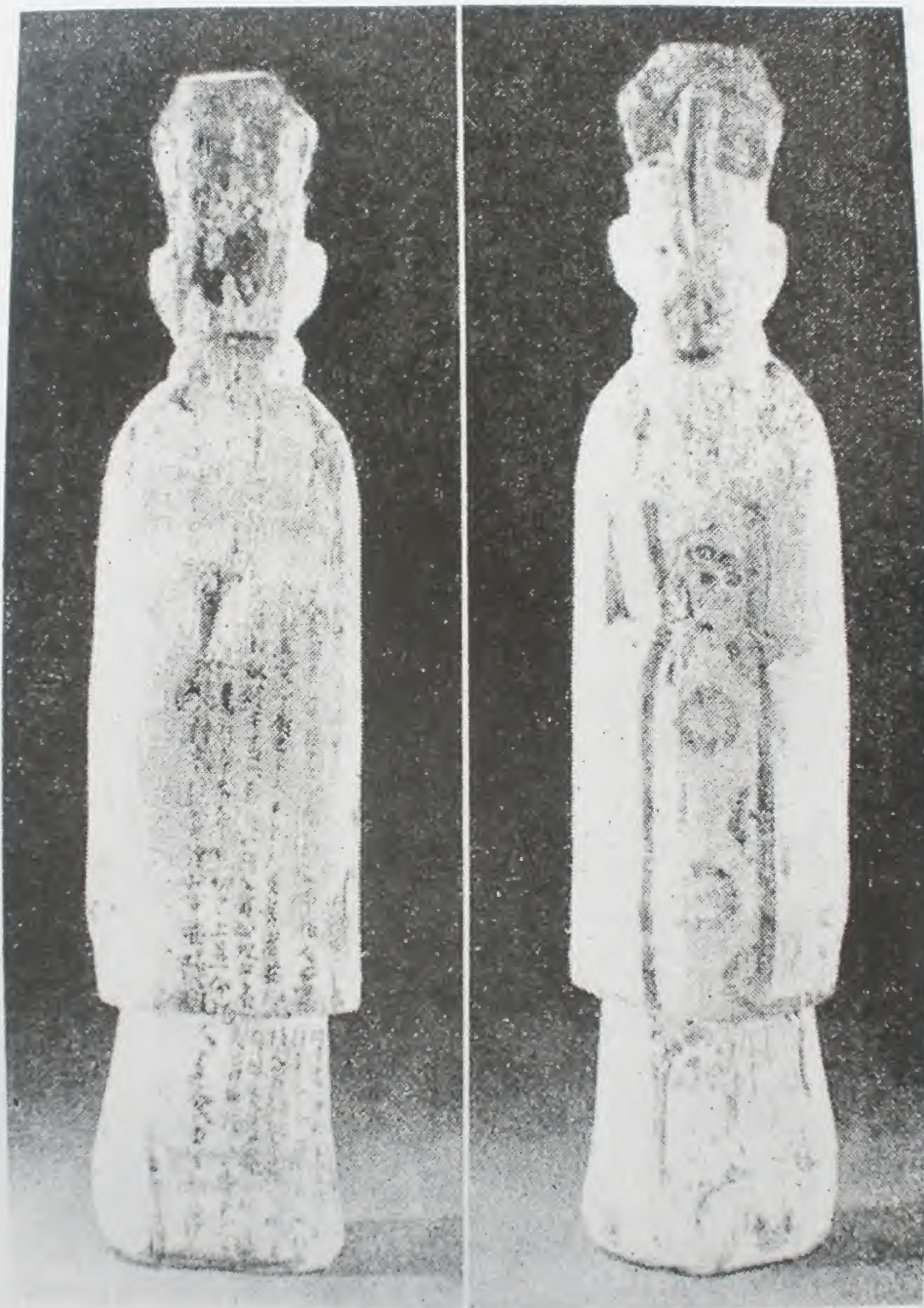
人流行，而在另外一些地区则流行所谓的“石真”。下面就这一时期的两类材料分别加以介绍，然后再进行综合考察。

1. 1973年发掘江西南昌北郊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墓，与木买地券和竹制的金鸡、玉犬、蒿里老人之类的神怪俑同时出土的一件柏木人，高35厘米，头着黑帽，身穿长袍，双手拱于胸前，眉目衣纹皆用黑线勾画而成，背面墨书（图版拾捌：6）。器文如下：

唯大唐岁次庚戌，九月甲申朔，十三日丙申。洪州南昌敬德坊
歿故亡人熊氏十七娘，□五十四岁。今用铜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
贯，已买得此地。坪（地）中有神呼主（生）人长男、长女、中
男、中女，并仰柏人当知（之）。地中有神呼主（生）人大□、小
□行年、本命、六田（甲），并仰柏人当知（之）。地中有神呼主
（生）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者，
并仰柏人当知（之）。[地中有神呼]奴婢、牛马六畜，并仰柏人当
知（之）。地中有神呼长孙、中孙、小孙、曾孙、悬（玄）孙本命
□□久亲……行年者，一切已（以）上，并柏人当知（之）。吃天
苍（仓）□□□□八根十二……木盟当坟等，并随柏人觅食。急急
如律令！^{〔1〕}

发表材料时未附文字摹本材料，器物照片图版字迹模糊，此据简报释文校读。如“柏人当知”的“知”应为“之”字的同音误写，“六田”应释为“六甲”，以及“[地中有神呼]”、“并仰”等，均系参考前后文义和它器文字改订。原释：“坪中有神呼主人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并仰柏人当知（之）。地中有神呼主人大□、小□行年、本命、六田（甲），并仰柏人当知（之）。地中有神呼主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者，并仰柏人当知（之）。”文中三处“有神呼主人”，参考下述北宋元祐五年（1090）柏人文例：“恐呼生人，明敕柏人一枚，宜绝地中呼讼。若呼男女，柏人当。”斟酌前后文义，皆当系“有神呼生人”之误释。原释“坪中有神呼”，联系后文两处“地中有神呼”文例，疑“坪”当系“地”字笔画模糊造成的误释。又器文所书“当知”一词，若径释其义为应当知晓，知而不代为承当，则义无所取。江西吉安王氏夫人柏人文作“知当”，江西彭

〔1〕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唐墓》，《考古》1977年6期，图版拾壹，2。



图版拾捌：6

泽元祐五年（1090）易氏八娘柏人文作“当”，“当”为“知当”之省写，其义为柏人知晓后代为承当，故“当知”应为“当之”的同音误字或“知当”之书时误倒，今姑订为“当之”，盖必先知而后始能代为承当，“知”字实为赘文，故以释“当之”为宜。

2. 1987年3月，江西吉安县敖城乡洋圻村非正式发掘挖开一座北宋开宝七年（974）石室柏棺墓，棺外头端置石买地券和镇墓券各一块。镇墓券作圆首碑形，首部阴刻细线花纹图案（图版拾捌：7）。刻文曰：

准开元敕，赐与亡人王氏夫人百（柏）人一躯，于墓中斩杀凶神恶鬼。条律如后：

地中有呼神亡人长男、中男、小男名字。仰百（柏）人知当。地中有呼神亡人长女、中女、小女名字，仰百（柏）人知当。地中有神呼亡人长新妇、中新妇、小新妇，仰百（柏）人知当。地中有神呼长孙、中孙、小孙及女孙等，仰百（柏）人知当。地中有神呼孙新妇及妇妹兄弟，仰百（柏）人知当。地中有神呼亡人良奴婢，仰百（柏）人知当。葬送亡人之后，墓中合出高官职禄，仰百人遍取，送与阳道子孙受之。墓中合出田塘万顷，牛马千万头匹，仰百（柏）人招取；墓中合出聪明儿孙，金银匹帛丝蚕，仰百（柏）人招取，送与阳道子孙受之。水、火、盗贼欲至，仰百（柏）人斩之。急急如律令！奉太上老君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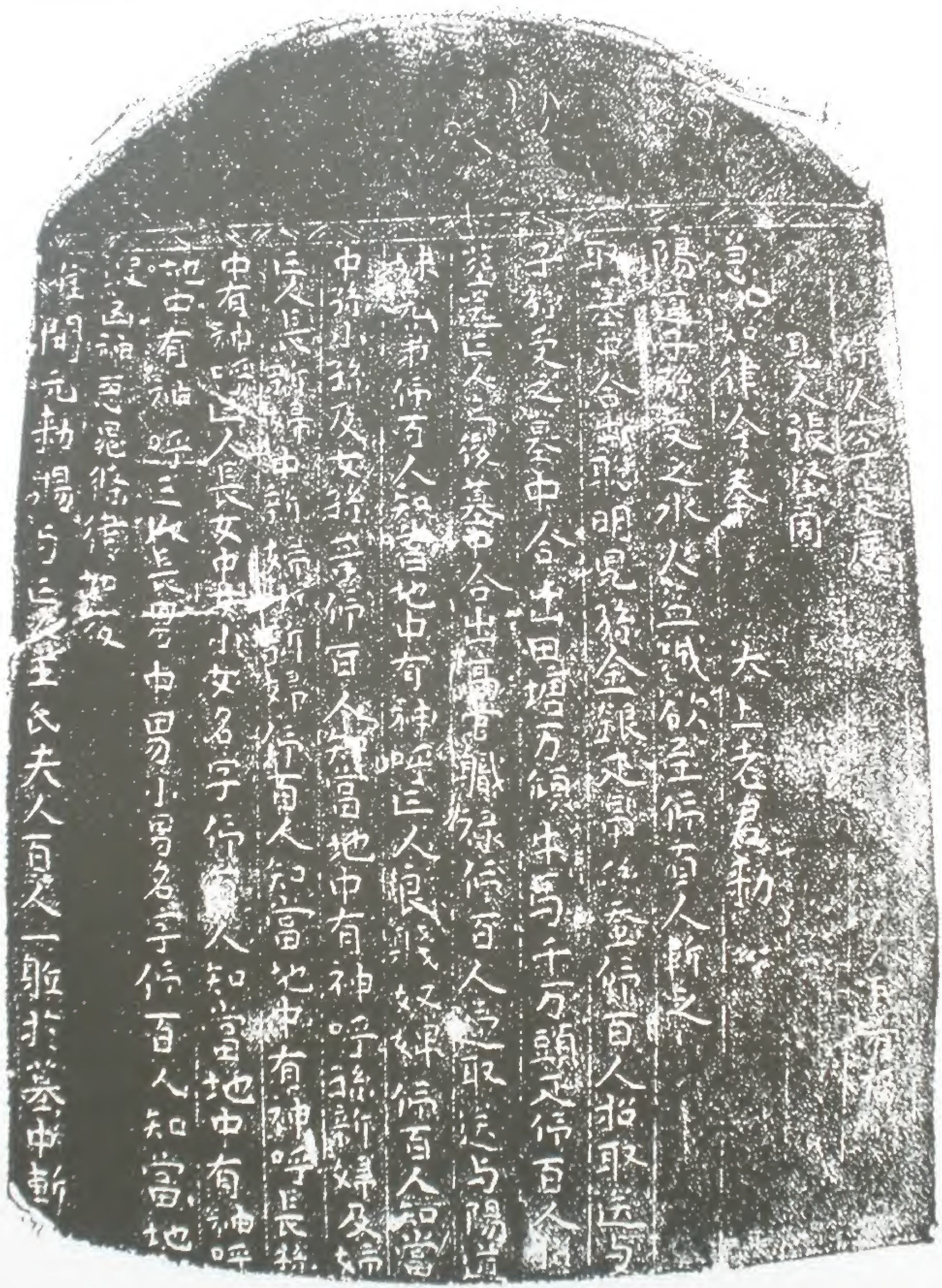
见人张坚固

保人李定度

人民有福。^{〔1〕}

简报发表材料仅附拓片图版，未作释文，今据图版作如上释读。券文中之“百人”乃“柏人”之误写。当年墓主尸体入墓，应另有木雕柏人实物随葬，本券系柏人之附件，与一般的墓券和买地券有所不同。大概由于文字太长，墨书柏人身体难容，故另刻石以附，或当时科仪本有此制亦未可知。因墓葬未经正规发掘，柏人或未被人注意而遗失，或早已腐朽无存，仅此附件可见。根据同墓出土买地券文记载，墓主王氏夫人，乃“江西道袁州庐陵县宣

〔1〕王吉永：《吉安发现一座北宋纪年墓》，《考古》1989年10期，923页，图二。



图版拾捌： 7

化乡崇仁里梅演村”人，“行年八十三岁”，死于北宋开宝七年（974）十月二十八日。此券虽有北宋开宝七年（974）纪年，刻石年代又晚于上述南昌唐大顺元年（890）熊氏墓材料，但券文称“准开元敕”，并有“长女、中女、小女名字”之语，与同墓伴出买地券之作双螭首状的时代特征相合，仍带有明显的唐制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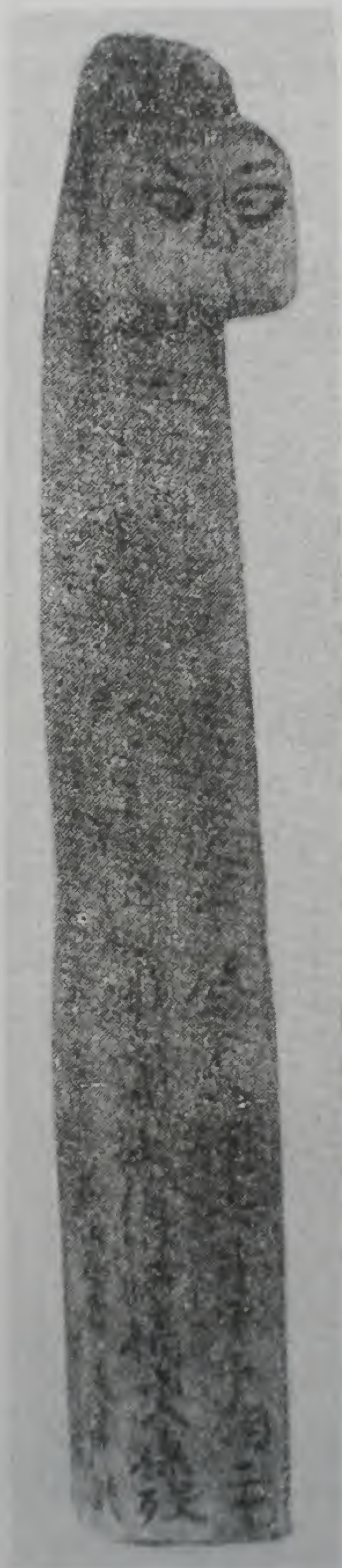
3. 1972年发掘江西彭泽县湖西公社湖西大队一北宋石槨木棺墓，在棺内发现元祐五年（1090）柏木人一件，高35厘米，上端刻削作头，墨线画出五官，身体呈八棱形，环写墨书（图版拾捌：8）。器文如下：

唯元祐五年，岁次庚午，癸未朔（此三字属衍文），六月甲午朔，二十二日，江州彭泽县五柳乡西域社傅师桥东保没故亡人易氏八娘。移去蒿里父老：天帝使者元皇正法，使人迁葬。恐呼生人，明敕柏人一枚，宜绝地中呼讼。若呼男女，柏人当。若呼□师名字，柏人当。若呼家人，柏人当。若呼兄弟，柏人当。若呼戚门论述，柏人当。若呼温黄疾病，柏人当。若呼田蚕二邨（业）、六畜牛羊，柏[人当]。若呼一木二木，柏人当。若呼不止，柏人当。急急如律令！〔1〕

发表器文材料时未附摹本，器物图版文字不全，仅见两行，且上部不清晰。所录释文未作句读，标点为引者所加。又“元祐五年，岁次庚午，六月甲午朔”，原释文脱漏“六”字，观图版材料甚明。查年表元祐五年属庚午，六月朔日属甲午，皆与器文干支相合。说者释读为“唯元祐五年（1090），岁次庚午，癸未朔月，甲午朔二十二日”〔2〕。古无以天干加地支相配纪月之习，若强以元祐五年（1090）朔月（正月）朔日或二十一日干支为甲午，当月朔日干支应为丁卯，二十二日干支应为戊子，皆不能与“甲午”干支相符，显然是错误的。“癸未朔”三字当为误书之衍文。“邨”字当为“业”之别误，亦为我们引录时所订。唯“若呼田蚕二邨（业）、六畜牛羊，柏[人当]”，句中“[人当]”两字原器文脱写，简报编者释文按文义增补，可从。

〔1〕 彭适凡等：《江西发现几座北宋纪年墓》，《文物》1980年5期，33页，图一九。

〔2〕 （美）耶鲁大学韩森：《宋代的买地券》，邓广铭、漆侠主编：《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



图版拾捌：8

本器文中的“天帝使者元皇正法”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材料，当于后文论之。券文称呼讼男女生人为“若呼男女”，而不再使用过去属于唐制范围的“长女、中男、中女”，这是时代较晚的显著标志。

4. 1989年江西瑞昌市白杨镇白杨村第八组村民偶然挖开一座宋代竖穴土坑墓，出土青石地券一件，高35、宽29.2、厚0.8厘米，上部委角。刻文极潦草，错误甚多（图版拾捌：9）^{〔1〕}。简报发表释文，除券额“乙酉日葬埋”和“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小男小女”而外，正文未作句读，抄录如下：

惟南善岁大宋国江州瑞昌县甘露乡白杨理田南保七人翟三郎五十九岁属大唐皇帝东皇公西皇母买前件地五亩东止甲乙南止丙丁西止庚申北止壬癸中止玄武所是前件用钱九万九千贯一时交与当处土地领纳讫此立天地之后日月之时葬埋以后杯柏（陌）人登（证）明无人争夺今将分付七十二贤张子高张坚固李定度合林君等〔仙〕今日分付了不于亡人之事证他东方朔天地见三灵七耀不得共相呼（掠）夺东不犯魅魍西不犯恼（凶）神南不犯阳北不犯阴得功曹传送遥路不得连类（累）主人之事明堂上对□神殡埋亡人不犯众神阳官无横祸阴官两无灾祸出入行来善神庆贺皇帝问谁人书水中鱼谁人读深山了入深山鲤鱼书了皇（黄）泉地〔安〕诏书玄都急急如律令

编者认为文中“南善岁”应为“南瞻部州”，“中止玄武”应为“中止戊巳”之误书，大体可信。其余释文，因不解文义，颇有舛误。今试作校读如下：

惟南善岁（南瞻部州）大宋国江州瑞昌县甘露乡白杨理（里）田南保亡人翟三郎，五十九岁，属大唐皇帝、东皇（王）公、西皇（王）母买前件地五亩，东止甲乙，南止丙丁，西止庚申，北止壬癸，中止玄武（戊巳）。所是前件，用钱九万九千贯，一时交与当处土地，领纳讫。此立天地之后，日月之时，葬埋以后，柏人登明，无人（令）争夺。今将分付七十二贤张子高、张坚固、李定度、合（？）林君等；仰今日分付了，不干亡人之事。证他（？）东

〔1〕 周春香、何国良：《江西瑞昌白杨镇宋墓》，《南方文物》1993年4期，18页。



图版拾捌：9

方朔、天地见(?)三灵七耀，鹰鸟不得共相呼夺。东不犯魁魁(罡)，西不犯恼(凶)神，南不犯阳，北不犯阴，得功曹、传送遥(?)路，不得连类(累)主(生)人之事。明堂上封安神，殡埋亡人，不犯众神，阳官无横祸，阴官两无灾祸。出入行来，善神庆贺。皇(黄)帝问：谁人书？水中鱼。谁人读？深山[鹿]。[鹿读]了，入深山。鲤鱼书了，皇(黄)泉地。女青诏书玄都急急如律令！

对照券石拓片图版仔细观察发现，本券文字，不仅如简报编者所指出“字迹潦草欠规整”，而且由于刻手文化水平低下，不熟悉字形笔画，不解文义，计划不周，错字、漏字或字序颠倒，有意无意造成的误刻紊乱相当不少，如果不了解券文的内容性质，掌握相关的文例，是很难正确识读的。“乙酉日葬埋”五字在额之上方，由右向左直行刻写，字形较小；“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小男、小女”十二字，分六行按正文方向竖刻，字形较大，两者有所不同，前者显然是在人葬前临时加刻的。又正文中第十一行上端的“对”字，第十二行上端的“祸出入”三字，第十三行上端的“了”字，都刻在横栏线以上，超出了正文的正常位置。加上末行“深山[鹿]。[鹿读]了，入深山。鲤鱼书了，皇(黄)泉地。女青诏书玄都急急如律令！（急急如女青诏书玄都律令）”有不少缺刻颠倒之字，显然是由于刻工文化水平过低，事先没有计划好行款字数，刻至第十行后发现，余下石面已不能容纳需刻之字，只好将一部分刻出上方横栏之外，另外一部分便随便加以省略，胡乱刻毕了事。参考其他柏人材料可知，券额空白处刻写的“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小男、小女”十二字，实际上是对券文“葬埋以后，柏人登明，无令争夺”，“不得共相呼夺”所作的补充，意思是说墓主下葬之后，如地下发生呼讼家中大小生人男女纷争之事，由柏人与值日之神一起代为应付，无使生人受害。券文无纪年，由“大宋国”云云可知，当属宋代遗迹无疑。券文称券主翟三郎“属大唐皇帝”治下；又“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小男、小女”文字，见于前述江西南昌唐昭宗大顺元年（890）熊氏十七娘墓柏人、江西吉安县北宋开宝七年（974）墓出土柏人墓券文，应为北宋早期遗存，其年代当在上述彭泽县元祐五年（1090）易氏八娘柏人之前。

5、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江西宋墓出土柏人砖券拓片。美国耶鲁大学韩森在《宋代的买地券》一文中作了如下的释读：

若有争兕神恶鬼急付太上老君。儿孙地中合出钱求万万贯文，
 仰百人受□□□□马六畜资生万万余疋，仰百人招取，与阳阳道。
 儿孙地中合出田蚕万倍，仰百人受取。地中合出儿孙地中合出金银
 万万余定，仰百人受取。将与出高官职禄(?)聪明儿孙，仰百人
 招取，送与阳道。中女孙，小女孙名字，仰百人当了。葬送亡人
 后，地中合出孙小男孙名字，仰百人斩支。地中有神来呼，长女孙
 亡人伺□仰百人斩支。地中有神来呼。长男孙，中男孙新妇，中新
 妇，小新妇名字，当了。地中有神来呼女，中女，小女名字，仰百
 人斩支。地中有神来呼地中斩斫兕神恶鬼。地中有神来呼，长男维
 □□元神断次劝一砖将与亡人〔1〕

这一重要材料，过去没有看到。数年前出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石刻拓片》，未能觅得该书查阅，不知是否收入此拓材料。既为砖券刻文，正文部分每行字数应当大致相同。细审韩森释文，各行字数多少出入极大，又语意多不连属，看来砖文保存不全，脱蚀相当严重。以上过录韩森的释读本身，也有不少明显的错误。如文首的“若有争兕神恶鬼急付太上老君”，显然就应当读作：“若有争，凶神恶鬼，急付太上老君。”第二行“儿孙地中合出钱求万万贯文，仰百人受□□□□”，应读为“……儿孙。地中合出钱求(?)万万贯文，仰百人受□□□□”；第三行“马六畜资生万万余疋，仰百人招取，与阳”；与第四行“阳道。儿孙地中合出田蚕万倍，仰百人受取。地中合出”，行间当泐缺若干字，连读当作：“马六畜资(滋)生万万余疋，仰百人招取，与阳……阳道儿孙。地中合出田蚕万倍，仰百人受取。地中合出……”第五行中“儿孙地中合出金银万万余定，仰百人受取。将与”，当读为“……儿孙。地中合出金银万万余定(錠)，仰百人受取，将与”。后经白彬组织考古系2004级硕士研究生学习讨论，将之与其他同类出土材料比较，发现与前录江西吉安县北宋墓出土开宝七年(974)王氏夫人柏人石券刻文基本相同。因未发表券石照片和拓本图版，原石到底是从左向右刻还是从右向左刻虽不得而知，但韩文是把券文的次序完全读反了，这点却完全可以肯定。今据韩森释文，参考江西吉安县北宋墓出土开宝七年(974)王氏夫人柏人石券文，试作校读如下：

〔1〕(美)韩森：《宋代的买地券》，邓广铭、漆侠主编：《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133~149页，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

准开元敕断次，勒一砖将与亡人，[于]地中斫斫凶神恶鬼。地中有神来呼长男，[中]男，小男名字，仰柏人斫支（之）。地中有神来呼[长]女、中女、小女名字，仰柏人斫支（之）。地中有神来呼[长]新妇、中新妇、小新妇名字，当了。地中有神来呼亡人伺□，仰柏人斫支（之）。地中有神来呼长男孙、中男孙孙（按：此字当属衍文）、小男孙名字，仰柏人斫支（之）。地中有神来呼长女孙、中女孙、小女孙名字，仰百（柏）人当了。葬送亡人后，地中合出出（按：此字当属衍文）高官职禄、聪明儿孙，仰柏人招取，送与阳道儿孙。地中合出金银万万余定，仰百（柏）人受取，将与阳道儿孙。地中合出田蚕万倍，仰百（柏）人受取。地中合出[牛]马六畜，资（滋）生万万余疋，仰百（柏）人招取，与阳[道]儿孙。地中合出钱求（？）万万贯文，仰百（柏）人受□□□□。若有争，凶神恶鬼，急付太上老君。

原释“劝一砖将与亡人”，文义不通，“劝”字与“勒”形近，当释为“勒一砖将与亡人”，意指将前面文字刻在砖上，交付墓主保存。由此可知，此拓原为砖刻，作为代人柏人的附属材料随葬墓中者。券文存字无纪年，说者订为宋器，未有论说。我们认为，券文有“长女、中女、小女名字”之称，犹沿用唐制，其时代当距唐代不远，应为北宋早期遗存，早于上述彭泽县元祐五年（1090）易氏八娘柏人，与上述江西吉安县敖城乡泮矿村北宋墓出土开宝七年（974）王氏夫人柏人券大体相当。

这种随葬代人柏木人材料的习俗，根据文献记载宋代以后有些地区仍在继续使用。明代嘉靖年间成书的《儒门崇理折衷堪輿完孝录》卷八，安葬仪，藏明器事云：“穿便房以埋明器，以闽俗之木刻金鸡、玉犬、柏人、土地等物，不无有泄地脉，且引水生虫，无益化者，不若皆不用为是。若孝子必欲遵礼用之，亦不必事雕刻，而但用纸糊裱楮为之，乃于窆完工毕之际，谢土告墓之时，对坟烧化，如焚楮钱之义，庶亦便焉。”^{〔1〕}在以福建为主的南方地区，看来一直流行到了元明时期，嘉靖年间以后才逐渐将柏人作成纸人焚烧以为替代，不再继续用木头雕刻俑形随葬入墓。在今后南方地区的元、明墓葬发掘工作中，随时可能还会有这种性质的木俑出土，应当引起考古工作者的注意。

〔1〕《道藏》二十五册，672页。

仔细分析，上述九批代人木人材料，除甘肃嘉峪关西晋墓“木俑”无文字而外，其余八批有文字的可根据文字内容的不同分为三类。第一类包括：甘肃敦煌新店台墓出土前凉建兴九年（321）朱书陶瓶文、甘肃武威磨咀子出土前凉张骏建兴二十八年即东晋成帝咸康六年（340）松、柏人解注木牍、河南偃师县杏园村北魏正始五年（508）陶“镇墓瓶”、江西南昌北郊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墓柏人、江西彭泽县北宋石槨木棺墓元祐五年（1090）柏木人。这五项材料，都是达到为死人解谪，绝鬼神呼讼，为生人除殃的单纯解注类型。第二类包括：江西吉安县敖城乡北宋开宝七年（974）墓柏人券、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江西宋墓出土柏人砖刻，两项材料属于与第一类不同的另外一种类型。第二类柏人的任务除了绝生人呼讼代人解注之外，还要于墓中斩杀凶神恶鬼，保证生人的平安长寿，保证家畜安全，蚕桑林木繁殖，并由柏人在地下招取金银钱财、土地资产、牛马六畜，高官厚禄、聪明智慧等，将种种好运送与阳道子孙，已越出单纯解决呼讼问题的范围，另外增加了新的功能，在过去的基础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是值得注意的情况。第三类目前只发现江西瑞昌市白杨镇翟三郎券一件，它既不是一般的单纯买地券，也不属于单纯的“柏人墓券”，而是一种同时包含以上两种材料在内的墓葬石刻，其文字以买地券为主，而又加上了一部分用柏人作代人，以绝呼讼“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小男小女”生人的材料。这种类型与柏人有关的券刻，似乎不是属于正规的材料，除了“柏人”的名称正式写入正文而外，说明绝呼讼生人范围的“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小男小女”，也是在其他文字刻好之后再补刻在券额空白部分的。如果不是对其他有关“柏人”材料相当熟悉，很难弄清上述分成几处刻写文字之间的关系，明了它们的含义。

第二节 石真类

此种类型的材料，以代人墓主像用石料或陶塑制成，自名为“石人”或“石真”，像身无文字，文字说明另置一券器为主要特点。总的说来，这种类型的材料时代相对较晚，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最早是从唐代末年才开始出现的。其分布地域范围虽不甚广，但文字部分的繁简在不同的地区差别很大，可分为蜀地型与江南型两种不同的类型。

一、蜀地型

从已知的材料看，这一类型主要发现在川西的成都附近地区，出土时除少数像、券并存者外，或存像失券，或存券失像。券契文字数甚多，详细记载了墓主姓名里籍、葬地所在、建墓日期等内容，有的还和地契内容结合在一起出现。

1. 成都市郊唐墓出土天复元年（901）石人地券。先师冯汉骥教授生前赐赠蜀土所出买地券拓片多种，中有唐天复元年（901）一券（图版拾捌：10）。文曰：

维大唐天复元年，岁次辛酉，十二月己卯朔，二十四日壬寅。今有成都府华阳县灵关坊大道弟子秦温，就当县界普安乡沙坎里，将信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文买地，敬造千年之宅，万岁石城。今蒙就了，不敢不谕启。告天上地下土伯山灵地祇：左至青龙，右至玄武，前至朱雀，后至玄武，今日封闭，诸神备守，温长生万岁，富贵长久。石人石契，不得慢临，若人吉宅，自有期契，天番（翻）地倒，方始相会。今日吉良，告诸封闭，主人□□，富贵高迁，子子孙孙，永保万岁。急急如律令！

四川大学东区图书馆亦藏此刻石拓本，文字保存更为完整，有“曾祐生所得金石文字”铃印。曾氏为成都著名拓墨高手，20世纪60年代辞世，此唐券当系1949年前成都地区出土。所谓“石契”，就是上录石券。所谓“石人”，当年另有石像，今已不存。“不得慢临，若人吉宅，自有期契”，谓当如阳世屋宅契约一样订立约定期限，必须严肃认真对待，不得轻视。

2. 成都市区五代前蜀墓出土永平六年（916）石人地券。1998年成都市考古队刘雨茂清理成都市光华路小学一五代前蜀残砖墓，出土石券一方（图版玖：2）。今据券石拓片释读其文：

因圖承平六年岁次丙子，四月乙酉朔，□□□寅，大蜀国成都县西市北团女弟于阿住置造寿堂，宜于成都县文学□□光里福地。谨告天神，下及地里土地灵祇，一切诸神，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及五方龙神：弟子阿住所置寿堂已后，望寿命增延，

图版拾捌: 10

子孙昌盛，富贵冲天，财帛山积。愿比春秋（？），一，年年雨露恩沾；一，日日□□誓固。今即择其吉日，闭此寿堂，所用石人石契，共断来期，但遇天蕃（翻）地覆，方来相会。伏愿诸神鉴知，垂恩界护，道树芬芳，神灵卫护。今日吉神（辰），封闭寿堂，主人长生，延寿万岁。急急如五帝使者律令！

女弟子阿住置□□寿堂文〔1〕

“石人石契”，文与上券相同，义亦如前所解。券石中间四行凿下中心一方块“方龙神弟”、“寿命增延子”、“愿比春秋”、“□□誓固今”等十八字，然后又将此凿下之石方块嵌回原处，最为特殊，为迄今所见之初例。由鑿凿用力甚猛，将券石之北、西、南及东北角震出裂缝，东北角并有缺损。

3. 成都后蜀墓明德二年（935）石人地券。先师冯汉骥教授所赐成都市郊后蜀墓出土明德二年（935）石人地券拓本一件〔2〕（图版拾捌：11）。券文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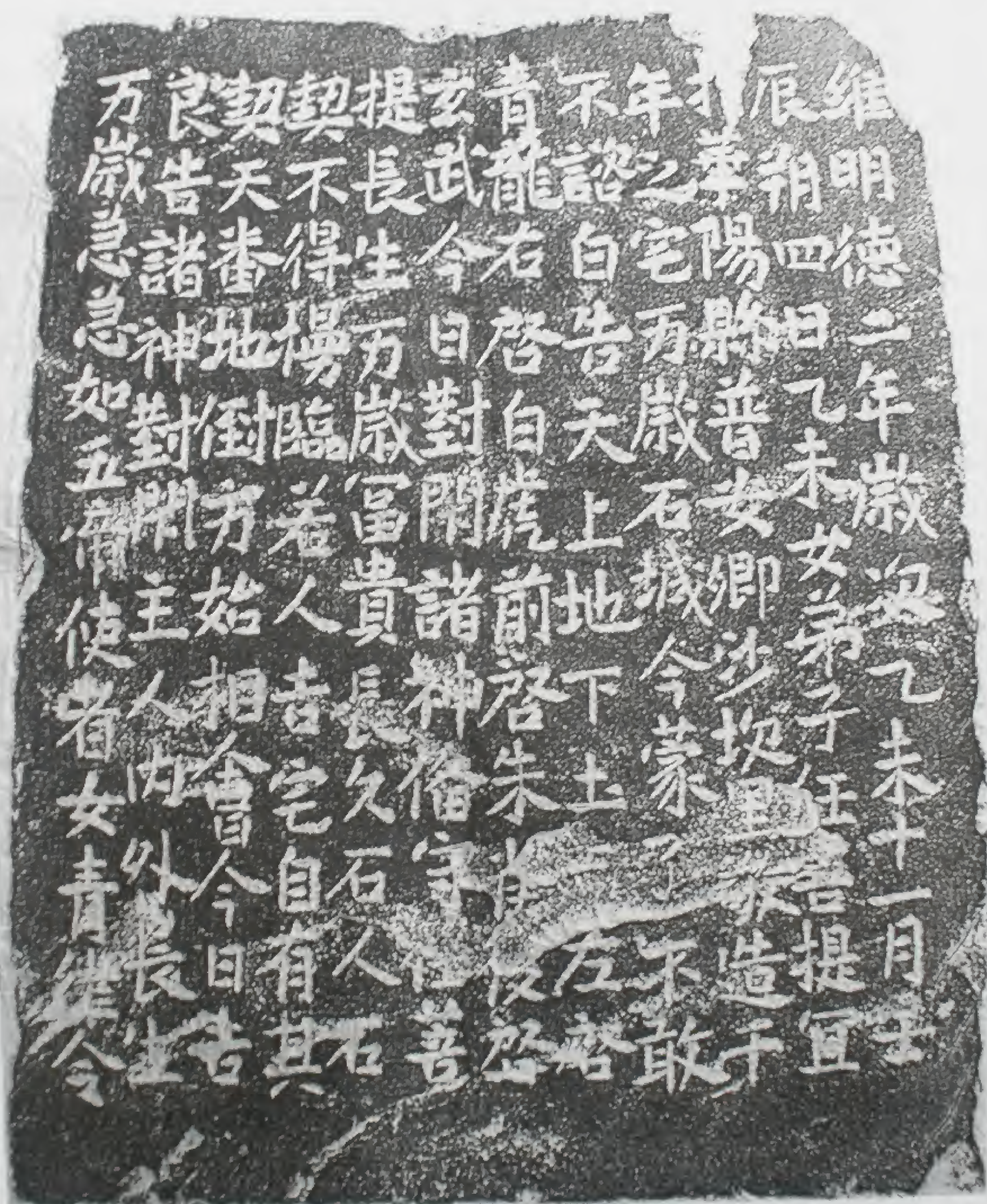
维明德二年，岁次乙未，十一月壬辰朔，四月乙未，女弟子任菩提，宜于华阳县普安乡沙坎里敬造千年之宅，万岁石城。今蒙了，不敢不谄白。告天上地下土□，左启青龙，右启白虎，前启朱雀，后启玄武：今日封闭，诸神备守。任菩提长生万岁，富贵长久。石人石契，不得慢临，若人吉宅，自有其（期）契，天翻地倒，方始相会。今日吉辰，告诸神封闭，主人内外，长生万岁。急急如五帝使者女青律令！

4. 成都大邑县安仁乡五代后蜀墓出土广政十八年（955）石人地券。大邑县文管所藏20世纪60年代安仁乡联合大队出土地券一方，70年代至该县文化馆抄得券文，因有些字迹不甚清晰，抄者对有关内容不够熟悉，个别关键文字未能识别，故过去使用材料时曾发生错误。2001年我们应邀至该馆鉴定道教文物，再度对此券文字仔细审视，对旧释作了校订。券文如下：

大蜀国邛州安仁县广德乡和众里奉道女弟子安定郡譙代，谨用

〔1〕 据成都市考古研究所刘雨茂提供石券拓片复印件。

〔2〕 自藏原石拓本。



图版拾捌：11

闰九月二十五日，果酒脯□□信钱，对天地众神买得此田一团封，其地东至青龙，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玄武。内方勾陈，则当□□（分掌四域）。谨将青石一枚，替代生人，永镇寿堂之宅。今逢良友劝课修因，置立寿堂吉宅后，愿保千春，永无灾难。故气邪精，万福（弗）来袭。养魂长魄，囹我千春，仙洞灵宫，保存吉寿，永无灾祸。置立吉宅之后，青龙守左，白虎守右，朱雀居前，玄武守后。讵代今日设延（筵），意者，觉凡夫之脆境，无保寿而有终丘坟，上圣犹然吉庆，永寿遐年。急急如律令！

券文未纪年号而称“大蜀国”，当为五代之蜀国王朝遗存。查后蜀广政十八年（955）闰九月，据此可定其年代。“谨将青石一枚，替代生人”，这里的“青石一枚”相当于其他券文中的石人，它在墓中的作用和石人一样。将其替代生人的作用说得更加明白，使我们对他券文中“石人”意义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5. 1979年发掘四川蒲江县五星镇北宋熙宁五年（1072）M1王□湜及其妻M2史氏同坟异室合葬砖墓，出土M1：38号石“坐俑”一件，“头戴高檐冠，身着圆领宽袖长衣，腰束带，脚蹬靴。垂耳方腮，眉眼清晰，额现皱纹，表情庄重，垂足端坐于矮背椅上。”（图版拾捌：12）^{〔1〕}“此俑出于M1靠近后壁的正中部位，似为死者之肖像。”该墓同时伴出的道教神像陶俑种类甚多，有金鸡、玉犬、雷神、日月星官等。在两室所出的地券文中讲道：“亡歿亡人王□湜（女作‘史氏大’）间生于北谷州，不入轮回之地。死在南关界为积凶趣之居，姓氏莫知，古今所记，凡有未葬之魂，使作守尸之鬼。”是说那些在王□湜夫妇墓地附近如有死于非命不知姓名的野鬼孤魂，统统命作王□湜夫妇的守尸鬼。“守尸”本属道教的概念，四川平武明代天顺年间王玺墓所出符牌，便有出自《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灵宝领教济度金书》等道书文献的“太乙守尸，三官卫灵”之语，这里的“守尸之鬼”，也是一种道教鬼神观念之说。此置于墓室后壁的石雕墓主像，应属道教代人“石真”者无疑。相配之券器已不存。

6. 1999年发掘成都市东北郊二仙桥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卫氏与其夫任某（下葬年代不详）同坟异穴合葬双室券拱砖墓，在两室后壁龕中各

〔1〕 陈显双等：《四川蒲江五星镇宋墓清理记》，《考古与文物》1986年3期，封二，图8。



图版拾捌：12

分别放置陶质男女墓主像。M1: 19号男墓主像高21厘米,底径14厘米,褐色无釉,头盘六瓣形发髻,身着交领长袍,双手拱置胸前,面部清瘦,高鼻大口,两眼平视前方,蹲坐于圆形空心底座之上。M1: 54号女墓主像,大小造型与男像基本相同,唯头上发髻与面容有所区别。^{〔1〕}从其形态和在墓中所在的位置看,简报编者将之确定为墓主像,是完全正确的。实际上,该墓应是在墓主去世之前建造的生墓,男女墓主像都是在墓室建成时放入的“石真”。相配之券器已无存。

7. 成都市区南宋墓出土淳熙九年(1182)石人墓券。20世纪90年代在成都市西抚琴小区金鱼村和相邻的化成小区,曾先后发掘两批南宋砖室火葬墓,金鱼村者为淳熙至嘉定年间所葬,化成小区稍晚。墓中除出土若干常见之宋三彩俑之外,还发现石雕或三彩釉陶之墓主像。以1992年发掘金鱼村92M9吕忠庆夫妇合葬砖室墓为例,左右并列二室,左侧吕忠庆一室,墓室长1.01米,宽0.67厘米,残高0.53米。后壁(南壁)砌龕宽0.385米,进深0.68米,高0.44米的龕室,因龕室底部与墓室底部在同一平面上,原简报误为后室。随葬器物放在墓室后面部分,在前面靠墓门处放石买地券一方。壁龕内置M9: 19红砂石雕墓主人像一件,高26.4厘米,头戴前窄后宽之幞头,身着圆领广袖长袍,下过脚面,腰束革带,垂足端坐,双手交笼于袖中,搁置双腿之上,面部丰满,神态安祥(图版拾捌: 13)^{〔2〕}。另立放墓券一方(图版拾捌: 14)^{〔3〕}。墓券文曰:

大宋淳熙九年,岁次壬寅,十二月丁酉朔,初四日庚子。今有奉道男弟子吕忠庆,行年四十六岁,九月十六日_圀,遂_口此成都县延福乡福地,预造千年吉宅,百载寿堂。以此良辰,备_口掩闭,所(祈)彰(愿)闭吉之后,四时无灾厄相侵,_口节有吉祥之庆。今将石真替代,保命延长。绿水一瓶,用为信契。立此明文,永保清吉。

〔1〕《成都市二仙桥南宋墓发掘简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1999),217页,图五,7、8;图版壹零,5、6。

〔2〕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成都市西郊金鱼村南宋火葬墓》,《考古》1997年10期,图版柒,6。

〔3〕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成都市西郊金鱼村南宋火葬墓》,《考古》1997年10期,70页,图八。



图版拾捌：13



图版拾捌：14

买地券出土时字迹尚清晰可见，取出后已破碎不能拓墨，据现场记录其文如下：

因因嘉定四年太岁辛未，二月□寅朔，二十五日戊寅，故吕忠庆地券。生居城邑，死安宅兆，卜筮叶从，相地图吉，宜于此成都县延福乡福地之原安厝。其界左至青龙，右至白虎，前至朱雀，后至玄武。中方勾陈，分掌四域。存之安吉。^{〔1〕}

上录买地券文与常见之其他同类器文相较，内容简单，无甚特殊之处。如果只看此券文字，除了说明墓主吕忠庆系在嘉定四年（1211）二月二十五日入葬墓中及葬地所在地名而外，似无更多价值。但我们如果把它和上述壁龛中的墓主石像和墓券联系起来考察，意义则相当重要了。墓龛所出墓券文中“千年吉宅，百载寿堂”之语，说明该墓是墓主未死之前在淳熙九年（1182）建成的生墓“寿冢”。“今将石真替代，保命延长”，证明所谓“石真”就是和镇墓券一起放在同一龛室中的墓主石像，墓主石像和镇墓券都是在淳熙九年（1182）寿冢建成时一起放入的，放入之后当即把整个墓室封闭（“掩闭”）起来。放入石真的目的，是让他为吕忠庆代死，让吕忠庆“保命延长”，长命百岁（按道教之说具体当为百二十岁）。等到二十九年之后的嘉定四年（1211）墓主吕忠庆死去，才再开冢葬入尸体和买地券等物。如果说我们过去对于其他这种带“石真”文字的墓券含义及其与“墓主像”之间关系的结论多少还带有一些推测成份的话，吕忠庆墓的材料则使这种推断完全得到了证实，是非常难得的有关葬俗最为完整的遗迹资料。化成小区的材料尚未发表，墓主夫妇像系三彩釉陶做成，墓中放置的位置和金鱼村墓也不同，但券文仍将之称作“石真”。可知此种石雕墓主身像，后来可用其他质地的材料制作而仍沿用“石真”旧名。

8. 成都市区南宋墓出土开禧二年（1206）邓百瑞石真墓券。1993年发掘成都西城区营门口乡化成五组新蜀工地南宋左右二室并列同坟异藏石室墓，左室（男室）出土93CHM1：8号石墓券一方，高25厘米，宽23厘米，刻文每行上部行端约二字笔画漫漶，右上角略有残缺（图版拾捌：15）。券文可识读作：

〔1〕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四川成都市西郊金鱼村南宋火葬墓》，《考古》1997年10期。



图版拾捌：15

因因开禧二年岁次丙寅，九月己卯朔，十三日辛卯。今有男弟子邓百瑞，行年三十□岁，十一月十八日生，福地在成都县延福乡，预造千年吉宅，百载寿堂，以此良辰，备□掩闭。祈愿闭吉之后，福如山岳，寿比松椿。今将石真暨因，因石碎，方归本堂。

9. 成都市区南宋墓出土开禧二年（1206）杨氏寿娘石真墓券。上述同坟异藏墓之右室（女室）出土 93CHM1：4 号石墓券一方，宽 23 厘米，上端略残，残高 21 厘米（图版拾捌：16）。券文可识读作：

因因开禧二年岁次丙寅，九月己卯朔，十三日辛卯。今有女弟子杨氏寿娘，行年三十四岁，□月□□日生，福地在成都县延福乡，预造千年吉宅，百载寿堂。以此良辰，备□掩闭。祈愿闭吉之后，福如山岳，寿比松椿。今将石真暨因，因石碎，方归本堂。

以上二石出自一墓，大小形制相同，字体书法显系出自一人之手，除墓主姓名生辰年岁之外，其余文字内容也完全一样。承发掘者见告，两室男女墓主像均用三彩釉陶做成，放在棺床前面，但券文仍将之称作“石真”。可知此种石雕墓主身像，后来可用其他材料制作而仍沿用“石真”旧名。可以判定，它们都是在生墓建成之际同时分别放入二室的，二室建成之际，邓百瑞及其妻杨氏均尚健在。在其他夫妻双室合葬墓中，两室都有石真和石真契券保存下来的例子，实不多见。

二、江南类型

本型材料，以契文简短为特点，仅具短短数字的盟语以明其性质而已。除见于文献记载者外，经科学发掘出土的数量不多。

1. 1958 年发掘上海西郊朱行乡南宋嘉定六年（1213）张玮墓（墓志材料未发表），出土一石雕老人坐像，高 29 厘米，男性髻发，作沉思状（图版拾捌：17）^{〔1〕}。石像后面置一雕砖插屏，高 30 厘米，宽 22.7 厘米，上雕一仙人坐于树下根干之上，有圆形头光，左一童捧物侍立，当系仙真人物。插

〔1〕 沈令昕等：《上海西郊朱行乡发现宋墓》，《考古》1959 年 2 期，110 页，图一。



图版拾捌：16



图版拾捌：17

屏背面镌刻“石若烂，人来换”六个大字（图版拾捌：18）^{〔1〕}。对石像与插屏雕刻之间的关系，发表材料时未作交待，但认为石像系“道教神像”。据报道，该墓不大，却分上下两层，每层四角各置一铁牛，木棺和买地券放在上层，石像和砖屏放在下层，在石像前还放着一个14厘米高的影青瓷瓶。显然，此墓初建也是一座与上述成都市郊南宋石真墓性质相同的寿冢。砖屏雕刻仙人与“石若烂，人来换”文字，和开禧二年（1206）邓百瑞券“今将石真替代，水干石碎，方归本堂”之类的文字，是同样的意思。下层同时伴出的石像当为墓主张玮之石真，而石像前的影青瓷瓶，也就是券文所说的“绿水一瓶，用为信契”。之所以把墓室建成两层，石像、砖屏放在下层，是在生墓建成时放入即行封闭，等到墓主死后，只须开启上层便可葬入棺木尸体。这是一种构筑非常巧妙的石真寿冢，过去对此材料的判断认识，看来整个都得重新考虑。

2. 文献记载，这一类型的材料，元代曾在苏州发现过。明正统年间进士叶盛著《水东日记》卷十，根据当时还能看到的元泰定四年（1327）虞集撰《朱宜人吉氏墓碣》石刻记载说：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十二月，朱德润母亲吉氏的祖母施夫人病重，使人于苏州城外的阳抱山营建墓藏。“役者治地深五尺许，得石焉，刻曰：‘郁林太守陆君绩之墓’。另有刻石在旁，曰：‘石若烂，人来换。’石果断矣。其祖命急掩之，而更卜兆”。据叶盛自注说所载碣文石刻，与虞氏文集本稍有出入，文集本“石若烂”作“此石烂”，“郁林太守陆君绩之墓”无“郁林”二字^{〔2〕}。此事元代苏州人陆友《砚北杂志》卷下亦有记载，其说与叶盛所言集本相同而文字甚简^{〔3〕}。此墓未经科学发掘，且当年启墓亦未全面揭露，有无石人石真虽不可确知，但石刻“石若烂，人来换”之文与上海南宋张玮墓砖屏一字不差，应属时代、性质相同的材料无疑，在墓中另外藏有石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墓中随葬“石若烂，人来换”石刻，宋代以前的墓葬，迄今尚无一例，更不可能有魏晋时期的材料出现。元明人记载此种石刻与“郁林太守陆君绩之墓”石铭同出，查《三国志·吴志·陆绩传》，汉末孙吴时陆绩曾为郁林太守，三十二岁而卒，是以该墓为孙吴时遗存。这一材料显然是有问题的，若非传闻有误，该

〔1〕 沈令昕等：《上海西郊朱行乡发现宋墓》，《考古》1959年2期，111页，图四。

〔2〕 （明）叶盛著《水东日记》，《影印文渊阁四库书》一〇四一册，68页。

〔3〕 （元）陆友：《砚北杂志》，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版《笔记小说大观》十册。



图版拾捌：18

石也应是附近或同一地点另一东汉末年墓中之物，与本墓无关。但无论怎样，这种类型的宋代材料也都发现在江苏境内，自有它的地方特点。

3. 贵州思南明代张守宗生墓朱书符砖上有“身披北斗，头戴三台，寿山永远，石朽人来”的普通汉字（图版拾捌：19）^{〔1〕}。在湖南石门和四川成都明墓中，也有大体相同的材料发现^{〔2〕}。这些材料，与上述江苏宋墓所出“石若烂，人来换”情况相类，亦可列入这一类型。这些材料，时代比江南地区的要晚，在墓中别无石人器物发现，是石（砖）券本身既刻文字，又代替石人，把单独的石人器物也省去了，显然是在江苏宋代材料基础上的进一步简化，应属江南类型的余波。

以上两种不同地区类型的石人材料虽然存在着一些差异，但它们却具有这样四个显著的共同特点：一是只用以替代生人，二是只用于生墓，三是契文与石人分件制作，四是都在唐代晚期以后的墓葬中出现。这些特点，反映了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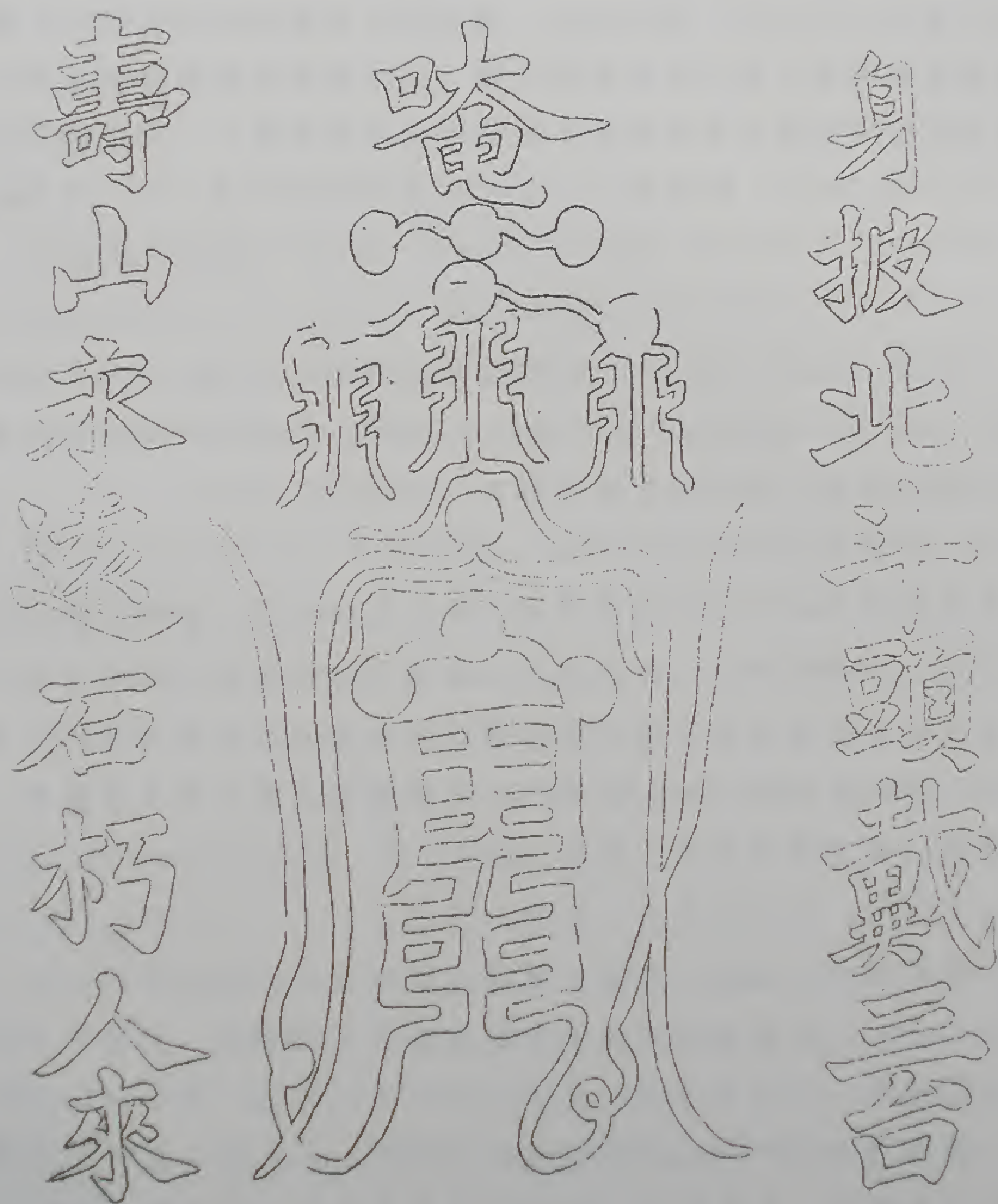
第二章 建兴二十八年松、柏人木牒文字的考释

第一节 材料的著录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前凉张骏建兴二十八年即东晋成帝咸康六年（340）松、柏人解注木牒一枚，据说是在甘肃武威磨咀子出土。虽然目前只发现一件，但器文最多，涉及内容复杂，有不少特殊之处，是这一时期墓葬解注文器物中一种不同的类型，并在学界受到广泛的关注，认识也不一致，有必要提出来单独进行讨论。

〔1〕 刘恩元：《贵州思南明代张守宗夫妇墓清理简报》，《文物》1982年8期。此据贵州省考古研究所提供摹本复印件。

〔2〕 湖南材料见王育成：《中国古代人形方术及其对日本的影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7年1期。成都材料未发表。



图版拾捌：19

据《三十年入藏文物选粹》图版及介绍说明，木牍作窄长方形，长36.2厘米，宽9.6厘米，厚0.6~1.2厘米。正面上部先凸刻立人像，再用墨笔粗线勾画五官、四肢、衣纹，两手笼袖拱于胸前，正中腰腹部分画一半圆形围腰，墨书“松人”二字。在人像四周墨书文字，上方及左、右两方各一行，下方八行。除上方一行字由右向左之外，余皆作由上向下书写。背面由上向下墨书七行文字，满布牍面。据介绍，木牍侧面尚有文字，惜未著图版。从图版材料看，文字大部清晰可读，仅个别字迹模糊难以准确辨识。

有关的研究论著，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主要有两篇，一篇是饶宗颐的《记建兴二十八年“松人”解除简——汉“五龙相拘校”说》^{〔1〕}，另一篇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连劭名的《建兴二十八年“松人”解除简考述》^{〔2〕}。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育成在他的《中国古代人形方术及其对日本的影响》一文中，也涉及到这一材料的部分内容^{〔3〕}。连、王二人所引用的“松人简”文材料，也都出自饶宗颐先生的释文，连文对饶先生的释读，仅个别地方略有改动。饶宗颐发表的释文，“四周文字如下：

建兴二十八年十一月丙申朔，天帝使者合同，复重，拘校，八魁九坎，年望朔晦、东井七星。死者王群洛子所犯，柏人当之，西方有呼者，松人应之，地下有呼者，松人应之。生人有所□，当问柏人。洛子死注咎，松人当之，不得拘校复，重父母兄弟妻子，欲复重酒，松、柏能言语。急急如律令。

上方记：无拘校复重，松柏人当之。

两旁记：日月时，拘校，复重，柏人当之。（右方）

岁墓年命，复重，松人当之。（左方）

背记：

建兴二十八年十一月丙申朔二日丁酉，（武威）北所住者谨为王氏之家解复。死者洛子，四时不食复重拘校，与生人相妨，故作松、柏人以解答殃。谨解：

〔1〕 饶宗颐：《记建兴二十八年“松人”解除简——汉“五龙相拘校”说》，《简帛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

〔2〕 连劭名：《建兴二十八年“松人”解除简考述》，《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3期。

〔3〕 王育成：《中国古代人形方术及其对日本的影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7年1期。

东方甲乙之复，鬼令复五木，谨解。

西方庚辛之复，鬼令复五金，谨解。

南方丙丁之复，鬼令复五火，谨解。

北方壬癸之复，鬼令复五水，谨解。

中央戊己之复，鬼令复五土。无复兄弟妻子妇女孙息宗亲，无罚无负，齐一人止，急急如律令。

主人拘校复重，松人应之，死人罚谪作役，松人应之，六畜作役，松人应之，无复兄弟，无复妻子，若松人前却，不时应对，鞭苔（答）三百，如律令。

右侧记：二日丁酉直闭”

连劭名的文章引录饶宗颐先生《记建兴二十八年“松人”解除简》待刊稿释文，句读与此不尽相同，作：

“建兴二十八年十一月丙申朔，天帝使者合同复重拘校，八魁九坎，年望朔晦、东井七星。死者王群洛子所犯，柏人当之，西方有呼者，松人应之，地下有呼者，松人应之。生人有所□，当问柏人，洛子死注咎，松人当之，不得拘校复重父母兄弟妻子。欲复重酒，松柏能言语。急急如律令。（四周）无拘校复重，松柏人当之。（上方）日月时拘校复重，柏人当之。（右）岁墓年命复重，松人当之。（左）（两旁）

建兴二十八年十一月丙申朔二日丁酉，（武威）北所住者谨为王氏之家解复，死者洛子，四时不食，复重拘校与生人相妨，故作松柏人以解咎殃。谨解：东方甲乙之复，鬼令复五木，谨解。西方庚辛之复，鬼令复五金，谨解。南方丙丁之复，鬼令复五火，谨解。北方壬癸之复，鬼令复五水，谨解。

中央戊己之复，鬼令复五土，无复兄弟妻子妇女孙息宗亲，无罚无负，齐一人止，急急如律令。

主人拘校复重，松人应之，死人罚谪作役，松人应之，六畜作役，松人应之，无复兄弟，无复妻子，若松人前却，不时应对，鞭答三百，如律令。（背面）”

失录右侧“二日丁酉直闭”之文。两种释文内容相同，句读有异，是连著引

用饶氏释文时，作了个别改动。王育成引用上述饶氏部分释文，又将“欲复重酒”改订为“欲复重复”。从《三十年入藏文物选粹》发表的器形照片图版材料看，此器当如该书编者所称是一木牍，将之订为木简，显然是不恰当的。

第二节 器文校读考释

由于对整个器文内容的理解存在问题，除个别文字的隶定有误之外，以上两种句读，也都多有可商之处。券主“王群洛子”的群字，原器笔画模糊，《三十年入藏文物选粹》编者径称为“王群洛子”，当以释“王𠂔洛子”为宜。“欲复重酒”，义不可解，王育成将之改订为“欲复重复”，未说明改释的理由。细审图版，器文“复”字所见甚多，右旁皆写作上面一点或一撇，下面一竖（多上端尖而下部渐粗），独此字左旁作三点画，实为一“须”字，当连下句读作“欲复重，须松、柏能言语”。敦煌祁家湾 M206 出土 M206: 3 朱书斗瓶文云：“今送铅人一双，斗瓶、五谷，用赎生人魂魄。须铅人𠂔汝，五谷再生，乃得出取。生死各异路，不得更相注𠂔作，除重复，便利生人。”^{〔1〕}与此当属同例，可为佐证。

细考器文所书纪时文字，前后共有三处：正面文首者为“建兴二十八年十一月丙申朔”；背面正文第二段者为“建兴二十八年十一月丙申朔，二日丁酉”；右侧者为“二日丁酉，直闭”。按理说，三处纪时文字皆为标注书写或随尸体葬入木牍之日期，不应一处为朔日，另一处为二日，而另一处虽具日序干支及日值名称，在前面却不加著年月。侧面所书者，除未著年月之日序干支及值日名称之外，别无其他文字，乍看起来完全起不到标记具体时间的实际意义，在此也没有这样再次单独著写日期的必要。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很值得研究的。按照东汉两晋墓葬出土解注器文通例，“二日丁酉，直闭”之文，本应书在前面的“建兴二十八年十一月丙申朔”和“建兴二十八年十一月丙申朔，二日丁酉”之后，作“建兴二十八年十一月丙申朔，二日丁酉，直闭”。“直闭”乃建除家建、除、满、平、定、直、破、危、成、收、

〔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109页，图七五·1。

开、闭中之闭日，谓建兴二十八年十一月二日丁酉当逢值闭之日也。应系书者最初疏忽，前一处漏写“二日丁酉，直闭”，后一处已书“二日丁酉”，却漏写了“直闭”二字，后来发现，一并补书于器侧，以示当分别取舍补足前文之意。经仔细反复摩摹，整个器文可分为两大部分：前面“建兴二十八年”至“天帝使者合同”部分，是器文标题。后面部分是合同正文，以三个“急急如律令”作为标志划分为三大段，每段皆以“急急如律令”为结束语。掌握这一情况，对于正确句读器文，有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器文当句读如下：

建兴二十八年十一月丙申朔 [二日丁酉]

天帝使者合同

复重拘校八魁九坎、年望朔晦、东井七星，死者王□洛子所犯，柏人当之。西方有呼者，松人应之。地下有呼者，松人应之。生人有所□，当问柏人。洛子死注咎，松人当之。不得拘校复重父母、兄弟、妻子。欲复重，须松、柏能言语。急急如律令！

无拘校复重，松、柏人当之。日、月、时拘校复重，柏人当之。岁墓、年命复重，松人当之。建兴二十八年十一月丙申朔，二日丁酉，[直闭]，（武威）北所住者谨为王氏之家解复。死者洛子，四时不食，复重拘校，与生人相妨，故作松、柏人以解咎殃。谨解东方甲乙之复鬼，令复五木。谨解西方庚辛之复鬼，令复五金。谨解南方丙丁之复鬼，令复五火。谨解北方壬癸之复鬼，令复五水。谨解中央戊己之复鬼，令复五土。无复兄弟、妻子，妇女、孙息宗亲，无罚无负，齐一人止。急急如律令！

主人拘校复重，松人应之。死人罚谪作役，松人应之。六畜作役，松人应之。无复兄弟，无复妻子。若松人前却，不时应对，鞭答三百。如律令！

器文中的“复重”、“复重拘校”、“拘校复重”、“复鬼”、“呼者”、“注咎”、“解复”是相互关联的几个关键性词语，其含义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学界存有异说，必须先把它们弄清楚，然后才能对通篇文字作出完整的解释。

“复重”、“复重拘校”、“拘校复重”、“复”、“复鬼”、“重复之鬼”，本书上卷《东汉墓葬出土解注器和天师道的起源》所论中原东汉墓及上述敦煌魏晋墓出土解注陶瓶文已多见之。如陕西长安县李王村东汉晚期墓出土神符解

注瓶有“南极、北斗、三台、七星，主别解张氏后死者句伍重复”之文。陕西临潼斜口乡东沟村东汉墓初平元年（190）刘氏神符解注瓶文有“谨为刘氏之家□（死？）去皇男字阿属解诸句（鉤）校（？）。解诸句（鉤）校：岁、月、日句校，天、地句校，□校（？）”。这种相同，也不只限于年、月、日时，也包括天、地、星辰等其他事物在内。这些“复重句校（钩校、拘校）”中之“钩校”、“句校”、“拘校”，乃因与死鬼发生牵连而受到冥世鬼神拘执检校之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经常是和“重复”连在一起出现，或将“句”字与“注”字联称“句注”，河南洛阳唐寺门东汉墓出土解注瓶文称：“为距（具）五石瓶十八物，雄〔黄〕神药，绝钩注重复咎殃（殃），便死利生，不得相防（妨）。”不仅将“钩注”和“重复咎殃”作为同义复词连在一起，还把断绝钩注重复咎殃和使用药物之事扯上了关系；又曰“别解张氏后死者句伍重复”，无论用星名、一般意义上的阴间官吏钩求考校或五行之龙来解释，也都很难相合，应是复连（重复相连）相注的意思。陕西西安昆仑机械厂东汉墓出土延熹九年（166）解注瓶泥水书文“父不得复，母亦不得复，兄不得复，弟亦不得复，子亦不得复，孙亦不得复……将取重复之鬼”^{〔1〕}；陕西户县朱家堡东汉墓出土阳嘉二年（133）解注瓶文“天帝使者谨为曹伯鲁之家移殃去咎，远之千里。咎（？）□大桃不得留，□复除（重）之鬼，不得□□……生死异路，相去万里”^{〔2〕}。甘肃敦煌祁家湾 M371 出土 M371：5 前秦苻坚建元六年（370）朱书（墨书）瓶文，有“魏得昌身死。今下斗瓶、五谷、铅人，用当重复地上生人”之语。^{〔3〕}诸器文中的“复重之鬼”、“重复之鬼”，也就是本券文中的“复鬼”；“复重”、“重复”，“复”，也就是松人木方文中“复重拘校”、“拘校复重”、“欲复重复”、“无复兄弟，无复妻子”、“解复”的“复重”、“重复”、“复”和“洛子死注咎”的“注咎”。它们都是指受前面死鬼寻求替代，崇害生人，造成重复发生与前面死者相同的祸殃，也就是注鬼注崇的意思。唐前正一派道书《赤松子章历》卷五《又大冢讼章》：

上世以来，先亡后死，墓谪不解，冢讼相逮……当年在世，莫

〔1〕 王育龙：《西安昆仑厂东汉墓清理记》，《考古与文物》1989年2期。

〔2〕 嵯振西：《曹氏朱书罐考释》，《考古与文物》1982年2期。

〔3〕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戴春阳、张琰：《敦煌祁家湾西晋十六国墓葬发掘报告》，114页。

不罪多福少，罪事既多，则久婴苦切，福业既少，故理无所有。是乃缠绵累业，殃注不已……先亡后死眷属，名状冥府，自然未皆放纵，或有拘执责罚，便生讼引……又生时所与人仇讎，事各有讼，并是怨结莫申，追想引逮。其亡后所兴诸讼，皆由不能自忍，求对生人，大略虽合八十一讼，其中枝叶分散，变成百千万种。又有生为愆罪，死受责罚，汤煮火灼，风刀电解，负石凿山，漕江壅海，如此之目，复百千万条，悉皆讼引子孙，更相摄对。又有阴伏匿怨，内疽隐恨，发念出言，起讼幽显……事彻晓冥，皆成讼考……悉入考目。百年、五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一年、一月、一日、一时，积考相加，众考积并。命没以后，余考不息，缠绵累积，世世不穷……或复舍命之日，不自甘分，怨天咎地，呼引鬼神，亦自遗殃相连，终不解释……又恐某家七世以来，复有阴罪阴过，阳罪阳过，死罪死过……没命三官，皆婴对罚，罪相及世，结固督切考课，终无止息。魂爽艰急，日就难忍，不堪荼毒，辞诉鬼官，求引生人，代其剧苦。幽司虽明，亦有曲妄，或能听理鬼言，移檄召对，致某家累年积厄，频岁灾衰，光怪梦寤，钱财耗减，无可禳厌……唯应分解冢讼墓注为急……特愿上官典者……为某家分解先亡后死冢讼诉注之气，令复注绝灭，逮害潜消，人鬼异路，生死乖隔……断绝某家冢讼之气复注之鬼……并解某家七世以下前升后化亡人星宿官将复连。^{〔1〕}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某家已经死去之人，由于生前做了坏事，在冥世被“拘执责罚”，受到“汤煮火灼，风刀电解，负石凿山，漕江壅海”等种种劳役酷刑的折磨。“不能自忍，求对生人”，“魂爽艰急，日就难忍，不堪荼毒，辞诉鬼官，求引生人，代其剧苦”。因为不能忍受其罪，便径直跑回家中谋害生人，企图取生人魂魄去冥世作替身，代替自己受苦，成为注鬼祟害家中生人。或因与人结仇，或因自身冤死感到委屈等，在地下发生冥讼，牵连家中生人，让冥官拘执家中生人前往冥世质对，引发种种祸殃。因为死者葬在墓中，所以在冥世兴讼发生注祟，称为“冢讼墓注”。《赤松子章历》文中说的“复注”、“复注之鬼”、“墓注”，也就是建兴木方文中所谓行“复重”的“复鬼”，行“注咎”的注鬼。在本书上卷《东汉墓葬出土解注器和天师道的

〔1〕《道藏》十一册，219～221页。

起源》一文中已有详细的论述，注鬼复连之说，最初起源于传染疾病，传染病人死亡的特点是后死者和前死者的死亡方式完全一样，看起来是一种前后重复的行为，人们用宗教的观点去加以解释，以为是前死者在为自己找替死鬼，让后死者按照自己过去的死亡方式去死，索取生人的魂魄去代替自己受苦以求自身解脱。因为受传染（注）之后死者和将疾病传染给人（行注）的前死者当年死亡的方式完全一样，而且彼此有连带关系，所以称为“重复”、“复重”、“复连”或“复注”。而前面死去并将疾病传染给人之鬼，则叫作“复注之鬼”，简称为“复鬼”或“注鬼”。“复”是“重复”、“复重”、“复连”、“复注”和“复鬼”即“复注之鬼”的简称，作动词使用为“重复”、“复重”、“复注”崇害生人之意，作为名词使用则是指“复鬼”、“注鬼”即“复注之鬼”而言。“呼”就是冥官因“冢讼”即冥讼而传唤生人，是和“复注”连在一起的，所以常有“呼讼”、“讼呼”和“冢讼墓注”之语出现。饶宗颐认为，“木简所言之‘复重’，可能指某一日辰之重见、重犯，有所禁忌。故云：‘日时拘校复重’，‘太岁墓年命复重’，此类日时、岁年重犯，概由柏人、松人当之。”并引《协纪辨方书》等所载极阴极阳“复日”、“重日”之忌为说。实际上仅就文中所提到的复重项目内容来看，包括八魁九坎、西方相呼、地下相呼等，已经超出了年月时日的范围。这里的“复重”，固然也包括时日重复之忌的内容在内，但完全用复日、重日的时日之忌来解释，显然是不够恰当的。连劭名则认为：“其中最难理解的是‘复重’的意义，又作‘重复’，当与古人天道反复的思想有关。”此说在许多地方也很难讲得通。

文首“建兴二十八年十一月丙申朔〔二日丁酉直闭〕天帝使者合同”，是整个器文的标题，说明这是一件由道士以天帝使者的名义，在建兴二十八年（340）十一月二日值闭之日和松人、柏人订立的合同契约。饶宗颐在文中说：“是简榜题曰松人，以此推之，应另有一板榜题曰柏人，惜已失去。”但何以器文所言合同对象不单指松人，也包括柏人在内，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合同正文第一段：“复重拘校八魁九坎、年望朔晦、东井七星，死者王□洛子所犯，柏人当之。西方有呼者，松人应之。地下有呼者，松人应之。生人有所□，当问柏人。洛子死注咎，松人当之。不得拘校复重父母、兄弟、妻子。欲复重，须松、柏能言语。”前面说：“复重拘校八魁九坎、年望朔晦、东井七星，死者王□洛子所犯，柏人当之。”东汉墓出土解注陶瓶有“星死鬼”之文，即《赤松子章历》所说“前升后化亡人星宿官将复连”。这

里是说王□洛子是因为触犯时日凶星之忌而死，可能引起家中生人受到复重拘校，要柏人代替王□洛子家中生人承当其祸。后面说：“西方有呼者，松人应之。地下有呼者，松人应之。生人有所□，当问柏人。洛子死注咎，松人当之。不得拘校复重父母、兄弟、妻子。欲复重，须松、柏能言语。”“呼”就是冥官传呼，多因死者在冥世不甘死苦而兴冥讼牵连所致，故常称“讼呼”或“冢讼征呼”。“呼”即呼讼，指东、南、西、北四方或其他地下鬼神若来招惹墓主王□洛子魂灵，使之与他鬼发生纠纷引起冥讼，受到冥官地吏的传呼拘执，由松人代为前往承应。《太上洞神洞渊神咒治病口章》载：“复连而死。死者相引，历劫不休，遂致弥灭，子孙相呼，展（辗）转不绝，地下不断，殃及后世。”〔1〕宋人傅洞真《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经注》卷中注解经文“冢讼征呼，先亡复连”说：

冢者，先亡坟墓。征呼者，因阴司考谪，乃追及生人。复连者，先亡传尸，连累生人。夫冢讼之事非一，而有多端，令人千载为祸，子孙绝灭，所为不成，皆冢讼之由也。大小冢讼八十一条，以人命有大墓小墓之会，而冢讼兴矣。其大略曰：人之九祖七玄，生存之日，过犯既多，亡没之后，被诸考谪，子孙未与追赎，冥漠得以怨嗟。既处阴司，无由予决，是以天曹勘会，谪及幽司官吏，谪及生人。每于三元五会之日，引出责问，勘会子孙姓名，坟墓所在，结罪定名，征呼后裔，以至延灭，非细事也。〔2〕

《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集注》卷下经文：“天瘟、地瘟、二十五瘟，天蛊、地蛊、二十四蛊，天瘵、地瘵、三十六瘵……亦有其由，或者先亡复连，或者伏尸故气，或者冢讼墓注……凡此鬼神，或悲思，或恚恨，牵连执证，并缘注谢，乘隙伺间，乃得其便。”白玉蟾释曰：“瘟乃不正之气，蛊乃无影之虫，瘵乃难愈之疾……只缘复连相染，尸气相熏，冢讼相呼之所致也。复连者，乃人之大厄也，世人不知禳解，故有绝门亡没者也。”〔3〕“西方有呼者，松人应之。”可用《淮南子·坠形训》中这样一段记载来解释：“西方有形残之尸，寝居直梦，人死为鬼。”东汉高诱注曰：“西方金，

〔1〕《道藏》三十二册，730、721页。

〔2〕《道藏》十七册，74～75页。

〔3〕《道藏》二册，580～581页。

金断割，攻战之事有形残之尸也……不终其命，死而为鬼，能为妖怪病人也。”是指死于战争形成的注鬼前来为害生人而言。十六国时期割据王朝林立，彼此攻战不息，死于战事者众，墓主之死或与战事有关，故单独列出“西方有呼者”的项目，特别加以强调。“洛子死注咎，松人当之。不得拘校复重父母、兄弟、妻子。欲复重，须松、柏能言语。”是说如果因为王□洛子也是因受注祟而死，一切由松人代为承当，不能因为王□洛子之死而发生注祟，使父母、兄弟、妻子家人受到重复拘校之害。如果以后再重复发生注害，必须等到松人和柏人能够开口讲话。而“洛子死注咎”一语，则更是整个器物解注性质最明显的标志。

合同正文第二段：“无拘校复重，松、柏人当之。日、月、时拘校复重，柏人当之。岁墓、年命复重，松人当之。建兴二十八年十一月丙申朔，二日丁酉，[直闭]，（武威）北所住者谨为王氏之家解复。死者洛子，四时不食，复重拘校，与生人相妨，故作松、柏人以解咎殃。谨解东方甲乙之复鬼，令复五木。谨解西方庚辛之复鬼，令复五金。谨解南方丙丁之复鬼，令复五火。谨解北方壬癸之复鬼，令复五水。谨解中央戊己之复鬼，令复五土。无复兄弟、妻子，妇女、孙息宗亲，无罚无负，齐一人止。”文首：“无拘校复重，松、柏人当之。”先来一个总括，说明不要因为王□洛子之死而发生重复拘校之事，如果一旦发生，即由松人和柏人负责代为承当。后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具体加以强调，分别指出：如果王□洛子家生人有因日、月、时与王□洛子死时相同重复而受到拘校注祟，由柏人负责承当。如果王□洛子系因生辰、寿数与前死者相同重复而受到拘校注祟，由松人负责承当。在建兴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二直闭之日，由武威北所居住的道士“天帝使者”为王□洛子家举行解除复鬼（注鬼）的醮仪。因为王□洛子死了，永远不再吃东西了，很可能发生复重拘校注祟，妨害家中生人的安全，所以特地制作松人和柏人，以作解除可能发生复重拘校注祟咎殃之用，为家中生人移殃转咎，使免遭复鬼注害。按照宗教五行学说，复鬼可能来自五个不同的方向，通过解除复鬼（注鬼）的醮仪，令其改变行注对象，分别改注其他五行所属之物，使复鬼不要去复注兄弟、妻子、妇女、孙媳等家中宗亲生人。日本的中村不折旧藏东汉灵帝光和二年（179）段氏甲解注瓶文：“谨为段氏甲□家通东、南、西、北土气木王，四方当生者。死者直□□□□□□土□道神□：东方起土，太白□之；南方起土，辰星威之；西方起土，营惑□之；北方起土，填（镇）星□□之。甲乙庭座，冥收左旁。趣召□己，辰先恐□。丑末对状，急还中央。段氏移央（殃）去咎，远行千里；移咎去央（殃），更到

他乡。”〔1〕日本的中村不折旧藏陕西西安市郊出土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刘孟陵解注瓶文称：“谨为刘孟陵填（镇）厌（压）。县官敢告东方吏：事生于甲乙，谋议欲来暴病足膝，昼旦啼哭，夜不能卧，便休，不来会，事□。县官敢告南方吏：事生于丙丁，谋议欲来返还。囹圄敢告西方吏：事生于庚申，谋议欲来暴病腹。县官敢告北方吏：事生于壬癸，谋议欲来暴病……囹圄中央吏，事生于戊己，某义谷（谋议欲）困暴病不起……皆不得来会。”〔2〕这和本牒文所云东方甲乙之复鬼，南方丙丁之复鬼，西方庚辛之复鬼，北方壬癸之复鬼，中央戊己之复鬼，显然是属同样的内容。“无罚无负，齐一人止。”是说即使王□洛子去到冥世受了责罚，最多也只能止于王□洛子一人，不能让其转移负担，再行复注，牵连拘校其他生人。说者由于不解“复重”即复重之鬼（注鬼）重复为害生人，句读作：“谨解：东方甲乙之复，鬼令复五木，谨解。西方庚辛之复，鬼令复五金，谨解。南方丙丁之复，鬼令复五火，谨解。北方壬癸之复，鬼令复五水，谨解。中央戊己之复，鬼令复五土，无复兄弟妻子妇女孙息宗亲，无罚无负，齐一人止，急急如律令。”这样一来，一方面使前面的第一个“谨解：”完全成了多余的文字；另一方面后面的东、南、西、北四方句末皆以“谨解”结束，独中方无“谨解”之词，句法不通，义亦无解，严重破读，是非常明显的。

合同正文第三段：“主人拘校复重，松人应之。死人罚谪作役，松人应之。六畜作役，松人应之。无复兄弟，无复妻子。若松人前却，不时应对，鞭答三百。”是说王□洛子死后，如果再在冥世重复受到拘校，由松人前往承应。如果王□洛子本人在冥世被罚作苦役，也由松人前往承应。总之，不要让王□洛子死后继续受苦，使兄弟、妻子遭受复鬼注害，也不要将家中饲养的牛羊六畜弄去代替墓主王□洛子在冥世服劳役。一切都由松人代为承当应付。如果事情发生，松人逃避责任，不及时前往应付，责打三百大板，予以重罚，决不宽贷。通过代人方式解除墓注，防止墓主变成注鬼（复鬼）为害，除了保证家中人身安全而外，还包括有生命的家畜财产安全在内，这是前所未见的。

三段文末均有“急急如律令”一语，都是强调合同规定内容条款，有如法律命令，必须立即执行，亦为道书文献和其他考古发现道教诰命传移文字习惯用语。

〔1〕（日）中村不折：《书道全集》，15页。

〔2〕（日）中村不折：《书道全集》，13～14页。

第一段说“不得拘校复重父母、兄弟、妻子”，第二段说“无复兄弟、妻子”，第三段说“无复兄弟，无复妻子”。由此可知，此次入葬之墓主王□洛子当为男性。

整个器文可通译如下：

建兴二十八年（340）十一月初二逢闭之日天帝使者与松人和柏人所订合同

墓主王□洛子是触犯八魁、九坎、东井七星等星忌和年望朔晦时日凶忌而死，如果因此使家中生人受到牵连，被鬼神拘检，由柏人代为承当。王□洛子死后，如果再受到死于兵难之鬼的讼呼，由松人代为承应。王□洛子死后，如果受到冥世其他鬼神讼呼，由松人代为承应。王□洛子死后，如果家中生人遭到祸殃，则唯柏人试问。王□洛子本人因为是受注鬼注害而死，可能在地下再受折磨，不堪忍受，由松人代为承当。总之，不能因为王□洛子之死，使家中活着的父母、兄弟、妻子再受到和王□洛子同样的灾难祸殃。如果要让王□洛子死后再继续在冥世受难，或使家中生人重复发生灾祸，必须等到松人和柏人能够开口讲话，实际上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以上所言，有如人间法律命令，必须立即贯彻执行！

不要再重复发生冥神拘检之事了！如果再重复发生冥神拘检之事，由松人和柏人共同承当。属于月、日、时辰相同重复造成的冥神拘检生人之事，由柏人代为承当。如果王□洛子死后因生年、岁数与其他死鬼相同重复而继续受到冥神拘检，则由松人代为承当。建兴二十八年（340）十一月初二日（初一的干支为丙申，本日干支为丁酉）逢闭之日，在武威北面居住的道士天帝使者，庄严地为王氏之家举行解除复连（解注）仪式。因为王□洛子死了，永远不再像生人那样饮食起居生活，对家中生人造成了威胁，可能在冥世受到谪罚或成为复鬼（注鬼）复注家中生人，所以特地做成松人和柏人以为解除。今后无论复鬼从哪个方向袭来，统统都让它转移复注的对象。按照道教五行的说法，若复鬼来自甲乙东方，通过解除之法，令其改复其他属五木之物。若复鬼来自庚辛西方，通过解除之法，令其改复其他属五金之物。若复鬼来自丙丁南方，通过解除之法，令其改复其他属五火之物。若复鬼来自壬癸北方，通过解除之法，令其改复其他属五水之物。若复鬼来自戊己中方，通过解除

之法，令其改复其他属五土之物。总之，通过解除之法，使家中兄弟、妻子、妇女、孙儿、孙媳等一切活着的亲人，不致受到复注谪罚之害。一切应有的复注谪罚，最多也只能限于墓主王□洛子一人，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不能再去重复牵连其他活着的人了。以上所言，有如法律命令，必须立即贯彻执行！

墓主王□洛子所受鬼神的复重拘校谪罚，由松人代为承应。死者王□洛子在冥世受到谪罚，被判服徒刑劳役，由松人代为承应。家中饲养的牛马六畜因王□洛子之死受到牵连，发生疾病死亡，由松人代为承当。总之，不能让家中的兄弟、妻子生人因为墓主王□洛子受鬼神的复重拘校，死后受到谪罚，引起复注之害。如果事情发生，松人逃避责任，不及时前去应承对付，将重责三百大板，严惩不贷。以上所言，有如法律命令，必须立即贯彻执行！

这里的松人与柏人，皆为因王□洛子之死以防灾祸而设的宗教代人用品，分别具有代死者王□洛子和死者王□洛子家中生人承当灾祸的职责，也就是东汉墓解注器文所说“为死人解谪，为生人除殃咎”的意思。代死者王□洛子承担责罚，也是让他不致因冥讼变成注鬼为注咎家中生人。山西出土熹平二年（173）张叔敬解注瓶文：“上党人参九枚，欲持代生人；铅人，持代死人。”前述甘肃敦煌辛店台佛爷庙湾前凉张茂建兴九年（321）朱书大女张雪光瓶文：“谨以桐人、铅人，广肩大背，可以自代，天注以解，不得相注忤。”为什么在一次放入的随葬代人用品中会有桐人和铅人两种不同的代人呢？铅人用代墓主，桐人则用代家中生人，二者是有区别的。该解注木牍文没有提到铅人，但却同时用了松人与柏人两种不同的木人，二者一代生、一代死，也应该有所不同。从现存松人器文看，前面两段在松人之外也同时讲到了柏人，如果不了解有关习俗，对所代对象的理解很容易发生混淆。但在最后一段只讲松人不讲柏人，而且明确说所司代人之事与“主人”、“死人”有关，“主人”即墓主人，与“死人”皆同指死者王□洛子而言，则此松人为死者王□洛子之代人。饶宗颐推测，该墓除现存松人木方之外，应该同时还有一枚柏人木牍，已经遗失。我们很同意饶宗颐的这一看法，而且进一步推测，遗失的柏人木牍也有三段文字，前面两段和现存松人木牍相同，第三段则只讲柏人代王□洛子家中生人而不讲松人代死者王□洛子。如此说不误，则应是以松人代死者王□洛子，以柏人代死者王□洛子家中生人。第一段文中有“生人有所□，当问柏人”的话，与上述松人为死者王□洛子

代人材料相合，遗失之柏人，应为代王□洛子家中生人之代人。下文所论唐宋墓葬柏人所代皆为死者家中生人而非死者，也是很好的佐证。有人认为，“简文中以墓主死亡时间为限，分配柏人、松人的职责，凡属墓主生时发生的事情，由柏人当之……凡属墓主死亡之后发生的事情，由松人当之。”^{〔1〕}是值得商榷的。

这是一件难得的解注文券契实物材料，虽出土情况不详，但系墓葬随葬品这是不成问题的。解注器文中明确讲到这是以“天帝使者”名义订立的一份“合同”，订立合同的对象就是松人和柏人。合同就是一种券契。在河南、河北、安徽等地东汉后期墓葬出土解注文器物中，除了大量陶瓶之外，有不少铅券和砖券出土，除有的夹杂部分买地契约内容而外，其余解注文字含义多与本牍相类。后来随着东汉王朝的覆灭，三国割据，进入魏晋时期以后，这种材料在中原地区迄今没有发现，在孙吴统治范围内则有不只一件实物出土，有的仍和买地契约内容混合在一起出现。沿丝绸之路而西至以敦煌为中心的西北甘肃之地，解注文陶瓶大量出土，而券契型材料过去一直没有发现，对于这一奇怪的现象，过去长期感到不能理解。这一木牍材料的出土，为这一问题的解决至少是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现在看来，这种解注券材料随着天师道沿丝绸之路西传，也和解注陶瓶、代人铅人之类的材料一起传到了这一地区，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环境条件的改变有所变化罢了，质地上已从铅、砖改作木材，至少是以木材为主了。在行文方式和内容方面，也有所改变。木质和陶、铅之类的材料不同，易于腐朽，在地下难以保存。这件木牍，恰好为我们透露了魏晋时期甘肃地区的解注墓券质地，已由旧时中原地区的铅、砖改用木质这样一个信息。

柏人代生人、松人代死人的习俗，前有渊源，后有流变，后文再论。

〔1〕 连劭名：《建兴二十八年“松人”解除简考述》，《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3期。

第三章 唐宋时期代人材料研究

第一节 器物文字的考释

唐宋时代南方地区的代人器物文字，川西类型石人材料，可以成都市郊唐墓出土天复元年（901）秦温石契、前蜀墓出土永平六年（916）石契及南宋淳熙九年（1182）吕忠庆石契三例材料为代表。天复元年（901）秦温墓券文字，可通译如下：

唐天复元年（901）岁值辛酉，干支为壬寅的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二月初一的干支为己卯），今有成都府华阳县灵关坊居住信奉道教的秦温，用冥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贯文，在本县普安乡沙坎里买地一处，建造长久保存的石室生墓。现在工程告竣，不敢不禀告神祇。特禀告诸天上地下土伯山灵地祇：本墓以左至青龙神所在，右至玄武神所在，前至朱雀神所在，后至玄武神所在为界。今天将建好的生墓封闭之后，请诸神代为守卫，保证墓主秦温长生万岁，富贵长久。封闭时放入的石雕墓主像“石真”和石券，不能让其随意遭受亵渎侵犯。正如人间买地建造住宅一样，也立契约定日期，以为凭信，一定要等到天翻地覆之日，秦温才死去葬入墓中，再与石人石契见面。择此黄道吉日，以为封闭生墓之期，使墓主秦温今后富贵日增，子子孙孙，永保大吉大利。以上内容，有如法律命令一样，必须立即执行！

券文中没有直接讲到用石人作为墓主替身代死，但放入石真能使墓主长生万岁，实际上具有为活着的墓主代死的作用，却是很清楚的。

成都前蜀永平六年（916）石人地契文，可通译如下：

女弟子阿住置圀圀堂文

岁值丙子的前蜀永平六年（916）的四月□日，蜀国境内成都县西市北团居住的道教女信徒阿住，在成都县文学□□光里吉祥之地建造生墓，今特敬告天神和本境土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及五方龙神等地祇：弟子阿住的生墓建成之后，希望神祇保佑富贵长寿，子孙兴旺发达，财帛堆集如山，年年风调雨顺，万事大吉。择此黄道吉日，将修建竣工的生墓加以封闭，安放代死的墓主石像和石契入内，立誓约定日期：要等到以后发生天翻地覆之日，阿住才死亡入葬，再来与石人见面相会。希望各位神灵知晓，代为保护好生墓墓室和墓地环境，使墓室不遭破坏，墓园所植树木，郁郁葱葱。最后再次强调，在此吉日良辰，将生墓封闭之后，一定要保证墓主阿住长命万岁。以上内容，有如道士天帝使者所传达道神五天帝发布的命令，必须立即执行，不得有所怠慢！

“女弟子阿住置圀圀堂文”十字，原刻位于文末，为契文之标题，当系刻工粗疏，最初忘记刻写其文，后来补刻如此。今按时下文式，移置正文之前。券石中间四行凿下中心一方块“方龙神弟”、“寿命增延子”、“愿比春秋”、“□□誓固今”等十八字，然后又将此凿下之石块嵌回原处，最为特殊，为迄今所见之初例。由于凿凿用力甚猛，将券石之北、西、南及东北角震出裂缝，东北角并有缺损。审其意，颇疑为阿住死后入葬时所为，以符“所用石人石契，共断来期；但遇天翻地覆，方来相会”之约。“石人”即墓主石像，“石契”即上述石券，生墓除石券之外，墓中原来应该还有阿住石像“石人”，惜该墓早经盗损，遗物不全，石像已损毁无存。墓主死去入葬墓中，约定与石人相会之期已至，故断裂石契，以示天翻地覆，石人不存，或当年墓主人葬时即有意损毁。是以此与诸神誓约，寿冢建成，保证阿住寿命增延，长生万岁之意。此种作法，应为某种宗教生墓葬仪之标准作法。他墓所见墓主死葬之后，墓中之石真石券未予打碎凿损，与“所用石人石契，共断来期；但遇天翻地覆，方来相会”之券文是不相符的，严格说来，当属非正规之列。

南宋淳熙九年（1182）吕忠庆墓材料，不仅有生墓建成时放入的代人石真和文字说明石契同出，并有墓主死后入葬时放入的买地券同出，石真文字说明材料石契保存也最为完整。今通译石契文字如下：

南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的干支是壬寅，当日干支为庚子的十二月四日（本月一日的干支是丁酉），四十六岁的男性道教信徒吕忠庆，已在九月十六日过了生日。现在在成都县延福乡这块吉地之上，预先建造能使人长寿的生墓，以备日后藏形之用。生墓建成，特地选择了十二月初四这个黄道吉日，封闭墓门。希望墓门封闭之后，墓主和家人岁岁平安，无灾无难，事事顺利。为此，放入墓主吕忠庆的石像，用以代替吕忠庆死亡。这样，吕忠庆就可以长命百岁，不会在短期内死丧。另外还放入一瓶清水，用为与神相约的信物，等到水干掉、石契毁坏，然后吕忠庆才真正死去，将尸体入葬。立此盟誓之文，以作保证。

这和上述唐代秦温券内容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与石人石契一起另外还增放一瓶清水，变天翻地覆为水干石烂。

南方代人木人材料均名“柏人”，分析器文内容，属于一家一形以代生人的类型。唐代者可以江西南昌大顺元年（890）墓柏人墨书文字为代表，今通译如下：

唐代九月初一的干支为甲申之年即昭宗大顺元年（890），日值干支为丙申的九月十三日，原在洪州南昌敬德坊居住的死者熊氏十七娘，死年五十四岁，今用仿铜冥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贯，买得这块墓地安葬。入葬之后，熊氏十七娘可能在地下发生冥讼，因事牵连而鬼神传呼拘执墓主家活着的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引起祸殃，希望柏人代为承当。如果地下有神因冥讼而传呼执对墓主家有关年龄、生年生日干支生人，引起祸殃，希望柏人代为承当。如果地下有神因冥讼而传呼执对墓主家有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干支属相生人，引起祸殃，希望柏人代为承当。如果地下有神因冥讼而传呼执对墓主家的奴婢、牛马六畜等，引起祸殃，希望柏人代为承当。如果地下有神因冥讼而传呼拘执墓主家活着的不同辈份、年龄段和生年干支的孙子、曾孙、玄孙等，引起祸殃，希望柏人代为承当。如果地下有神因冥讼而传呼拘执墓主家有关年龄或生年干支的其他亲属生人，引起祸殃，希望一切由柏人代为承当。墓主死后吃仙界天仓的粮食，其他木盟、当圻等墓神，则随柏人到适当的地方去寻找食物，不得骚扰墓主和家中生

人。以上内容，有如法律命令一样，必须立即执行！

器文“长男、长女、中男、中女”，“长孙、中孙、小孙”，所谓的长、中、小，是指不同的年龄段。“行年”，是指人的生寿年数；“本命、六甲”、十二支，则当如杜光庭《道门科范大全集》卷一“生日本命仪”所称之“六十甲子本命”，而为墓主家亲生人之诞年干支所属者。此柏人文中，还包含了一部分买地券的材料，其他两器则无此项内容，似非定制所有。

宋代者可以江西吉安北宋开宝七年（974）墓券及元祐五年（1093）易氏八娘一器为代表。江西吉安北宋开宝七年（974）墓券刻文可通译如下：

根据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布的命令规定，赐给女性死者王氏夫人柏人一枚，放入墓中，让它在墓中斩杀凶神恶鬼，防止因王氏夫人在地下发生冥讼，牵连家中的生人受到鬼神的传呼侵扰。有关律令条文如后：

凡冥世有鬼神呼唤墓主王氏夫人的大女、二女、小女等各个不同年龄段的女儿一类生人名字，欲行拘执加害，希望柏人代为知会承当。

凡冥世有鬼神呼唤墓主王氏夫人的大媳妇、二媳妇、小媳妇等各个不同年龄段的媳妇类生人名字，欲行拘执加害，希望柏人代为知会承当。

凡冥世有鬼神呼唤墓主王氏夫人的大孙子、二孙子、小孙子和孙女等各个不同年龄段的孙儿孙女类生人名字，欲行拘执加害，希望柏人代为知会承当。

凡冥世有鬼神呼唤墓主王氏夫人的孙媳妇和她们的兄弟姐妹一类亲属生人名字，欲行拘执加害，希望柏人代为知会承当。

墓主王氏夫人入葬墓中之后，地中长出高官厚禄，希望柏人代为领取，转送给活着的子孙后代让他们享受。

墓主王氏夫人入葬墓中之后，地中长出良田万顷，牛马六畜千万头，希望柏人代为领取罗致，转送给活着的子孙后代让他们享受。

墓主王氏夫人入葬墓中之后，地中长出无数金银财帛，长出聪明智慧儿孙，希望柏人代为罗致，转送给活着的子孙后代让他们享受。

凡是水、火、盗贼要来危害家中生人，希望柏人代为断除其祸殃。

以上条文，奉太上老君之命，必须立即执行！

见证人 仙人张坚固

担保人 仙人李定度

最后，希望人人都能获得福佑。

总括起来，柏人的任务有三：一是在墓中斩杀凶神恶鬼，不致发生冥讼受到鬼神侵扰牵连家中生人受到传呼拘执。如有鬼神来呼唤为害家中不同身份、年龄的亲人，由柏人代为承当。二是代为将墓地中长出的金银财富、高官厚禄、兴旺人丁等福庆罗致起来，转送给子孙后裔；三是为家人消除水、火、盗贼等各种祸殃。比起过去的解注代人材料已经有了明显不同，除了一般的除咎去殃之外，为墓主家中生人罗致各种福庆，成了一项主要内容，断绝生死的思想已不再有什么表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江西宋墓出土柏人砖券文中的“地中合出钱求(?)万万贯文，仰柏人受取。地中合出牛马六畜资(滋)生万万余疋，仰柏人招取，与阳道儿孙……地中合出田蚕万倍，仰柏人受取。地中合出……[仰百柏人招取，与阳道]儿孙。地中合出金银万万余定(錠)，仰柏人受取，将与[阳道儿孙。地中合]出高官职禄、聪明儿孙，仰柏人招取，送与阳道儿孙。”有人解释其含义说：“这个记载更清楚，死人的儿孙要给柏(或者‘百’)人钱、禽畜、田蚕、金银。柏人接受了之后，他们可以把这些东西再送到阳界，给死人的后代。这种想法和中国一般的想法不同。这种礼物并不是给死人用的，而是要送到阳界，给他们后代的。这些东西并不是真的，只是模型，可能是纸糊的。后文说柏人要斩首所有的叫死者亲戚名字的鬼神，或要防备牵涉死者后代的冢讼。”^{〔1〕}这样理解，除冢讼而外，与器文本义多有不合。即使金银钱财、禽畜蚕丝资产可以作为随葬品放入墓中送给墓主，然后再由墓主转送给阳世子孙。高官厚禄、聪明儿孙之类的好运，如果不是在地中长出，又怎么能够先作为随葬之物放入墓中，再由墓主转送给子孙活人呢？这显然是讲不通的。“地中合出”是指葬得龙脉吉地，可使子孙后代获得高官厚禄、富贵荣华、人丁兴旺发达等种种福荫，是和风水堪舆葬墓选择术相联系的概念，也就是后来四川明墓买地券背文中

〔1〕（美）韩森：《宋代的买地券》，邓广铭、漆侠主编：《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集选集》。

常见的“天星生贵子，八卦旺儿孙”的意思。

江西彭泽县元祐五年（1090）易氏八娘柏人墨书文义，可通译如下：

北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的干支是庚午，“癸未朔”为衍文已于前论）在本年六月初一日干支为甲午的六月二十二日这天，江州（州治今江西九江市）彭泽县（今江西彭泽县）五柳乡西域社傅师桥东保的死者易氏八娘，要易地改葬，由冥司地吏蒿里老人和道士“天帝使者”，按正宗道法安排迁葬事宜。唯恐在迁葬过程中引起“冢讼征呼”，冥司判罚，“追及生人”，连累家亲，特用此柏人一躯，书写天帝敕令，替代生人，以绝呼讼注害之患。如有呼讼男女生人者，由柏人代为当之。如有呼讼□师名字者，由柏人代为当之。如有呼讼兄弟者，由柏人代为当之。如有呼讼墓主亲戚家人者，由柏人代为当之。如有呼讼而致各种传染性瘟疫疾病者，由柏人代为当之。如有呼讼而祸及家中农副二业有关的山林树木、牛羊六畜、蚕桑等物者，由柏人代为当之。如果还有呼讼其他一切物类以为千灾百祸者，概由柏人代为当之。以上所敕，有如法律命令，必须立即贯彻执行！

“恐呼生人……宜绝地中呼讼”，就是前引《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经》说的断绝“冢讼征呼，先亡复连”，很清楚的说明了柏人的性质、作用。所“呼男女”，不仅指本家人而言，还包括了亲戚家人在内。文中的“天帝使者”和“元皇正法”，特别值得注意。

江西南昌北郊唐大顺元年（890）墓出土熊氏十七娘柏人文说：“[地中有神呼]奴婢、牛马六畜，并仰柏人当知（之）。”江西彭泽县宋墓出土元祐五年（1090）易氏八娘柏人文说：“若呼田蚕二邨（业）、六畜牛羊，柏[人当]。若呼一木二木，柏人当。若呼不止，柏人当。”也都讲到由柏人负责防止鬼神呼害墓主家中牛马六畜之事，似乎有些难于理解。《道法会元》卷二五一《太上混洞赤文女青天律·人死鬼》：“诸人死鬼意欲克害生人而难近，返损伤牛马之类者，杖一百，流三千里。”^{〔1〕}这一记载可以对此作出解释。原来注鬼欲祟害人而未得逞，往往损伤所养牛马六畜以代，所以柏人文中也就有了这方面的内容。

〔1〕《道藏》三十册，539～540页。

第二节 几种唐宋代人材料的道教性质

上述木人、石真材料的道教性质，以甘肃武威建兴松人木牒为代表的早期遗存已作专门论述，其他属于唐宋阶段部分，除了主要从器文内容本身了解以外，还可以结合同时代伴出的其他相关遗存得到说明。在代人器物文字中的“天帝使者”、“元皇正法”、“奉太上老君敕”、“凶神恶鬼急付太上老君”、“五帝使者律令”、“五帝使者女青律令”、“奉道男弟子”等语，也都与道教直接有关。从武威前凉建兴年松柏人木牒到江西彭泽北宋元祐年柏人文字中的“天帝使者”，源于中原东汉墓解注器文，见著于正一经系早期文献记载，本书第一卷《东汉墓葬出土解注器和天师道的起源》一文已有详论，在此无庸赘述。江西彭泽县北宋墓元祐五年（1090）易氏八娘柏人文：“蒿里父老、天帝使者：元皇正法，使人迁葬。”除“蒿里父老”、“天帝使者”为传统道神而外，“元皇正法”亦应属道教内容。五代著名道士杜光庭主要根据早期正一道文献整理而成的《太上宣慈助化章》卷四有《元黄上品六合生算章》，每言“正真之道”，“三天正法”，“正教”云云^{〔1〕}。元祐柏人“元皇正法”当即杜书所说的“元黄正法”，也就是正一道的元黄上品之法，这更说明了它和天师正一道的派属有关。

以其他同时伴出的材料作为佐证，主要是这些代人材料在墓中大多不是孤立出现，而是往往还有其他一些具有道教特征的器物同时伴出。以下列举数例，加以说明。

江西南昌唐大顺元年（890）墓，与柏人同墓出土的还有“竹犬”、“竹鱼（鸡？）”、着帽“竹俑”和墨书木买地券。所谓的“竹犬”、“竹鱼（鸡？）”、着帽“竹俑”，当即道教所用的金鸡、玉犬和蒿里老人，道书多有记载，其他唐宋以来墓葬中曾有不少陶制品实物发现，本书另文曾有专门论述。此外，同出之买地券文内容，亦多与道教有关。本券出土时部分字迹模糊，简报原释读作：

唯大唐□□庚戌九月甲申朔十三日丙申，洪州南昌敬德坊歿亡

〔1〕《道藏》十一册，327页。

故人熊氏十七娘□□□□□命已终，别无余犯。今用铜钱玖万玖千玖百玖拾玖贯□□□□百匹，就蒿裏父老□都承武夷王贾得此地□，东至□□，西至□□，南至丙丁，北至壬癸，中央戊己，上至天苍（苍天），下至地碭。□□□□□□□□安葬熊氏十七娘神枢剋用九月十三日归家……章光玉堂土伯凶殃历罗府君，魂爽今下明堂，敕□□□此地占土水□方圆百里，藏上土历君侯二千石不得呵止。□□□人有□□□□廓田有顷（？）亩，钱有千百，熊氏十七娘埋葬谁敢□□立有四□□□注，墓舍四甬道路将□主持步度。此地若……退去千里不得停留。证知……有金银铜铁宝贝悉属后人掇有……读……识朱书前卷，死魂无乱谁为书。

□□□谁如读九□□□□□主人□人□□□万岁不得相关……律令□□□券。□钱买得镇□□□□□□□□□□〔1〕

审其文义，以上释读，多有未确。今参考前录本墓柏人文字和他墓出土地券材料，校订如下：

唯大唐罗次庚戌，九月甲申朔，十三日丙申。洪州南昌敬德坊歿亡故人熊氏十七娘，□□□□□命已终，别无余犯。今用铜钱玖万玖千玖百玖拾玖贯文、□□□百匹，就蒿裏（里）父老、安都承（丞）、武夷王买得此地坪，东至甲乙，西至庚辛，南至丙丁，北至壬癸，中央戊己，上至天苍（苍天），下至地碭。□□□□□□□□安葬熊氏十七娘神枢，克用九月十三日归家冢……章光玉堂，土伯凶殃，历罗府君，魂爽今下明堂，敕□□□此地占土水□，方圆百里，藏上土历二千石，不得呵止。□□□人有□□□□廓（？），田有顷亩，钱有千百，熊氏十七娘埋葬，谁敢□□立有四□□□注，墓舍四甬（？），道路将军，主持步度。此地若……远去千里，不得停留。证知……有金银铜铁宝贝，悉属后人所有……读……识朱书前卷（券），死魂无乱。谁为书？□□□。谁如（为）读？九□□□□□主人□人□壬午（秋？）万岁，不得相关。……如……律令！□□□券□钱买得镇□□□□□□□□□□

〔1〕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唐墓》，《考古》1977年6期。

券文中之蒿里父老、安都丞、武夷王、藏上土历二千石、土伯、历罗府君等，多见于东汉以来墓葬出土解注器文，《正一法文经章官品》、《赤松子章历》等天师道道书文献亦有记载，均为道教葬仪有关的道神，本书另文已有详论。“□命已终，别无余犯”，“千年（秋）万岁，不得相关。”是说墓主熊氏十七娘之死，系算尽寿穷而死，阳命应该结束，属于正常死亡的范围，并不是因为忤犯鬼神所致，死后发生的一切纠纷，永远都与家中生人无关。与柏人文中有关呼讼事宜概由柏人代为承当的意思是一致的。

江西吉安北宋开宝七年（974）王氏墓与柏人同时伴出的其他道教文物，除伏听、金鸡、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而外，尚有带道教内容的石买地券一块。原简报未发表地券释文，今据拓本图版释读如下：

维开宝七年岁次甲戌，十月乙亥朔，二十八日壬寅。今有江南西道吉州庐陵县宣化乡崇仁里梅□村没故亡人王氏夫人，行年八十三岁，因向后园采花，路逢仙人赐酒，因此迷而不返。凡人生居田宅，死还丘墓，谨用金银钱万万玖仟贯文，于天地父母处买得地名半山下舍丙向地壹坟，将与亡人王氏二娘永为山宅。其地东止甲乙，南止丙丁，西止庚辛，北止壬癸，上止皇天，下止黄泉。其地左有青龙，右有白虎，前有朱雀，后有玄武，内方勾陈，外方勾陈，分为界畔。乱系（丝）自□，死灰烟起，卵中鸡子能啼，如此之时，不可顾问。谁为书？水中鱼。谁为读？山中鹿。鹿何在？上高山。鱼何在？入深泉。急求之不得，觅之不见。欲觅相见，直待桑田改变相见。急急如律令！

奉太上老君斩之。

见人 张坚固

保人 李定度^{〔1〕}

本券文有的内容与一般地券不同，“因向后园采花，路逢仙人赐酒，因此迷而不返”，乃葛洪《抱朴子内篇》佚文、释玄光《辩惑论·章书代德是其五逆》等书所载东晋以来南天师道之说，本书中卷《吴晋南朝买地券、名刺和衣物疏的道教考古研究》一文已有详考。“奉太上老君斩之”，与本墓出土柏

〔1〕 王吉允：《吉安发现一座北宋纪年墓》，《考古》1989年10期，921页，图

人文“奉太上老君敕”，及前述江西另一宋墓出土柏人砖券文之“若有争，凶神恶鬼，急付太上老君”，其中的“太上老君”，都是道教的教主，更是人所共知的材料。张坚固和李定度，也是道教中的神仙人物。这些材料和柏人同墓出土，也说明了柏人本身的道教性质。

上海南宋嘉定六年（1213）张玮墓带“石若烂，人来换”文字的砖质屏风上雕刻道教神像，屏风前面放置的石像又着道装，也都说明此类材料应属古代道教活动遗存。

没有文字的生墓代人“墓主像”，除四川蒲江县五星镇北宋熙宁五年（1072）王□湜夫妇合葬墓有金鸡、玉犬、雷神、日月星官俑，和地券文中讲到的“守尸之鬼”等道教葬仪用品同时出土，前面已作了介绍。又如四川成都市东二仙桥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任某夫妇合葬墓，也有雷鼓、天关、地轴、玉犬等陶制道教冥器，以及上清派的华盖宫文、天帝敕告文和成套的灵宝派五方炼度真文石刻共出^{〔1〕}。上述其他出土代人材料的墓葬，往往也是相同的情况，说明代人用品，不过是这些道教葬仪材料中的一组成部分而已。

第三节 渊源和流变

有人在谈到上述河南偃师县杏园村北魏墓出土北魏正始五年（504）朱书陶“镇墓瓶”时，曾指出该器在此出现，“显然是承袭了东汉晚期墓中的一些习俗”^{〔2〕}，这是不错的。可惜其说过于简单化，未作进一步的分析考察。

上述几种类型的木人、石真材料，从器文所述和出土情况看不仅有质地、形制、时代、地域之差异，在用法、功能方面也有很大的不同。虽然总的说来也都属于道教代人的范畴，它们之间也有一定的同源关系，但两晋南北朝墓葬出土的木人和唐宋墓葬出土的柏人石真材料，应该分别属于两个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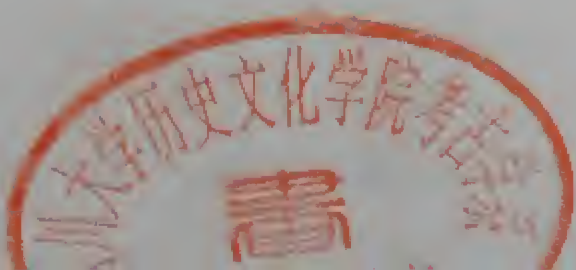
〔1〕 王仲雄、王军：《成都市二仙桥南宋墓发掘简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1999）。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偃师县杏园村的四座北魏墓》，《考古》1991年9期。

同的阶段。

如前所说，东汉的代人材料本有代生人与代墓主死人两个不同的系统。山西东汉墓出土熹平二年（173）张叔敬解注瓶文称：“上党人参九枚，欲持代生人；铅人，持代死人。”^{〔1〕}同时葬入人参和铅人作为避免生人受注的代人用品，铅是没有生命的矿物，所以铅人用来代替死人；人参是有生命的植物，所以用来代替生人，具体发生作用时，有直接与间接之分。代生人的人形器物是用人参之类的有生命的材料，代死人的人形器物主要是用铅等没有生命的材料。铅（包括金银之类的其他金属材料在内）人用代死人，在东汉本属定制。从理论上讲，人参和树木都是植物，后来的木人应该是由早期用人参之类代生人的系统发展演变而来，属于同一类型。两晋北朝墓代人大体上尚沿旧习，但在某些方面已有所改变。甘肃敦煌新店台 M156 前凉墓出土建兴九年（321）朱书陶瓶文之“建兴九年三月庚寅朔，廿五日甲申，直除，大女张雪光今身死。重复之日，生者软（谋？）议负担。谨以桐人、铅人，广肩大背，可以自代，天注以解，不得相注忤”，就是说墓主张雪光本身就是因为与前死者之日时重复受注而死，家里的人经过商议策划，害怕再有人于相同的时日受到注害，所以葬入宽肩大背身强力壮的铅人和桐人，各自分别作为生人和死者张雪光的替身，解除张雪光的苦难，避免生人再受重复牵连之殃，包括岁月时凶、八魁九坎、旱涝疫震等在内的各种天灾之注，一切解除。审此器文之意，与之大略相同。“铅人持代死人”，文中的铅人是用来代替墓主张雪光的。桐树与人参一样均为有生命的植物，文中的桐人当用以替代生人。本器文特地突出代人用品桐人和铅人“广肩大背”的特点，是为了说明它们身强体壮，完全能够胜任“负担”劳役，也就相当于陕西长安县三里村东汉墓出土建和元年（147）加氏解注器文中的“故以自代铅人，铅人池池，能舂能炊，上车能御，把笔能书”，是同样的意思。几乎完全沿用了正规旧习，这是很清楚的。自建兴二十八年（340）松人木牋契文开始，在讲到木人当“拘校复重”、“重复”、“死注咎”的同时，就出现了“西方有呼者，松人应之。地下有呼者，松人应之”的说法。所谓的“呼”，如前所说，就是道书记载的“呼讼”。而木人代人也分成了两类：一种是由松人代死人受谪罚，让死者鬼魂脱离苦境，不再成为注鬼或牵引鬼神拘执为害生人，而不再用铅人代死人。另一种是柏人直接代替生人承当呼讼复注，使生

〔1〕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94页。



人免于注殃。至于制作代人的材料，则往往随性质之异和时代早晚而有所不同^{〔1〕}。这和汉代的情况已经有所不同。南北朝道书《赤松子章历》更是多次讲到假人代生人之形以解注者。其假人所用材料，或金，或银、或锡。其数或一或五，一形者以一身总代全家生人，五形者按每方一身以代全家生人。亦有如卷一《病死不绝银人代形章》所云，代生使用“银箔人，随家口多少，一人一形”^{〔2〕}，而与上述汉张叔敬瓶文所载相同者。过去那种金属铅质人形只能用代死人的情况，至此已有所改变。

进入唐代以后，不再有专门用代死人的代人出现，甚至完全不再使用金属材料作代人，无论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遗存也都是一致的。唐宋墓葬出土用代生人的材料有石人和木人两类。木人一类，目前所知，只有以一形总代家亲生人的柏人一种，文献记载也仅见“柏人”之称。所承当的义务，则以杜绝冥讼引起的鬼神传呼死者家中生人造成的疾病死亡、财产损失为主，还包括为死者家中生人子孙罗致各种福运。所用木材种类由过去的桐、松、柏和其他一般的木材变为只有柏木一种。这种情况，除了沿用建兴松柏人木牒以柏人代生人的旧俗，和松柏多脂，防腐性能良好，易于在地下长久保存之外，专用柏木，可能还与道家的另外一种说法有关。《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五十四载云：“盖丛柏之尊，天降灵气，秉执万年。人寿之贵，三元所领，九地之最，形比金玉，万灵所卫……以柏木为相，秉之秀气，受正万年，灵司称金木之体，地府贵生成之简。故古之为棺槨，柏木为之者，免三涂之役。《虚皇宝录》云：以柏木为简者，代金玉也。”^{〔3〕}柏木不仅多脂防腐，利于地中长久保存，无金玉之价昂而具金玉之优点，且受天地之灵气，本身就有辟邪致福的作用，道家法物多以为材，以之雕像代人绝讼注，乃至在地中招取金银田产、六畜蚕桑林木、爵禄、聪明儿孙送与阳世后人等，当出于此。江西吉安宋初开宝七年（974）王氏墓柏人石契文：“准开元敕，赐与亡人……柏人一躯”，说整个器文内容，都是按照开元年间的敕令撰写而成。器文同时还讲到“长女、中女、小女”，“长孙、中孙、小孙”。江西南昌唐大顺元年（890）墓熊氏十七娘柏人文中也有“长男、长女、中男、中女”，“长孙、中孙、小孙”之语，证明“准开元敕”的说法是可信的。虽然所谓“长男、长女、中男、中女”，“长女、中女、小女”，“长孙、

〔1〕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94页。

〔2〕 《道藏》十一册，176页。

〔3〕 《道藏》三册，922～923页。

中孙、小孙”，按照当时人的意思大概是一种不甚确定的年龄大小等级观念，但溯其源当与唐代前期实行租庸调税制，将人按不同的年龄段分为老、丁、中、小、黄几等有关，大概“长”相当于“老”，“中”相当于“丁”与“中”，“小”相当于“黄”与“小”。又有关石契作成双螭首碑状的形制，也同样带早期唐碑的特点。这两方面的材料，也都和契文中“准开元敕”的说法相符，说明这种规范化的宗教葬仪，确系源于唐代玄宗开元年间所订的制度。柏人虽在唐代中叶以前的建兴年间已经出现，但松、柏并用，未专用柏人。是至玄宗时专用柏人，始为定制。明皇特重道教，开元之敕，文献无征，或系道门所传，与考古发现材料相印证，大抵可以说明其制应始于唐代玄宗之世。柏人定制出现之后，其他松人之类的木人就不再有材料发现了。

唐宋墓石真专用于代生墓墓主，为前所未有的。石为无生命之物，按理说，石人应该是从铅人系统发展而来为死者代人的材料。但石人文字明确讲到“今将石真替代，保命延长”，应与解注代墓主生身有关，自无疑义。墓葬石人代形属一人一形，且限于替代生存之墓主，保证墓主一人长寿，为寿藏所专用，与木人之属随墓主尸体入葬，可代家中各种年龄、性别、辈份之生人，保证合家生命乃至家畜林木等财产安全者不同。这是因为魏晋以后的代人用生物材料以代生人、无生命之物以代死人的原则已逐渐淡化，二者之间的严格界限已不复存在，铅人既可代死者也可代生人，石人自然也就不是非用来代死人不可。与此相反，由于隋唐以后道教代人已不再用铅而改用木、石，石质不易腐烂，雕琢石像最为逼真，唐宋以来宗教造像亦多用石，取“石若烂，人来换”之义，说要等到石人烂掉墓主人才来入葬替换，如果石人不烂，墓主则长生不死，制为“石真”藏于寿冢以代生人，可谓最为适宜。此石真之所由兴。陶质在墓中亦不易朽，具有与石质相同的优点，可以代石，所以用陶塑墓主像以代石雕墓主像而仍以“石真”名之，显然就是这样来的。上海南宋张玮墓出土砖屏前面的石像认为是一般的道教造像，那是不对的，实际上应是还活着的张玮的替身石真，因其奉道或即道士，故着道装。两种石真，性质上完全一样，只是做法上稍有不同罢了。石人石契均用于生墓，是墓主恐死后始建墓室，时有不及，提前在生时建成墓室以备用。但墓室毕竟最终是为死者藏尸而设，建造墓室而讳言死，遂作石人以代墓主真身，与神盟约，需待天翻地覆，海枯石烂，墓主方死去来与石人相会，意在祈祷墓主长寿。此种石人性质与上述木人相较，虽然从质地、形制和具体用法也都有很大的不同，但二者之间却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是属同一源头发展而来的一种后起的派生形式。

川西地区出土之石真材料，和苏沪一带宋墓遗存有明显的渊源，但也有所区别。成都石真墓，寿冢建成放入石真和附刻石券即行封闭，等到若干年后墓主死去，再将尸体敛棺入葬墓室，到了南宋时期，有的却是将尸体烧成骨灰再放入墓中。后面一种情况，与常人葬法不同。以“奉道弟子”而行此火葬，我们认为可能与道教火解之说有关。唐人薛少微注《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说：“世人德薄，功行未圆，虽不能骨肉同飞，亦能尸解而度。”尸解方式有多种，刀剑等兵器所伤致死为“兵解”，水淹而死为“水解”，火焚而死为“火解”。^{〔1〕} 唐人所编《道典论》卷一引《太极真人飞仙宝剑上经》说：“夫尸解者，尸形之化也……以录形灵丸涂火炭，则他人见形而烧死，谓之火尸解。”^{〔2〕} 《云笈七签》卷八十五有“宁封火解”条说：“宁封者，黄帝时人也，世传为黄帝陶正。有人守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积火自烧，而随烟气上下，视其灰烬，犹有其骨。时人共葬于北山中，故谓之宁封。”^{〔3〕} 这是道家以火葬为尸解之最典型材料。不过，宋代石真火葬墓之尸骨应是死后焚烧而非生人焚死者，所以上述意见也只是一种推测。

结 语

两晋十六国时期的铅人、木人和唐宋时期的柏人、石真，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除了质地形制方面的内容之外，主要在于后者只有代生人而无代死者性质的代人。无论石人还是柏人，或一家一形，或一人一形，或用于生墓，或随尸入葬，所代也都是生人，没有发现代替死人的材料。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应当与道教度亡醮仪制度的兴盛有关，为死者解谪，一般都是通过黄箓斋仪一类的斋醮仪式超度亡魂，不再采用过去那种简单的代人方式达到目的。从这一时期的代人器物文字内容看，死者灵魂与生人关系方面的观念也

〔1〕（宋）陈景元：《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四注》卷一，《道藏》二册，196页。

〔2〕《道藏》二十四册，844页。

〔3〕《道藏》二十二册，598页。

有了变化，过去那种特别强调生死异路，死者亡魂与生人绝对分离，一旦发生接触即将引起注祟的意识已很不明显，这和代人用法、功能的变化也应有关。以唐宋柏人文“准开元敕”为标志，八世纪前期唐代开元年间，应是划分墓葬代人形式前后不同阶段的分水岭。唐宋类型的柏人、石真，今后可能还会在唐代晚期之前开元年间以后的唐墓中发现，这是值得注意的。

唐宋以前有木人而无石人，而且都分布在北方西北甘陕境内，北方其他地区和整个长江以南都没有材料发现。到了唐宋时期，木人和“石真”两种类型的墓葬材料也都发现在南方地区江苏和四川，江苏木、石并存，四川则有石而无木，整个北方黄河流域还没有确切可靠的材料出土。几种不同类型的墓葬代人材料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流行情况，反映了这些主要属于天师道系统的葬俗在唐宋以来流传的历史情况。其性质、意义虽可参考道书文字得到解释，而有关的整个具体制度则为道书所未载，可补文献之缺略，很值得研究。

补记：近日获读北宋熙宁四年王洙所编《地理新书》，该书卷十五《禳除镇厌篇》记载：

由吾公裕说：凡厌墓呼人，以柏木板厚一分，刻作人形四枚，可长七寸，背书曰：“东方柏人呼，西方柏人应之”，墓内东厢安；“西方柏人呼，东方柏人应之”，墓内西厢安；“南方柏人呼，北方柏人应之”，墓内南厢安；“北方柏人呼，南方柏人应之”，墓内北厢安。^{〔1〕}

王书系根据唐代吕才以来堪舆术数之书多种，斟酌编纂而成，所载当为唐制而行于宋代者，与江西吉安县开宝七年（974）墓镇墓券文所说“准开元敕，赐与亡人王氏夫人柏人一躯，于墓中斩杀凶神恶鬼”相较，有合有不合。用柏人随葬墓中厌墓以避生人遭受鬼神呼讼之殃，并书文于背，以上两点最基本的内容，二者完全一致。二者不同之处，主要也有两点：第一，柏人用一分厚之柏木板作成，与甘肃磨咀子出土建兴二十八年松柏人形制相合，而与唐宋墓之用圆木者不同。第二，一墓所用柏人之数，《新书》云为四枚，东、

〔1〕《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术数类）一〇五四册，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金刻本。

南、西、北四方各一枚，而发掘唐宋墓所见都只有一枚。又王书所载，北方未见遗迹，是或王书成后数十年北宋亡，中原之地沦为金人统制，实际影响不是太大。南方墓葬柏人材料唐末已用之，至宋相传，自成一脉，所用不尽为王书所载制度。盖王书之制，在唐代亦只是由吾公裕一家之说，非开元定制也。

拾玖 江苏、陕西、河南、川西南朝 唐宋墓出土镇墓文石刻之研究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江苏、陕西、河南和四川西部成都附近的南朝唐宋墓葬中，不断出土一些被称为“镇墓文”的铭刻材料，有的刻在石板上，有的刻在砖板上，按习惯统称之为“镇墓文石刻”。这种石刻内容非常特殊，数量极多，种类不一，过去一般把它区分为“敕告文”、“华盖宫文”、“五精石”和“镇墓真文”等四种。前面三种，全用普通汉字刻写。所谓的“镇墓真文”，有的全用道教特有的符书字体刻成，有的主体部分为符书，同时还附刻一部分普通汉字材料。这种“镇墓真文”石刻，按其内容差异，实际上包含了三种不同的材料在内。除此之外，在没有发表的材料中，还有一种一道大神符下面附带普通汉字咒语的宋墓石刻，过去很少为人所知。三种不同的“镇墓真文”和大符咒语石刻，再加上前面三种纯普通汉字型的材料，整个“镇墓文石刻”共有七种不同的类型。这是过去一直没有弄清楚的。对于它们的用途，虽然很早以来人们已知其与道教有关，其中部分材料并有专文讨论，但其内容之具体含义及其在道教发展史上之源流、价值，迄今尚未有联系道书文献记载作深入的实质性研究者，谜底尚未真正揭开。此外，这些镇墓文石刻，在江苏、陕西、河南的南朝或唐墓中也曾有过一些零星的材料发现。与川西宋墓所出虽然在形制和组合方面不尽相同，而性质用途则完全一致，明显有渊源关系。由于过去未引起注意，于此一并论之。

第一章 镇墓文石刻的类型

第一节 “华盖宫文”与“敕告文”石刻

一、华盖宫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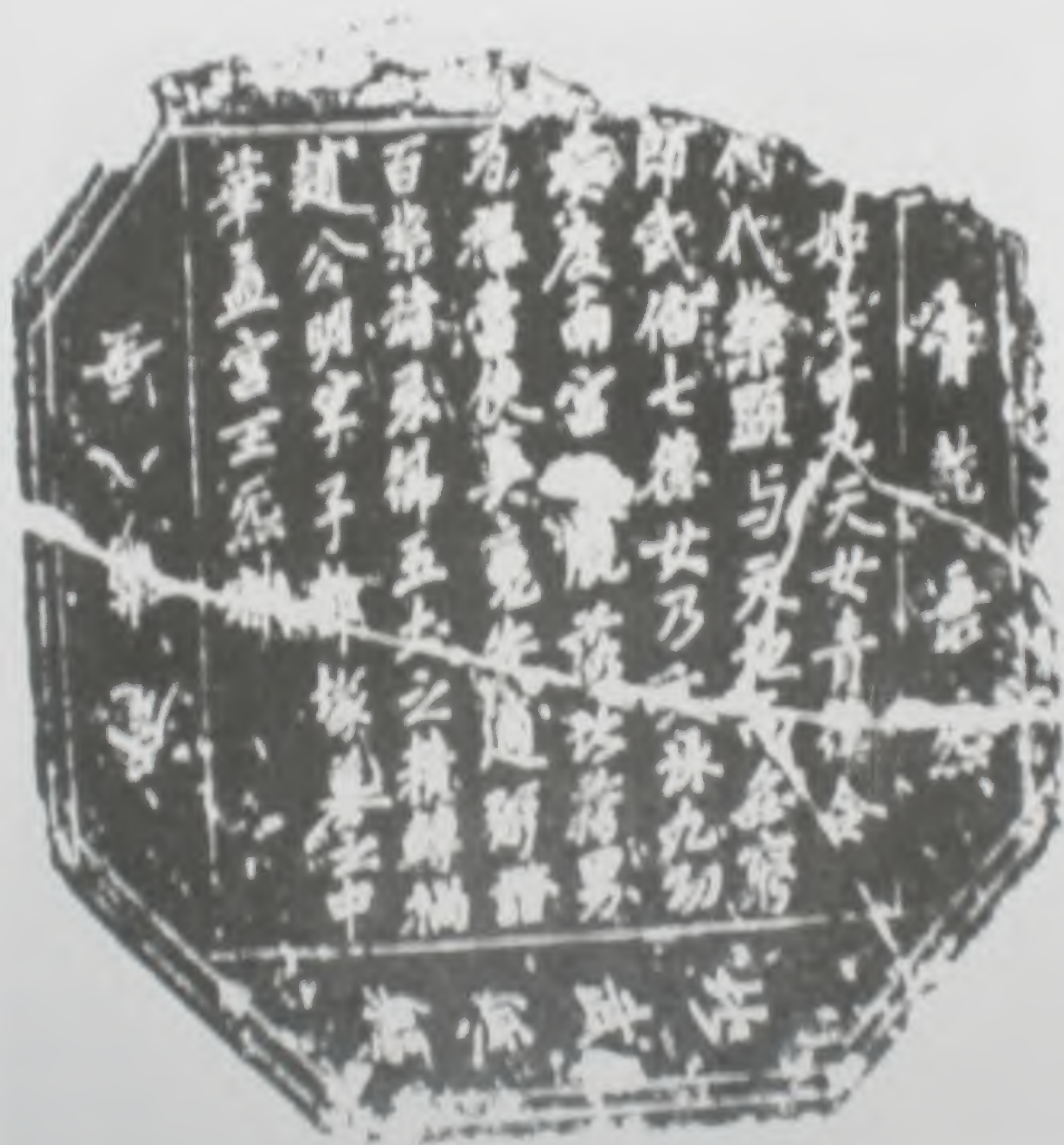
“华盖宫文”石刻，以铭文中“华盖神宫”或“华盖宫”名称为标志，形制和刻文内容同中有异。以形制而论，有八角形与方形两种。可分为两型。外形上的差别，意义不是太大，文字内容方面的不同，却很重要。今主要按文字内容之不同分作两型，先就有关材料情况作一些介绍，然后进行分析论述。

A型，铭文刻于一石，内容较详而比较固定，其主要特点为四方刻“青龙秉气”等十六字而无八卦，与文献记载有较大的一致性，可称其为“标准型”。可分为三式。

I式 以1998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四川成都东郊龙泉驿区十陵镇M2北宋双室合葬砖墓，左边嘉祐七年（1062）田世中墓室出土M2左：6号器为代表。石呈八角形，中间单线刻一大方框，周围刻双线与石边平行形成四个梯形带。在梯形带内，分别刻出“北武延躯”、“虎啸八垂”、“青龙秉气”、“田囟（朱鸟）翳目”。中间方框内从右向右刻文如下：

华盖宫王气神赵公明字子都，冢墓之中百禁诸忌，御五土之精，转祸为福。当使真魂安适弼谐，受度南宫，脱落北籍，男即武备七德，女乃文咏九功，代代荣显，与天地而无穷。一如土下九天女青律令！（图版拾玖：1）^{〔1〕}

〔1〕《成都市龙泉驿区青龙村宋墓发掘简报》（1999），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90页，图十。



图版拾玖：1

Ⅱ式 以 20 世纪 80 年代四川成都九眼桥与四川大学之间招飞办北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房府君墓出土一石为例，石作方形，在四周刻四方抹角线，线内四方按左、右、上、下顺序分别刻出“青龙秉气”、“虎啸八垂”、“朱雀辟非”、“北（玄）武延躯”字样。然后，在内刻成细线方框，方框内从右至左刻字八行如下：

华盖宫旺气神赵公明字子都，冢墓之中百禁诸忌，御五土之精，转祸为福。当使真魂安适弼谐，受度南宫，脱落北籍，男既武备七德，女乃文咏九功，代代荣显，与天地而无穷。一如女青律令！（图版拾玖：2）〔1〕

Ⅲ式 以 1998 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四川成都东郊龙泉驿区十陵镇 M6 北宋嘉祐前后田世用墓出土 M 6：2 号器为代表。石作方形，中间刻双线大方框，四周刻单线与边缘平行，再在中间方框四角外斜刻双线，使方框外形成四个梯形带，分别刻以“圉圉圉气”、“虎啸八垂”、“朱雀辟非”、“真武延躯”字样。然后，在内刻成细线方框，方框内从右至左刻字八行如下：

圉盖宫王气承赵公明字子都，冢墓之中百禁诸忌，害气之神，尽考□属，御五土之神精，转祸为福。当使者令子孙昌吉，禄祚遐长，千秋贵富，宜子宜孙，宜男宜女。急急如地下女青律令！（图版拾玖：3）〔2〕

B 型 此型以带有八卦图象为特点，铭文字数多少差别较大，与文献记载出入也大。可称为“变体型”。可分为三式。

I 式 以 1955 年清理四川成都外东跳蹬河南宋绍兴二年（1132）王宜人墓出土一石为例。石作四方抹角（八角）形，边内刻四方抹角细线框栏，栏内再刻一大方框，方框与四方抹角框栏间刻一周八卦，方框内刻楷书铭文。刻石略有断缺，字迹不完整，文曰：

〔1〕 原成都市考古队罗伟先队长提供拓片。

〔2〕 朱章义、刘雨茂、毛求学执笔：《成都市龙泉驿区青龙村宋墓发掘简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1999），291 页，图十一。



图版拾玖：2



图版拾玖：3

华盖宫旺气神赵公明字子都，冢墓之中百禁诸忌，御五土之精，转祸为福。当使真魂安静，所至弼谐，受度南宫，脱[图][北]籍，[口]后代昌隆，金玉满堂，福禄倍增，子孙荣显。一如五方使者女青律令！（图版拾玖：4）^{〔1〕}

又20世纪50年代发掘四川成都北门外羊子山淳熙九年（1182）严世广妻乔氏墓出土一石，石形、刻线、八卦皆与上述王宜人墓所出者相同，唯文字有所不同。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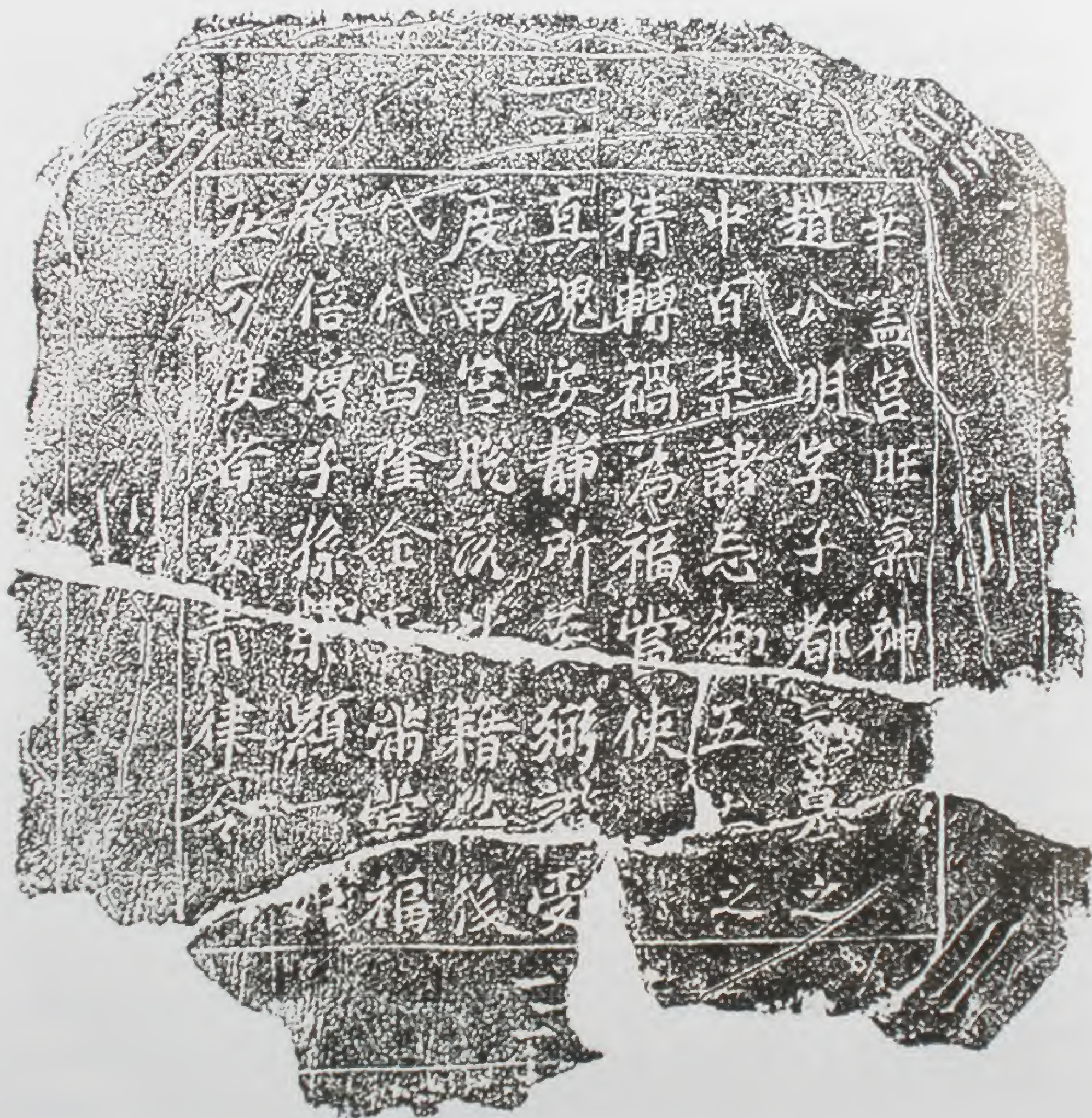
华[图]神宫五方旺气[图][神][图]公明等：今有奉道弟[图][子][图]氏行年六十五岁，[田][月][初]五日生，预造千年[口][口]，遂涓良日，将伸掩[图]，[口]后所[口]，福禄永坚，[图]孙安吉，身心吉健，命[口]石崇。[图]此明文，存[口][口]吉。一急（如）太上律令！^{〔2〕}

此石文字说明其为建成生墓时所用，与上述诸石用法有所不同。

此式最主要的特点是四周无“青龙秉气”等16个刻字而以后天八卦卦象代之，如“后代昌隆”至“子孙荣显”等佑护生人之祝语，则或有或无，没有一定。成都市考古队徐鹏章研究员惠赠其发掘四川成都市郊南宋隆兴二年（1164）张中正五郎墓出土一石拓片，文作：“华盖宫中五方旺气诸神等，当令故亡考张五郎生值清真之气，终存不死之灵，既……潜宁冲虚……不得[图][因][图][图]……[图]五土之精……一如律令！”四周亦有八卦。1957年发掘成都东南郊四川大学西区附近原得胜乡和平村一绍兴年间小型砖墓出土华盖宫文石刻二件，形制和文字内容基本相同而稍有出入，字迹书风也明显非出一人之手，入墓时间当略有先后之别。一件中间方框外四正四维仍画八卦卦象。框栏内文作：“[图][盖]宫中五方王气神[图]公明字子[图]，[口]在冢墓之中百禁诸忌，[口][口]为祸害，御五精，转祸为福。当令亡者早生天界，今后子孙金玉满堂，[口][口]显昌，与天地而[图][图]。[口][图]如五帝君律令！”另外一件石形栏式与上件相同，唯方框栏外之八卦不画卦象而以书写卦名替代，微有差异。框栏内文作：“华盖宫中五方[图]气神赵公明字子都，[口]在冢墓之中百禁诸[图]，[口][口]妄为祸害，遇（御）五土精，[图]祸为福，[口]令真魂……昌盛不绝。一如律令！”

〔1〕《成都外东跳蹬河发现宋代墓葬》，《考古通讯》1956年6期，73页，图二。

〔2〕据拓本材料释录。



图版拾玖：4

他石“五土之精”，此二石作“五土精”或“五精”，此种省称，值得注意。另他石所见之“御”字，此二石一作“遇”，一作“御”，当以“御”字得其本义，属正写，其他写法皆为不明文意者之别写。八卦不画卦象而书卦名，旨意无殊。凡此皆应归入本式。

Ⅱ式 以20世纪80年代发掘成都九眼桥与四川大学之间成都市二十九中侧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邓世英墓出土一石为例，石作正方形，边内刻两道细线方栏，栏内再刻双线八角八边栏框，八边形框栏内再刻双线方栏。八角栏内四方刻八卦中之四卦，栏外刻八卦中之另四卦。中间方框栏内刻铭如下：

华盖宫中五方旺气神等，守镇墓堂，一切神杀，不得妄生灾害，故邓世英真魂宁益，受度南宫，保佑子孙，永坚永固。一如天台律令！（图版拾玖：5）^{〔1〕}

另从先师冯汉骥教授处得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掘四川成都市郊宋墓出土一石拓片，石形、栏线、八卦与上述邓世英一石相同，文作：“华盖宫中五方旺气赵公明字子都，今有故吕氏八三太孺神魂安吉，荡绝六天，禄与天地同休，子孙荣贵，世代吉昌。一吉如律令！”亦属此式。

Ⅲ式 此式特点为铭文分刻于两石，字数多而带韵语，与文献记载文字出入甚大，可称为“变体式”。此式材料不多，迄今仅见20世纪50年代发掘四川彭县10号南宋墓出土一例。出土时，M10：7号和10：8号“两石刻有文字的一面相对重叠，放在腰坑之上”。M10：8号石放在上面，铭作：

华盖神宫，统摄无穷。五星璇玑，九曜皆同。气禀龄大，风虎云龙。朱雀翱翔，玄武垂从。各隆真（贞）祥，保佑昌隆。永镇岗穴，南山之松。紫茜远冢，气象升□，福荫后裔，禄□□□。

在铭文的四周，用甲子围成一圈。M10：7号石放在下面，文作：

赵公明字子都，□□□□之中，镇压寿堂之内，固禁固忌、五土之精，转祸为福，改灾为祥。伏乞□佑男生胡□寿堂遐龄，兼附亡

〔1〕 已故之原成都市考古队罗伟先队长提供材料。



图版拾玖：5

室杜氏道喜娘子幽室一所，各引旺气入穴，一枕来岗，永远千福，
□外邦于他方，纳吉祥□□□。^{〔1〕}

在铭文的四周，用八卦围绕。上面 10：8 号一石，铭首曰“华盖神宫”，自是“华盖宫文”无疑。下面 10：7 号一石，铭中虽无“华盖宫”之词，但其“赵公明字子都，□□□□之中，……百鑿閼閼，五土之精，转祸为福”之语，与上述诸式华盖宫文内容不仅意思相同，文字也是一样的，显然也是华盖宫文石刻的一组成部分。其“风虎云龙，朱雀翱翔，玄武垂从”，则似又包含 A 型 I 式中四周所刻“青龙秉气，虎啸八垂，朱雀辟非，玄武延躯”之意。至“五星璇玑，九曜皆同”；“紫茜远冢”等语，则为他式所无。其文字分刻二石，有底有盖，合上下二石为一器，与中原唐墓所出“五精石”有关。此式似亦建生墓时所用者。可惜发表简报时未附拓片图版，不知原始材料是否保存。

C 型 1999 年 12 月笔者在四川彭州市博物馆得见馆藏一正方形砖刻，中央“华盖宫”三字，余文：“今有大宋剑南西川彭州郫阳县□□乡没故亡考宋承之灵……今归神乡，□诣南宫，脱落北籍，世世炽昌，与天地而无穷。□□墓宅宁静，□护亡人，保佑子孙，永无殃咎。一如土下急急如律令！”由里向外旋刻。文字旋刻而无八卦及四灵内容，是其特点。可惜字痕较浅，未能拓片，对砖识读，有者难于辨认，有待将来拓本材料发表，可得更为完整准确之了解。今略述于此，以期引起注意。

此外，从后面将要述及之四川成都华阳三圣乡北宋熙宁二年（1096）曹姓道士墓材料看，两宋时期华盖宫文石刻和敕告文一样也有少数呈近六角形者，至少在北宋时是如此。可惜没有见到拓片材料，不能得到更为详细准确的了解。

“华盖宫文”多不著墓主的姓名、官封。

“华盖宫文”石刻，据现在所掌握的材料，仅在川西宋墓中有实物出土，以四川成都龙泉十陵镇青龙村一五砖厂北宋中叶仁宗嘉祐七年（1062）田世中夫妇合葬墓出土者为最早，将于后详述。A 型南北宋皆有，北宋未发现 B 型和 C 型，可见 B 型和 C 型属后来晚出的类型。

〔1〕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官渠埝唐、宋、明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6 年 5 期。

二、天帝敕告文

“敕告文”石刻，以文首有“天帝敕告”之语，整个刻文为天帝敕令内容而得名，亦称“天帝敕告文”石刻。川西宋墓所出者，从形制看有六角形（包括八边而左右两边较短）和方形两种，从文字内容看亦有生墓与尸墓之不同。可分为两型。

A型 其特点为石形和铭文内容也都大体上按照道书文献记载制作刻写。分为二式。

I式 1998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四川成都东郊龙泉驿区十陵镇M2号北宋嘉祐七年田世中夫妇双室合葬砖墓，左边嘉祐七年（1062）田世中墓室出土红砂石买地券、华盖宫文、五方炼度真文同出的一方天帝敕告文，“平面呈抹角方形，临边处刻六边形框栏”，栏内自右向左竖刻七行楷书汉字：“天帝敕告土下冢中王气五方诸神、赵公明等：今有男弟子田世中，行年四十七岁，十一月生。生值清清之气，死归神宫，瘞身冥乡，不得妄为害气。令真魂安适弼谐，受度南宫，脱落北籍。然后子孙昌盛，金玉满堂，世世贵王，与天地而无穷。一中（如）上下九天律令！”^{〔1〕}该石为本式之年代最早者，可惜未附图版。1950年代发掘四川成都东门外华阳县三圣乡上河村M2北宋熙宁二年（1068）曹氏墓，出土本式敕告文一石，八边形而左、右二边极短，呈近六角形，长41厘米，两端宽24厘米，中宽40厘米，边内周围亦刻六角形框栏。栏内刻文，原简报未作释文，今据附图拓本照片释读如下：

天帝敕告土下冢中王气诸神、赵公明字子都：今有小兆臣曹氏，行年七十四岁，九月十四日生。生值清真之气，死归神宫，瘞身冥乡，不得妄为害祸。当令真魂宁□，然后男即武备七德，女乃文咏九功，与天地而无穷。一如律令！（图版拾玖：6）^{〔2〕}

〔1〕《成都市龙泉驿区青龙村宋墓发掘简报》（1999），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290页。

〔2〕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华阳县北宋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12期，42页，图四。



图版拾玖：6

Ⅱ式 以四川成都东门外沙河堡原一五一工地宋墓出土一石为例，洪剑民《略谈成都近郊五代至南宋墓墓葬形制》附载拓片图版，石作八边近六角形，边内刻两道六角形框栏，栏间刻短线水波纹。里层六角形框栏内再刻一大方框，方框与此六角形框栏间距较大，上下方及左右两角刻半圆弧线，弧线内刻凿芝麻点纹饰。半圆弧上下各六，左右各三，似以三弧为一组。中间框栏内文曰：

天帝敕告土下冢中王气诸神赵公明等：今有弟子文承咏，行年三十一岁，十月生。生值清清之气，死归神宫，瘞身冥乡，不得妄为害气。当令精魂安适弼谐，受度南宫，脱落北籍，然后子孙昌盛，金玉满堂，世世贵王，与天地而无穷。一如土下九天律令！（图版拾玖：7）^{〔1〕}

此石具体年代不明，似应为北宋遗存。

B型 此型特点，乃在敕告文之外增刻“青龙秉气，上玄辟非，玄武延躯，虎啸八垂”等十六字。在此型刻石中，又可按“青龙秉气”等六字所在之位置及文字内容所云使用制度之不同分为三式。

I式 以四川成都东门外跳蹬河南宋绍兴二年（1132）王宜人夫妇合葬墓出土一石为例，石作方形，边内刻八角形框栏，栏内再用两道方形框栏分为内外两区。中心区自左至右直行刻“青龙秉气”等四句十六字。外区作三重环刻敕告文，文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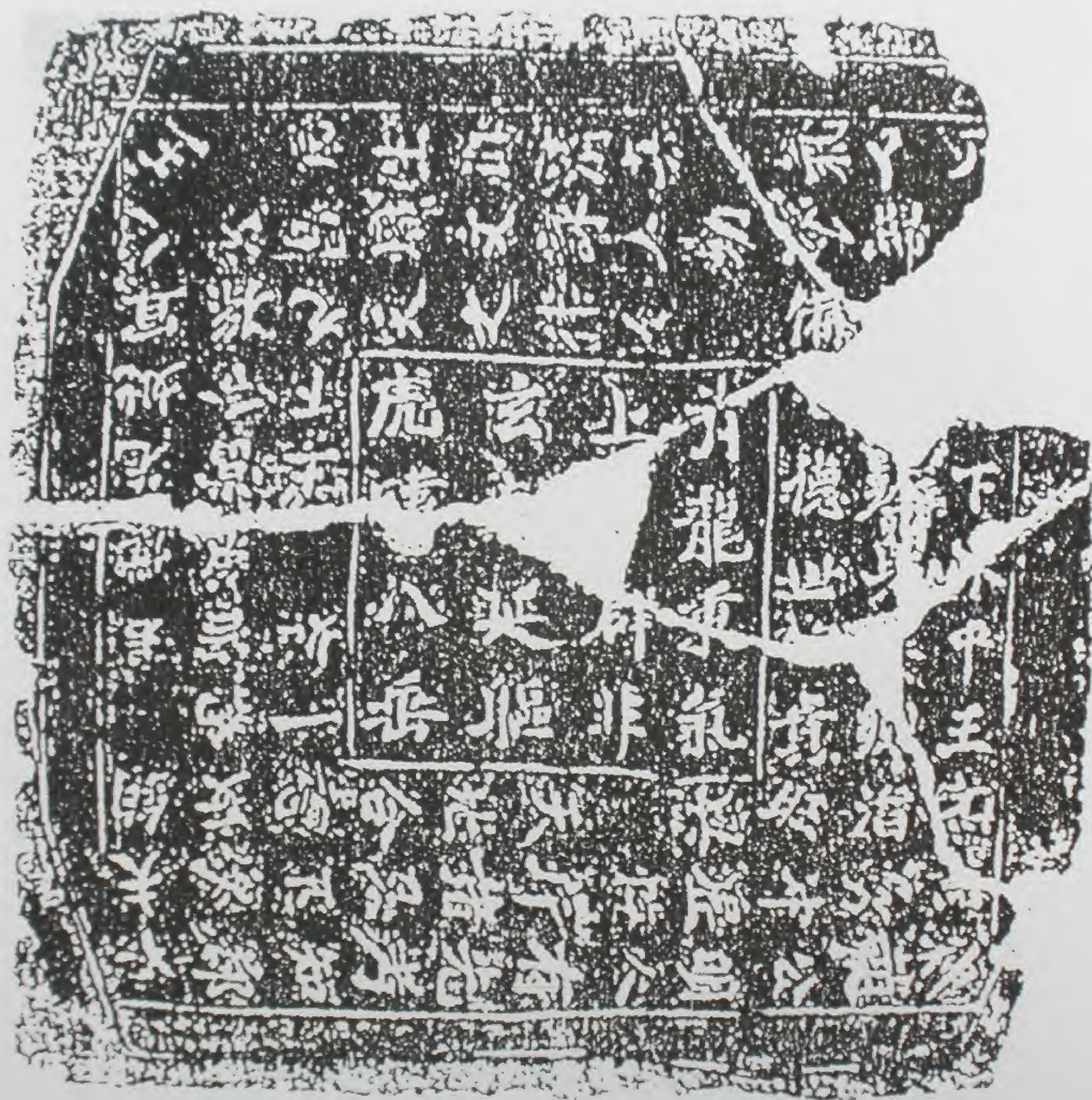
天帝敕告土下冢中王气诸神赵公明等：今有先考知郡大夫钧君□、先妣宜人王氏，生值清真之气，尸归神宫，瘞身冥乡，潜宁冲虚，辟斥诸忌，不得妄为害气。当令子孙昌炽，文咏九功，武备七德，世世贵旺，与天地合德。一如土下九天之律令！（图版拾玖：8）^{〔2〕}

〔1〕 洪剑民：《略谈成都近郊五代至南宋的墓葬形制》，《考古》1959年1期，39页，图八。本图版据自藏原石拓片摄影。

〔2〕 傅汉良：《成都外东跳蹬河发现宋代墓葬》，《考古通讯》1956年6期，76页，图三。



图版拾玖：7



图版拾玖：8

Ⅱ式 以四川成都市郊南宋黄氏五娘子墓出土一石为例，石作方形，边内双线刻八角形框栏，再刻大方形框栏，于方形框栏外四方分刻“青龙秉气”等十六字，每方四字。中间大方框内直行右行刻文：

天帝敕土下冢中旺气神赵公明等：今有□□黄氏五娘子生值清真之气，终存不死之灵，尸归神宫，翳身冥乡，潜宁冲虚，辟斥诸忌，不得妄为祸害。当令子孙昌炽，文流九功，世世贵旺禄，与天地之无穷。如律令！（图版拾玖：9）^{〔1〕}

“文流九功”，“流”字当为“咏”字之误。又成都九眼桥原招飞办发掘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从义郎邓世英墓出土天帝敕告文石刻亦作此式，双线刻栏，中间大方框内由右向左刻字七行，文曰：“天帝敕告土下旺炁神等：今有亡者邓世英，生值清真之炁，终存不死之灵，尸归神宫，宜资善护，当令子孙旺禄，与天地而同休。”四方十六字作“朱雀辟非”，“玄武延躯”，“青龙居左”，“白虎守右”（图版拾玖：10）^{〔2〕}。部分文字与他石微有不同。

Ⅲ式 以成四川都北门外羊子山 147、148 号南宋淳熙九年（1182）严世广及其妻乔氏合葬墓出土二石为例，石作方形，边内四周刻方框，四角刻云纹，方框四周刻“青龙秉气”等十六字。中间方框内刻敕告文，148 号墓室所出乔氏一石文曰：

天帝牒告土下五方旺气诸神赵公明等：今有奉道弟子乔氏，行年六十五岁，十月初五日生，建立寿堂，以伸庆贺。伏愿掩吉之庆，寿同彭祖之载，各保贞祥。江水一瓶，用为契信，水干石朽，方开此穴。立此明文，永保安吉。□急如律令！（图版拾玖：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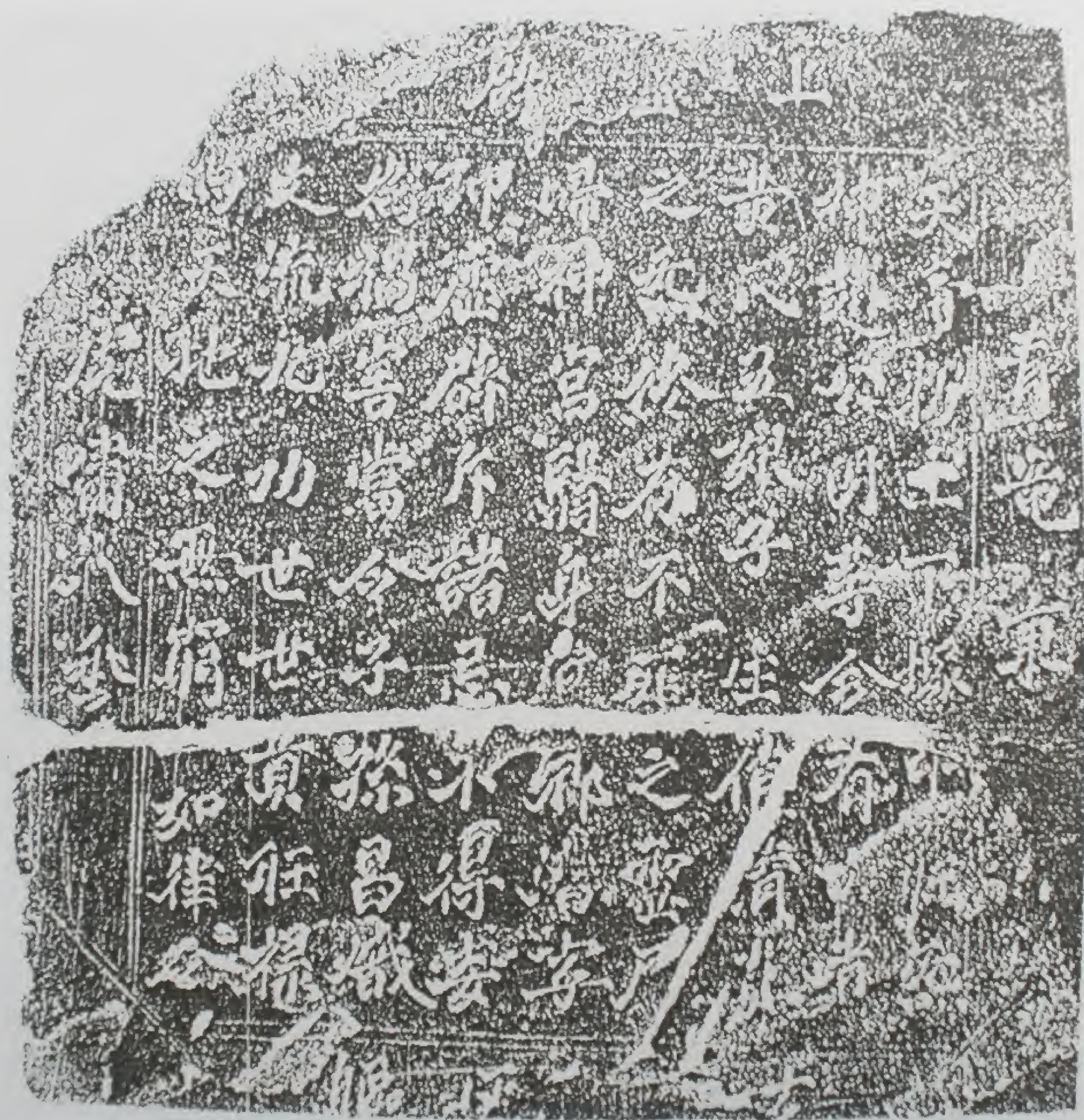
此刻石当为建成生墓时放入墓中，其内容特点一见可知。

此外，成都龙泉驿区青龙村嘉祐年间田世用墓出土 M6：3 号石残去上半，仅存下半段（图版拾玖：12）^{〔3〕}，有“……王炁五方诸神赵……弟子田

〔1〕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徐鹏章惠赠原石拓片。

〔2〕 原成都市考古队罗伟先队长提供拓片材料。

〔3〕 朱章义等：《成都市龙泉驿区青龙村宋墓发掘简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1999），29 页，图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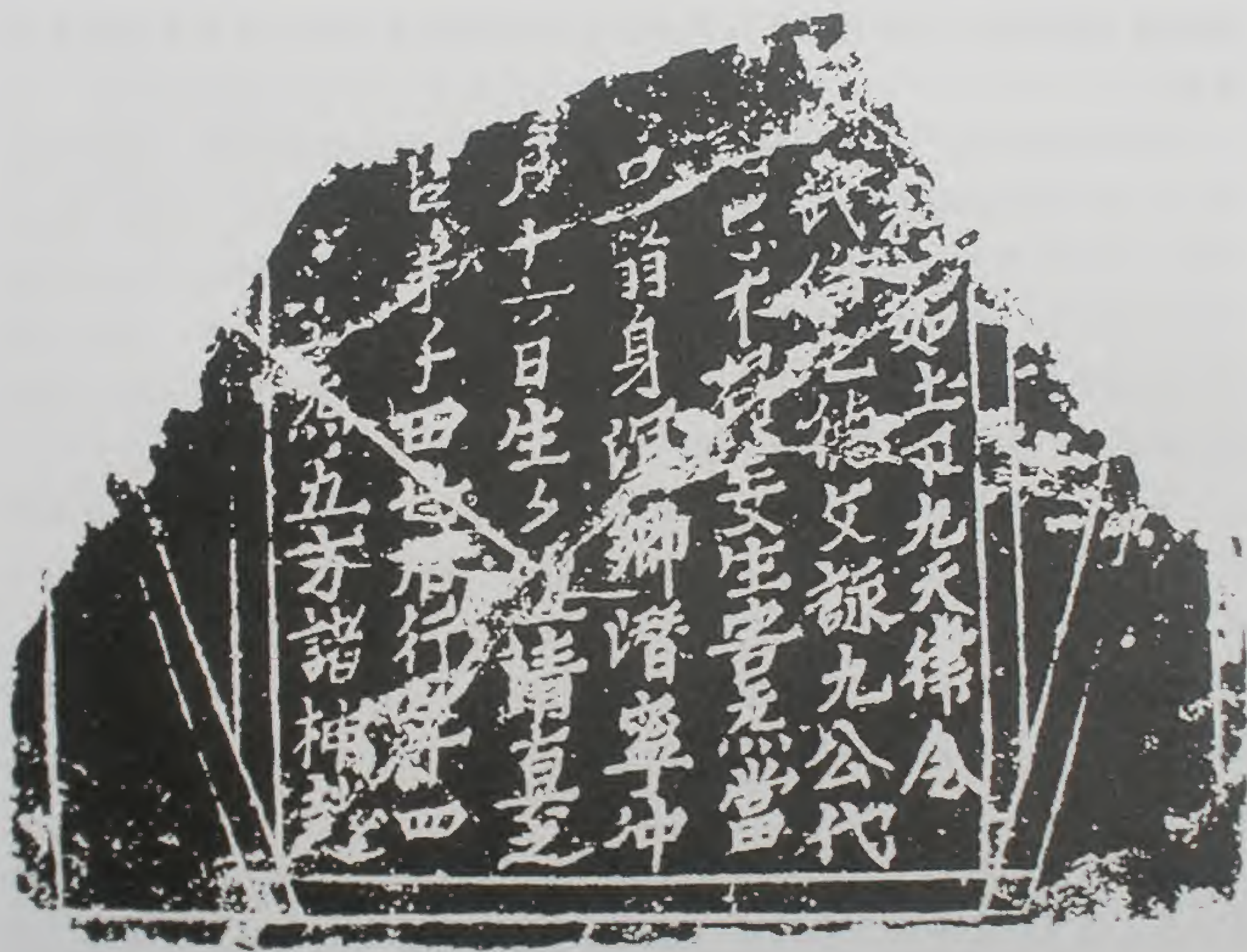
图版拾玖：9



图版拾玖：10



图版拾玖：11



图版拾玖：12

世用行年四……月十六日生，生值清真之……翳身溟乡，潜宁冲……诸忌，不得妄生害炁，当……武备七德，文咏九公（功），代……如上下九天律令！”等字可见。从刻石边缘和刻线形状看，石作方形，中间双线大方框内刻写敕告文，方框外再刻双线六边形框栏，四方无“玄武延躯”等字，与上述诸式天帝敕告文都不相同，其年代较早，因保存不全，不知是否属于另外一种型式，姑作附录于此。

从现在已知的材料看，敕告文石刻均无有关八卦之图象或文字，但一般都有墓主的姓名，如有官封者亦加标注，这是敕告文不同于华盖宫文的显著特点。







川西宋墓中的“华盖宫文”与“敕告文”两种石刻的关系，过去有人说：“一般说来可能北宋用敕告文（六方形），南宋用华盖宫文（正方形）。”根据上述材料考察，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自四川成都龙泉嘉祐七年（1062）田世用墓开始，敕告文除六方形之外也有作方形者。但总的说来，无论天帝敕告文或华盖宫文石刻，除了在方形石板上刻出八角形双线框栏之外，真正将石板作成六角形的数量很少，有的也只在北宋时期出现。

华盖宫文和敕告文石刻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材料，但器形和刻文内容却往往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如“土下冢中王（旺）气神赵公明子都：男即武备七德而女乃文咏九功”；乃至正文以外大字书刻上下左右四方之“青龙秉气，上玄辟非，玄武延躯，虎啸八垂”等，往往两种石刻也都可以看到，表现出两者之间存在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可能有某种共同的渊源。这是值得注意的。

华盖宫文和敕告文石刻材料，在川西地区虽然要晚到北宋中叶以后才开始出现，但其中的敕告文在其他一些地方却出现得较早，而且本身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北方的黄河流域中原地区，1964年考古工作者河南扶沟县发掘了一座约在开元、天宝年间以前的唐代赵洪达墓，发现“墓志石2方。皆为正方形。出土于墓室的中部。其中一方有盖，但志石及盖上均没刻文字；另一方仅存志石，无盖，石长36、宽38、厚8~10厘米，制作很不平整。其上刻文字九行，每行12字。志文云：

天帝告上（土）下冢中王气四方诸神赵公明等唐国许州扶沟县
 □川公赵洪达年四十□□□年七十二生□□□气死归神宫
 □□□□乡□冲虚辟序诸忌不得忘为□气当令子孙□□□九
 功武备七□世世富贵王与天地无穷一如主下九天律令

志文四侧刻篆书十六字，上刻‘上宫辟非’；下刻‘宫□延□’；右刻‘清龙□气’；左刻‘虎啸□□’。篆书之外有线刻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图案。”（图版拾玖：13）^{〔1〕} 由于简报编写者对石刻性质缺乏认识，将之视为一种“墓志”，释文亦有不少错误。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有人在专门研究洛阳地区隋唐墓葬材料的大型论文中，仍然沿袭了这一错误的释文和石刻性质的判断，“认为这是一种志盖与志石融为一体的异形墓志”^{〔2〕}。对照上述川西宋墓出土镇墓文材料可知，此刻石实为类似B型Ⅱ式之“敕告文”。不同的只是围绕中间九行敕告文四周的“青龙秉气，上玄辟非，玄武延躯，虎啸八垂”系用双钩楷书刻写，编者误以为篆书。四方十六字与中间敕告文之间无框栏相隔，另在每方四大字之外靠石边外分别刻出与铭文内容相应之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图像，这是川西两宋墓出土材料所没有的。细审该石拓片图版，参考其他有关资料，其敕告文之正确识读应为：

天帝告土下冢中王气、四方诸神、赵公明等：唐国许州扶沟县
 □川公赵洪达，年四十；夫人□氏，年七十有二。生值清真之气，
 死归神宫，身冥乡，潜宁虚，辟斥诸忌，不得妄为害气。当
 令子孙昌，文九功，武备七德，世世贵王，与天地无穷。一如
 土下九天律令！

最末的符号，当别有含义，于后再论。将此石材料与上述川西宋墓所出敕告文相比较，除部分形制小有差异而外，文字内容完全相同，这是十分清楚的。另河南省洛阳市旧出隋开皇二十年（600）马稚与其妻张氏合葬墓志，原石藏陕西省博物馆，视其拓片图版，在志前题名“大隋故荡边将军信州典义马君墓志铭”之前，有隶书大字一行，文曰：“天帝告冢中王气、五方诸神、赵子都等：马老生善人。”（图版拾玖：14）^{〔3〕} 只刻了敕告文前面的十多个字，而且是附刻于墓志文前，没有单独刻石，时代亦远在扶沟、川西唐宋墓敕告文之前，应是此种镇墓文石刻的早期形态，具有显著的原始性特征。河南与四川隋、唐、宋墓出土的几种敕告文石刻，有着一脉相承的发展

〔1〕 河南省文物工作队：《河南扶沟县唐赵洪达墓》，《考古》1965年8期，387页，图二。

〔2〕 徐殿魁：《洛阳地区隋唐墓的分期》，《考古学报》1989年3期。

〔3〕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一册，24页。



图版拾玖：13

夫帝告塚中王業五方諸神趙子都等馬老生護
大隋故盛將軍信州興義縣人趙靈王之子馬服君之後
尚書勳學六藝皆通刺史西漢朝名典三十有餘晉室宰平八九
折恭子官歸楷智數之西漢朝名典三十有餘晉室宰平八九
而己隆華蓋轉朱輪樹映空時望衆四海祖顯除平遠將軍鳳
元姿龍虎挺異器翩翩書記不異陳琳情情風流還同賦昆輕於世
事貴在無爲父賢解褐挽郎又除通直知若月望重府寶又授
冠軍將軍宋義之才具深沈清虛尚遠次歛之折旋損翼羽儀非
遜將軍輝戈動不爲錢杖之應感渡水結冰王霸之消息又授內均
將軍官州典籤尺情操之宜略相龍遂有家傳數百終朝其
之業取置於懷石享倫之宜略相龍遂有家傳數百終朝其
亦既安還取不能散入伽藍之室累日忘歸陪講肆之堂終朝其
返濕心回向頃倉庫之資設意行檀捨絲桐之玩經疏切貝益
之籍已空像鍊十區胥王之功未盡奄歌梁木恰被丰侯春秋大
十有五終於平樂鄉廣世里殯於正寢夫人南陽張氏之女斷機
弘訓爲母儀存則樂世有靈死使同穴以禮厚以大隋開皇二
十年歲次諸離月居因葬日在攝提舍箕于浴陽三市之而南八
里地多形勝宅兆惟宜前對崑崙却崇邱阜固不可殯焉
豈遠爲卑深落昔蕭蘭桂垂芳金石未銷迺銘曰
亡事同泉下太山如麗蘭桂垂芳金石未銷迺銘曰
爰初志學廩官宰相駟馬聯輝清塵可望祇固亦鑒招提
置福田心焉放曠一壘石見火流電過隙淵芒宅兆宜其
思路迴人稀寒雲漸密輕沙細飛維看墳地號淚霑衣

图版拾玖：14

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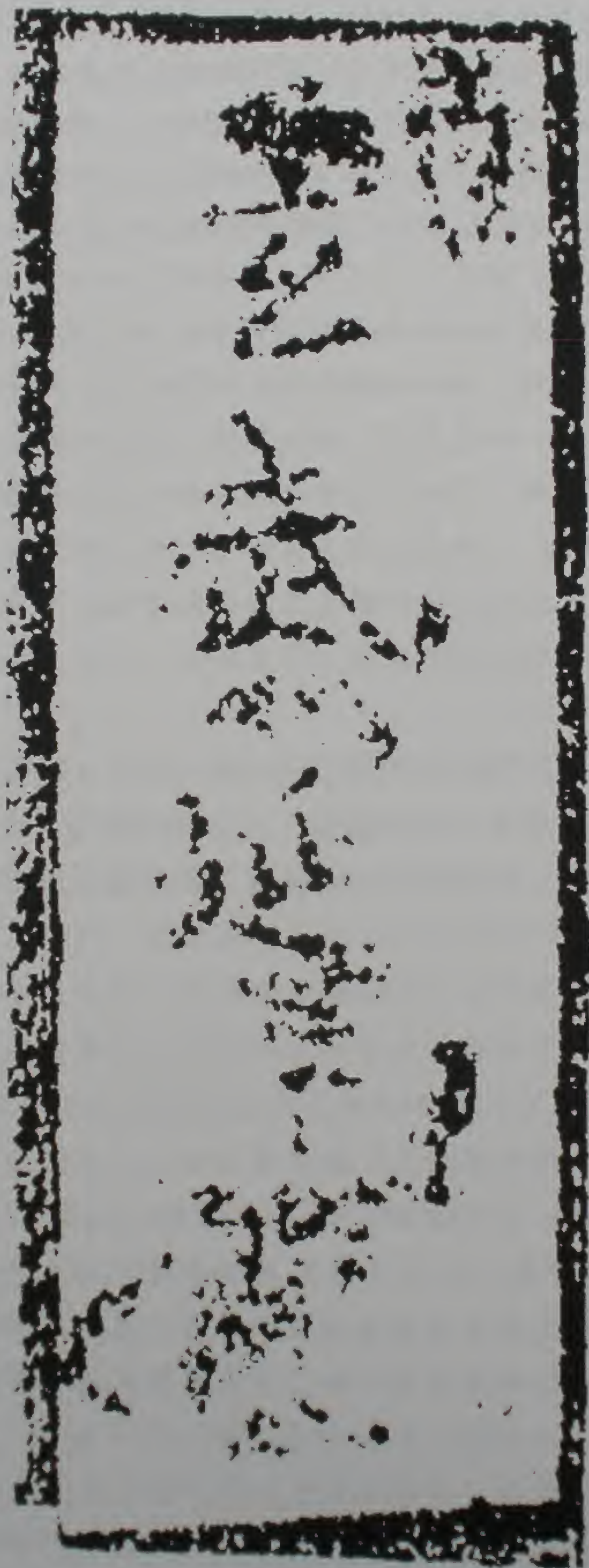
在江南地区，此种敕告文虽未发现有时代更早的完整材料，但其中“玄武延躯”墓砖，却已有梁代实物发现。“文化大革命”期间，江苏句容农民在茅山北部的小山峰雷平山偶然掘开一座梁“天监十九年”铭砖墓，墓主为一佛、道双修的道士，砖铭自称“太上道君之臣”、“释迦佛陀弟子”。在多种不同铭文的墓砖中，有一种名作“玄武延□”者（图版拾玖：15）^{〔1〕}，末字字迹模糊不清，江苏句容市文管所陈世华推测“或为‘年’字，大约取龟蛇寿长之意，正合道教求长生不老义”。其实该字应释为“躯”，此砖全铭应作“玄武延躯”。陈世华考证，砖文为陶弘景所书。如此说不误，则与陶氏编著之道书文献记载正相吻合。对此，将于后文论之。可惜该墓被毁，陈世华仅从墓地附近一农民家中获见残存之部分铭砖。已毁失之铭砖，不知是否另外还有“青龙秉气”、“上玄辟非”、“虎啸八垂”等三种在内。

“敕告文”与“华盖宫文”属道教上清派的材料，二者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对此，上清派著名道士陶弘景在《真诰》卷十，协昌期第二有详细的记载。这一记载，是解决上述诸石刻问题的关键材料，过去在学术界又很少有人引用，我们先把它抄录下来，然后进行分析考察。文云：

范幼冲，汉时尚书郎，□解地理，乃以冢宅为意。魏末得来（引者按：此字应从《洞真太上太霄琅书》卷八作“道”），在童初中。其言云：“我今墓有青龙秉气，上玄辟非，玄武延躯，虎啸八垂，殆神仙之丘窟，炼形之所归，乃上吉冢也。”其言如此。（此犹是前所服三气之范监也。四灵虽同墓法，而形象莫辨。又以朱鸟为上玄，亦所未详也）积善憩德，慈心在物，兼修长存之方，洞守形中之宝者，虽有此墓，为以示始终之观耳。至于神全得会熙镜玄开（引者按：此处文义不可解，《洞真太上太霄琅书》作“至于神全德全德会熙镜玄观”）亦何时，永为朽物，不复生出耶？此墓之人，斯可为应运矣。（此并论长史妇所葬墓事）

在紧接此文之后，复有低三字刻写之文三段。文曰：

〔1〕 陈世华：《陶弘景书墓砖铭文发现及考证》，《东南文化》1987年3期，56页，图13。



图版拾玖：15

夫欲建吉冢之法，去块后，正取九步九尺，名曰“上玄辟非”。华盖宫王气神赵子都冢墓百忌，害气之神，尽来属之，能制五土之精，转祸为福。侯王之冢招摇，欲隐起九尺（引者按：《洞真太上太霄琅书》此下尚有“庶人五尺”四字），以石方圆三尺题其文，埋之（引者按：《洞真太上太霄琅书》此下尚有一“入”字）土三尺也。世间愚人，徒复千条万章，谁能明吉凶四相哉！辟非之下，冢墓由此而成，亦由此而败。非神非圣，难可明也。必能审此术，子孙无复冢墓之患。能知坟墓之法，千禁万忌，一皆厌之，必反凶为吉。能得此法，永为吉冢。不足宣也。〔此一纸异手书青纸。依如此法，亦为可解，其九步九尺，而不云十步三尺者，是九尺入冢墓（引者按：此字《洞真太上太霄琅书》作“里”），正取中心为数也。但辟非应是朱鸟，而云冢复。若征家甲向，朱鸟在西南；羽家庚向，朱鸟在东北，所不论耳。〕

本段字凡十五行（原注用小字刻写，两行算一行），其第三、六、十、十四行之顶端，分别顶格刻写“青龙秉气”、“上玄辟非”、“玄武延躯”、“虎啸八垂”四句，字形较小，有若后之作眉批者。其后提行复云：

员三尺题其文曰：“天帝告土下冢中王气，五方诸神、赵公明等：某国公侯（引者按：此二字《洞真太上太霄琅书》作“帝王公侯官生民”）甲、乙，年如干岁，生值清真之气，死归神宫翳身冥乡，潜宁冲虚，辟斥诸禁忌，不得妄为害气。当令子孙昌炽，文咏九功，武备七德，世世贵王，与天地无穷。一如土下九天律令！”（员三尺，犹是方员。方员之法，六边皆等，如印形也。赵公明，今《千二百官仪》乃以为温鬼之名。九功十德，事出《左传》）

夫施用此法，慎不可令人知。若云冢墓王相刑害诸不足者，一以填文厌之，无不厌伏，反凶为吉。四（行下被割，余一字如此。当是此字后行又被剪，语则未尽也。从“员三尺”来，别一纸。后是异人迹，不与前同，而俱书青纸，色理亦小殊，疑此迹写非真。前范监既有此言，恐后人因以造法耳）〔1〕

〔1〕《道藏》二十册，550页。

上录文字经仔细考察，知凡低一格写者，据陶氏双行夹注文称，乃另一人所书写，与最前面一段顶格写者书写人不同。《正统道藏》正乙部，左字号《洞真太上太霄琅书》卷八，所载文字内容与此全同，除个别字句为今本陶书传刻脱误，已在引录时加注说明而外，段次前后略有移易，并另外加上了一部分解说材料，其中颇有能说明问题者。有云：

[学道之人死后]，上学之曹，身神未得俱去，运应转轮，皆用舍身之术，炼神上升，留尸下瘞。瘞之卜地，同墓凡人，不骇于俗，是谓和光。至于密法，潜候山川，施置会神，镇尸不朽，朽即又生，终与神会。天地不偏，灵祇归一，地有青龙秉气，色（引者按：此当为“上”字之误）玄辟非，玄武延躯，虎啸八垂，则藏尸少时，枯骸更肉，凋藏生花，瘁形不郁，先神后身，混合为一。炼易之妙方，成真之要术，精能遵行，福流万叶矣。^{〔1〕}

查《洞真太上太霄琅书》一书，题为“紫微夫人撰”。据《真诰》卷一，运象篇引南岳夫人说：“紫微左夫人王，讳请娥，字愈意，阿母第二十女也。”又卷十九，翼真检篇引《南岳夫人传》云：东晋兴宁二年（364），南岳夫人“已降授杨君诸经”。如此，则紫微夫人生当在东晋兴宁年间以前，《洞真太上太霄琅书》之成亦在其时。但其说未必可信。《洞真太上太霄琅书》实为托名之作。北周宇文邕《无上秘要》卷三十，经文所出品，已据《洞真太上太霄琅书妙经》言：“《太霄琅书》乃九天王飞霄之曲，《琼文帝章》乃九天之上文，并以元始之初，生于自然虚洞之中，虚皇玉帝受之于九玄。”至迟在唐初即已成书的《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教营始》^{〔2〕}卷五《上清大洞真经目》所录，已有《上清太霄琅书琼文帝章》之书一卷^{〔3〕}，是其书亦当为隋以前之作。但《真诰》内容，乃梁代以前一些著名道士假托仙真口授材料之原始记录，故《洞真太上太霄琅书》之成，时代应略晚于陶弘景，其材料当出自《真诰》。

〔1〕《道藏》三十三册，692页。

〔2〕《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教营始》一书的年代，学术界的看法不一致，胡道静等编《道藏要籍选刊》八册提要以为“约成书于陶弘景歿后二十年间”，即梁武帝大通九年至梁元帝承圣四年（公元535—555年）；而日本学者尾崎正治等著《道教》第一卷（82页）则以为系“唐太宗（626—649）时期编纂的”。

〔3〕《道藏》二十四册，760页。

对照河南扶沟唐代赵洪达墓及川西宋墓所出的“敕告文”和“华盖宫文”石刻，可知皆出自《真诰》与《洞真太上太霄琅书》。敕告文不仅文字内容相同，川西宋墓所出之作六角形者，亦与《真诰》二书之“以石方圆三尺题其文”制度相合。盖陶氏注云：所谓的“圆三尺，犹是方圆。方圆之法，六边皆等，如印形也。”此处之“六边皆等，如印形”，本来是说石作立方形体，长、宽、高皆三尺。六朝时流行六面印，故云“如印形也”。后人或误解文意，或有意适当加以改变以便安排刻文，做成了“六边皆等”的石板。作成四方形或四方抹角之八边形者，乃是不知或未顾及文献记载原制材料而任意为之所致。又赵洪达墓所出石文末尾之卐符号，亦书石文者不知其为《真诰》编录本材料时，原纸“行下被割，余一字如此。当是此字后行又被剪，语则未尽也”，照样抄录了下来。将此“字”刻诸于石，实为无义之蛇足，但它却成了该敕告文石刻与《真诰》渊源关系的最好证据。上录四段文字，皆在说明同一种“青龙秉气，上玄辟非，玄武延躯，虎啸八垂”的四相葬墓之法，唯各段具体说明之重点有所不同。第一段所言为此种葬法之性质及由来。第二段所言为具体之建冢方法及效应。“去块后，正取九步九尺，名曰‘上玄辟非’……辟非之下，冢墓由此而成，亦由此而败。”所谓“去块”，就是挖掘墓穴之前先铲去地表之草皮。“上玄辟非”，既是四相中一相之名，亦取以为整个这种葬法的总名。“华盖宫王气神、赵子都、冢墓百忌、害气之神，尽来属之，能制五土之精，转祸为福”，是在说明此种辟非葬法的效应。而“以石方圆三尺，题其文，埋之入土三尺”，是在说明此种葬法在墓穴中必须入藏的镇墓石刻的形制和在地下的深度。第三段的“天帝告土下……一如土下九天律令”八十九字，乃是“圆三尺题其文”的镇墓石刻标准文字。第四段是对前面诸文所作的功能和有关注意事项的补充说明。无论河南唐墓还是川西宋墓所出的“敕告文”石刻，铭文主体部分大多相同，出入不大，这是因为《真诰》二书所载本有固定文字，用今天的话来说，敕文是打了引号的，不便随意改变。至于“青龙秉气”等四句十六字之文，虽与之有关，但并非固定之石刻铭语，作为附属内容，或加或不加均可，故川西宋墓所出，或有或无，有的刻在中央，有的刻在四周，位置也不一致。

华盖宫文石刻文字，在《真诰》二书材料中虽有所本，但它原非固定的石刻铭词，将之作为一种镇墓石材料纳入墓中，与文献所载制度是不大相符的，所以在河南唐墓中也就没有出土这种石刻。作为一种镇墓文刻石，当系出自宋人按照他们自己对《真诰》二书有关文意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加以敷衍而成，故此种石刻文字，往往彼此差异甚大。此种石刻，实际上是“敕告

文”石刻的一部分扩大的附属内容，在宋墓中出现时，最初都是与“敕告文”同时共存，不像“敕告文”那样，既可与“华盖宫文”组合出现，亦可单独入葬，其出土数量也就不如“敕告文”多。

此二种镇墓石在墓中的具体作用和意义，根据石刻铭文和《真诰》、《洞真太上太霄琅书》的记载，乃道教葬埋所谓“太阴炼形”之秘法（“密法”），以之“制五土之精”，“冢墓百忌，害气之神”，使墓室成为“神仙之丘窟，炼形体之所归”，“镇尸不朽，朽即又生，终与神合”；“藏尸少时，枯骸更肉，凋脏生华，瘁形又郁，先神后身，混合为一。炼易之妙方，成真之要术。”对墓主是炼尸成仙，对墓主之子孙后代，则可“无复冢墓之患”，“千禁万忌，一皆压之，必反凶为吉”；“子孙昌炽，文咏九功，武备七德，世世贵王（旺），与天地无穷”。所谓的“文咏九功，武备七德”，陶氏注称事出《左传》。查九功材料，见文公七年，乃晋却缺与赵宣子对话时所引《夏书》之语。《夏书》之文，见《尚书·大禹谟》。文云：“德唯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唯修；政德、利用、厚生，唯和。九功唯叙”。言为官者行利民之善政。七德事见宣公十二年，楚子语潘党之言曰：“夫武，楚暴、战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此“武有七德”也。“受度南宫，脱落北籍”，南宫即南斗帝君所居之神宫，北籍即北斗北帝所掌管的名册。盖人之生死皆由北斗和南斗星君主管，北斗掌握死人的名册，判定何人应死，即在北籍上登记注册，如果改判已死者为不应死，则从北籍上除去他的姓名，再把他登记到南斗星君所掌握的生籍册上去。即道书所说的北斗主死、南斗主生，“北斗落死籍，南斗上生名”。《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云：“老君曰：北辰垂象而众星拱之，为造化之枢机，作人神之主宰，宣威三界，统御万灵，判人间善恶之期，司阴府是非之目……有迴死注生之功，有消灾度厄之力。上至帝王，下及庶人，尊卑虽则殊途，命分俱无差别。凡夫在世，近谬者多，不知身属北斗，命由天府”〔1〕。这里说的北辰，就是指的北斗星君北帝。

天帝敕告文一般均以“天帝敕土下冢中王气诸神赵公明等”起首，“王气”或作“旺气”，华盖宫文起首则曰“华盖宫中五方旺气神等”。赵公明后来成为财神，但最初见于晋人干宝《搜神记》及梁人陶弘景《真诰》，如上所引《真诰》云，“赵公明，今《千二百官仪》乃以为温（瘟）鬼之名。”华盖宫文与天帝敕告文出自《真诰》，其性质自属鬼名而非财神，盖天帝警告

〔1〕《道藏》十七册，73~74页。

其不得侵犯冢墓妄为祸害者。“旺气”即“王气”，亦即“五方王气”，《真诰》文中所说的“冢墓王相刑害，诸不足者，一以填文厌之，无不厌伏，反凶为吉。”王气是由五行学说发展出来的王、相、休、囚、废五气中的一气，汉代纬书《春秋运斗枢》记载说：“王者休，王所胜者死，相所胜者囚。假令春之三月，木王，水生木，水休，木胜土，土死。木王火相，王所生者相，相所胜者囚。火胜金，春三月金囚。”^{〔1〕}《太平经·某诀第二百四》云：

夫王气者宜动摇，动摇见乐相奉助也。休囚死气皆欲安静，不欲见动摇，即不悦喜则战怒，战怒则生凶恶奸邪灾害矣。是乃自然乃天地之性格，万不失一也……所共废共衰，故当废之，不宜兴乐之……时气者，正天之时气也。天地为法，王相之气主太平也，囚、废、绝气主凶年。王、相之气多所生，多善事……夫囚、废、死绝气少所生，无成善事。^{〔2〕}

又同书《忍辱象天地至诚与神相应大戒第二百五十三》云：“受王、相气多者为尊贵则寿，受休、废、囚气多者数病而早死，又贫极也。”^{〔3〕}又《太平经钞癸部·以自防却不祥法》云：

顺用四时五行，外内思正身，散邪却不祥，悬象而思守，行顺四时气，和合阴阳，罗网政治鬼神，令使不得妄行害人……主夏日盛德火，王气转在南方，太阳之气以中和治。其神吏用之得其意，口中生甘，神吏赤衣守之，魄去千里。夏至之日……其神吏思之可愈百病。季夏六月，盛德合治，王气转在西南，回入中宫，其神吏黄衣，思之令人口中甘，每至季思之十八日。立秋日盛德在金，王气转在西方，断成万物，其神吏白衣，思之四十五日至九十日，可除病，得其意，令骨强老寿……立冬之日，盛德在水，王气转在北方，其神吏衣黑衣。令人志达耳聪，守之四十五日至九十日，百病除。此五行四时之气，内可治身，外可治邪，故天用之清，地用之宁。天用之生，地用之藏，人用之兴，能顺时气，忠臣孝子之谓

〔1〕《纬书集成》723页。

〔2〕王明：《太平经合校》，630—638页。

〔3〕王明：《太平经合校》，424页。

也。此名大顺天地阴阳四时五行之道。^{〔1〕}

王气是不同季节在不同方位的旺盛吉祥之气。唐代道书《道典论》卷四《服王气》引《太上八素真经》云：

随王……春则震王生火，夏则离王生土，秋则兑王生水，冬则震、坎王生木，四季乾、坤、艮、巽王也。其行者，今依月回转，巽三月，坤六月，乾九月，艮十二月。^{〔2〕}

是旺气所在，随四时五行相应变化，因季节时日和方向之不同而不同，实为人们对自然现象变化设定如何以不同方式与之相适应的一种理论总结，后来被道教吸收加以神化，广泛用于服气、葬埋等许多方面。如《道典论》卷四《服王气》引《老君胎中经》所云，行事当顺应自然变化而“随王所在”，不得与之相忤。道者谓王气皆各有神主之，是为王气诸神。道教王气之说，东汉即已重之。《云笈七签》卷二十三，日月星辰部，奔辰：“木春王，火夏王，金秋王，水冬王，皆依历以四立日前夜半为王之始。冬七十二日，至分至日前，各王十八日，分至日之前夜夜半为王之始。有星时，可出庭中，坐立适意。有五星中相见者，次当修服之时而出庭中，坐胜于立，可于庭坛向星敷席施按（案），烧香礼拜讫，正坐而为之。若无星之时，天阴之夕，可于寝室中存修之也。星行不必在方，面亦随所在向而修行。谓五星所在而向之，不必依星本方之面，犹如木或在西也。”^{〔3〕}是王气乃顺四时五行气之变化，各有其神，可以内用于存思服气，强身健体，除病致寿；外用之于法，驱邪治鬼，祛除不祥，使不为害。“天用之清，地用之宁”，此券文所谓的天帝敕令冢中王气诸神，使墓主“与天地合德”，“生值清真之气，瘞身冥乡”，“不得妄为害气。当令精魂安适弼谐”，“潜宁冲虚，辟斥诸禁忌”，“子孙昌盛，金玉满堂，世世贵王，与天地而无穷”也。

此种道家葬墓之法，《真诰》二书言可以溯源于东汉时范幼冲之“解地理”，“以冢宅为意”，讲求吉地的选择，与风水堪舆之说有关。出自东汉范幼冲之说，自未必可信，依托成分居多。但从梁天监年间陶弘景书墓砖文字

〔1〕 王明：《太平经合校》，720—722页。

〔2〕 《道藏》二十四册，855页。

〔3〕 《道藏》二十二册，173页。

中有“玄武延躯”材料看，至迟在南朝后期即已开始出现了。江苏句容茅山梁天监“玄武延躯”铭砖墓，在宋代甚至宋代以前即已遭破坏，资料不全，当时墓中是否另外还放有敕告文镇墓石材料，不得而知。旧传为晋郭璞所著《葬书》中，即有“葬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形势反此，法当破死”之记载。“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与华盖宫文和敕告文中的“青龙秉气，虎啸八垂，朱雀（上玄）辟非，玄武延躯”，两者文字虽不尽相同，而句式不异，含义亦大体相合。郭书或为后人托名之作，但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也都确切证明了六朝时期风水堪舆葬术兴起之后，与道教彼此互相渗透。

陶弘景为早期上清派著名道士，《真诰》系上清派著名道书，带此种镇墓文石刻之“密法”葬，应当与道教中之上清派活动有关。

第二节 五精石

在河南境内还发现一种过去称为“五精石”或“安魂盒”的唐代石刻。日本学者池田温《中国历代墓券考略》引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方部藏拓本河南出土镇墓“安魂石刻”三件，其编号分别为五四二（甲）、五四三（乙）、五四四（丙）号。甲拓文曰：

其灵冥冥，以此」为极。阳覆阴施，」大道之则。五精」
变化，安魂之德。」子孙获吉，诸殃永」息。急急如律令！

乙拓铭曰：

其灵冥冥，以此为」极。阳覆阴施，大道」之则。五精
变化，安」魂之德。子孙获吉，」诸殃永息。急急如」律令！

丙拓铭曰：

其灵冥冥，以此为极。」阳覆阴施，大道之」则。五精变化，

安魂之」德。子孙获吉，诸殃」永息。急急如律！〔1〕

云河南图书馆藏石，年代未详，推测可能系十世纪以前唐代遗存。又诸史家编《中国历代墓志大观》著录“唐五精铭”拓本一件（图版拾玖：16），云“志高、宽14厘米。六行，行七字。正书。不记年月。”其文可释读为：

其灵冥冥，以此为」极。阳覆阴施，大道」之则。五精变化，
安」魂之德。子孙获」吉，诸殃永息。急急如」律令！〔2〕

其铭文各行字数，与池田温所记三券中之乙券最为接近，但乙券第四行从“吉”字以后另自提行，而此券则系从“获”字以后另自提行，微有不同，当非同石。总的说来，四券除每行字数不一而外，文字完全相同，唯丙券文末少一“令”字，皆无伤文意。以上四石，出土情况不详，唯池田温先生所述三石既为河南图书馆藏，可能是在河南境内出土，根据20世纪90年代正式考古发掘资料判断，很可能原墓即在河南洛阳或附近郊县。

相同的器物，在20世纪90年代的考古发掘中，出土过两批三座墓葬的材料。一是1990年发掘河南偃师县城西约9公里的南蔡庄乡90YNCM8号天宝十三年（754）郑灵墓出土一件。该墓是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的刀形土洞墓。墓道残长1.2米，宽1米，甬道长0.6米，宽0.8米。墓室长方形，长2.75米，宽2.66米。经甬道进入墓门，墓室东南角安放墓志，墓志以北放置铜钱、铜钵和石镇墓兽、马、猪以及陶猪、鸡、羊等各种随葬品。甬道内靠近墓志方向放带盖青石“安魂盒”一副（编号M8：5）。盒36厘米见方，高8.5厘米。盖作盂顶形，顶面阴刻楷书六行（图版拾玖：17）〔3〕，文曰：

其灵冥冥，以此为」极。阳覆阴施，大」道之侧。五精变化」，
安魂之德。子孙」获吉，诸殃永息。」急急如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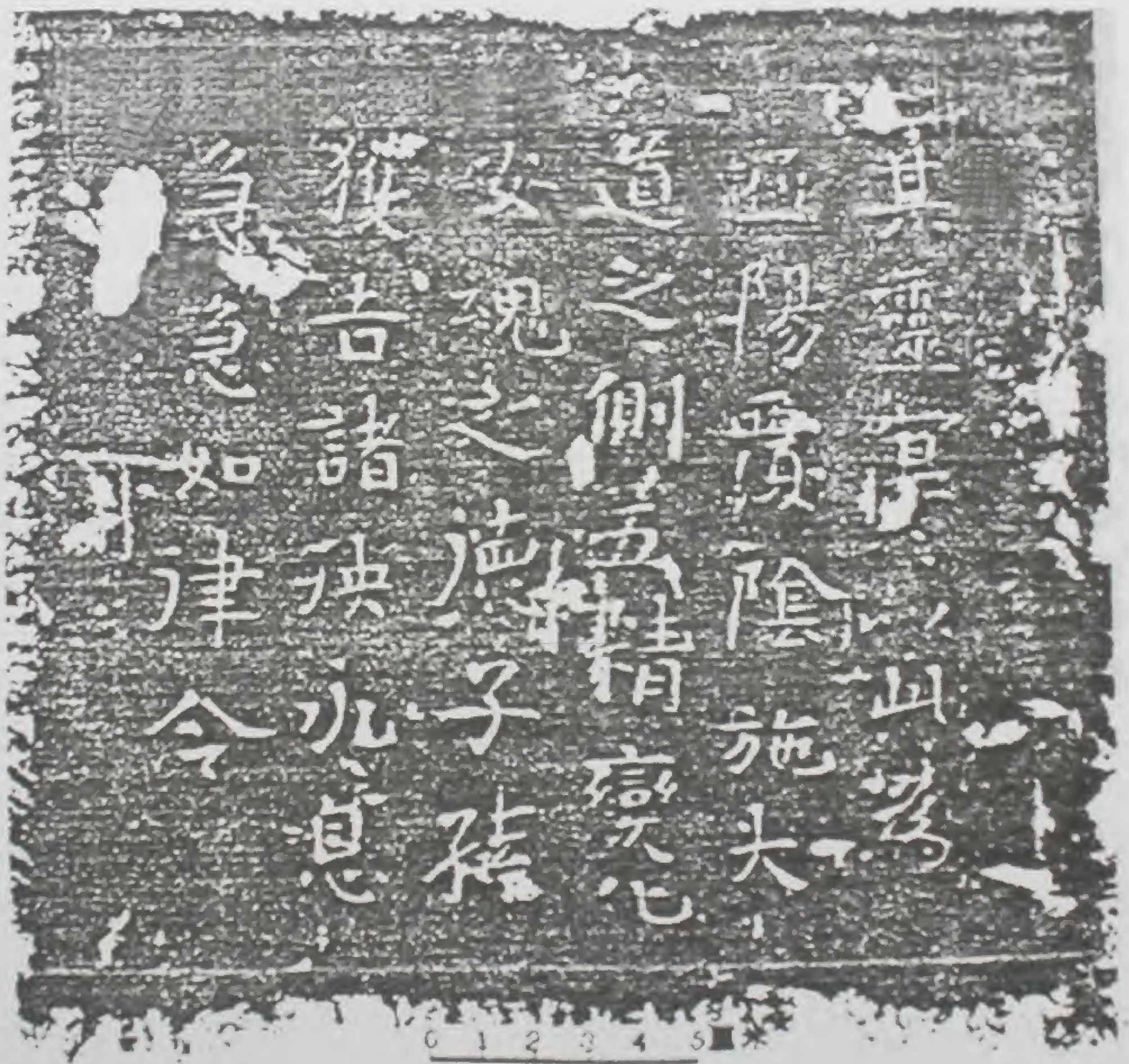
〔1〕（日）池田温：《历代墓券考略》，《东洋文化研究纪要》86辑，237～238页，东京：1981年。

〔2〕诸史家：《中国历代墓志大观》第四册，1213页。

〔3〕偃师商城博物馆：《河南偃师唐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5年1期，26页，图一七。



图版拾玖：16



图版拾玖：17

盒身部分，上面凿成梅花形排列的五个方槽^{〔1〕}。1996年，我们师生二人前往偃师县文管所考察该器，见五个方槽表面已满填泥土，估计应有雄黄、丹砂、白石英等五种不同颜色、质地的矿石药物，应属道教遗存。讯诸保管人员，云已部分剥开上部一槽之表土，果露出丹砂粉末痕迹。当即建议他们细心去除其余全部泥土，将原来放入之药物送交有关部门分别进行化验检测，作出准确的质地鉴定，不知后来结果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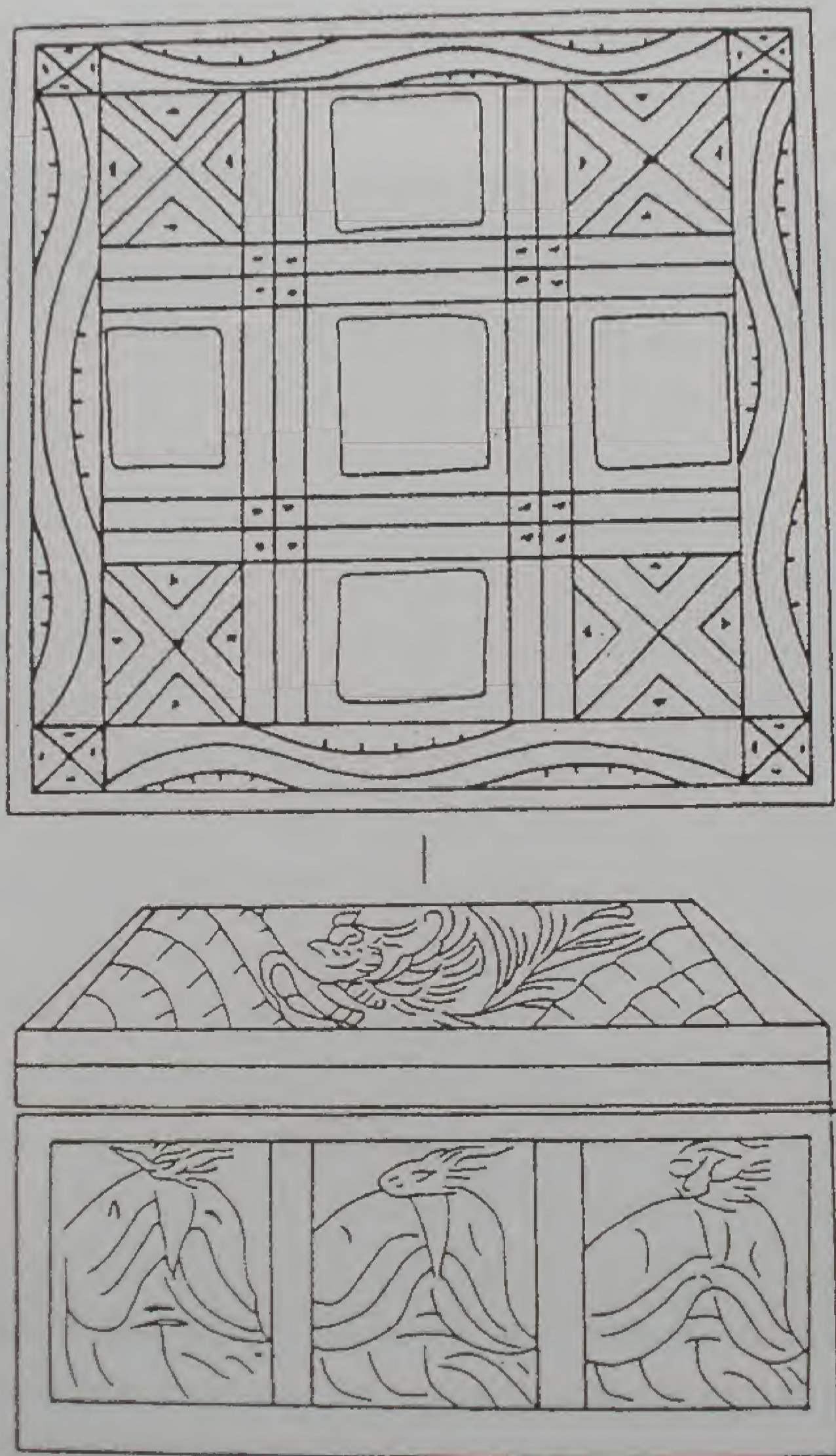
1994年，在河南洛阳城北郊邙山南麓龙泉东沟西侧的坡形阶地上，考古工作者发掘了两座小型唐代刀型单室土洞墓（编号M1038、M1037），也各出土了一件“石盒”。墓葬遗址南距隋唐洛阳城北城墙约300米，西距唐下清宫遗址（其北近两公里处为唐上清宫遗址）120米（下清宫之北1700米为唐代上清宫），两墓东西相隔仅14米。M1038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组成。墓道长1.8、宽0.9米。甬道长1、宽各约0.9米。墓室长方形，长2.4、宽1.8米。墓室中部掘凿方坑，长0.28、深0.1米，四角各放生肖俑一个，石盒置于坑内。M1037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墓道长2.2、宽0.9米。墓室长方形，长3、宽1.5米。墓室已经盗扰，石盒出土在靠近墓室东北角处，西部正中向南一线，发现有鼓腹瓷盖罐、高足塔顶盖罐、镇墓兽和骆驼俑等残片。两墓所出“石盒”形制相同，分盒盖、盒身两部分。盖呈盪顶形，四杀分别线刻四神图像。M1038：1号器盖15厘米见方，高3.7厘米^{〔2〕}，底座14.5厘米见方，高5.5厘米，四壁线刻十二生肖图像，每壁三图。正面四边各刻两条直线作出框栏，栏带内刻星、云纹饰，框栏内线刻九宫方格，四隅之方格内刻点、线纹饰，东、南、西、北、中五方格，则分别凿成长2.7、深2厘米的坑槽，呈梅花形排列，槽中分别放有朱砂、云母、白色水晶和紫色晶体物等矿物材料（图版拾玖：18）^{〔3〕}。盖顶刻楷书五行^{〔4〕}，文曰：

〔1〕 偃师商城博物馆：《河南偃师唐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5年1期，26页，图一六。

〔2〕 李德方、申建伟：《隋唐洛阳城北郊道士墓的初步考订》（《1995年中国古都学会年会论文》）打印稿，1995年。《华夏考古》正式发掘简报未说明其高度。

〔3〕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隋唐洛阳市北郊墓唐代墓葬的发掘》，《华夏考古》1996年1期，10页，图五，1、2。此据李德方、申建伟：《隋唐洛阳城北郊道士墓的初步考订》（《1995年中国古都学会年会论文》）打印稿，图四，1995年。

〔4〕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隋唐洛阳市北郊墓唐代墓葬的发掘》，《华夏考古》1996年1期，10页，图四。



石盒的底座正视图（上）和石盒侧视图

其灵冥冥，以此为「极。阳覆阴施，大道」之侧。五精变化，
安」魂之德。子孙获吉」，诸殃永息。急急」如律令！

M1037：1号盒底座已不存，仅余器盖。盒盖16厘米见方，高4.5厘米。盖顶铭文与M1038：1号器相同，但最后两行字数安排略有差异（图版拾玖：19）^{〔1〕}。铭曰：

其灵冥冥，以此为「极。阳覆阴施，大道」之侧。五精变化，
安」魂之德。子孙获吉」，诸殃永息。急」急如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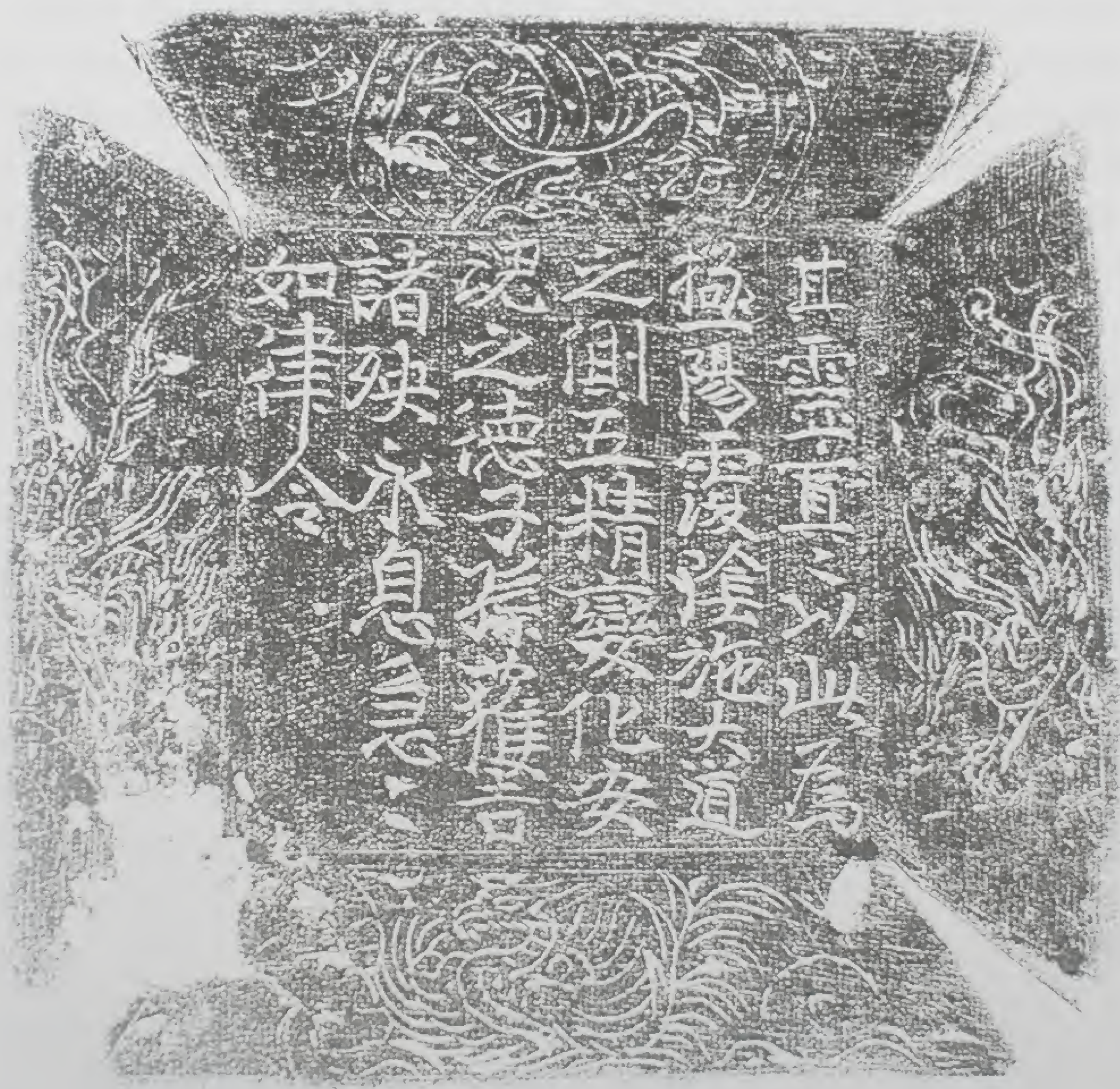
比较经过科学发掘所得的三墓材料，从墓葬大小形制到“石盒”器物，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器铭内容更是完全相同，只是郛师者为素面无纹饰，置于甬道中，洛阳城郊者有纹饰而置于墓室西北隅或中部土坑内，稍有不同而已。偃师墓随葬墓志，年代和墓主身份均极明确。洛阳城郊墓无墓志及其他纪年材料，发掘者当时根据墓葬和部分随葬器物形制判为唐代中期或稍晚，从郛师墓材料看，这一判断大体不误，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盛唐玄宗年间之遗。上述四件传世“石盒”的年代，亦应大抵同时。

这种“五精石”，过去没有在陕西以外地区发现，最近在陕西考古研究所得见西安南郊雁塔区东八里村出土顶形五精石刻一方，详细材料尚未公布，说明在唐代长安地区也有少数这种器物存在。

关于“石盒”的性质、用途，罗振玉《蒿里遗文目录补遗》称为“墓中镇石”、“安魂石刻”，未涉及所属之宗教为何。《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年）在《新发现铭刻资料简目》所分墓志、墓碑（附买地券）、碑刻（附造像刻铭）、有铭砖、陶器文字等类目中，将偃师郑灵墓石以“唐安魂石盒”之名著录于“碑刻”类中^{〔2〕}，是亦未明其性质。池田温将之录入研究地券的论著中，对其与地契之关系亦未作交待，似有定为买地券性质材料之意。诸史家将之收入《中国历代墓志大观》而未作另外说明，是直以墓志视之。偃师墓材料简报编写人未作交待，洛阳城郊墓发掘者径称之曰“石墓志”。石文全无土地买卖方面的内容，将之订为地券，显然不符合实际。石文无任

〔1〕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隋唐洛阳市北郊墓唐代墓葬的发掘》，《华夏考古》1996年1期，10页，图六。

〔2〕 《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年），168页。



图版拾玖：19

何记述墓主姓名爵里之类的传记材料，定性为墓志，也肯定是不对的。我们认为，根据石盒形制和石文内容特点，此种器物当系道教葬仪用品，属于上清派的遗存。

石文中的“阳覆阴施，大道之侧。五精变化”，所谓“大道”，自然是指道教的道，而“阳覆阴施”，“五精变化”与整个“石盒”之构造，则系道教阴阳五行基本理论思想的具体运用。天覆地载，天为阳，地为阴。天在上，地在下，上为阳，下为阴，石盒盖在上为阳，器身在下为阴，盒盖于身，即象征“阳覆阴施”。其五坑不成纵列、横行或其他方式而按东、南、西、北、中位置排列，是五方之五行；坑中盛以五种不同颜色的矿物药材，是五色之五行。以五种不同颜色的矿物药材表五色之五行，而不是像有的墓葬那样采用在墓室四角和中央放置染成五种不同颜色的圆石的方式表示，这就不单纯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五色五行，其药物和盛药“石盒”的特殊形制，当另有特殊的含义，盒底上五个方坑槽中所盛之五种药物，也就是盒盖刻文中的“五精”。

道教的“五精”又称“五石之精”或“五石”，是由五种矿物原料配成的药物。五石，乃古之所谓仙药，生人修道用于服食，随葬死人辟邪镇墓。《黄帝九鼎神丹经诀》卷十一《炼药使不散法》：“五石者，丹砂太阳之精也，磁石太阴之精也，曾青少阳之精也，雄黄石上之精也。感阴阳之正气，配五方之正位，能相制伏，无所发动，调炼去毒，故能令人不死者。”〔1〕《抱朴子内篇·金丹篇》云：“五石者，丹砂、雄黄、白礬、曾青、慈（磁）石也。”〔2〕构成五石的五种矿物药，大都带有相当的毒性，具有杀菌疗病的性能。雄黄，《神农本草经》卷三：“雄黄……杀精物、恶鬼、邪气、百虫毒”〔3〕。《图经衍义本草》卷三：“雄黄……有毒，主……癖气中恶，腹痛鬼疰，杀精物、恶鬼、邪气、百虫毒……胜鬼神”。又引《太上八帝玄变经》：“小丹法，用雄黄、柏子拘魂制魄方……服……百日之后，与神人交见。”〔4〕

以五石（五精）放入墓中解注镇墓，自东汉道教形成以来即行其术，考古发掘材料所见甚多。东汉时期者，如河南洛阳许屯东汉墓出土元嘉二年（152）解注瓶文：“黄帝为河南缙氏……许苏阿铜……刑宪女……合会，神

〔1〕《道藏》十八册，826页。

〔2〕王明：《抱朴子内篇校注》（增订本），78页。

〔3〕顾观光辑：《神农本草经》，21页。

〔4〕《道藏》十七册，298、299页。

药厌镇冢宅……定冢阴阳，死人无谪，生人无过……为□五石、人参，解……安井（神）瓶，神明利家……许苏氏生人富利，从合日始。如律令！”^{〔1〕} 河南洛阳烧沟东汉墓出土建宁三年（170）解注瓶文：“以曾青□木之精，置中入厌除四方，土害气消也，祐利死者……如律令！”^{〔2〕} 陕西西安和平门外东汉墓出土初平四年（193）王氏之家后死黄母解注瓶文，有“转要道中人，和以五石之精，安冢墓，利子孙。故以神瓶震（镇）郭（槲）门。如律令！”^{〔3〕} 河南洛阳唐寺门东汉墓出土解注瓶文：“距（具）五石瓶十八物，雄〔黄〕神药，绝钩注重复咎殃（殃），便死利生，不得相防（妨）。如律令！”^{〔4〕} 在此，五种矿物药材作为“绝钩注重复咎殃”的“神药”放入墓中，其作用是杀灭因患传染病致死之墓主尸体带人之传染病菌，以防后葬者（生人）开启墓室时受墓中病菌的传染，我们在本书第一卷《东汉墓出土解注器和天师道的起源》文中已有论述。唐代葬仪发展，设置已渐趋于形式化，但仍然保存了五种药材实物。到宋代进一步发展，则已完全失去最初的实际作用而完全流于形式，变成一种纯科仪法术性质的设施。上述A型Ⅰ、Ⅱ式华盖宫文石刻有“御五土之精，转祸为福。当使真魂安适弼谐”；或“御五土之精，转祸为福。当使真魂安静，所至弼谐……后代昌隆，金玉满堂，福禄倍增，子孙荣显”；“御五精，转祸为福。𠄎令真魂𠄎𠄎……今后子孙金玉满堂，□□显昌，与天地而𠄎𠄎”之语。此中之“五土之精”、“五精”，与这种唐代被称为“五精石”文中的“五精变化，安魂之德。子孙获吉，诸殃永息”是同样的意思。唐代“安魂盒”，有的盒盖四杀刻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神图像，与按《真诰》记载设计的上清派“天帝敕告文”、“华盖宫文”镇墓石“青龙秉气”、“虎啸八垂”、“朱雀辟非”、“北（玄）武延躯”文字、图像完全相同。又整个石刻完全不用符书而用普通汉字刻写等，也都与上清派材料的特点相同，而与几种属灵宝派石刻文字内容以及采用符书或带神符的情况完全不类，当属上清派《真诰》系统遗存无疑。特别是四川彭县10号南宋墓出土B型Ⅲ式华盖宫文石刻，不仅有“镇压寿堂之内百禁诸忌、五土之精，转祸为福，改灾为祥”的文字，而且铭文

〔1〕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李屯东汉元嘉二年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2期。

〔2〕 《洛阳烧沟汉墓》，154页。

〔3〕 唐金裕：《汉初平四年王氏朱书陶瓶》，《文物》1980年1期。

〔4〕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唐寺门两座汉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4年3期。

分刻于两石，“两石刻有文字的一面相对重叠，放在腰坑之上。”其文字分刻二石，有底有盖，合上下二石为一器，尤与中原唐墓所出“五精石”之有底有盖及“阳覆阴施”之文的整体材料情况相吻合。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是很清楚的。川西宋墓中没有中原唐墓那种单独的“安魂盒”式“五精石”出现，而是将其内容与华盖宫文合并在了一起，是一种后起的新的变化发展。《大汉原陵秘葬经·盟器神煞篇》记载，大夫以下至庶人随葬明器，有“镇墓五方五精石，镇五方”一项。《宋会要辑稿·礼二十九之二五》记载：真宗乾兴元年（1022）驾崩，群臣议葬礼，六月“二十五日，内降镇墓法，五精石镇墓法，令山陵修奉司要存放祇应人将阴阳文字看详。如得允，当即依逐件事理，候至时精洁镇谢。”^{〔1〕}徐苹芳说陕西西安地区唐墓出土与《太上灵宝洞玄灭度五炼生尸经》内容相同的“这种镇墓石大约到北宋初期，有了变化”。认为上述四川彭县官堰渠南宋杜道喜娘子墓出土B型Ⅲ式“华盖宫文”镇墓石就是文献中记载的“五精石”，这是对的。但把唐代《太上灵宝洞玄灭度五炼生尸经》符书五方、五色镇墓石刻当作是“五精石”的一种形式，认为川西宋墓出土的这种华盖宫文石刻是由唐代《太上灵宝洞玄灭度五炼生尸经》符书五方、五色镇墓石发展演变^{〔2〕}而来，这就不对了。实际上，整个道教也都讲求与五行相应的五方、五色，但不同道派的具体运用方式往往各不相同。这里的“五精”和不同颜色的药物配合出现，与“五石者，丹砂太阳之精也，磁石太阴之精也，曾青少阳之精也，雄黄石上之精也。感阴阳之正气，配五方之正位”之说相合，与五方各置一石的《五炼生尸经》符书石刻或圆形“五色石”的灵宝派材料截然不同，不能混为一谈。把唐代“安魂盒”和川西宋墓“敕告文”、“华盖宫文”材料联系起来认识，这对于研究上清派经典材料在科仪方面具体应用的发展变化情况，也是很有意义的。

第三节 “八威真文”石刻与“灵宝五真文”

前述四川成都九眼桥与原四川大学与成都科技大学之间南宋淳熙十三年

〔1〕《宋会要辑稿》，1076页。

〔2〕徐苹芳：《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与“墓仪”制度》，《考古》1963年2期。

(1186) 邓世英墓，除出土华盖宫文和敕告文石刻各一方之外，还同时出土五方镇墓文刻石共五件，石板略呈横长方形，四边刻细线方栏，再于此栏框内刻丁字形栏线，将石面分成三区。上区之石面较窄，刻写题名。右区最宽，刻云篆符书。左区较右区稍窄，刻右区云篆之部分释义及咒语汉字。今按其方位顺序分录五石汉字并附拓片图版于下：

东方青帝安墓真文（云篆四行三十二字）东方神咒，摄照九天。赤书符命，制命丰山。束魔送鬼，所诛无穷。悉诣木宫，敢有皆延。（图版拾玖：20）

南方赤帝镇墓真文（云篆四行三十二字）南□神咒，束送魔宗。□□□□，明列罪原。北摄丰山，威伏百方。以此真文，存亡安吉。（图版拾玖：21）

西方白帝□□真文（云篆四行十六字）□□□□，九天玉文。□□□气，普□□□（图版拾玖：22）。

北方黑帝安灵真文（云篆四行二十字）北方神咒，激扬起雷。流铃焕落，攬天振威。北方神部，万妖灭摧。（图版拾玖：23）

中方黄帝安山真文（云篆四行十六字）敕摄中方，遏塞鬼门。剪除不祥，莫有当存。（图版拾玖：24）^{〔1〕}

这是目前所知保存最完整的一套出土材料。这种材料，其他川西宋墓零星出土者不少，个别题名和云篆汉字译文、咒语稍有出入。如20世纪50年代发掘四川成都北郊羊子山南宋庆元四年（1198）刘氏引娘墓残存一件，上方题名，中间云篆四行十六字，汉字云篆译文和咒语刻于云篆两侧，右边一行八字，左边两行二十字。汉字文曰：“东方镇墓真文 东山神咒，摄照九天。赤书符命，制命丰山。乞为亡过刘氏引娘永镇不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徐鹏章先生发掘四川成都市郊宋墓所得不少，蒙赠有两墓石刻共五件，一为南宋乾道五年（1169）张翱小九郎墓出土，上部刻题名“北方黑帝安墓真文”八字。下部右方刻云篆四行二十字，字形甚大，左方刻字四行三十二字，字形较小，文曰：“北方神咒，激扬起雷。流铃焕落，攬天振威。北方神部，万妖灭摧。□□真文，梵气天君。”另一墓未保存纪年文字，系南宋遗迹，出土此种镇墓文石刻四件，其刻线栏框、文字形制，一如上述邓世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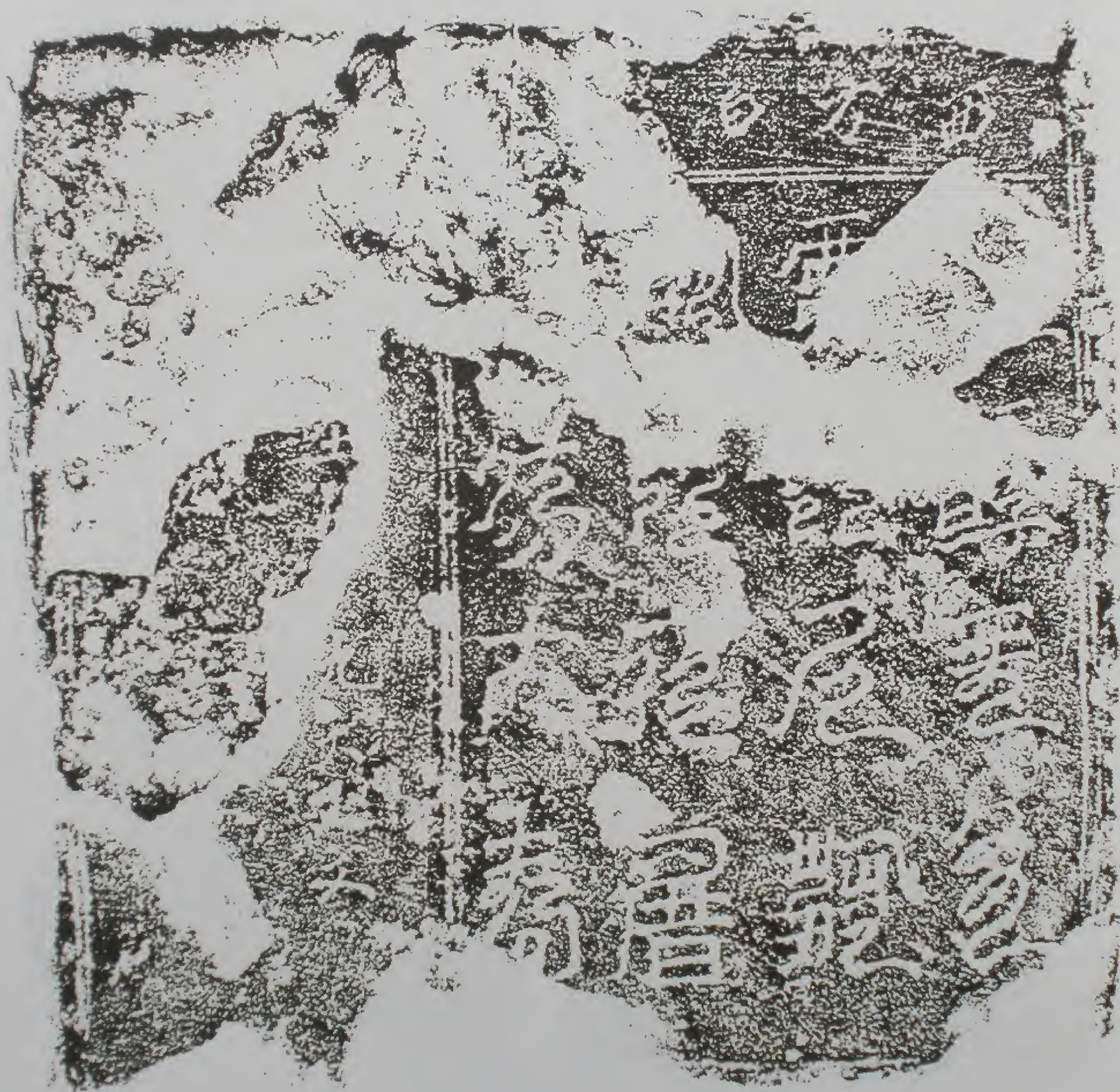
〔1〕 已故之原成都市考古队罗伟先队长提供拓片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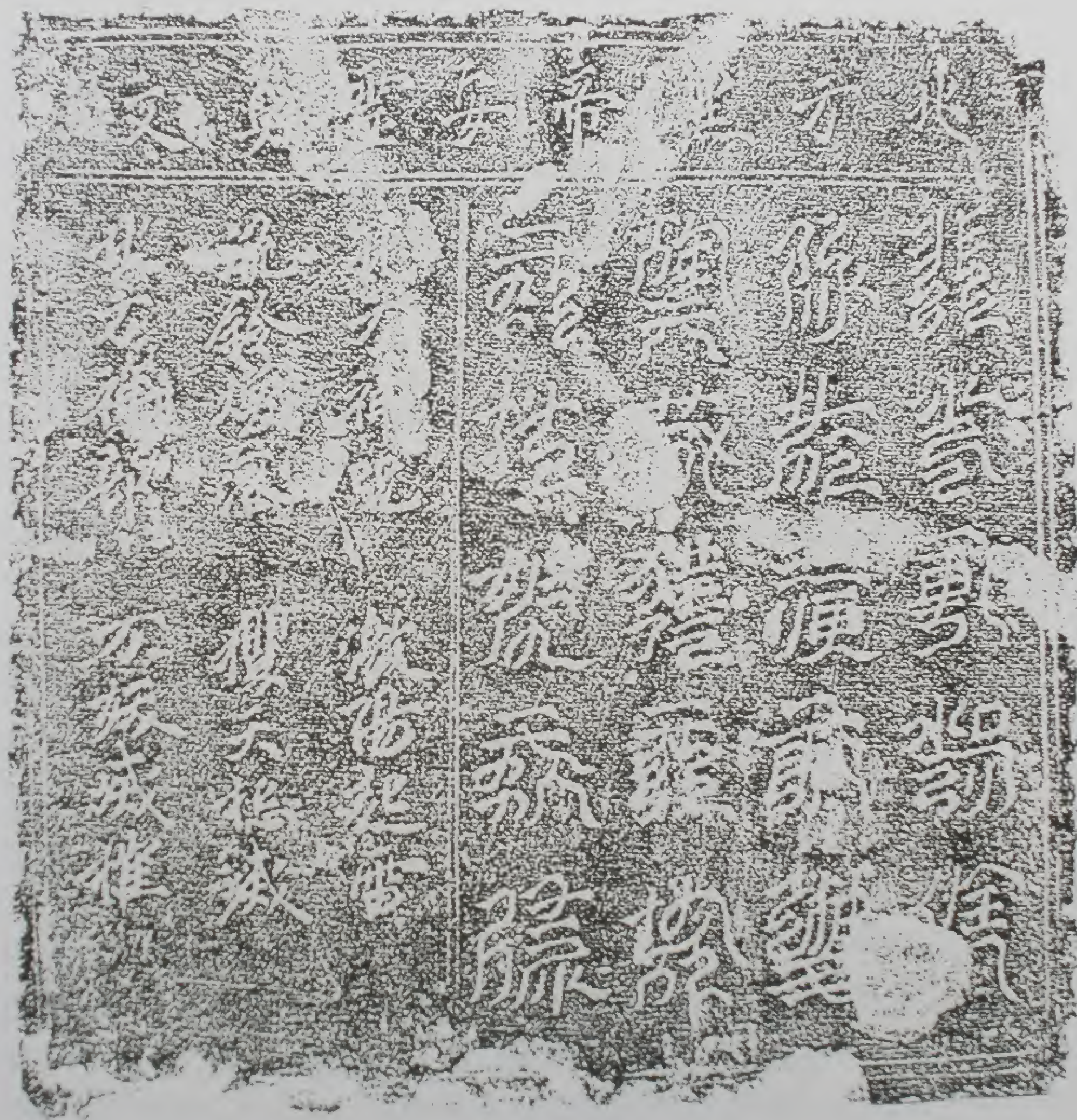
图版拾玖：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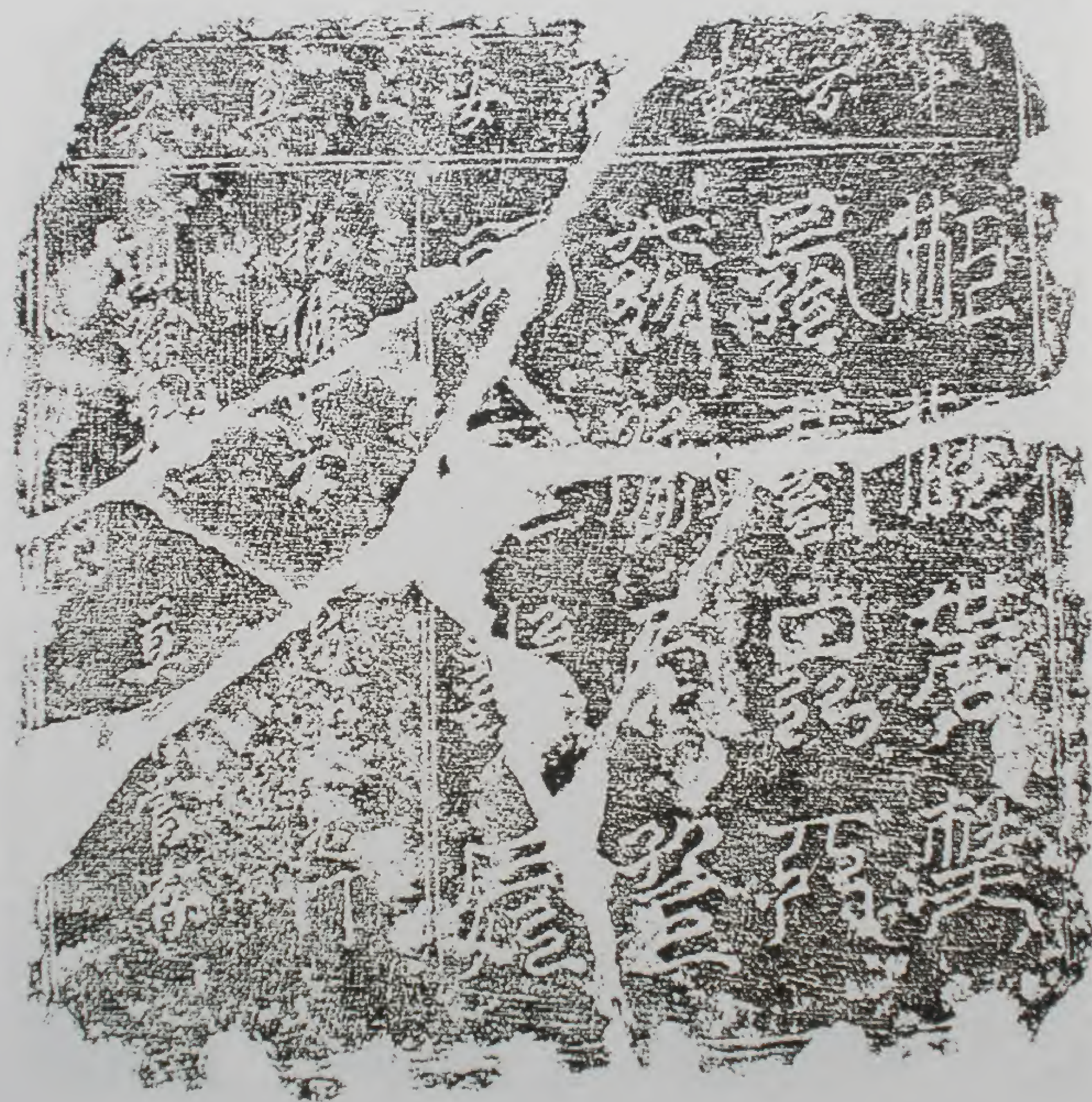
图版拾玖：21



图版拾玖：22



图版拾玖：23



图版拾玖：24

墓所出者，录文如下：

𡗗𡗗𡗗𡗗安墓真文（云篆四行三十二字）东山神咒，摄召九天。赤书符命，制命丰山。东（束）魔送鬼，所诛无穷。悉诣木宫，敢有皆通（稽延）。

南方赤帝安灵真文（云篆四行三十二字）北摄丰山，束魔送宗。符教所讨，明列罪𡗗。南山神咒，威伏𡗗𡗗。群妖灭爽，万□□□。

北方黑帝安灵真文（云篆四行二十字）北山神咒，激扬起雷。流铃焕落，攬天振威。北方神部，万妖灭摧。以此真文，符方安置。

中方黄帝安墓真文（云篆四行十六字）𡗗𡗗中方，遏塞鬼门。剪除不祥，莫有𡗗存。

仅缺失西方一石。另四川成都青白江区文物管理所收藏本境北宋墓出土一石，1992年我们前往考察记录，刻文曰：“东方青帝洞玄灵宝东山神咒八威策文（云篆四行三十二字）东山神咒，摄照九天。赤书符命，制会丰山。束魔送宗，所诛无竭。悉诣木宫，敢有稽延。东山真文，用镇东方。请为至孝孤子马仁静速（？）忤（？）亡人马诚普受大快乐东山青帝君符命于元丰三年十二（？）月。镇山真文。”虽仅存五石中之一方，对研究这种镇墓文石刻却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比较上录诸石文字可知，它们的基本内容相同，应属同一种性质的材料，这是很清楚的。但从石刻标题到云篆多少、汉字内容则往往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以刻题而言，或称“安墓真文”，或称“镇墓真文”，或称“安山真文”，或称“安灵真文”。同墓之五方五石，各自称谓不同，以邓世英墓所出者最为典型。但并非不同墓葬出土之同方刻石均有固定的叫法，如邓世英墓之“南方赤帝镇墓真文”，徐鹏章惠赠一拓则称“南方赤帝安灵真文”；邓墓“中方黄帝安山真文”，徐拓则称“中方黄帝安墓真文”，均可为例。五方云篆之数，一般说来大体固定，如邓墓之东方32字，南方32字，西方16字，北方20字，中方16字，其余诸墓零星出土者绝大多数均与之相合。但亦有不同者，如刘氏引娘之东方一石16字，仅为他墓所出者之一半。可视为特殊之简式。至于石刻汉字译文及咒语，除咒文祷语而外，译文部分一般比较固定，但亦间有出入。这种出入，看来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书写

道士或刻工的笔误。如邓墓东方一石中之“东方神咒”，他墓所出者皆作“东山神咒”；“束魔送鬼”，徐拓并同，青白江一石作“束魔送宗”；“所诛无穷”，徐拓并同，青白江一石作“所诛无竭”；“敢有稽延”，徐拓作“敢有皆通”，青白江一石作“敢有稽延”；等等，皆是。如“皆延”、“皆通”，皆文义无解或与整个文意不合，显系“稽延”形音相近之误，稽延即滞留延误时间的意思。至如邓墓南方一石之“南□神咒，束魔送宗。□□□□，明列罪原。北摄丰山，威伏百方。以此真文，存亡安吉。”徐拓作“北摄丰山，束魔送宗。符教所讨，明列罪圆。南山神咒，威伏囚囚。群妖灭爽，万□□□。”不唯字句相同者前后位置顺序不同，另用“以此真文，存亡安吉”八字韵文纳入其中以足三十二字云篆之数，显然不是一种正规的云篆译语录文，而是摘抄部分释文颠倒次序并混入其他材料的杂拌，当系道士无知或底本讹误所致。

过去我们曾经撰文指出，这种刻石文字材料，道书文献中记载甚多，用法各异，名称也往往有所不同，属于道教灵宝派“灵宝五真文”中的“八威真文”。这种看法的正确性，已为后来所见上述四川新都青白江元丰三年（1080）马诚普墓出土之“东方青帝洞玄灵宝东山神咒八威策文”题名刻石所证实。南宋西蜀道士吕元素《道门定制》卷八有“八威真文”全文，每方先书文名，次录云篆，再录云篆汉字译文曰“正音”，最后录告文。今引录五方汉字部分并注云篆字数于下，并附东、南、西三方书影照片，以供比较对照（图版拾玖：25 东、南、西三方）^{〔1〕}。东方部分文云：

东方青帝八威真文（云篆六行三十二字）正音（别以小纸书附于真文上宣读）：“东山神咒，摄照九天。赤书符命，制会丰山。束魔送鬼，所诛无竭。悉诣木宫，敢有稽延。”右谨告闻东方镇宅大将军，乞为奉道某家保护住宅东方木王之气、甲乙之方、寅卯之位，唯冀百邪不入，万恶祛除，犯触消平，居止安泰。一如东方青帝君符命！年 月 日高功半銜姓 某 告行。

后特注明：“以下四方并同后语，只换方位、支干。若于安坟及祛邪等醮，于用可随宜改正后文，祈祷庶几吻合。”

〔1〕《道藏》三十一册，730页。

南方赤帝八威真文（云篆六行三十二字）正音：“北摄丰山，束送魔宗。符教所讨，明刘罪原。南山神咒，威伏八方。群妖灭爽，万试摧亡。”南方火王之气、丙丁之方、巳午之位。

西方白帝八威真文（云篆三行十六字）正音：“赤书王字，九天真文。摄召万气，普归帝君。”西方金王之气、庚辛之气、申酉之位。

北方黑帝八威真文（云篆四行二十四字）正音：“北山神咒，激扬起雷。流铃焕落，攫天振威。北丰所部，万妖灭摧。”北方水王之气、壬癸之气、亥子之位。

中央黄帝八威真文（云篆三行十六字）正音：“敕摄北帝，遏塞鬼门。剪除不祥，莫有当前。”中央土王之气、戊己之方、辰戌丑未之位。^{〔1〕}

此“八威真文”之“正音”，又见南宋嘉泰元年（1201）吕太古《道门通教必用集》卷二，文字与此全同。^{〔2〕}吕元素书所载，主要针对安镇生人住宅著文。墓为阴宅，与阳宅同为人之居室，故特说明此“八威真文”亦可用于“安坟”，只不过是所加后语祷词需“随宜改正”，有所不同。上述考古发现材料，与此文献记载完全是一致的。

《道门定制》卷八在上录一组“八威真文”之后，还另著一组五方“召龙真文”，每方题名之后云篆、正音、祝文格式一如八威真文，唯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其“东方青帝召龙真文（云篆六行三十二字）正音：‘下制东河，溟海水神。大劫洪灾，蛟龙负身。水府开道，通径百千。上帝赤文，风火无间。’右云篆上召东海广德龙王水府官属，伏乞降临道场，保安境土，兴云致雨，救济生灵，殄灭凶荒，祛除旱魃。一如青帝天君符命！年月日具位姓 某宣行。（以下四方语并同，只换龙王号）南方赤帝召龙真文（云篆八行四十八字）正音：‘南方赤帝，太伯龙王。神咒流行，普扫不祥。洪水飞灾，上召蛟龙。开除水径，千道万通。敢有干试，摄送火宫。赤书所告，莫有不从。’南海广利龙王（右语）西方白帝召龙真文（云篆八行四十八字）正音：‘西山神咒，八威七传。符水上龙，召山送云。在所校录，同到帝门。辅卫上真，斩灭邪源。若有不祥，截以金关。赤书符命，风火驿

〔1〕《道藏》三十一册，730～731页。

〔2〕《道藏》三十二册，17页。

传。’西海广润龙王（右语同前）。北方黑帝召龙真文（云篆四行二十四字）正音：‘九河倾訖，鸟母群飞。蛟龙通道，水陌洞开。赤文玉书，驿龙风驰。’北海广泽龙王（右语同前）。中央黄帝召龙真文（云篆八行四十八字）正音：“中山神咒，召龙上云。制会黄河，九水河源。不得怠纵，善恶悉分。千妖万奸，上对帝君。莫有干试，太阳激愤。赤书玉字，宣告普闻。”中央九江水帝水府一切龙神。”〔1〕《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三十“禳度施用品”之“赤书玉文”，下面列有“安镇星度天灾玉文”、“保安禳灾安镇玉文”、“受法摄伏鬼神玉文”、“止洪水度水灾玉文”等四种玉文名目，并具体著录了四种玉文的云篆、云篆汉字译音、用法和咒文，云篆译文汉字分别用细字直接注于字下，五方同用一咒总录于五方玉文之后而与吕书书写方式不同，其“受法摄伏鬼神玉文”、“止洪水度水灾玉文”之云篆及汉字译文，与上述《道门定制》之“八威真文”、“召龙真文”相同，是“玉文”即“真文”也。《大法》于“赤书玉文”总题之后有文字说明称：“元始赤书五篇真文，上清自然之灵书，九天始生之玄奥，空洞之灵章。”〔2〕而《道门定制》在前面的“八威真文”总题下注说：“此名出《元始五老经》，篆文亦然，‘召龙真文’同出。”说明此“八威真文”、“召龙真文”与“受法摄伏鬼神玉文”、“止洪水度水灾玉文”，以及另外两种“玉文”，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同属“元始赤书五篇真文”而出自道书《元始五老经》。“元始赤书五篇真文”不仅和上述八威真文镇墓石刻有关，和将在后面论述的另外一种川西宋墓出土的“五方消灾真文”石刻同样密不可分。包括上述两种“真文（玉文）”在内的四种真（玉）文，实际上就是灵宝部的主要经文“灵宝五篇真文”的分段组合。这一情况，牵涉到道教发展史上的一重大问题，过去未见有人论述过。它的正确认识，也是我们讨论有关两种镇墓文石刻的基础。因此，必须对“灵宝五真文”在道教斋醮科仪中的分段组合和运用情况作一些考察。

“灵宝五篇真文”或简称“灵宝五真文”、“灵宝五文”，最早见于《元始洞玄灵宝玉篇真文天书经》，即上述吕元素书所注《元始五老经》，或称《元始洞玄灵宝赤书玉篇真文经》、《洞玄赤书玉篇真文经》、《太上洞玄灵宝五篇真文赤书》。今本《道藏》洞真部本文类所收《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三卷，卷上著录此五方真文，按“东方安宝华林青灵始老九气青天赤书

〔1〕《道藏》三十一册，731～732页。

〔2〕《道藏》三册，778页。

玉篇真文”、“南方梵宝昌阳丹灵真老三气丹天赤书玉篇真文”、“中央玉宝元灵老一十二气黄天赤书玉篇真文”、“西方七宝金门皓灵皇老五气白天赤书玉篇真文”、“北方洞阴溯单郁绝五灵玄老五气玄天赤书玉篇”之名，先录本方经文云篆字形，分为四段，每段之后分别注明本段字数，于每方经文之后总述各段经文之不同经德及本方经文之种种异称，但不著云篆经文之译文汉字^{〔1〕}。收入《道藏》太平部之北周宇文邕《无上秘要》卷二十四、真文品引《洞玄赤书经》，经文分段、字数与此完全相合，有关经德叙述大意亦同，但经文只有汉字译文而无云篆字形，经德叙述更详，并另有用法说明，所据当为《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之古本，两者可相互补充配合使用。《秘要》之文，多为后来诸书所沿用，与本文所论镇墓文石刻材料关系至为密切，今每方分别标注段序，具录于下，以便研究。

东方九气青天真文：（1）“东方九气，始皇青天。碧青郁垒，中有老人。总校图录，摄气举仙。”右二十四字，主召九天上帝，校神仙图录。学仙道士，常以本命甲子立春之日，青书二十四字于白刺上，记姓名年月于下，投灵山之岳。九年，仙官到，身得飞仙。（以下四方本段文字，除书色及书刺季别各不相同而外，余文无异，与本文所论石刻关系不大，仅标省号而不复赘录。——引者）（2）“岁星辅肝，角亢镇真。氐房心尾，四景回旋。箕主七辰，正斗明轮。承气捕非，扫除灾群。”右三十二字。主召天宿星官，正天分度。诸以东方星宿越错，朱书三十二字于青纸上，露于中庭九日九夜，夕夕依法别咒。讫，以火烧文，散灰于青烟之中。并刻书三十二字于青石上，埋东方。天灾自消，星宿复位。（3）“东山神咒，摄召九天。赤书符命，制会丰山。束魔送鬼，所诛无躅。悉诣木宫，敢有稽延。”右三十二字，主摄鬼魔，正九天气。行此法，朱书青木刺上，以文向东北而依别咒文三咒，鬼自束形，万妖自灭。精心行之。（4）“下制东河，溟海水神。大劫洪灾，蛟龙负身。水府开道，通径百千。上帝赤文，风火无间。”右三十二字，摄东海水帝，大劫天灾之数，召蛟龙及水神事。遇水灾及欲度大水，皆黄书三十二字于青纸上，依别咒以投水中，身自得过，蛟龙负难，河伯奉迎，水下可行。（以下四方本段文字，除书色各不相同而外，

〔1〕《道藏》一册，776～783页。

余义无异，与本文所论石刻关系不大，仅标省号而不复赘录。——引者)

南方三气丹天真文(1)“南方丹天，赤帝玉堂。中有大神，号曰赤皇。上炎流烟，三气勃光。神仙受命，应运太阳。”……(2)“荧惑辅心，井鬼守房。柳星张翼，抗御四乡。軫总七宿，回转天常。召运促会，正道驿行。”右三十二字，主召星官，正天分度。诸以南方星宿越错，有诸灾异，当朱书青纸上，露于中庭三日三夜，夕夕依别咒。讫，刻书三十二字于赤石上，埋南方。天灾自消，星宿复位。(3)“赤文命灵，北摄丰山。束送魔宗，斩灭邪根。符教所讨，明列罪原。南山神咒，威伏八方。群妖灭爽，万试摧亡。”右四十字，主制北丰，正鬼气。行此法，黄书赤木刺上，以文向东北而依咒文三行此法，鬼精自灭，万魔束形。宜精心行之。(4)“南河水帝，太伯龙王。神咒流行，普扫不祥。洪水飞灾，上召蛟龙。开除水迺，千道万通。敢有干试，摄送火宫。赤书所告，莫有不从。”……

中央黄天真文：(1)“中央总灵，黄上天元。始生五老，中皇高尊。摄气监真，总领群仙。典录玄图，宿简玉文。推运促气，普告万神。”……(2)“镇星辅脾，徊度北元。魁魍主非，截邪斩根。魍魍魍魍，扫移除氛。魍正玄斗，明度天关。九天符命，金马驿传。”右四十字，主摄星官，正天度数。诸以中央星宿越错，生诸灾异，当以朱书四十字于青纸上，露于中庭十二日十二夜，夕夕向王，依别咒法。讫，以火烧文，散之于青烟之中。并刻书四十字于黄石上，埋中央。天灾自消，星宿复位。(3)“敕摄北帝，遏塞鬼门。剪除不祥，莫有当前。”右十六字，主摄北帝，正天气，检鬼精。行此法，白书十六字于黄木刺上，以文向东北而依别咒三行此法，鬼精自灭，天魔束形。宜精心行之。(4)“中山神咒，召龙上云。制会黄河，九水河源。不得怠纵，善恶悉分。千妖万□，上对帝君。莫有干试，太阳激焚。赤书玉字，宣告普闻。”……

西方七气素天真文：(1)“西方素天，白帝七门。金灵皓映，太华流氛。白石峨峨，七气氤氲。上有始生，皇老大神。总领肺气，主校九天。检定图策，制召上仙。”……(2)“太白检肺，奎娄守魂。胃昴毕觜，主制七关。参总斗魁，受符北元。”右二十四字，主白帝星官，正明天度。诸以西方星宿越错，有诸灾异，当以

朱书青纸上，露于中庭七日七夜，夕夕向西方依别咒法。讫，以火烧之，散灰于青烟之中。并刻书二十四字于白石上，埋西方。天灾自消，星宿复位。(3)“赤书玉字，九天正文。摄照万气，普归帝君。”右十六字，摄六天鬼气。行此法，墨书十六字于白木上，以向东北而依别咒文七过行之，鬼精自灭，万魔束形。宜精心行之。(4)“西山神咒，八威七传。符水上龙，召山送云。在此校录，同到帝门。辅卫上真，斩灭邪源。若有不祥，截以金关。赤书符命，风火驿传。”……

北方五气玄天真文：(1)“北方玄天，五气徘徊。中有黑帝，双皇太微。总领符命，仙炼八威。青裙羽褐，龙文凤衣。上帝所举，制到玉阶。”……(2)“北辰辅肾，斗牛卫扉。女虚危室，豁落四开。璧总七星，执凶纠非。却灾扫秽，明道洞辉。”右三十二字，主北方星官，正天气。诸以北方星宿越度，有诸灾异，当以朱书三十二字于青纸上，露于中庭五日五夜，夕夕向北方依别咒法。讫，以火烧文，散灰于青烟之中。并刻书三十二字于黑石上，埋北方。天灾自消，星宿复位。(3)“北山神咒，激扬起雷。流铃焕落，覆天振威。北丰所部，万妖灭摧。”右二十四字，主摄天魔北帝万鬼事。行此法，青书二十四字于黑木刺上，以文向东北而依别咒文五过行之，鬼精灭形。宜精心行之。(4)“九河倾訖，鸟母群飞。蛟龙通道，水陌洞开。赤文玉书，驿龙凤驰。”〔1〕

但是《天书经》五方云篆每方后面所载之异名材料为《秘要》所无。云：东方“合一百二十字，皆元始自然之书也。一名‘生神宝真洞玄章’，一名‘东山神咒八威策文’。”南方“合一百五十二字，皆南方梵宝昌阳丹灵真老君自然之龙也。一名‘南云通天宝灵衿’，一名‘九天神咒’，一名‘赤帝八威策文’。”中方“合一百四十四字，皆中央玉宝元灵元老君自然之书也。一名‘宝劫洞清九天灵龙’，一名‘黄神大咒’，一名‘黄帝威灵策文’。”西方“合一百三十六字，皆西方七宝金门皓灵皇老君自然之书也。一名‘金真宝明洞微篇’，一名‘西山神咒’，一名‘八威召龙文’。”北方“合一百二十字，皆北方洞阴朔丹郁绝五灵玄老君自然之书也。一名‘元神生真宝明文’，

〔1〕《道藏》二十五册，68～70页。

一名‘北山神咒’，一名‘八威制天文’。”^{〔1〕}盖《秘要》系摘引而非全录也。

《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的成书年代，一般认为应在刘宋之前。其后，除《无上秘要》详引之外，刘宋人陆修静《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著录“元始五老赤书真文玉篇”之汉字译文，当亦出自《天书经》，唯有译文汉字而无云篆，且每方皆不分段^{〔2〕}。另齐梁时成书之《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二卷，卷上所载之五方真文赤书玉诀之汉字译文，虽无云篆，其分段、经德说明和著录方式，皆与上述《无上秘要》大略相同，并同时包括了《天书经》所载之各方经文异名，无疑也是《天书经》之传衍。但该书南方真文络文总数和第（2）、（3）两段字数及文字内容，与今本《天书经》、《秘要》有所出入。南方经文总数，《天书经》与《秘要》为152，《妙经》为148。其第（2）段字数，《天书经》与《秘要》为32，《妙经》为36。其第（3）段字数，《天书经》与《秘要》为40，《妙经》为32。核其文，盖《妙经》将“赤文命灵”四字分入第（2）段，遂较《天书经》、《秘要》的第（2）段多出四字。而《天书经》与《秘要》将“赤文命灵”四字分置第（3）段之首，并于“束送魔宗”与“符教所讨”之间增入《妙经》所没有的“斩灭邪根”四字，遂使本段真文为四十字，较《妙经》多出了八字。这样一来，南方经文的分段字数也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版本，后来不同的道书文献记载往往不同。如唐末五代杜光庭编《太上黄箓斋仪》卷五十四和《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三十一，也都有此真文的云篆、汉字对照分段著录，杜书同《天书经》，而《大法》同《妙经》。《大法》将“赤文命灵”置于南方经文第（2）段之末，并注云：本段“《本行经》无‘赤文命灵’四字”^{〔3〕}。是《大法》属《妙经》系统，杜书与《本行经》属今本《天书经》与《秘要》系统。《太上黄录斋仪》注其“真文赤书安镇法”云“出《灵宝玉诀经》”^{〔4〕}，这是有问题的。这里的《灵宝玉诀经》不是指《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而是指《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

在《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和《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中，虽然把五方真文也都分别划成了不同的段落，并每段赋予不同的作用，

〔1〕《道藏》一册，777～783页。

〔2〕《道藏》九册，848～849页。

〔3〕《道藏》三册，778页。

〔4〕《道藏》三册，778页。

但尚无后来将五方同一段序之文别出另自配置成套单独使用的组合形式。不过，在《妙经》卷上五真文材料之后讲到总的用法时，已经按照“元始五老修道求仙赤书真文玉诀”、“元始五老禳星宿客灾明天分度真文玉诀”、“元始五老禳大劫洪水召蛟龙水官度灾真文玉诀”、“元始五老摄召北丰鬼魔赤书玉诀”四个标题进行了叙述，每题之下并附不同的咒语，代表了四种不同的用法。只是当时这四种用法，也都同样是将整个真文从头到尾写读一遍，而不是分别采用其中的某一段材料。后来杜光庭所编录的材料，仍然如此。在杜氏《太上黄箓斋仪》卷五十四，镇坛真文玉诀，真文赤书安镇法，载录“灵宝五篇真文”，每方之篇题称“△方△帝君符命”、“△方玉字”，其分段情况与《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相同，每段真文，除录译文之外，并录符书字形。真文之其他有关说明材料，文字虽然要简单得多，但内容含义大体上还是一致的。宁全真授、林灵真编《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卷二百七十一，祈禳通用之“符简轨范品”所著，称为“五方赤书玉字”，亦并录真文符书和译文，虽无其他文字说明材料，真文之分段情况亦同于经过分段的《五篇真文》，每篇在同一段序上的真文经德也是一样的，只是方位不同而已。^{〔1〕}同时，在书中也有将五方中同一段序位置之经文抽出单独组合运用的情况，如后文所论五方消灾真文者即是。看来随着道教斋醮科仪的发展，遂渐有将五方同一段序同一经德之真文分出，另自单独组合成不同用途的五方真文者。各书所载，由此种组合构成的五方真文，种类多少不同。其中，当以《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所收最为完备。该书卷三十一，禳度施用品，赤书玉篇，收玉文凡四种，每种皆真文符书与译文对照写出。经过比较可知，其“安镇星度天灾玉文”，即上录《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经》所分之第（2）组；“保安禳灾安镇玉文”，即《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所分之第（1）组；“受法摄伏鬼神玉文”，即《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所分之第（3）组；“止洪水度水灾玉文”，即《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所分之第（4）组。四种名称，和《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文字虽不尽相同，但含义却是一致的，每种玉文后面所附的长篇祝文咒语也完全一样。四种内容不同的玉文，恰好包括了整个灵宝五篇真文的全部内容，虽然在个别文字的归段上有些出入，但它确是在《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和《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系统诸书的分段基础上加以发展组合而成，这是很清楚的。

〔1〕《道藏》八册，367～374页。

《灵宝领教济度金书》虽至宋末元初始由林灵真编成，但其内容则传自宁全真。据书前所附宁全真传的材料，全真生于北宋末建中靖国元年（1101），以南宋淳熙八年（1181）八十一岁终。如果从这一材料看，似乎《灵宝五篇真文》到南宋初年即已出现有如《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之组合形式，分化成四种单独使用的真文。至淳熙十五年（1188）西蜀道士吕元素编成《道门定制》一书，更载其第（3）组为“八威真文”，第（4）组为“召龙真文”（以上见该书卷八），第（2）组为“消灾真文”（见该书卷四）。但于“八威真文”题下注云：“此名出《元始五老经》，篆文亦然，‘召龙真文’同出。”则其始出时间又似较早，有无此种组合配置，也可能与地区或教派有关。“东山神咒”八威真文，诸书皆统言其用以“摄伏鬼神”，仅西蜀道士吕元素书始言用于安坟镇宅。另一西蜀道士元素门人吕太古于嘉泰元年（1201）编成的《道门通教必用集》一书，卷二除录有“八威真文”译文之外，并录将此种真文用于“安坟安宅”的专门“祝八威真文”祝文^{〔1〕}。此种真文石刻出自墓中的现象，仅见于蜀中，与文献记载所反映的情况正相吻合，看来这应当是南宋时期川西地区的一个特点。

第四节 “消灾真文”石刻

“消灾真文”石刻，是根据石刻自名、汉字祷文祝语参考道书记载命名的。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川西宋墓出土消灾真文石刻，主要有四批材料。一是20世纪50年代发掘四川成都北门外羊子山南宋淳熙九年（1182）严世广及其妻乔氏收喜娘子同坟异藏合葬墓所出。出土时严世广墓室五方五石俱存，乔氏墓室者仅存南、中二方二石。但以上七石，文字大多漫漶莫辨，仅严氏之东方一石和乔氏之南、中二方二石保存比较完整。所见两石拓片形制相同。石作方形，四方边内用单线刻出框栏，栏内上部再用双线横刻将石面分作上下两区，上区狭窄，横刻汉字标题；下区广阔，直行刻字，右方云篆，左方汉字。刻文如下：

〔1〕《道藏》三十二册，17页。

东方青帝消灾真文（云篆四行三十二字）东方青帝消灾真文：
今有奉道弟子严世广，解除春之三月木星行度刑克临照之灾。一如
青帝君符命！（图版拾玖：26）^{〔1〕}

中方黄帝消灾真文（云篆四行三十二字）中方黄帝土星真文：
今有奉道弟子严世广同室乔氏收喜娘子，解除四季之月土星行度刑
克临照之灾。一如黄帝君符命！（图版拾玖：27）^{〔2〕}

刘志远、坚石在《川西的小型宋墓》一文中曾经涉及到本墓镇墓文材料，对
上述二石文字未加报导，但却发表了另外一件石刻的部分汉字录文。文曰：

南方赤帝火星真文今有奉道弟子严世广同乔氏收喜娘子解除春
之三月火星刑度克灾临照之灾一如赤帝君符命^{〔3〕}

不仅没有说明该石云篆行字数目，上述附于云篆左方之汉字释录材料也有明
显的错误，“火星刑度克灾临照之灾”应作“火星行度刑克临照之灾”，“严
世广同乔氏收喜娘子”之“同”字下应脱一“室”字，这是很清楚的。“严
世广同室乔氏收喜娘子”是指严世广妻子乔氏收喜娘子一人而言，如果是
“严世广同乔氏收喜娘子”就是指的严世广夫妇二人，说明此石乃二人所共
用了。这不仅与上录中方石拓文字不合，亦与严、乔二室各自单独随葬五方
消灾真文石刻一套的材料相悖。一字之差，影响到石刻使用方法之正确与
否，特辨之以引起引用此材料者之注意。

二为 1998 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四川成都西郊沙湾路四达房产
公司商住楼基建工地南宋墓所出。该墓为同坟异室夫妻合葬，北边一室已完
全损毁，南边一室北壁也遭破坏，残存消灾真文石刻二件与龟、马、人物等
陶俑同时出土。两方真文方位不同，引文格式相似。前后两排字均为汉字，
中间三、四行文字系道教符书。两方真文的汉字识读如下：

西方金星消灾真文 乞与奉道弟子解除秋之三月厄 金星真君
行度刑克临照之灾一如律令

〔1〕 原拓摄影。

〔2〕 原拓摄影。

〔3〕 《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 9 期。



图版拾玖：26



图版拾玖：27

东方火星消灾真文 乞与奉道弟子解除夏之三月厄火星真君行
度刑克临照之灾一如律令^{〔1〕}

简报附有“东方”一石拓片图版，其形制与四川成都羊子山严氏夫妇墓所出石刻真文之上部有栏额题名、汉字咒文祷语书于一侧者不同。惜所附拓片图版仅有火星真君一石，且拓墨不全，无右侧汉字部分。据拓片材料看，既云“夏之三月”“火星真君行度”，则应为“南方火星消灾真文”，释“东方”者误。又“刑临照之灾”，缺释一文当为“克”字。南方一石云篆四行三十二字。西方一石云篆三行，未注字数，参考其他材料，当为二十四字或十六字。

其三是 20 世纪 50 年代发掘四川成都东南郊四川大学西区附近原得胜乡和平村南宋绍兴年间（地券残片有“绍兴”字样可见）砖室墓，出土消灾真文石刻五件，基本完整，仅少部分字有泐缺。此墓石的形制与上述四川成都羊子山严世广夫妇合葬墓所出者大体相似，唯云篆真文与左方汉字之间另加刻双线竖栏相隔，竖线上部直通顶端横刻双线，将额文亦分成两半；左方汉字除祝文祷语之外，并有右方云篆之释文，有所不同。其文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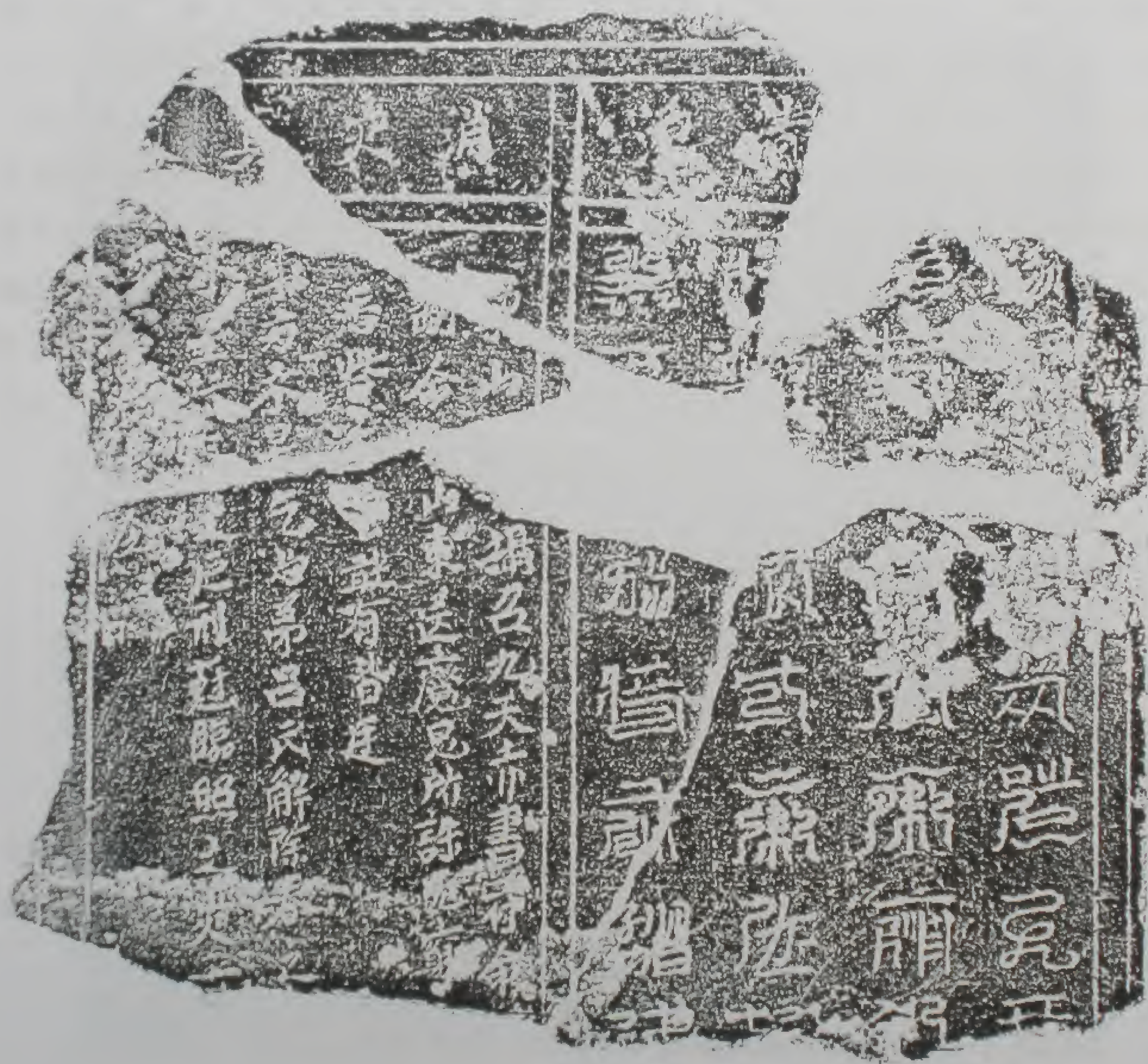
圀圀青帝消灾真文（云篆四行三十二字）“东山 𠄎𠄎，摄照九天。赤书符命，制命 𠄎山。束送魔鬼，敢有皆延。”东方木星，乞为弟〔子〕吕氏解除春之 𠄎𠄎木星行度厄刑克（剋）临照之灾。一如 𠄎𠄎律令！（图版拾玖：28）

南方赤帝安墓真文（云篆四行三十二字）“北方摄山，东（束）送魔宗。符教所讨，明列罪原。南山神咒，威伏百方。群妖灭爽，万试摧亡。”南方火星，乞为弟 𠄎𠄎解除夏之三月火星行度之厄 𠄎𠄎临照之灾。一如律令！”（图版拾玖：29）

西方金星消灾真文（云篆四行十六字）“赤书玉字，九天告文。摄召万气，普归帝君。”西方白帝真文，乞为弟子郭氏解除秋之三月金星行度之厄刑克之灾。一如律令！（图版拾玖：30）

北方五气安墓真文（云篆三行二十四字）“北山神咒，激扬起雷。流铃焕落，覆天振 𠄎。 北方神部，万妖灭摧。”北方黑 𠄎𠄎文，乞为弟子郭 𠄎𠄎解除冬之三月水星行度之厄刑克之灾。一如律令！（图版拾玖：31）

〔1〕《成都西郊沙湾宋墓清理简报》，《成都文物》1999 年 1 期。



图版拾玖：28



图版拾玖：29



图版拾玖：30



图版拾玖：31

中方土星消灾真文（云篆四行十六字）“救摄北帝，遏塞鬼门。解除百（不）祥，莫有当存。”中_因黄帝真文，乞为弟子吕氏解除_四_季之月土星行度之厄刑克_之灾。一如下土五帝君律令！（图版拾玖：32）

其四是四川成都青白江区文管所藏该区华严乡宋墓出土五方五帝真文镇墓砖刻四件，37.7厘米见方，厚5.5厘米，无横额，自右至左，分真文题名、云篆真文、云篆真文汉字译文和祷语四部分。其铭如下：

东方青帝_真_文（云篆四行三十二字）“岁星辅肝，角亢正真。氏房心尾，四景迴旋。箕主七辰，正斗明轮。承气捕非，扫除灾群。”安山大吉。

_南_方_赤_帝_真_文（云篆四行三十二字）“荧惑辅心，井鬼守房。柳星张翼，抗御_四_乡。_总总七宿，回转天常。召运促会，正道_行。”安山大吉。

西方白帝真文（云篆三行二十四字）“太白检肺，奎娄守魂。胃昴毕觜，主制七关。参总斗魁（魁），受符北元。”安山大吉。

北方黑帝真文（云篆四行三十二字）“北辰辅贤（肾），斗牛卫扉。女虚危室，豁落四开。辟（璧）总七星，执凶_紕（纠）非。却灾扫秽，明道轮辉。”安山大吉。^{〔1〕}

失去中方黄帝真文一件。这一套五方五帝真文虽然没有“消灾真文”的题名，却是目前我们看到唯一的一套云篆、汉字译文都和文献记载相吻合的真正的消灾真文镇墓石（砖）刻材料。

以上四批材料，除得胜乡绍兴年间墓出土者外，其余三墓所出保存都不完整。综合加以考察，情况相当复杂，不仅不同墓葬所出之同一方位刻石的名称、云篆字数、正音之有无往往不同，即使同一墓葬所出不同方位刻石名称也不尽统一。以云篆字数而论，如中方一石，羊子山墓者为三十二字，得胜乡墓者为十六字。以名称而言，沙湾路墓者称“△方△星消灾真文”。羊子山者东方一石横额与祝文咒语皆称“东方青帝消灾真文”；中方一石横额称“中方黄帝消灾真文”，祝文咒语称“中方黄帝土星真文”。得胜乡墓者歧

〔1〕 以上就原石抄录。



图版拾玖：32

异尤大，东方一石称“东方青帝消灾真文”，西方与中方称“西方金星消灾真文”、“中方土星真文”，南方一石称“南方赤帝安墓真文”，北方一石称“北方五气安墓真文”，共有四种不同的称法。除得胜乡墓者外，其他三批皆无云篆之汉字译文。但无论怎样，其祷文祝语都无一例外地有“乞为弟子解除△季之三月厄△星行度之厄刑克临照之灾”之语，它们也都属于消灾真文石刻的性质。这是毫无疑问的。

此种消灾真文，道书文献多有记载。上述南宋西蜀道士元素所编《道门定制》一书，卷四云篆符告门即有其真文云篆及告文云：

东方青帝消灾真文（云篆六行三十二字）右云篆上告木德岁星重华真君，乞为奉道某家主摄星官，正天度数，解除命运刑克之灾。愿于东华之宫，降神布气，保肝护魂。谨奏。年月日高功衔宣行。（以下四方“谨奏”下文并同不录）

南方赤帝消灾真文（云篆六行三十二字）右云篆上告火德荧惑星执法星君，乞为奉道某家主摄星官，正天度数，解除命运刑克之灾。愿于洞阳之宫，降神解患，养气守心……

西方白帝消灾真文（云篆四行二十四字）右云篆上告金德太白星天皓真君，乞为奉道某家主摄星官，正天度数，解除命运刑克之灾。愿于素灵之宫，布气降神，静魄安肺……

北方黑帝消定真文（云篆六行三十二字）右云篆上告水德辰星伺辰真君，乞为奉道某家主摄星官，正天度数，解除命运刑克之灾。愿于玄元之宫，布气降神，通血守肾……

中央黄帝消灾真文（云篆七行四十字）右云篆上告土德镇星地侯真君，乞为奉道某家主摄星官，正天度数，解除命运刑克之灾。愿于太玄之宫，布流道气，保固黄庭……〔1〕

元素书所载五方消灾真文云篆未附译文，今仅摄照其东方之文附图为例说明（图版拾玖：33）〔2〕。我们比较宋墓石刻和《道门定制》这两种消灾真文所附用普通汉字写刻的告文材料，发现不仅名称相同（仅少数例外），而乞求五方五星君为奉道之某某“正天度数，解除命运刑克之灾”，文字也是一样

〔1〕《道藏》三十一册，698～700页。

〔2〕《道藏》三十一册，698页。

的。只是此种真文材料，存亡可用，吕书者例用于生人，故以五星配五脏，而石刻用于死者葬墓，则无此项内容。又石刻多出了五方星宿照临月季，这也主要属于行文繁简之异，在其他有关道书文献述及祈禳五星星官消灾材料时，往往也有同样的文字。对此，我们还将在后文论及。

《道门定制》所载五方消灾真文，有云篆而无云篆释文“正字”，其正字译文，见于另一南宋西蜀道士吕太古的《道门通教必用集》卷二和宋人宁全真授、宋元间人林灵真编《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卷一百四十一。吕太古书称“五方消灾真文正字”^{〔1〕}，《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入于祈禳通用“科仪立成品”之“安镇真文仪”，两书皆有相同译文而无云篆，后者附有详细的祝词祷语，可供研究石刻材料之参考。摘文如下：

东方真文正字：“岁星辅肝，角亢镇真。氐房心尾，四景回旋。箕主七辰，正斗明轮。承气捕非，扫除灾群。” 祷文：“东方青灵九气天君、东方神仙诸灵官：今有修斋弟子某修建某斋，恭依灵宝品格，敷露东方赤书消灾真文，安镇东方九气之天……上告东方木德岁星重华星君，请为修斋弟子某主摄星官，正天分度，解禳命运刑克之厄，消除隐显之灾，保护肝魂，和平春令。火急奉行！”

南方真文正字：“荧惑辅心，井鬼守房。柳星张翼，统御四乡。轸总七宿，回转天常。召运促会，正道驿行。” 祷文：“南方丹灵三气天君、南乡神仙诸灵官：今有修斋弟子某修建某斋，恭依灵宝品格，敷露南方赤书消斋真文，安镇南方三气之天……上告南方火德荧惑执法星君，请为弟子某主摄星官，正天分度，解禳命运刑克之厄，消除隐显之灾，保固心气，和平夏令。火急奉行！”

西方真文正字：“太白检肺，奎娄守魂。胃昂毕觜，主制七关。参总斗魁，受符北元。” 祷文：“西方皓灵七气天君、西方神仙诸灵官：今有修斋弟子某修建某斋，恭依灵宝品格，敷露西方赤书消灾真文，安镇西方七气之天……上告西方金德太白星君，请为修斋弟子某主摄星官，正天分度，解禳命运刑克之厄，消除隐显之灾，保固肺魄，和平秋令。火急奉行！”

北方真文正字：“北辰辅肾，斗牛卫扉。女虚危室，豁落四开。璧总七星，执凶纠非。却灾扫秽，明道轮辉。” 祷文：“北方玄灵

〔1〕《道藏》三十二册，16页。

五气天君、北乡神仙诸灵官：今有修斋弟子某修建某斋，恭依灵宝品格，敷露北方赤书消灾真文，安镇北方五气之天……上告北方水德辰星伺宸星君，请为修斋弟子某主摄星官，正天分度，解禳命运刑克之厄，消除显隐之灾，保固肾血，和平冬令。火急奉行！”

中央真文正字：“镇星辅脾，迴度北元。魁魍主非，截邪斩根。魍魍魍魍，扫移除氛。魍正玄斗，明度天关。” 祷文：“中央元灵一气天君、中乡神仙诸灵官：今有修斋弟子某修建某斋，恭按灵宝品格，敷露中央赤书消灾真文，安镇中央一气之天……上告中央土德镇星地侯星君，请为修斋弟子某主摄星官，正天分度，解禳命运刑克之厄，消除显隐之灾，保固黄庭，和平四季。火急奉行！”〔1〕

此五方消灾真文虽系主要针对生人建斋所用撰文，但注明“祈禳通用”，每方皆称“某方赤书消灾真文”，而以木（岁）、火（荧惑）、金（太白）、水（辰）、土（镇）五星与春、夏、秋、冬、四季配东、南、西、北、中五方，“主摄星官，正天分度，解禳命运刑克之厄”。凡此，均与宋墓出土消灾真文镇墓石刻相吻合。

但是，石刻云篆和译文的情况便不是那么简单，问题较大，有不少相互矛盾的地方，需要另作研究。

《灵宝领教济度金书》中所谓的五方“安镇真文”云篆、汉字译文也就是《道门定制》和《道门通教必用集》中的“消灾真文”云篆和译文材料，我们再把它和上面讲到的《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所载由“灵宝五篇真文”分化出来的四种“赤书玉文”相比较，发现正好就是其中的第一种“安镇星度天灾玉文”，甚至连标题意义和后面所附的144字祝文也是一致的。由此可知，此种消灾真文石刻，也是由“灵宝五篇真文”分化演变而来，系由《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系统诸书“灵宝五篇真文”分段材料中的五方（2）段组合而成。《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在五方本段真文之后所加的经德和用法说明中，也都同时讲道：“其△△△字，主召天宿星官，正天分度。诸以天灾，星宿越错，△书△△△字于△纸上，露于中庭△日△夜，夕夕依法别咒。讫，以火焚散灰于青烟之中。并刻书△△△字于△石上，埋△方，天灾自消，星宿复位。”又“元始五老禳星宿客灾明天分度真文玉诀”云：“道言：诸天星宿，各有分度。至于径道错越，更相侵犯，或

〔1〕《道藏》七册，647～649页。

有异见于四方境域，皆由天气运度否激之，灾有所防，出其分国。故以天光转照，玄告不祥。故元始垂文，和天安地，解灾却患，安国宁民。”^{〔1〕}后来《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三十一，禳度施用品，赤书玉文，“安镇星度天灾玉文”之用法、用途说明，实为上引二文的摘抄综合。由此记载可知，此种消灾真文的使用，书纸焚烧或刻石埋于地下均可。川西宋墓出土消灾真文石刻，置于墓室之五方，与文献记载相合。文献记载未言用于死人，由石刻材料可知其存亡皆用之，可补道书文献记载之缺漏。所述消灾真文之用途、功能，则是对出土石刻及《道门定制》等书所附乞祷五星君解除五星“行度刑克临照之灾”普通汉字材料的具体解释。

过去我们由于没有看到宋墓出土消灾真文石刻的云篆和释文材料，单凭少数公开发表的石刻题名和祷语祝文，判断其应属整个灵宝五真文四种分段组合中由五方第二段组合成的第（2）组，也就是上录《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以至《道门定制》、《道门通教必用集》诸书所载的“岁星辅肝”、“荧惑辅心”、“太白检肺”、“北辰辅肾”、“镇星辅脾”等一百六十字的五方消灾真文。后来看到石刻原拓和新出土的材料，感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云篆、译文和名称、经德说明内容，与文献记载并不一致。根据石刻本身的材料，不仅有的方石真文字数与文献不一致，如南方一石文献记载为三十二字，石刻二十四字，中方一石文献记载为四十字，石刻为三十二字或十六字。真文云篆字形，与文献记载也不相同。得胜乡墓所出，真文部分除云篆之外尚有译文，其内容皆与上述“八威真文”完全一样。也就是说，本来是由五方真文中第二段组成的第（2）组“主召天宿星官，正天分度”的“元始五老禳星宿客灾明天分度真文”即消灾真文，也使用了和由第三段组成的第（3）组“主摄天魔万鬼事”的“元始五老摄召北丰鬼魔真文”即八威真文相同的真文云篆，换言之，第（3）组真文云篆实际上成了两种名称和经德内容完全不同的镇墓文所共用的材料。这种矛盾和紊乱的情况，是很值得研究的。云篆字形复杂，既不同于汉字小篆，与常用汉字楷书相去更远，即使受过专门训练的道士，掌握起来也极不容易。灵宝五真文云篆单字六百余，五方四段区分组合，经德不同，熟悉尤难。过去每方真文单独使用可包括四种不同的经德，无论何种场合，将五方全文通通抄上即可，分段成组使用之后，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在真文四种不同经德中，“元始五老修道求仙真文”，用于道士修道求仙；“元始五老禳大劫洪水召蛟龙水官真文”，

〔1〕《道藏》六册，186～189页。

用于水灾之事，二者与丧葬事无关，不用于葬墓，故不作为镇墓文刻石入墓。其余二种，“元始五老摄召北丰鬼魔真文”，“主摄天魔北帝万鬼事”，治一切死鬼妖魔之为患；“元始五老禳宿客灾明天分度真文”，主诸方星宿错位失度致灾事，虽与死者有关，但与葬墓之关系远不如前者密切，作为镇墓文刻石入墓之机会亦远不如前者之多，两种镇墓石刻出土数量比例情况，亦可说明这一问题。使用机会较少，掌握不易，加上过去没有单独分段组合等历史原因，以致出现这种以八威真文云篆代替消灾真文云篆，两种不同镇墓文石刻共用同一种真文的异常情况。尽管这是一种推测，但如前所指出，四川新都青白江华严乡宋墓出土的一套五方五帝真文镇墓砖刻，从保存下来的四方内容看，无论云篆字数、字形还是汉字译文，都和文献记载的消灾真文完全吻合，虽无应有的祝文祷语，却是真正的消灾真文镇墓石刻，这不能不说是这种推测的一个很好的证明。

我们在前面论及，灵宝五真文在南宋以前尚无将五方同一段次真文合为一组的用法，而是将整个真文分置五方以获四段四种经德之功效。这一看法，已为北方陕西地区出土的唐代材料所证实。《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四册著录陕西西安市唐墓出土的“待辨识墓志”拓片一合，云“石藏西安市小雁塔保管所。拓片志（图版拾玖：34）与盖（图版拾玖：35）长、宽均43厘米，篆书。”^{〔1〕}审其“志”文，十二行，行十二字，共144字，每字皆置于棋盘格内。整个“志”文无一普通汉字，所谓“篆书”实为道教之云篆。本“志”即上述《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太上黄篆大斋仪》诸书所载灵宝五真文中之中方真文，无论字形、字数也都相合，只是有的单字部分笔画稍有不同，这属于在传写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差异，对于研究云篆字形发展变化的历史具有一定的价值。该书所附“志盖”拓片图版，正中细线刻符书，由若干大小不等的单字并列、重叠组合成一纵带形，不知是一道符还是石刻题名，无从识别。当时葬入墓中者，除此石之外，当尚有120字之东方、152字之南方、136字之西方与120字之北方等四石，此中方者为幸存之一石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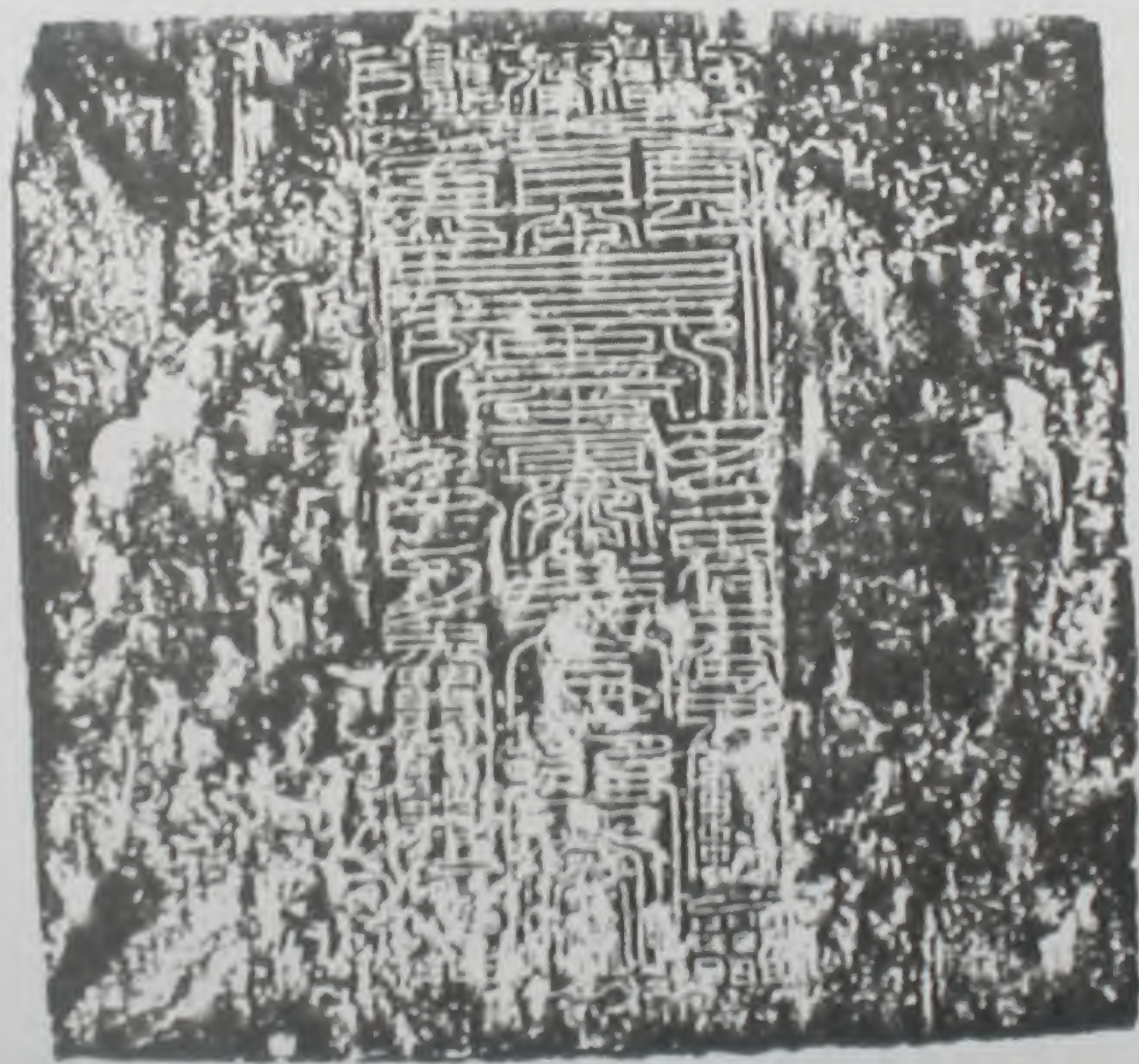
杜光庭《道教灵验记》卷十一“玄武楼北真文验”条载：

光启初，大驾还京，宫城修饰。所司于玄武楼北……掘深八、九尺，得青石函，方四尺。发之……乃于函中得灵宝黑帝北方真文

〔1〕《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四册，172页。



图版拾玖：34



图版拾玖：35

刻石板一片，广二尺二寸，厚五寸。题则隶书，文皆篆字。云“黑帝元老君镇宫城符命”。复醮而藏之……按灵宝内法，王城、宫阙、殿宇、郡邑，凡所制创，先镇五方真文以制召正神，镇抚其所。则隋筑京城之时，安平宫依按玄经，镇符于此矣。亦将是高宗大帝藏镇此文，以保卫宫内欤。^{〔1〕}

是此种隋唐时埋入地下以为镇压之灵宝五真文石刻，唐末僖宗光启初年（885）在西安已有实物出土。分析杜书记载，当是120字的北方一石，属于灵宝五真文使用中的早期形态，虽系用于安镇王城宫阙殿宇而非镇墓，与川西宋墓所出土“八威真文”、“消灾真文”镇墓石刻当有一定的远源关系，对研究川西宋墓灵宝五真文系统镇墓文石刻的来源和整个灵宝五真文使用方法发展的历史，也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五节 “五方五帝灵宝真符”

先师冯汉骥教授所赐石刻拓片中，有四川成都宋墓出土“北方黑帝灵宝真符”一纸，拓片高26厘米，宽25.5厘米，上部为一大神符，下部刻字九行。其铭曰：

北方黑帝灵宝真符，安镇宅宇，辟斥邪精故气。一如黑帝君律令！（图版拾玖：36）

既自名“灵宝真符”，自当属灵宝派材料无疑。

《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卷上有“元始五帝真符”，五方五帝各一神符，符下以细字注文，符后另有文字说明，最后有一总说。其中之“元始黑帝真符”，符形与石刻几乎完全相同，仅少数笔画断续稍有出入，当属辗转传录过程中出现的误差，实为一符。今附录符形于此，比较自可明了

〔1〕《道藏》十册，838页。



图版拾玖：36

(图版拾玖: 37)。^{〔1〕}符下细字注文云:“召直符尹丰守灵宝天文,道士吞之,灵气镇肾,生玄精五叶,神为役使,通灵致神仙。”符后文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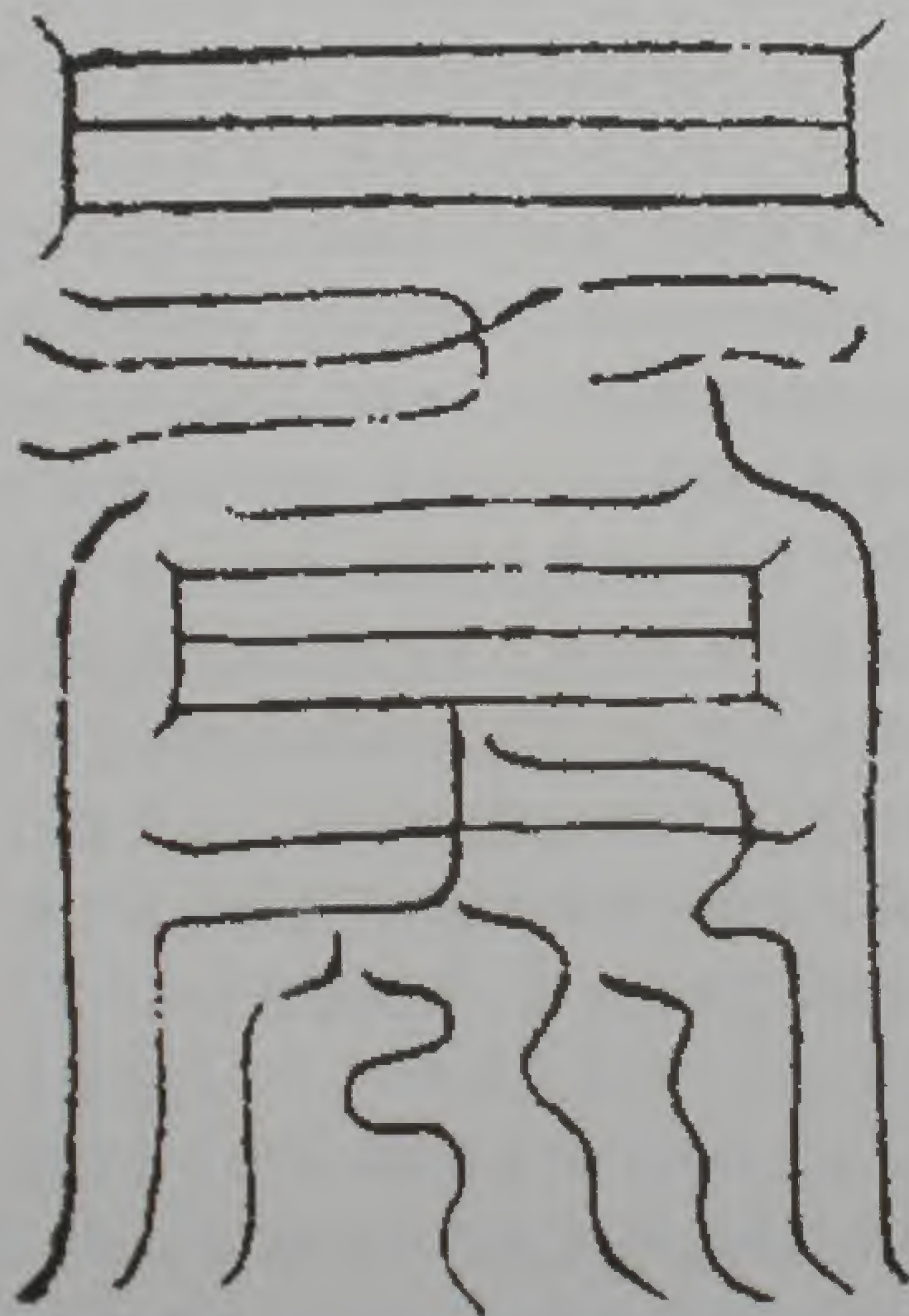
右通明文出《黑帝真文篇》,以安北方五气之天。黑帝受此文以镇北岳。封一通于玄阴洞室,四万劫一开。道士命属北岳,黑书青缯佩身,并本命日朱书,向北服之五枚。直符吏尹丰,随符入腹肾府之中,五年,皆生黑精,宝华五重,光映于形外。又当黑书青缯,内神杖次白帝下节中。太玄玉女五人侍卫。勿不精,有考吏。五帝真符,上精在天为五星,中精在人身中为五脏,下精在地为五岳。故三元之气,各有所属。天无五文,三光不明;人无五文,无以立形;地无五文,五岳不灵。五帝真符,以元始同生,旧文今秘于玄都紫微宫。侍真五帝神官五亿万人,诸天皆一月三朝真文,有火水阴阳官考,禁于泄漏。^{〔2〕}

此种神符,据后总叙之文及上录之文,用法颇多,或吞服,或纳于神杖节中随身携带,皆可安镇诸方,去祸来福,“得尸解转轮成仙”。此外,“国土北方及冬三月有灾,欲使北乡安镇,当朱书黑石上,置北方。五日,灾自灭,凶逆自消,北方自宾,善瑞日昌,地藏发泄,金玉露形,天人歌咏,国富民丰。”“元始施安灵宝五帝镇宫宅上法,以施于上学好道之士,不行凡庶。”^{〔3〕}亦可书符于石分置五方以镇宫宅,属“元始施安灵宝五帝镇宫宅上法”所用。如前所论,所谓的安镇宫宅,既包括生人所居的阳宅宫室屋宇,也包括死人所居之阴宅墓室,墓葬中出土此种以神符为主的镇墓文石刻,与文献记载也是一致的。当时放入墓中的,除此石之外,当尚有“东方青帝灵宝真符”、“南方赤帝灵宝真符”、“西方白帝灵宝真符”和“中方黄帝灵宝真符”等四石,其石已不存,符形则可从《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等文献中求得。唯此种神符仅“施于上学好道之士,不行凡庶”,此种镇墓文石刻很可能主要出在道士墓中而不出于一般道教信众之墓,所以很少实物发现。当年出土此北方黑帝灵宝真符镇墓石刻的宋墓很可能是一道士墓,可惜具体发现情况不详,望能引起今后川西宋墓发掘者的注意。《道教灵验记》

〔1〕《道藏》一册,786页。

〔2〕《道藏》一册,786~787页。

〔3〕《道藏》一册,785~788页。



元始黑帝真符

卷十一《襄州城角铁篆真文验》：“襄州城后据汉水，昔人版筑之时，于城角铸铁仙人像，手执方札，上刻灵宝真文。札方尺余，文字篆刻，殊为精妙。常时此角，每有神异，往来之人，不敢污犯。俗中皆言此中有巨蛇之穴，或云尝有城隍神现于其处。及奇章公在镇之年，江波泛滥，坏堤犯城，此角摧剥，方见铁像及所刻符文，大有隶书云：‘元始五老敕直符尹丰，奉灵宝真文，以禳水害。如赤书符命！’既而修复城池，泥之如旧。但不言刻砖年月尔。向若无此真文镇于坊壁，巨波泛滥，雉牒颓坏，襄阳之陷，未可知矣。”^{〔1〕}这是古代此种类型神符用于镇水护城之例，出土于五代，当系唐时人士的遗迹。

元始五帝真符材料，《无上秘要》卷四十一策杖品有部分文字，云出《洞玄玉诀上经》，当即《太上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的异名，未著符形，亦未及镇宫宅刻石事，摘录时删落所致者^{〔2〕}。又明人所编《受篆次第法信仪》亦有“元始五帝真符”五道，符形与《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大同小异，其“元始黑帝真符”画法与宋墓石刻出入更要大些，但仍未失去共同的基本形状，只是时代愈晚，失真愈甚。《受篆次第法信仪》将此材料归入“本命符”中，既无其他文字说明，亦未涉及刻石镇宫宅事^{〔3〕}。无论怎样，此宋墓出土“北方黑帝灵宝真符”镇墓文石刻，与上述之“八威真文”和“消灾真文”石刻一样，也都同样是源出于早期灵宝派文献《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属于灵宝派的材料，这是很清楚的。

第六节 “炼度真文”石刻

这种石刻，在川西两宋墓葬中都有发现，是几种出土镇墓文石刻中数量最多的一种。过去曾有人发表材料说：此种真文石刻，“初见于宣和五年，盛行于绍兴年间”。根据后来发掘的材料，至迟在北宋中叶仁宗之世即已开始出现，一直流行到南宋宁宗年间。前面提到1998年发掘四川成都龙泉驿区十陵镇青龙村一五砖厂M2北宋嘉祐七年（1062）田世中夫妇合葬砖墓，

〔1〕《道藏》十册，837页。

〔2〕《道藏》二十五册，134～135页。

〔3〕《道藏》三十二册，224页。

男、女二室共出土此种石刻八方^{〔1〕}。此外，20世纪80年代发掘四川成都九眼桥与四川大学之间招飞办北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房府君墓出土此种石刻也是年代较早的材料，唯出土时文字尚清晰可见，其石触手即碎，据称只有发掘现场照片保存下来。1984年清理四川成都东郊圣灯乡元祐八年（1093）张确夫妇合葬墓出土的三方石刻^{〔2〕}，1999年发掘四川成都市高新区紫荆路M3北宋同坟异藏券拱砖墓出土二石^{〔3〕}，1999年发掘成都市南三环路99CCS M1北宋砖室墓出土一残石（西方）^{〔4〕}，也是迄今正式发表有明确纪年并经科学发掘的年代较早的材料。

这种“炼度真文”镇墓石刻，完整者一套五件，分东、南、西、北、中刻写不同内容的云篆、普通汉字，在墓中按方位放置。每方刻石，主体部分为固定字数的云篆，中方16字，其余四方各64字，仅极少数材料字数有所变化。此外，多数刻石另外还有普通汉字刻文，包括石刻名称、云篆释文和祷语祝文等方面的内容，但诸墓所出此种文字项目内容之多少及所在位置则无一定。至于石刻名称，除“△方八（五）天炼度真文”之外，尚有“△方八（五）天安灵真文”、“△方八（五）天荐拔真文”、“△方八（五）天安灵荐拔真文”、“△方八（五）天安墓真文”、“△方八（五）天镇墓真文”、“△方△帝安尸真文”、“△方△帝镇山真文”、“太上洞玄灵宝△帝练度五仙安灵镇神△气天文”等种种不同的名称。四川成都龙泉驿区青龙村嘉祐七年（1062）田世中夫妇合葬砖墓，男、女二室所出之中方炼度真文，左方栏内书名“中方炼度真文”，中间祝文则称“太上真元大道五方炼度荐拔真文”，一般均为正方形。按其所附普通汉字项目之多少，此种石刻可分为四式：

I式 除云篆外仅刻题名。如四川成都东郊跳蹬河南宋绍兴二年（1132）王宜人墓之“北方八天镇墓真文”（图版拾玖：38）^{〔5〕}，1987年四川什邡隐峰镇宋墓出土之全套五方五帝“安尸真文”（图版拾玖：39 东方、

〔1〕《成都市龙泉驿区青龙村宋墓发掘简报》（1999），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

〔2〕《成都东郊北宋张确夫妇墓》，《文物》1990年3期。

〔3〕《成都市高新区紫荆路唐宋墓发掘简报》（1999），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200页，图七、八。

〔4〕《成都市南三环路发现北宋砖室墓》（1999），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240页，图四。

〔5〕《成都东门外跳蹬河发现宋代墓葬》，《考古通讯》1956年6期。



图版拾玖：38



图版拾玖：39

图版拾玖：40 西方、（图版拾玖：41 南方）、图版拾玖：42 北方、图版拾玖：43 中央）^{〔1〕}，皆刻题名于云篆上方的横栏内。成都市考古队朱章义等发掘龙泉驿区红河乡三桥村南宋墓出土的“北方八天安墓真文”，则刻题于云篆的右方栏内。云篆外的汉字，别无题名以外之其他内容。凡此等等，皆属其例。不过，什邡隐峰镇宋墓出土的全套五方真文砖刻，每方上端大字横额，左边第一字下方空白无祷文与之相对应，留出一竖宽带，似是准备刻书云篆释文而未及完成者。

Ⅱ式 除云篆真文和石刻题名之外另附祝文祷语或其他简单普通汉字说明材料。如先师冯汉骥教授所赐四川成都宋墓出土“东方八天炼度真文”，刻题于云篆右方，另刻“一如青帝律令符命”于云篆之左方（图版拾玖：44）^{〔2〕}。

Ⅲ式 除石刻题名、真文云篆之外，并附云篆真文之汉字译文。如先师冯汉骥教授所赐四川成都宋墓出土之“西方八天炼度真文”（图版拾玖：45）^{〔3〕}与“南方八天炼度真文”^{〔4〕}，皆于石之上方横刻汉字楷书题名，下方以细线刻出大方框。方框分为左右两半，左半刻细线棋盘格六十四，格内刻写八行六十四字之云篆真文；右半刻四行六十四字之真文云篆楷体汉字译文，四字为句，每句刻一框线栏格，与右方云篆之每字一格者不同。另四川成都东郊圣灯乡元祐八年（1093）张确夫妇墓所出三石，从保存较好（下端有残缺）之北方石文看，上段横栏刻“𧈧无自育”等真文汉字译文 64 字，下段右栏刻云篆真文 64 字，右栏刻“北方荐拔炼度真文”八字题名（图版拾玖：46）^{〔5〕}。1999 年发掘成都市高新区紫荆路 M3 夫妻东西并室合葬宋墓，西室出土 M3 西：3 号北方炼度真文石刻，上段横栏刻“𧈧无自育”等真文汉字译文 64 字，下段右栏刻云篆真文 64 字，左栏刻“北方荐拔炼度真文”八字题名（图版拾玖：47）^{〔6〕}，与张确墓材料相较，除刻写题名一在下

〔1〕 材料发表于四川省什邡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编《什邡馆藏文物集粹》，54～55 页。此据自藏原石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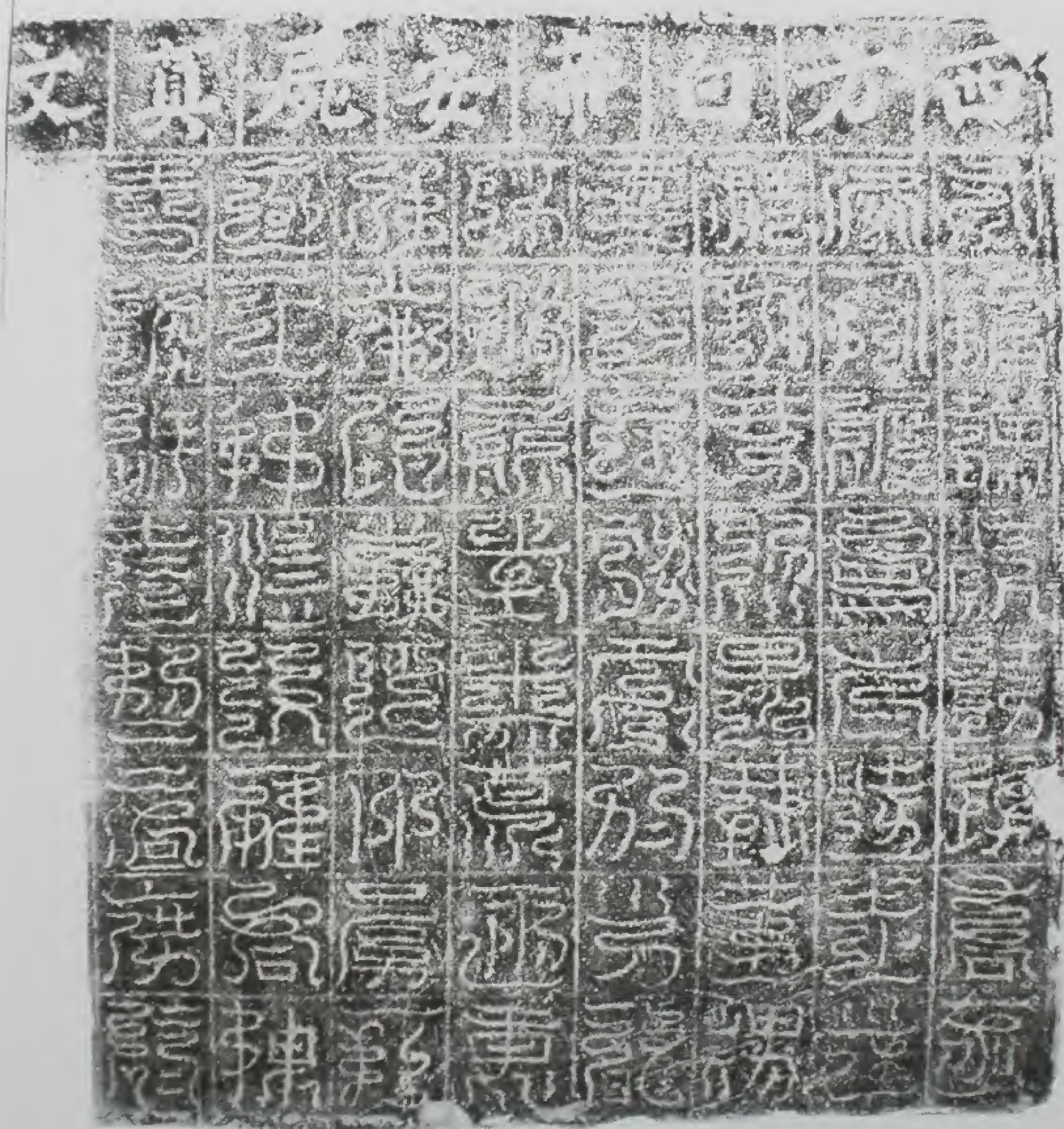
〔2〕 自藏原石拓片。又见《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136 页，图十二。

〔3〕 自藏原石拓片。

〔4〕 《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136 页，图十三。

〔5〕 本石图版发表在翁善良、罗伟先：《成都东郊北宋张确夫妇墓》一文中，见《文物》1990 年 3 期，10 页，图一九，但图版不清晰，今据原拓照相制版。

〔6〕 《成都市高新区紫荆路唐宋墓发掘简报》（1999），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200 页，图八。



图版拾玖：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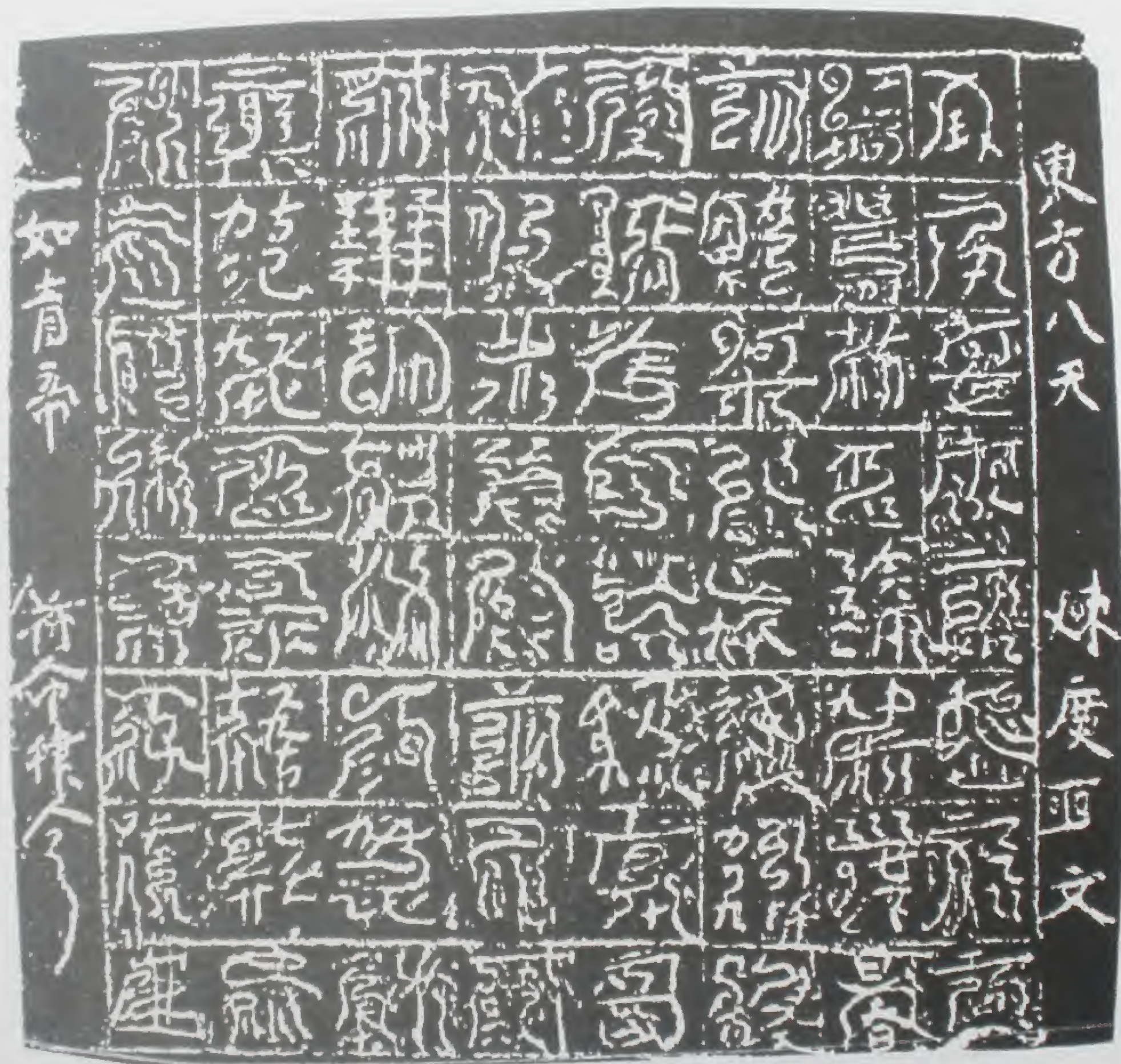
图版拾玖：41



图版拾玖：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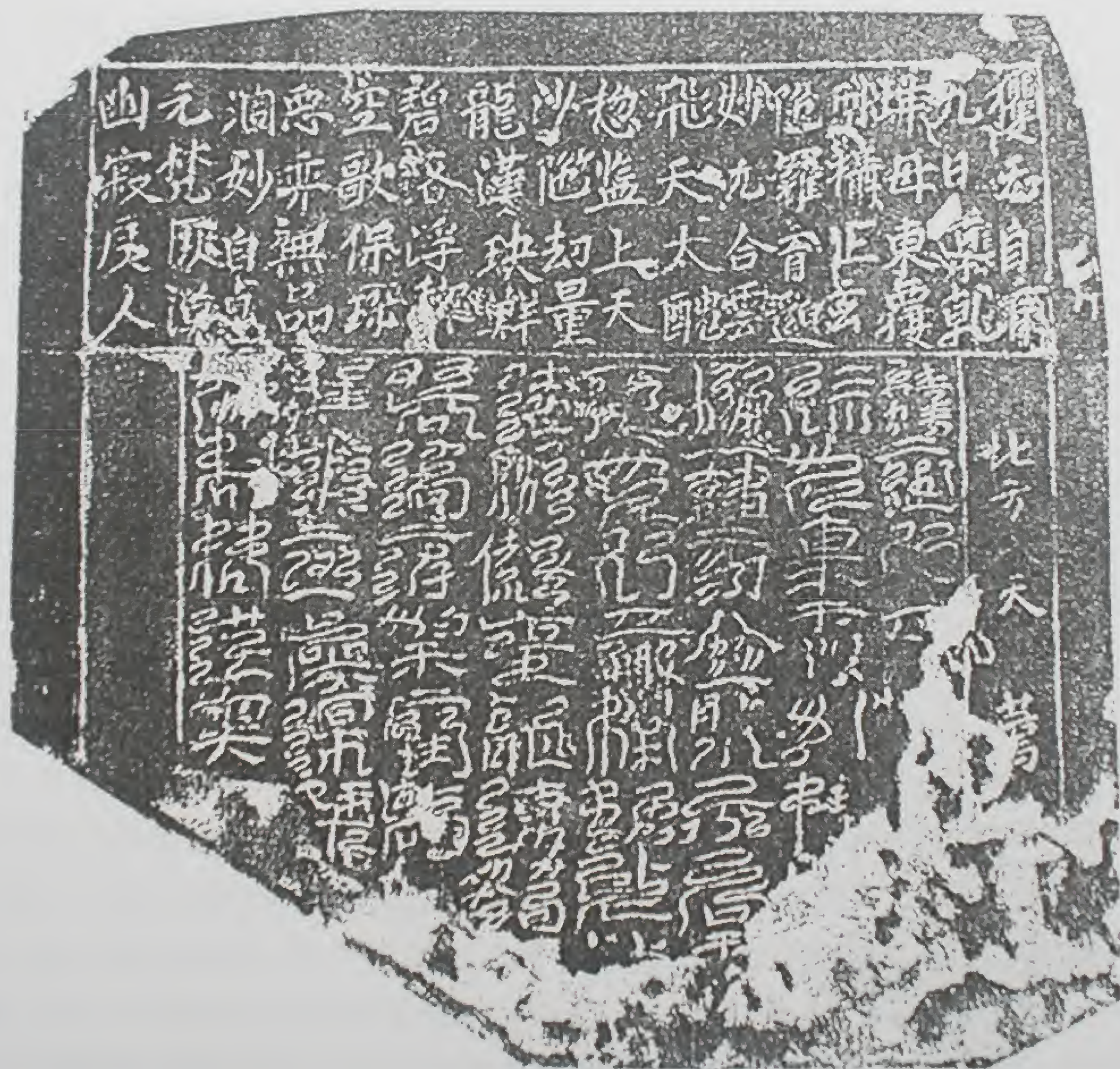
图版拾玖：43



图版拾玖：44



成都宋墓出土“西方八天炼度真文”石刻



图版拾玖：46



图版拾玖：47

栏左侧，一在下栏右侧，微有不同而外，其他内容和布局完全是一样的，亦应归属此式。将上述出土材料与有关文献对照，其云篆字形与汉字译文大体均能吻合，仅极少数单字间有出入，亦属传刻失真所致。今录所见以上三石之云篆普通汉字译文于此，以供对照分析。

南方八天炼度真文：“南阎洞浮，玉眸诜诜。梵形落空，九灵指前。泽落菩台，录罗大千。眇葬（莽）九丑，韶谣缘遭。”

西方八天炼度真文：“刀利禅猷，婆泥九通。宛藪涂色，太渺之堂。流罗梵萌，景慰肃（萧）嵎。易邈无寂，宛首少都。阿那郁筑，华莫延由。九开自辨，阿那品首。无量浮盖，浮罗合神。玉诞长桑，柏空度仙。”

北方八天荐拔真文：“攬无自育，九日导乾。坤母东覆，刑摄上玄。陀罗育邈，妙无（炁）合云。飞天大丑，总监上天。沙陀劫量，龙汉玦（璫）鲜。碧落浮黎，空歌保珍。恶无列品，洞妙自真。元梵恢漠，幽寂度人。”

北方释文，发表材料时与原刻间有出入，今据原拓订正。南方一石，细审拓片之形，拓墨不全，失拓右边二行三十二字，仅存云篆释文之前半部分，与原石之有意省刻者不同。

Ⅳ式 除真文云篆之外，同时并有云篆之汉字译文、石刻题名和简单的祷语祝文等其他普通汉字说明文字。此式最典型的是四川成都青白江区文管所藏本区弥牟镇宋代刘氏十三娘子墓出土炼度真文砖刻三方、雍氏足娘子墓出土炼度真文砖刻二方。原成都市考古队队长罗伟先同志生前曾提供材料线索，1991年伟先队长因积劳成疾去世以后，我们师生二人于1992年11月12日偕该队刘雨茂同志前往对两墓砖刻实物进行考察，测量记录。刘氏墓三砖，38厘米见方，厚4厘米，中间大方框棋盘格内刻写真文云篆与汉字译文，云篆与译文相间，每字对应，各四行三十二字。真文两侧汉字字形较小，右侧为砖题，左侧其他文字说明。录普通汉字刻文于下：

太上洞玄灵宝青帝炼度五仙安灵镇神九气天文：“须筵明首，流揽菩昙。华都曲丽，鲜菩育臻。飞丽玉都，明魔上门。阿那龙罗，四象吁员。”成都府新都县弥牟镇居住亡人刘氏十三娘子镇墓。

太上洞玄灵宝白帝炼度五仙安灵镇神七气天文：“宛藪涂色，

太妙之堂。易邈无寂，宛首少都。九开自辩，阿那品首。玉诞长桑，栖（柏）空度仙。”成都府新都县弥牟镇居住亡人刘氏十三娘子镇墓。

太上洞玄灵宝黑帝炼度五仙安灵镇神五气天文：“坤母东覆，形摄上玄。飞天大丑，总监上天。碧落浮黎，空歌保珍。元梵恢漠，幽寂度人。”成都府新都县弥牟镇居住亡人刘氏十三娘子镇墓。

雍氏足娘子墓两砖大小形制与刘氏三娘子者相同。其普通汉字部分录文如下：

太上洞玄灵宝白帝炼度五仙安灵镇神七气天文：“宛藪涤色，太妙之堂。易邈无寂，宛首少都。九开自辩，阿那品首。玉诞长桑，栖（柏）空度仙。”成都府新都县弥牟镇居住亡人雍氏足娘子镇墓。

太上洞玄灵宝黑帝炼度五仙安灵镇神五气天文：“坤母东覆，形摄上玄。飞天大丑，总监上天。碧落浮黎，空歌宝珍。元梵恢漠，幽寂度人。”成都府新都县弥牟镇居住亡人雍氏足娘子镇墓。

值得注意的是此两墓出土之真文，除缺失中方材料情况不明之外，其余诸方本应为六十四字之真文，云篆和释文都只有三十二字，是否凡属本式者都是如此，有待更多的出土材料方可论定。又此二墓均未经科学发掘，其他一些有关情况也不清楚，甚为可惜。

还应当提到的是，出土情况表明，“炼度真文”石刻虽然可以分为上述四式，但一墓出土之五石有时并非统一属某一式，大抵东、南、西、北四方同为一式，中方另为一式。凡属此种情况者，中方一石属Ⅳ式，其余四石属于另外三式中之何式则无一定。如1998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四川成都东郊龙泉驿区十陵镇M2北宋嘉祐七年前后双室合葬砖墓，左边嘉祐七年（1062）田世中墓室出土红砂石买地券、华盖宫文、天帝敕告文各一方，炼度真文五方。买地券，有北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八月纪时文字，为刻石入葬之准确年月。该墓室所出炼度真文石刻，M2左：11号中方一石与其余四石大小形状相同，文字内容则比较特别，除右区下部16字符书，上部用普通汉字“黄中总气，统摄无穷。镇星吐辉，流炼神宫”刻写符书译文之外，左方用普通汉字自左至右刻写如下祝文：“中方炼度真文：太上真元大

道五方炼度荐拔真文，今有剑南西川成都府华阳县宣阳坊居住小兆臣田世中魂识葬于斯境，弟子忏悔生平，切恐三世宿缘，误有愆尤，希回巨福，保护真魂宁谧，托往净方，荫佑子孙兴隆昌泰，富贵大吉。急急如律令！”（图版拾玖：48）^{〔1〕} 此石“小兆臣田世中”的“兆”字，石刻字形原作并列两土字中间一竖画向右大弯钩，原简报编者将之误释为“地”，“小地臣某某”，未见他例，其义无解。按辽僧行均《龙龕手鑑》卷二，土部，上声，“兆”字作此形，谓：“直小反，祲也。”^{〔2〕} 田世中称“小兆臣”，有他特殊的意义，将于后论。其余东、南、西、北四石，无祝文部分内容。属炼度真文石刻之Ⅲ式。成都市考古队发掘四川成都龙泉驿区红河乡三桥村绍兴二十五年（1155）宋兴仁夫妇合葬墓出土中方炼度真文石刻，上部横额刻题“中央黄帝荐拔真文”，其下右方刻云篆大字四行十六字，云篆左方刻楷体汉字八行，文曰：“元始赤书旧典八天五炼隐文，谨用荐资歿故程氏六娘子。伏愿仗八天之真诰，度品南宫，持大梵之隐文，超生胜境。一如五帝君符命！”^{〔3〕} 四川成都市郊宋墓出土“中方八天安灵真文”石刻，石面分为左右两半。右半面积较大，上方四行八字题石，下方大字四行十六字云篆。左方汉字楷书五行，文曰：“中方八天镇墓之真文，并用荐奉亡过先妣张氏四娘子香魂，证品生界。仗此八天之秘录（篆），速生仙府，云祥自在，福荫见子孙昌盛，代代不绝。一如太上五帝命律令！”（图版拾玖：49）^{〔4〕} “奉”字下空字未刻，当为“道”字，盖墓主张氏生时为奉道者。“福荫见子孙昌盛”，“见”字当系衍文。此外，前面提到四川成都东郊圣灯乡元祐八年（1093）张确夫妇墓出土之炼度真文石刻，其北方一石属Ⅲ式，而中方一石情况却不一样。此石刻一竖线将石面分为两半，右半再用一条横线隔为上下两区，再用一条竖线将下区分为左、右两个部分。整个石刻之右半下区右部刻“中方八天荐拔真文”楷书汉字，左部刻大字云篆四行十六字；上区刻云篆释文：“黄中总气，统摄无穷。镇星吐辉，流炼神宫。”石刻左半刻楷体普通汉字祝文祷语说明，文曰：“今有成都府犀浦市居故张确，行年七十一岁，四月八日生；并故杜氏，行年七十一岁，十月一日生。忏悔生前□宿缘，误有衍由，希回

〔1〕《成都市龙泉驿区青龙村宋墓发掘简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1999），289页，图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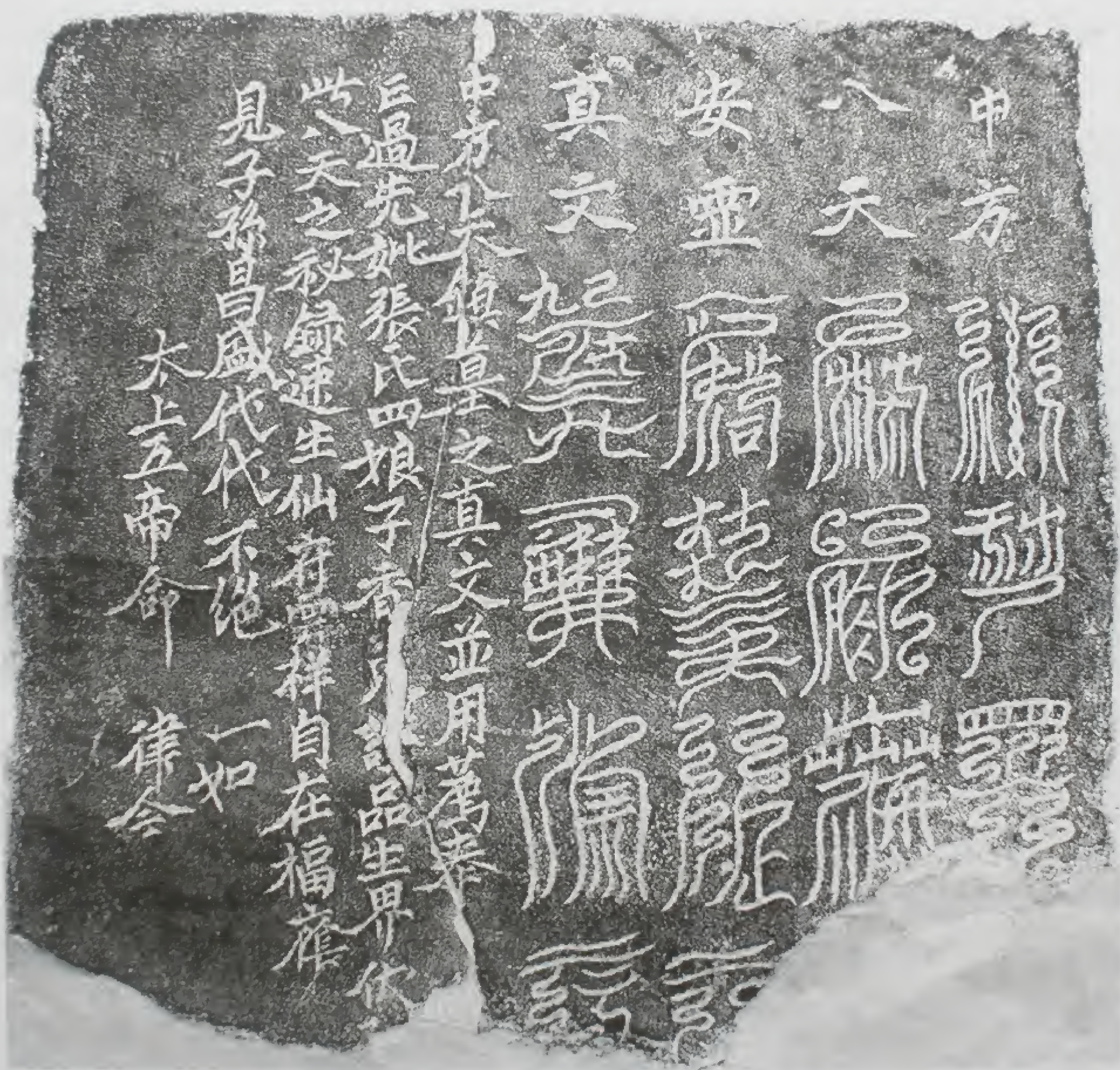
〔2〕影印《龙龕手鑑》本2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3〕发掘者提供石刻拓片复印资料。

〔4〕徐鹏章先生惠赠拓片。



图版拾玖：48



图版拾玖：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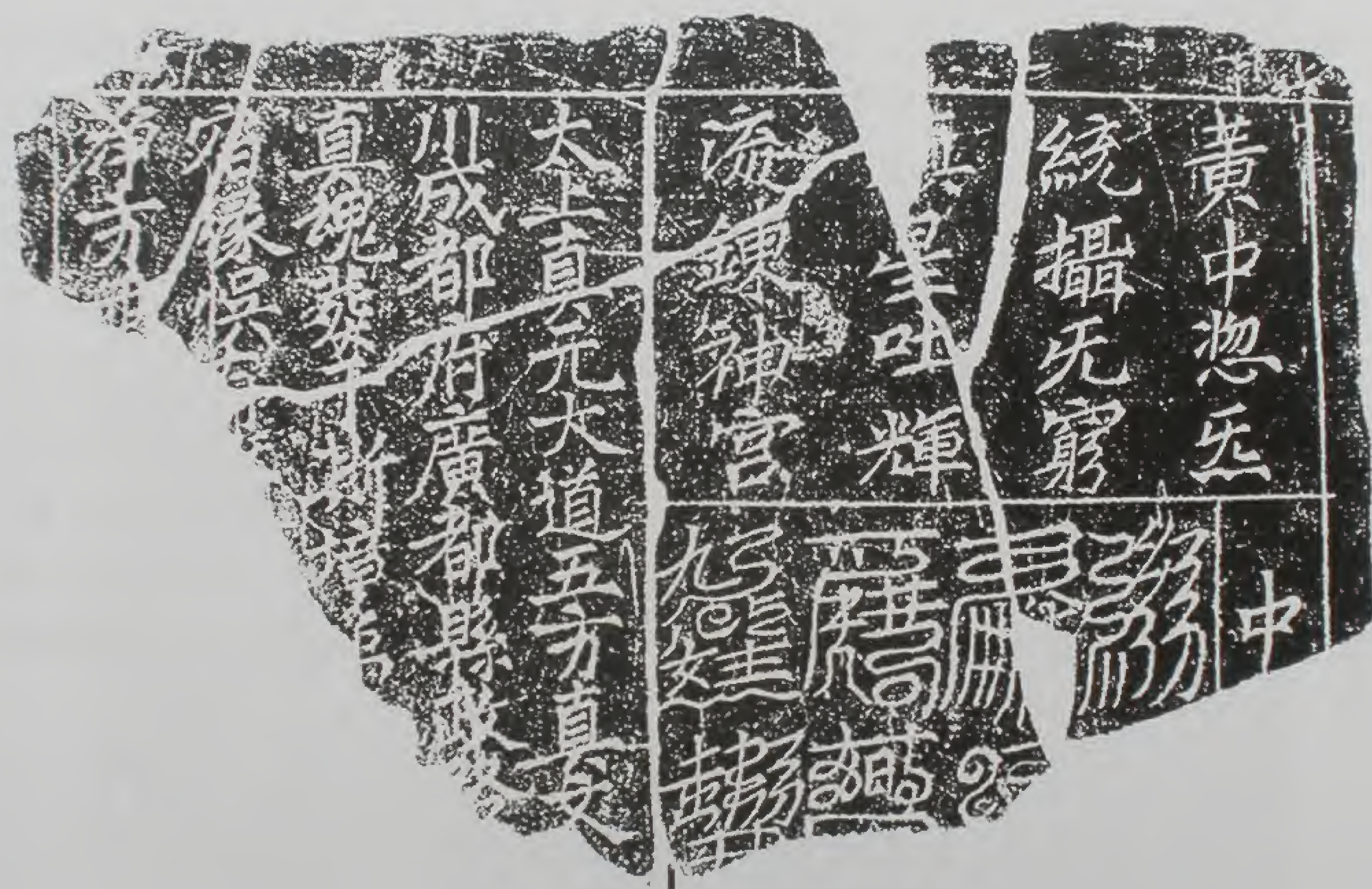
巨福，保护真魂安宁，托往净方，荫祐子孙，昌隆代代。一如五帝律令！”^{〔1〕}又前面提到四川成都市高新区紫荆路 M3 夫妻东西并室合葬北宋墓，西室除出土北方炼度真文石刻之外，尚出土 M3 西：8 号中方炼度真文（图版拾玖：50）石刻一方，下部已残^{〔2〕}。残存部分，也是中刻一竖线将石面分为左右两半，右半再刻一横线分成上、下栏，上栏刻“黄中总气，统摄无穷。镇星吐辉，流炼神宫”真文汉字；下栏右方尚有一“中”字可见，全文当是“中方荐拔炼度真文”题名，左方刻真文云篆十六字。左半部分刻祝文，尚有“太上真元大道五方真文……四川成都府广都县政务……真魂葬于斯境福囿……宿缘误有……净方”等字可见，与上述二石情况相同，残去文字可参考以上完整之石文大致补足。从上述四批材料看，十分清楚地说明此种炼度真文石刻，往往是将Ⅲ式与Ⅳ式配合使用，中方用Ⅳ式，其余四方用Ⅲ式。盖祝语祷文诸方并同，“黄中总气，统摄无穷”，意在说明四方祝文祷语语意既同，可一总于中方述之以省写刻之烦也。此外，中方一石刻文除了记述墓主姓名和统一的祝文祷语，有的还包含其他一些内容在内，具有特别的道派标志意义，将于后作专门的讨论。

这种五方炼度真文镇墓石刻，在北方地区的宋墓中没有出土，但陕西西安、咸阳和河南安阳唐墓中却有所发现，西安地区数量较多。陕西的材料，早在清末就已引起金石学家们的注意，加以收集、研究和著录。叶昌炽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撰成的《语石》卷五记载：

符篆，道家言也……唐人所用，皆纳之幽窆中，大小与墓石（引者按：当指墓志石）略同。余所藏有四本：一为顺天皇后考鄴王墓中物，一出金仙公主墓，皆无年月。顺天皇后者，韦庶人也。符文在上截，共十一行，行六字；下截为五气天文，但诸刻前有题字一行，此刻直起无题字，即以诸刻证知之。其石出关中，今为渭南赵乾生所藏。此外二刻，并无题名。中一刻亦藏赵氏，符文居中，八行，行皆八字，首行题“灵宝黑帝炼度五仙安灵镇神五气天文”。其文四面环刻于边际，小字真书，略似古镜，但变圆为方耳。

〔1〕 罗伟先等：《成都东郊北宋张确夫妇墓》，《文物》1990年3期，9页，图一八。

〔2〕 《成都市高新区紫荆路唐宋墓发掘简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1999），200页，图七。



图版拾玖：50

一石浚阳制帅（引者按：即端方）藏，其制略同，唯首行“帝”字上“灵宝黑”三字已蚀，不知有无异同。其文首云：“东（引者按：当为‘北’字）方五气玄天，承元始符命，告示北方无极世界，土府神乡诸灵（‘诸灵’二字泐，以酆王刻互证，得之）官：今有大洞弟子”，云云。其末则云：“如元始明真旧典女青文”。酆王一刻皆同，唯改“东方五气元天”为“西方七气素天”，下“北方”亦作“西方”。此外，唯“大洞弟子”改“顺天皇后先考”，云云^{〔1〕}。

《新唐书·睿宗十一女传》：金仙公主，太极元年（712）与玉真公主同度为道士。据1974年陕西蒲城县桥陵金仙公主墓^{〔2〕}出土开元二十四年（736）徐峤撰《大唐故金仙长公主志石铭并序》称：公主“以壬申之年建午之月十月辛巳，薨于洛阳之开元观，春秋四十有四。越以景（丙）子之年七月己卯朔四日壬午，启旧茔而自洛阳陪葬于桥陵。”即公主开元二十年（732）死后，初葬于洛阳，至开元二十四年（736）迁葬于陕西蒲城其父睿宗李旦桥陵祔葬。陕西蒲城金仙公主墓出土炼度真文石刻，当为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遗存。又陕西西安碑林所藏西安市郊“唐光化年间（898～900）墓”出土所谓“崔镇墓石记”，其拓片长54厘米，宽54.3厘米。石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刻云篆十一行六十四字，下部刻普通汉字正书十九行。（图版拾玖：51）^{〔3〕}下部刻文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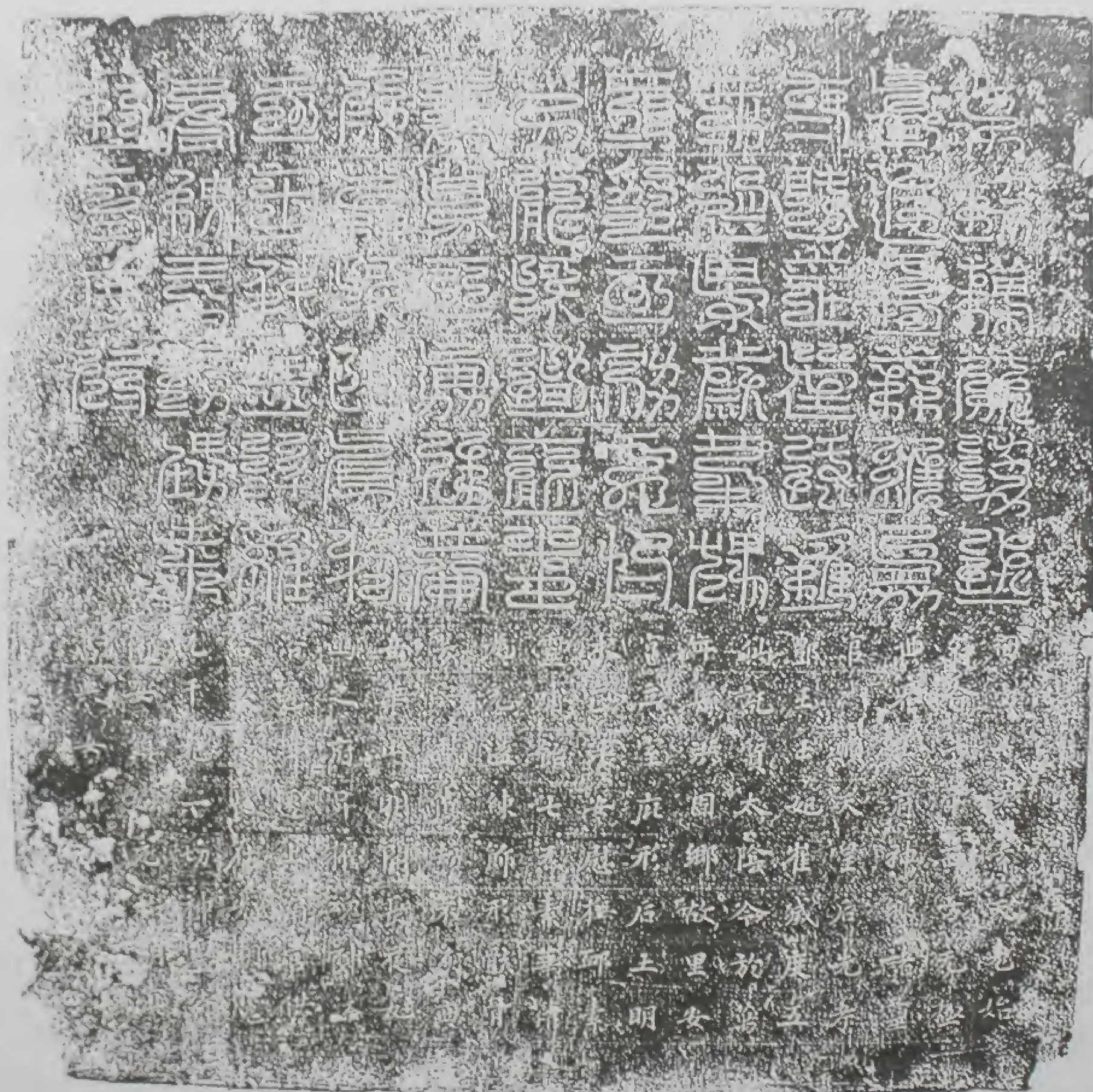
西方七气素天元始符命告下西方无极世界土府神乡诸灵官：顺天皇后先考酆王王妃崔灭度五仙，托质太阴，今于万年县洪固乡故里安宫立室，庇形后土，明承正法，安慰抚恤，素灵哺饴，七气素华，精光充溢，炼饰形骸，骨芳实（肉）香，亿劫不灰。西岳华山，明开长夜九幽之府，开擢魂神，沐浴冠带，迁上南宫，供给衣食，长在光明，魔无干犯。一切神灵，侍卫安镇。如元始明真旧典女青文！

此刻应是上述叶昌炽《语石》中所提到的关中赵乾生旧藏“顺天皇后先考酆

〔1〕 叶昌炽：《语石》卷五（188～189页）。

〔2〕 樊光春：《陕西新发现的道教金石》，《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2期。

〔3〕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二册，140页。



图版拾玖：51

王妃墓”中所出之“西方七气素天”一石者，入土时间当不晚于玄宗之世。顺天皇后即中宗韦皇后，景龙四年（710）毒死丈夫，掌握朝政，睿宗时为后来立为玄宗的李隆基和太平公主联手所杀，贬为韦庶人。谓其父酆王之妃崔氏镇石出于唐昭宗光化年间（898～900）墓中，不知何据。宣统元年（1909）成书的端方《匋斋藏石记》卷三十七记载：

灵宝黄帝中元天文，石纵横各九寸四分，前一行标题正书，下符篆四行，行四字。“灵宝黄帝炼度五仙安灵镇神中元天文”（符文不录）。

灵宝黑帝五气天文，石纵横各尺许，前一行标题正书，下符篆八行，行八字。

灵宝黑帝练度五仙安灵镇神五气天文（符文不录）。

其灵宝黑帝五气天文，当即叶书所云之端氏藏石也。今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灵宝黄帝炼度五仙安灵镇神中元天文”石刻拓片，除普通汉字标题和十六字云篆外别无其他刻文，不知是否即此端方藏石。又北京图书馆藏 5068 号“灵宝黑帝练度五仙安灵镇神五气天文”石刻拓片，石面粗泐，拓本图版字迹不甚清晰，细看中间普通汉字标题和六十四字云篆，左、右两侧靠边处尚有“亿劫不灰”、“元始符命”等细字隐约可见，且左、右行字方向相反，难辨上下方是否亦有此种细字^{〔1〕}，不知是否即叶昌炽书所说陕西赵乾生所藏之“其文四面环刻于边际”者。若是，今时流传来历不明之此种唐石拓片大抵亦为早年陕西西安及附近县境所出。李子春《唐武三思之镇墓石》一文介绍：“唐武三思之镇墓石，不知何时由咸阳北原唐顺陵周围出土，石之制式如墓志，正方形，每边 0.56 米，多年存县，而咸阳县志则不载”。该石有底有盖，盖石中央刻普通汉字五行，行五字，凡二十五字，文曰：“大唐景龙元年，岁次丁未，十一月乙未朔，八月壬寅，谨为梁王镇。”底石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部云篆十一行，除末行为四字外，其余十行行皆六字，共六十四字。作者认为，“其字似篆文，而皆不可识；即有可识者，恐亦非是。”石之下部小字刻写普通汉字如下：

〔1〕 二石材料见王育成：《文物所见中国古代道符述论》，《道家文化研究》第九辑 296 页，图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南方三气丹天，承元始符命，告下南方无极世界土府神乡诸灵官：大唐梁王灭度五仙，托质太阴，令陪顺陵，庇形后土，明承玉文，安慰抚恤，赤灵哺饴，三气丹池，清光充溢，炼饰形骸，骨芳肉香，亿劫不灰。南岳霍山，明开长夜九幽之府，升擢魂神，沐浴冠带，迁上南宫，供给衣食，长在光明，魔无干犯。一切神灵，侍卫安镇。悉如元始明真（李文此字误读为“置”）旧典女青文！^{〔1〕}

原石现存陕西咸阳博物馆，石刻拓片除附载李子春文之外，又见著于张弘杰主编之《咸阳碑石》一书，称“梁王镇墓石”（图版拾玖：52）^{〔2〕}并附盖石材料。《咸阳碑石》另外还著录了咸阳博物馆藏的“延陵镇墓石”一拓材料，据介绍，石39厘米见方，厚10厘米。右方刻大字云篆二行十六字，左方刻普通汉字九行，共一百四十四字。（图版拾玖：53）^{〔3〕}九行普通汉字，原书识读云：

中央黄天承元始符命，告下中央九垒_王府洞极神乡四_统_诸_灵_官，今有太上清信弟子怀道，灭度五仙，托尸太阴。今_王延陵乡安宫立室，庇形后土。明承_正法。安慰抚_鄙。黄元哺饴，流注_豊_泉。练芳形骸，骨芳_穴香。与神同元，亿劫长在。中英嵩高，明开长夜九幽之府。出怀道魂神，沐浴冠带，迁上_南宫，供给衣食，长在光明。魔无忤犯，一切神灵侍卫安镇。依元始明真旧典女（汝）青文。

对照拓片图版，识读有数字讹误。须加订正。“安慰抚鄙”，“鄙”字当改读为“卹”，即恤字，“鄙”乃原刻之误。“豊泉”即“澧（沔）泉”，甘美之山泉水也。“练芳形骸”，“芳”字原刻作𦰩，乃“饰”字常见之别写字形。“骨芳穴香”，“穴”字原刻作宀，乃北朝隋唐石刻“肉”字常见之别写字形。“中英嵩高”，当释“中岳嵩高”。“元始明真旧典女（汝）青文”，“女”字原刻无误，作“汝”反讹。凡结婚之道士，男称“清真弟子”，女称“清信弟子”，由石文可知，墓主怀道为已婚之女道士，与所见他石墓主身份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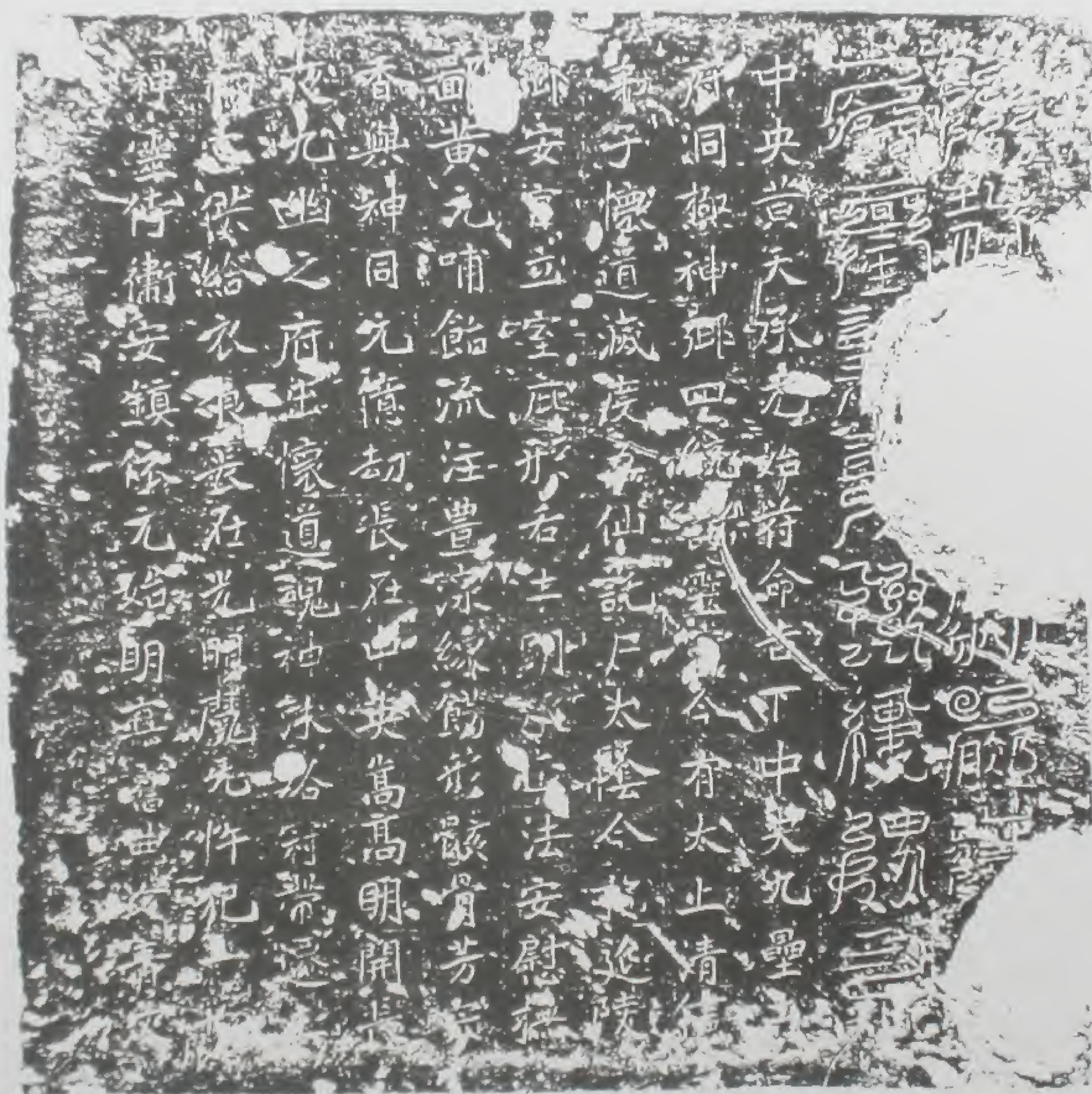
〔1〕《人文杂志》1958年2期。

〔2〕张弘杰主编：《咸阳碑石》，59页，图43。

〔3〕张弘杰主编：《咸阳碑石》，60页，图版44。



图版拾玖：52



图版拾玖：53

此石材料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又《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北京卷附辽宁卷》所收“酆王妃崔氏镇墓符命刻石”图版，称：“拓片高、宽均53厘米。咒文下正书。”〔1〕经仔细审视，与上述陕西卷所收实系同为一石，只是根据拓片测量大小，以致尺寸微有出入，当属一书异卷重出。此拓之著入北京卷，显系因北京方面收藏该石拓片所致，并非河北地区唐代曾有此种宗教葬俗流行，这是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

以上材料，皆未经科学发掘所得。正式考古发掘出土的材料，共有以下三批：

20世纪后期，陕西富平县城北凤凰山中宗定陵陵园东神门外等处，曾出土正方形炼度真文石刻两方，一为“东方九气天文”，高64厘米，宽65厘米，厚18厘米，分上下两区刻字，上区符篆真文11行64字，字形较大而方整。下区用普通楷体汉字刻写“东方九气青天，承元始符命，告下东方……”等祝文，18行100余字，字形较小，笔画多有漫漶（图版拾玖：54）〔2〕，难以尽识，可参考他石及文献补足。中方一石64厘米见方，厚十数厘米。石面刻云篆真文4行16字，字形方整一如东方，但体积极大，几乎将整个石面布满。139个祝文，用普通汉字围绕大字云篆真文环刻，因字形甚小，拓片图版已不可识读（图版拾玖：55）〔3〕，据报导称，其文曰：

中央黄天，承元始符命，告下中央□□土府洞极神乡四阕诸灵
 囿，大唐中宗孝和皇帝，论质□阴。今葬定陵宫室，庇形后土。明
 承王文，安慰抚卹，黄元哺飴，流注豊泉，练冶形骸，骨芳肉香，
 与神同元，亿劫长存。中岳嵩高，明开长夜九幽之府，开擢魂神，
 沐浴冠带，迁上南宫，供给衣食，囿在光明，魔无干□。一切神灵
 侍卫安镇，悉如元始明真旧典女青文。

以上释文，间有未确，“论质□阴”，当作“诤质因阴”；“明承王文”，当作“明承玉文”；“流注豊泉”，当作“流注豊（泮）泉”；“魔无干□”，当作“魔无干（忤）犯”；“一切神灵侍卫安镇悉如元始明真旧典女青文”，当作

〔1〕《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北京卷附辽宁卷》第二册，164页。

〔2〕姜捷：《关于定陵制度的几个新因素》，《考古与文物》2003年1期，73页，图五。

〔3〕姜捷：《关于定陵制度的几个新因素》，《考古与文物》2003年1期，72页，图四。



图版拾玖：54



图版拾玖：55

“一切神灵侍卫安镇，悉如元始明真旧典女青文”。说者称，姜捷在《关于定陵制度的几个新因素》一文中考订，定陵建成李显下葬定陵，时在睿宗景云元年十一月二日（公元707年11月27日），此二石“很可能是帝王使用镇墓石的首例”，它不是目前所知帝王陵墓最早使用这种炼度真文镇墓石的仅见一例，也不是最先出土的帝王陵墓使用这种炼度真文的镇墓石，但说它是迄今发现唐代帝王陵墓最早使用这种炼度真文的镇墓石遗存，却完全是事实。它的出现，比我们在后文中即将谈到的20世纪60和80年代在睿宗桥陵出土皇帝李旦和皇后窦氏的墓石还要早上四、五年，的确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新材料。

1963年和1980年两次勘察陕西蒲城县唐睿宗桥陵，先后收集到南方和西方炼度真文石刻各一件。南方一石1943年出土于陵南墙外东侧石狮之南数米处。石刻有底有盖，正方形，长宽各0.73米。盖厚0.125米，录顶，顶面阴线刻一凤凰，杀宽0.11米，雕饰云纹。盖里素面，正中一小圆孔。底厚0.16米，四边线刻“蛇、马、羊、鹿”，中间刻符书八行64字。符书外圈刻汉字160。底石外沿一周及汉字字面皆以朱涂。原简报未附图版，仅发表未加标点之符书外圈刻汉字释文，隶定颇有不确定者。今校录如下：

南方三气丹天承元始符命，告下南方无极世界土府神乡诸灵官：今有大唐睿宗大圣真皇帝李_回、昭成皇后（左）窦氏，灭度五仙，托灵太阴。合于京兆府奉先县安宫立室，庇形后土，明承正法，安慰抚恤，赤灵哺饴，素灵哺饴，三气丹池，精（下）光充溢，炼饬形骸，骨芳肉香，亿劫不灭（灰）。南岳霍山，明开长夜[九幽]之府，出睿宗大圣真皇帝魂神，沐浴冠带，迁（右）上南宫，供给衣食，长在光明，魔无干犯。一切神灵，侍卫安镇。如元始明真旧典女青文！（上）

20世纪70年代在陵墙西门外北侧石狮背后，又出土西方炼度真文一件，形制与上述南门所出者相同，大小微有差别，发表原图版字迹模糊莫辨。中间西方炼度真文符书外之汉字，今据简报未加标点之释文校读如下：

西方七气素天[承]元始符命，告下西方无极世界土府神乡诸灵官：今有大唐睿宗大圣真皇帝李旦、昭成皇后窦（右）氏，灭度五仙，托灵太阴。合于京兆府奉先县界_回_回立室，庇形后土，明承

正法，安慰抚恤，赤灵哺饴，素灵哺饴，七气素华（下），精光充溢，炼饬形骸，骨芳肉香，亿劫不灭（灰）。西岳[西岳]，明开长夜九幽之府，出睿宗大圣真皇帝魂神，沐（左）浩（浴）冠带，迁上天府，供给衣食，长在光明，魔无干犯。一切神灵，侍卫安镇。如元始明真旧典女青文！（上）^{〔1〕}

简报将之称为“五精石”，是不对的。《旧唐书·睿宗纪》：“开元四年（716）夏六月甲子，太上皇帝崩于百福殿，时年五十五。秋七月己亥，上尊谥曰‘大圣贞皇帝’，庙曰‘睿宗’。冬十月庚午，葬于桥陵。天宝十三载（754）二月，改谥曰‘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旧唐书·睿宗昭成皇后窦氏传》：“长寿元年（692）正月二日，窦氏为武则天害死，‘睿宗即位，谥曰‘昭成皇后’，招魂葬于都城之南，号曰靖陵。又立庙于京师，号为‘坤仪庙’。睿宗崩，后以帝母之重，追尊为皇太后，谥仍旧，祔葬桥陵，迁神祖于太庙。”是五方炼度真文应在开元四年（716）六月睿宗下葬时埋入土中，因为昭成皇后窦氏已于二十六年前早死，迁来陵墙之内祔葬，故真文云“睿宗大圣真皇帝李旦、昭成皇后窦氏，灭度五仙，托灵太阴”，石系李旦与其妻窦氏合用，除中方一石置于李旦墓室之外，其余四方四石分别埋在陵墙四门之外不远处。因为窦氏遇害死，不知尸骨所在，当年建靖陵于长安城南即系招魂而葬，这次迁来桥陵祔葬仍无尸骨，故石文改“托尸（质）太阴”为“托灵太阴”，并于后文仅说“出睿宗大圣真皇帝魂神，沐浴冠带”，而不及窦氏。此二石虽非科学发掘所得，但出土位置清楚，年代明确，为皇帝葬仪所用，对研究有关教派信仰流行情况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1958年陕西文管会清理陕西西安南郊庞留村唐至德三年（758）玄宗子寿王李瑁女清源县主墓，出土“镇墓石五合（一缺底），除灵宝黑帝五气天文镇墓石底在甬道内口以外（字朝下），其他均在墓道内。”保存完好之四石，发掘简报除中方同时发表拓片图版和普通汉字刻文释文之外，其余三方均只发表了普通汉字部分录文，无拓片图版，对符书字数和位置情况也未作介绍。从中方一石拓片图版看，盖石正中刻“灵宝黄帝中元天文”正书八字。底石中央云篆四行十六字，字形甚大，四方分刻普通楷体汉字，字形较

〔1〕 王世和、楼宇栋：《唐桥陵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0年4期。

小，除最后之右方（古之西方）为十行外，其余三方各九行^{〔1〕}。汉字内容除各方之帝色、气数、岳名互异而外，余文并同。与上录陕西西安碑林、咸阳博物馆藏西、中二方材料相较，除石主和葬墓地望之外，基本上也是一样的。只是不知同墓出土之其余四方是和中央一石一样，将此文字围刻于中间云篆四方，还是如碑林、咸博二石之分置于云篆之下方或一侧。

河南方面未见有关正式发掘材料，但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河南卷》著录安阳市出土唐代“女道士李镇墓文”石刻拓片（图版拾玖：56）^{〔2〕}，拓长29厘米，宽27厘米。细审图版，实为一仅有普通汉字祝文而无云篆之“西方七气素天”炼度真文石刻。铭称：“西方七气素天承元始符命告下西方无极世界土府神乡诸灵官：今有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女道士李灭度五仙，托尸太阴，今于东京河南县界安宫立室……”余文与上述陕西诸石并同。不知原墓是否另外尚有一石刻云篆真文六十四字与之配套使用。无论怎样，这一材料都可说明河南地区唐代炼度真文石刻的形制和陕西者不同。

从整个炼度真文石刻的出土材料看，北方中原地区除云篆真文之外的普通汉字部分，都用统一规范的祝语祷文而不著云篆真文的译文。而川西宋墓的炼度真文石刻，除真文云篆外之普通汉字部分，多有云篆真文译文，没有和北方唐墓石刻相同的那种长篇祷词，而使用另外一种内容不同的简短祝语。这种区别十分明显，一望可知。

在道书文献中，有关此种炼度真文的材料，记载非常之多，名称也很不一致。大而言之，其记载方式可分为以下三种不同的类型：（1）符书与译文并具者；（2）有符书而无译文者；（3）有译文而无符书者。属于（1）类者，最早见于《正统道藏》洞真部，玉诀类，收字号所收之《太上灵宝诸天内音自然玉字》。该书共四卷，卷一、二“大梵隐语无量洞章玉诀”，按东、西、南、北四方，分别以“△方△帝八会内音自然玉字△气总诸天文”为名录其方六十四字真文符书。然后，在卷三、四“大梵隐语无量洞章”按三十二天之序，每天录八字真文符书之译文，并分别进行了解释^{〔3〕}。但从符书到译文，也都只有四方而无中方。《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四“灵宝中

〔1〕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南郊庞留村唐的墓》，《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10期43页。

〔2〕 《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河南卷》，136页。

〔3〕 《道藏》二册，532～561页。



图版拾玖：56

盟经目”载有“《太上洞玄灵宝诸内音玉字》上、下二卷”；《无上秘要》卷二十四摘录不少《洞玄诸天内音经》的材料，内容与《太上洞玄灵宝诸天内音自然玉字》相同。三个书名，文字稍殊而意义全同，实应同为一书。由此可知，其成书当不晚于刘宋。此种类型材料之五方皆备者，则最早见于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十月著名道教学者杜光庭整理编著而成的《太上黄箓斋仪》卷五十七，标名“八天真文”，云唐“西京清都观张万福天师仪轨”总名之曰“诸天隐语八会玉文”，更准确则称作“八天隐字及中天玉文”〔1〕。时代较晚者，则有宋徽宗撰序之《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符图》卷下，总名之曰“道君撰《元始灵书中篇》”，仅有东、西、南、北四方而无中方，每方分别先以“△方八天”为名录其释文，释文后以“△方灵篆”为名录其符书〔2〕。宁全真授、王契真纂之《上清灵宝大法》，于卷十六以“三十二天灵章宝文”、“三十二天玉字”之名录其符书〔3〕；同书卷四，十玄修用门，以“玄真隐讳”之名录其释文〔4〕。属于（2）类者，最早见于《正统道藏》洞玄部、本文类、服字号所收之《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依五方不同之帝色、气数，分别为“灵宝△帝炼度五仙安灵镇神△气天文”〔5〕。他如《灵宝玉鉴》卷十六，真文玉字门〔6〕、蒋叔舆編集《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卷四十一，符命门，总称“五方真文玉字”，五方分名，除中央简称“中央真文”，全称“太上灵宝大罗之天自然玉字黄帝一气天文”之外，其余四方皆简称“△方真文”，全称“太上灵宝△方八天自然玉字△帝△气天文”〔7〕。宁全真授、林灵真编《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卷二六三，符简轨范品，称“五方真文”〔8〕。吕元素集《道门定制》卷四，云篆符诰门，五方之分别命名，除中方称“中央梵天炼度真文”而外，其余四方名称“△方八天炼度真文”。今举所载东方炼度真文与南方炼度真文为例（图版拾玖：57）〔9〕，以供参考。《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三十二，禳度施用品，则

〔1〕《道藏》九册，371页。

〔2〕《道藏》三册，85～87页。

〔3〕《道藏》三十册，803页。

〔4〕《道藏》三十册，681页。

〔5〕《道藏》六册，261～264页。

〔6〕《道藏》十册，258～261页。

〔7〕《道藏》九册，614～616页。

〔8〕《道藏》八册，285～287页。

〔9〕《道藏》三十册，700页。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右雲篆上告

土德鎮星地使具君乞為奉

道系家主攝星官正天度數解除命運刑剋

之災願於太玄之官布流通炁保固黃庭謹奏

年月

日高功街

宣行

鍊度真文

出諸天內
書玉字註

東方八天鍊度真文

醮醮醮醮醮醮醮醮醮
醮醮醮醮醮醮醮醮醮
醮醮醮醮醮醮醮醮醮
醮醮醮醮醮醮醮醮醮

醮醮醮醮醮醮醮醮醮

醮醮醮醮醮醮醮醮醮

醮醮醮醮醮醮醮醮醮

醮醮醮醮醮醮醮醮醮

醮醮醮醮醮醮醮醮醮

醮醮醮醮醮醮醮醮醮

右雲篆上告

東方九炁天君伏乞承

元始符命告下東方無極世界開長夜九幽

之府為奉道系家拔度亡人等魂或庶使

死魂受鍊倦化成人謹奏

年月

日高功街

宣行

已下四方古書並同止換
各方系炁東方無極世界
南方八天鍊度真文南方無極世界

醮醮醮醮醮醮醮醮醮

醮醮醮醮醮醮醮醮醮

醮醮醮醮醮醮醮醮醮

醮醮醮醮醮醮醮醮醮

醮醮醮醮醮醮醮醮醮

醮醮醮醮醮醮醮醮醮

醮醮醮醮醮醮醮醮醮

醮醮醮醮醮醮醮醮醮

醮醮醮醮醮醮醮醮醮

醮醮醮醮醮醮醮醮醮

称“大梵隐语无量音”^{〔1〕}。属于（3）类者，最早见于大约东晋成书的《灵宝无量度人经》（《正统道藏》所收之《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之第一卷），称为“道君撰”“元始灵书中篇”^{〔2〕}。次为刘宋陆修静之《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无总名，每方分别题为“△方△帝八会内音自然玉字△气总诸天文”^{〔3〕}。他如郑所南《太极祭炼内法》卷上等书，亦有这种类型的记载^{〔4〕}。在以上三种不同类型的材料中，有的还附有其他祝文咒语之类的说明文字，内容往往彼此不同，详略差异也很大。为了节省篇幅，于后随文引录，在此不作专门叙述。

和符书有关的其他普通汉字材料，何者为符书之译文，何者为咒语或其他说明文字，无论文献记载还是出土石刻，往往不易区别，由混淆而引出种种错误。今据材料比较完整、明确而时代又较早的杜光庭《太上黄箓斋仪》卷五十七，录其译文于下，以便后之论述。其“东方玉文”云：

亶楼阿荅，无愁观音。须筵明首，法揽菩昙。稼那阿奕，忽诃流吟。华都曲丽，鲜菩育臻。荅落大梵，散烟庆云。飞洒玉都，明魔上门。无行上道，迴蹕流玄。阿陀龙罗，四象吁员。

“南方玉文”云：

南阎洞浮，玉眸眈眈。梵形落空，九灵吹（引者按：此字当从石刻及他书作“推”）前。泽洛菩台，绿罗大千。眇莽九丑，韶遥延遭。云上九都，飞生自騫。那育郁馥，魔罗法轮，泓持无镜，揽姿运容。馥朗廓奕，神纓自宫。

“西方玉文”云：

刀利禅猷，婆泥咎通。宛藪涤色，太眇之堂。流罗梵萌，景蔚肖蛄。易邈无寂，宛首少都。阿鑑郁竺，华漠延由。九开自辩，阿

〔1〕《道藏》三册，786～789页。

〔2〕《道藏》一册，6～7页。

〔3〕《道藏》九册，849～850页。

〔4〕《道藏》十册，447页。

罗品首。无量扶盖，浮罗合神。玉诞长桑，柏空度仙。

“北方玉文”云：

覆无自育，九日导乾。坤母东覆，形摄上玄。陀罗育邈，眇气合云。飞天大丑，总监上天。沙陀劫量，龙汉瑛鲜。碧落浮黎，空歌保珍。恶奕无品，洞妙自真。元梵恢漠，幽寂度人。

“中方玉文”云：

黄中总气，统摄无穷。镇星吐辉，流炼神宫。^{〔1〕}

《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卷二六三，符简轨范品，“五方真文”，东、南、西、北四方皆仅有符书而无译文，唯中方于符书之后另附译文云：“黄中理气，总统元真。镇星吐辉，流炼神宫。”其符书字形与石刻及诸道书文献相同而次序有异，其译文之前面八字和石刻及诸书都不一样。

在上录诸文献所载的三种类型材料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有的同时有五方，有的只有东、西、南、北四方而无中央真文。只有四方材料的，包括最早的《灵宝无量度人经》、《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太上灵宝诸天内音自然玉字》，与后来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符图》、《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太上灵宝净明飞仙度人经法》等书。同时有五方者，以《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为最早。后来诸书，直接间接，均系以之为本。如蒋叔舆《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一书，在卷四十一符命门，以“五方真文玉字”题名专录符书时虽未说明来源，但在卷四十五符告门，五方真文每方皆仅录“太上灵宝△方八天自然玉字△帝△气天文”之分题，题下以双行夹注说明：其真文符书“见符命门，出《五炼生尸经》。”^{〔2〕}有的虽然没有如此说明，甚至注明另有根据，实际上与《五炼生尸经》仍然不无关系。如吕元紫《道门定制》的“五方炼度真文”，虽然笼统地说是“出《诸天内音玉字经》”，但他说的《诸天内音玉字经》，实即《正统道藏》所收之《太上洞玄灵宝诸天内音玉字》一书的简称。如前所云，该书所载真文只有四方而无中

〔1〕《道藏》九册，372～374页。

〔2〕《道藏》九册，635页。

方，吕书说真文出自《诸天内音玉字经》，是指这四方的材料而言，而且实际上只能从远源关系上来理解。其中方之文，仍当出自《五炼生尸经》。唐人朱法满《要修科仪戒律钞》卷十六，道士吉凶仪，送葬仪，称：道士死后安葬，“若是大德名人，可依镇经《五炼生尸经》预书五石，一依经法……至葬尸行丧，以入冢。”^{〔1〕}南宋宁全真传授、宋末元初林灵真编辑后经明人增订之《灵宝领教济金书》，对葬墓使用炼度真文石刻的方式方法、目的和渊源有详细的记载。该书卷二百六十二，炼尸生仙品，上清灭度炼尸生仙科法，原殡，云：“应当曾受大洞篆或三洞篆者，临葬时，用方砖磨刻五方真文，安于五方桌上……法师中立……右手执本方真文，祝曰：‘某方真气承元始符命，告下某方无极世界土府神仙诸灵官：今有弟子某伏为亡故某运应灭度，身经太阴，谨于某处安宫立室，托尸后土，明承正法，安慰抚垣（恤），某灵哺飴，某气朝华，精光冲溢，骨芳血秀，亿劫不灰。某岳某山，明开九幽之府，出某人魂神，沐浴冠带，迁上南宫，供给衣食，长生光明。魔无干犯，鬼无妖精，一切神灵侍卫安镇。急急如元始明真旧典女青律令！’……五方毕，然后掘地平埋方砖一尺二寸，以土塞之，方以棺葬。其东方真文碧地青填字，南方黄地朱填字，西方黑地白填字，北方白地黑填字，中央朱地黄填字。其所谓某方某灵哺飴某气及某天某灵某气者，乃东方青灵青天九气、南方丹灵丹天三气、西方皓灵皓天七气、北方玄灵玄天五气、中央元灵黄天一气也。”^{〔2〕}其方砖磨刻五方真文葬于墓中，其五方神灵、气数及道士在举行葬仪过程中围绕真文砖刻所诵之咒语，无不与《五炼生尸经》记载及北方唐墓出土炼度真文石刻材料相合。在同书本卷的“序说”中还明确讲到，卷中说的所谓“‘灭度炼尸生仙符法’者，五方安镇，见于《生尸妙经》。”更是明确说明了这些材料与《五炼生尸经》之间的直接关系^{〔3〕}。又同书卷一百二十二，科仪立成品，阴宅土神醮仪，在告文中说：“伏念亡故某学道末生……倏尔沉幽……幸图宅兆以归藏，岁迈时迁，终拟形魂之返复。遂遵圣法，庸按神经，磨五方安镇之文，刊诸天光明之字，荣卫五体，围束百骸。俾缘会之倏来，体魄再合，它时节之或到，骨肉重苏，振衣上造于玄虚，鸣佩高跻于碧落。”^{〔4〕}此种置刻炼度真文方砖于墓以期达到炼度死

〔1〕《道藏》六册，1001页。

〔2〕《道藏》八册，267～268页。

〔3〕《道藏》八册，257页。

〔4〕《道藏》七册，565页。

者形魂，使将来能够复生尸解成仙之法，是按照“神经”材料安排的。所谓的“神经”，也同样是指的《五炼生尸经》而言。

四方三十二天真文符书，虽然早在《五炼生尸经》之前即已存在，并亦可用于炼度，但是否刻石入墓，无材料说明。由四方增为五方，专用（至少是主要用于）刻石葬墓，很可能是从《五炼生尸经》开始的。从考古发现的炼度真文石刻材料看，北方唐墓所出者，一套原皆五方，其符书与《正统道藏》所收《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相同，符书外之普通汉字刻文，与《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的记载也完全一样。今仅录《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的西方“灵宝白帝炼度五仙安灵镇神七气天文”云篆后所附告文为例，与前录陕西西安碑林收藏唐光化年间（898～901）顺天皇后之父崔某一石材料相比较。文曰：

西方七气素天，承元始符命，告下西方无极世界土府神乡诸灵官：今有太上清信弟子某甲，灭度五仙，托尸太阴。今于某界安宫立室，庇形后土，明承正法，安慰抚恤，素灵哺饴，七气素华，精光充溢，炼饰形骸，骨芳肉香，亿劫不灰。西岳华山，明开长夜九幽之府，出某甲魂神，沐浴冠带，迁上天府，供给衣食，长在光明。魔无干犯，一切神灵，侍卫安镇。如元始明真旧典女青文！〔1〕

其余四方“迁上天府”皆作“迁上南宫”，知“天府”乃“南宫”之别写。将此与石刻相对照，两者除个别文字小有出入而外，完全相同。由此可知，北方唐墓出土石刻文字，完全是按《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所记载式文填上墓主姓名和墓址刻写而成。同时，《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尚有材料说明此种真文的用法。仍以西方为例，云：“黄书此文于白石上，师拜黄缁章毕，埋文于亡人尸形所住，西乡（向）极墓界。临埋时，师云行禹步七步至所在，西向读大字及文毕……咒曰：‘……今日五合少阴，告盟甲乙，受度五仙炼形，托尸幽户，中房暂经。太上清信，众真所明。地乡开明，万神经营。尸安魄镇，亿劫长宁。道成去世，奉以灵輶。一如明真，依旧驿呈。’毕，便埋文土中。”〔2〕其余四方，除镇石及所书真文方色各异外，并同。从整个出土材料看，镇石及书文之色虽未必严格按经文施

〔1〕《道藏》六册，263页。

〔2〕《道藏》六册，263～264页。

行，刻石按方位葬于墓中一定的位置，却与文献记载完全相符。但是到了五代以后，自杜光庭《太上黄箓斋仪》以下诸书，所记科仪中使用此种炼度真文，均在《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基础上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在真文符书这一主体部分之外，取消了原有的固定长篇祝文，开始加上符书的译文和其他内容的文字，使用范围也更加广泛和多样化。杜光庭《太上黄箓斋仪》卷五十七，八天真文，序称：“黄箓斋拯救幽灵，迁拔飞爽，开度长夜，升济穷泉，固其大旨也。然祛灾致福，谢罪希恩，人天普修，家国兼利，功无不备矣。”“元始天尊于香林园中为上智童子所说，下拔五苦，遍拯九幽，于迁神仪中，刊石行用。今则黄箓斋坛，宜用此文，凶吉合仪，铨量允当，庶夫永劫可以流通。咒祝焚烧，与真文同耳。具有成法，共弘之焉。”〔1〕此中所谓元始天尊于香林园中说以五方诸天玉文在迁神仪中刊石行用，乃《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所载之用法。而杜氏谓将之扩大于人天普修、家国兼利、祛灾致福、谢罪希恩之黄箓等斋仪，则系后人所“共弘之焉”。但无论怎样，此种包含五方的炼度真文，其渊源皆应出自《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这是很清楚的。

《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一书，敦煌石室中曾有手抄残纸本发现。《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四“灵宝中盟经目”亦有“《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一卷”的记载，可知其在南朝初年即已存在〔2〕。北周天和五年（570）甄鸾《笑道论·五炼生尸》云：“五炼生尸者，《五炼经》云：灭度者用五色缯，天子一匹，王公一丈，庶民五尺。上金五两而作一龙，庶民用铁。五色石五块，以书玉文，通夜露，埋深三尺。女青文曰：九夜幽魂，即出长夜，入光明天，供其厨饭三十二年，还其散形而更生矣。”〔3〕所谓的《五炼经》，当即《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但从五方炼度真文的内容和组合情况看，它的最早出现应较最初的《灵宝无量度人经》为晚，是在《灵宝无量度人经·元始灵书中篇》的基础上蜕变而成。这牵涉到道教史上两种重要文献之间的关系和形成问题，于此不能不有所论述。

唐宋石刻炼度真文和《五炼生尸妙经》东、南、西、北四方真文译文，

〔1〕《道藏》九册，371页。

〔2〕据大忍渊尔《论古灵宝经》考订，《灵宝中盟经目》陆修静写成于刘宋元嘉十四年，目中诸经，“虽然我们无法考证这些经文写定的时间，但显然距元嘉十四年不远。”（《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三辑4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3〕（北周）甄鸾：《笑道论》，《广弘明集》卷九（152页）。

与《灵宝无量度人经》的“灵书中篇”，陆修静《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的“△方△帝八会内音自然玉字△气总诸天文”完全相同。今本二书该项内容虽无符书，但后来符书仅有四方三十二天而无中方材料的属于《灵宝无量度人经》系统的文献，包括《太上灵宝诸天内音自然玉字》、《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符图》、《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太上灵宝净明飞仙度人经法》诸书在内，其符书内容和《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及唐宋墓出土石刻四方材料完全相同，只是由于具体书写人的书风和水平不同而出现了某些字形笔画上的差异。从字数上看，东、南、西、北四方真文，每方皆各64字，非常整齐，合每方八天、每天八字之数。根据王契真纂《上清灵宝大法》卷二十六，经旨训解门，明内音所因的说法，此四方云篆经文称“大梵隐语”、“灵书八篇”，谓“（元始）天尊告众灵曰：此灵书八篇，字无正形，其趣宛奥，尔等难可寻详。乃命天尊皇人，注书其字，解释其音，以赐道君，总二百五十六字。道君撰次成文，是为大梵隐语。”其“隐语正音，自‘亶娄阿荅’至‘幽寂度人’，计二百五十六字”〔1〕。又同书卷十六“三十二天灵章宝文”每方云篆前之说明文字称，如此安排，乃系按八挂配置，“每一句（四字）配合一卦”，并录有所配卦名。同书卷四称四方真文为“玄真隐讳”，没有著录云篆字形，每方仅录释文，每四字一句之下，皆用细字注出干支和卦名〔2〕。又《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三十二“大梵隐语无量音”谓，“大梵者，天中之天也；隐语者，诸天秘音也，乃太上玉晨大道君受元始天尊秘诀修行之微妙，故按六十四卦而成其句，以象中黄之数。”录四方真文符书，四字一行，于每行之顶用细字注出卦名，其说亦同〔3〕。当然，最初的《灵宝度人经》到底是否即按此原则设计尚难确指，但四方皆有可与八天相应的相同固定字数，却是很清楚的。这一情况表明，《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系统材料中的东、南、西、北四方三十二天真文和《灵宝度人经·灵书中篇》相同，看来应当来源于最早的《灵宝度人经》。《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在东、南、西、北四方的基础上增为五方，增加的中央真文只有十六字，与八天之说完全不一致，这显然是后来的人为了将之纳入道教五行学说的范畴，从别的材料中取来凑上去的。这种拼凑的痕迹，除字数方面的情况而外，还可找到其他方面的材料。从真文内容

〔1〕《道藏》三十册，889页。

〔2〕《道藏》三十册，883～887页。

〔3〕《道藏》三册，786页。

性质看，东、南、西、北四方，每方 64 字皆用道教特殊语言写成，与一般的通行词语有很大的不同，故称“内音玉字”或“诸天中大梵隐语无量音”。所谓的“内音”，就是道教内部所用的特殊语言。所谓的“隐语”，齐严东注云：“隐者有四也。一隐名，二隐讳，三隐事，四隐语也。”唐人薛幽棲注“诸天中大梵隐语无量音”则称：“梵者，道也。言此篇乃是三十二天中大道隐讳语，不可测量也。”^{〔1〕}无论“内音”、“隐语”，都是“不可测量”的，一般人无法理解的非常隐讳的特殊语言。唐人所编《洞玄灵宝玄门大义·详释第六》说：“诸天内音，天有八字，三十二天，合二百五十六字，论诸天度数期会，大圣真仙名讳位号，所治官府台城处所，神仙变化升降品次，众魔种类，人鬼生死转轮因缘。其六十三字，是五方元精名号，服御求仙、炼神化形、白日升空之法。余一百二十二字，阙无音解。”^{〔2〕}说其中除一百二十二字无法释义之外，另外六十三字是讲的五方神灵名称和求仙方法，还有七十一字应该是讲大圣真仙名号和他们所在之官府名称、神仙品级升降等方面的内容。这是对这种材料的概括认识。在今天看来，其中不少词语的确很有点像是某种特殊语言的译音材料，无法释义，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有的勉强解释，也未必符合实际。兹举东方八天六十四字中最前面的八个字为例，即可说明。“亶娄阿荟，无想观音”，我们看了简直无法理解。宋人陈景元集《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四注》卷四引唐人李少微注云：

此八字，黄曾天内音也。亶者，坦然广远貌。娄者，玉京山下长楼之名也，上承玄都宫，亦谓之楼都。言山楼互耸，亶然广远。阿者，玄都中阿那之神名也，掌楼之监主。大梵之炁，炁数交周，阿那之神，则鸣楼都之鼓，以集众真，上朝元始，日三周而一鸣，以为常节。荟者，帝君游台之名，荟蔚华秀，故曰荟。无者，太无，言太无之中，自然能生真圣。《太霄琅书》曰：“无形生真，真从无中生也。”想者，日月门户之名，言无中日月，会于想门。观者，观觉也，是天中帝君之讳，主长夜之录。音者，八字之音也。能诵八字之音，则真人乘金轮以开冥，玉女扬华幡以披钮。观觉主长夜之录，四冥拔九幽之府，七祖披朗，朽骸还生。^{〔3〕}

〔1〕《道藏》二册，240 页。

〔2〕《道藏》二十四册，737 页。

〔3〕《道藏》二册，241 页。

以上李少微的解释,有的可能正确,有的则未必完全符合实际。正因为如此,历代解注《灵书中篇》之作品甚多,《正统道藏》所收,除陈景元集《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四注》之外,如元人陈观吾《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注解》、明人张宇初《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经通义》等若干种文献中,皆有专篇,并有若干无名氏《洞玄灵宝度人经大梵隐语疏义》这样的专门著作出现。对有的词语的解释,各家之说往往不同。而《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所增中方十六字之文:“黄中总气,统摄无穷。镇星吐辉,流炼神宫”,则完全和普通一般的汉语词语文体一样,也很容易理解,不带任何“隐语”、“内音”的意味,与四方三十二天真文明显有别。所以如前所说,杜光庭在《太上黄箓斋仪》卷五十七一段讲这种五方炼度真文的文字中,将之称作“八天隐字及中天玉文”,“八天隐字”是指东、南、西、北四方三十二天部分。“中天玉文”是指中央部分,准确地反映了两个部分的区分。又宁全真授、王契真纂《上清灵宝大法》卷十六有关材料的记载也很值得注意。他先在“三十二天灵章宝文”、“三十二天玉字”的名称下录四方三十二天真文符书,符书之后无译文,紧接着便是“五方安镇祝辞”,祝辞之后接以“中央八威龙文章”之标题,题后为十六字之符书及译文。译文作“黄中理气,统摄无穷。镇星吐辉,流炼神宫”,与《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中方之文相同。从表面看,似乎此“中央八威龙文章”和四方三十二天真文是分开的。实际上,在三十二天真文之后附上了“五方安镇祝辞”,是把“中央八威龙文章”和三十二天真文组合在了一起,否则三十二天真文仅有四方,何得称为“五方安镇”?但这里的中央真文又确是在“三十二天灵章宝文”、“三十二天玉字”之外单独用了个“中央八威龙文章”的不同名称。这也就表明了中央部分的十六字真文,原本和四方三十二天真文不属同一系统,而是后来从与“八威龙文”有关的材料中将之摘取出来,按照五行、五方和五色的说法配上去的。又如四方三十二天真文的符书和译文,诸书记载都很一致,而中央真文字数虽不多,文献记载却出入极大,这也很能说明问题。以译文而论,《太上黄箓斋仪》作:“黄中总气,统摄无穷。镇星吐辉,流炼神宫。”上录王契真纂《上清灵宝大法》,“黄中总气”作“黄中理气”,余并同。《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四方三十二天真文皆仅有符书而无译文,独“中央真文”符书与译文并具,已经显得很特殊了,而其前面八字译文作“黄中理气,总统元真”,第二句与以上二书均不相同^{〔1〕}。以符书而

〔1〕《道藏》八册,287页。

论，诸书差异，除了书体和个人书风不同造成笔画方面的出入之外，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字形大体相同而顺序不同，二是字形笔画完全不一样。字形顺序之不同者，主要表示在最后八字上。根据唐宋墓葬出土材料看，《灵宝领教济度金书》的字形顺序是比较正确的，以之为标准作比较，可得结果如下：

《灵宝领教济度金书》：9、10、11、12、13、14、15、16

《五炼生尸妙经》：9、15、10、11、12、13、14、16

《太上黄箓斋仪》：13、14、15、16、9、10、11、12

《道门定制》：9、10、11、15、12、13、14、16

四者显然差别是很大的。字形笔画完全不一样的，如王契真纂《上清灵宝大法》的“中央八威龙文章”，字形系由小篆蜕变而成，其迹甚显，多数比较容易认识，与其他诸书中多数已远离小篆笔画而难于识读者大异其趣。这也说明二者原来不是同一系统的东西。

究竟《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十六字的中央真文是从哪里来的？我认为应当是出自陆修静《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的“卫灵神咒”。该书云：道教弟子奉受灵宝经法，“登坛告盟，佩受《五老赤书真文玉篇》、《三部八景》”，“于案上请《灵宝五篇真文》及五符”，“次诵卫灵神咒”。所诵卫灵神咒，与“五篇真文”及“五符”的五方相应，包括东方“九气青天”、“南方丹天三气”、西方“七气之天”、“北方玄天五气”和中方之文。其中方卫灵神咒，全文如下：

黄中理气，总统玄真。镇星吐辉，流焕九天。开明童子，一十二人。元气阳精，焰上朱烟。同照一室，及得我身。百邪摧落，杀鬼万千。中山神咒，普天使然。五灵安镇，身飞上仙。^{〔1〕}

以上这一组卫灵咒，亦见于后来之留用光传授、蒋叔舆撰集之《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卷三十二，斋法修用门，卫灵咒并释，名曰“太上灵宝自然五篇卫灵神咒”，云“出《灵宝真文要解经》”^{〔2〕}。陆修静书在卫灵咒后面的另外一处，依次著录了《五方赤书玉篇》、《五魔玉讳》、《度三部八景》和四

〔1〕《道藏》九册，843页。

〔2〕《道藏》九册，571页。

方四帝《八会内音自然玉字诸气总诸天（三十二天）文》的文字^{〔1〕}。所以，“五方卫灵咒”主要是配合《灵宝五篇真文》使用，最初和三十二天真文并无多少关系，更不是一种和三十二天真文相配的真文，至多也只不过是因三十二天真文在此连带《五篇真文》出现而发生了一点牵连罢了。但上述中央卫灵咒的前面十六字，和《五炼生尸妙经》系统的中央真文相比较，却有许多共同之处，如以《灵宝领教济度金书》译文为准，除了有三个字不同，把最后的“流焕九天”改作“流炼神宫”之外，其余部分完全一样（古之“玄”、“元”二字可通，“总统元真”即“总统玄真”）。其他文献“总统玄真”作“统摄无穷”，文字虽不同，含义也是差不多的，即总管诸方一切之意。此外，杜光庭《太上黄箓斋仪》卷五十四，在叙述前面讨论的另外一种“灵宝五篇真文”时，中央真文第（1）段四十字真文后所附的48字咒文云：“中央总灵，黄上天元。始生五老，中皇高尊。黄中总气，统摄无穷。镇星吐辉，流炼神宫。敕摄北帝，遏塞鬼门，剪除不祥，莫有当前。”^{〔2〕}其中也包含了这十六字的“真文”材料，这就更值得注意。四方三十二天真文，最早出自大约成书于东晋的《灵宝度人经》中的《元始灵书中篇》，以后诸书之仅录四方三十二天真文者，也往往有文字说明其此种渊源。吕元素《道门定制》的“五方炼度真文”注明出自《诸天内音玉字经》，前面已经指出实际上只是四方真文如此，《诸天内音玉字经》即《无上秘要》所载《洞玄诸天内音玉字经》及《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所载之《太上洞玄灵宝诸天内音玉字》。由此材料说明，早在《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之前，已有人专取《灵书中篇》的材料加以敷衍而成专书，只是当时仍沿《灵宝度人经》之旧，仅有东、南、西、北四方而无中方罢了。后来《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之由四方三十二天增为五方，或系直接以《太上灵宝诸天内音自然玉字》为基础亦未可知。但无论怎样，它和《灵书中篇》仍然是有渊源关系的，只是属于直接还是间接的问题。而《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在四方三十二天真文的基础上增入中央十六字真文，则是根据《洞玄灵宝授度仪》中四方三十二天真文与“五方卫灵咒”之间的上述关系，按照五行、五方、五帝、五色理论的原则，把中方卫灵咒的开头十六个字摘取出来略加改造，然后作为正式的真文和三十二天真文凑合在一起的。

据《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的记载，五方炼度真文，乃是上

〔1〕《道藏》九册，848～850页。

〔2〕《道藏》九，356页。

智童子等在香林园中向天尊反映，有奉道之人“功未洞真”，因功行未到，死而灭度，只好“安宫立室”，“庇形后土”，建墓室于地下，暂时“托尸幽户”，“玄房”、“太阴”。但不幸往往“宿缘未绝，不得还者，形尸故宅，幽在九泉，为众灵所迫，不相容受，飞魂无泊，还逮子孙”，在地下受到各种故气邪精的迫害，甚至殃及子孙。因而请求设法加以拯救解脱。天尊乃命在座之三十二天帝君、无极太上大道君等，“出天中灵音自然玉书无量洞章，以属地官，度一切人，安尸镇灵，保魂度神”。“开度一切死魂，安镇尸形，营卫抚恤，无令地官驱迫摇动”，“魔无干犯”。“分别故宅，形骸所在，随其部界，悉为安恤。地祇护卫，经营供给，无令动摇。随功成就，使应迁者迁，应度者度，应转者转，应生者生”。“炼饬形骸，骨芳肉香，亿劫不灰”，“白骨受气，朽尸还魂”，“死骸还人”。“明开长夜九幽之府，出某甲魂神，沐浴冠带，迁上南宫”。“安镇死人尸形，所在地官，安尉抚恤，使得速还，更生福世，兴家致禄，世世不绝”。书五方真文于石，分别“埋文于亡者尸形所在”之相应方位，目的就在让墓主尸体和灵魂得到各种土官、仙真、神灵的保护，不受邪魔精怪的侵害，经过炼度，最后得以返魂再生，升天成仙。同时，也让死者的子孙得到福祐。《道门定制》卷四，云篆符告门，炼度真文，引《诸天内音玉字经》也说：诸“云篆上告△方△气天君：伏乞承元始符命，告下△方无极世界，开长夜九幽之府，为奉道某家拔度亡人某等魂识，庶使死魂受炼，仙化成人”。在此，四方三十二天加上中央梵天之“五方炼度真文”符书，其唯一的作用就是为奉道之家“拔度亡人”，“使死魂受炼，仙化成人”^{〔1〕}。虽然没有具体讲它的使用形式，但无论对象和目的、作用，皆与《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相同。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材料所反映的情况，完全是一致的。由生死科仪共用的《灵书中篇》、《诸天内音玉字经》的四方三十二天真文，增加中央真文而成五方真文的《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专用于亡人，刻石埋于墓中这种变化的发生，北方唐墓和川西宋墓五方炼度真文石刻的大量发现，都是南北朝唐宋道教练度学说发展的结果。

〔1〕《道藏》三十一册，700页。

第二章 几种真文石刻在墓葬中的组合情况

整个唐宋墓葬的道教真文石刻，宋代以前的材料多数未经科学发掘，除墓主可能是陶弘景的江苏一例而外，隋唐时期的也都集中出在以洛阳、西安为中心的河南、陕西境内，其他地区完全没有发现。唐代以前的材料，仅见敕告文一种，而且内容极为简单，只是将有关的少部分文字附在墓砖或墓志上，没有单独成器。唐代的镇墓真文，属于上清派的材料，除“五精石”和“天帝敕告文”之外，没有华盖宫文石刻发现。灵宝派的材料，绝大多数也都属于《五炼生尸经》系统，属《灵宝五真文》系统的仅见陕西西安市唐墓出土 244 字的中方真文一例，且为未经科学发掘所得。凡经科学发掘或出土情况比较清楚的，从已知的墓例情况看，江苏可能是梁陶弘景墓、河南扶沟唐赵洪达墓只出天帝敕告文系统的材料，河南偃师磨郑灵墓和洛阳郊区唐墓只出“五精石”，包括未经科学发掘出土材料在内的陕西西安几批五方炼度真文和灵宝五真文系统的材料，不仅两个不同道派的石刻不曾在同一墓中共出，就是两个教派自身不同种类的石刻，如敕告文和五精石、炼度真文和灵宝五真文灵宝五符也没有同时出土两种以上材料的例子。

在四川西部成都地区两宋墓葬出土的道教镇墓真文，无论种类、数量和墓中的组合放置，比起唐代其他地区的材料情况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种数而言，虽然在过去的基础上减少了单纯的五精石，但属于上清派和灵宝派两个经系的材料，上清派新增了华盖宫文；灵宝派除“炼度真文”继续广泛使用而外，灵宝五真文已经将每方分成几个不同的段落赋予不同的经德，然后将五方相同段次的材料分别加以组合，分化出“八威真文”、“消灾真文”等几种不同的镇墓真文石刻。此外，还增加了灵宝五帝真符的新品种。迄今所知川西宋墓所出“华盖宫文”、“天帝敕告文”、“八威真文”、“消灾真文”、“元始五帝真符”和“炼度真文”等六种分别出自上清派《真诰》和灵宝派《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五炼生尸经》等两个不同教派三个不同经系的真文石刻。过去曾有人说：“一般说来可能北宋用敕告文（六方形），南宋用华盖宫文（正方形），两者是同一性质，但不同出。”根据

上述材料考察，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整个川西宋墓真文石刻材料的组合，从大的方面讲，可以分为只出某一教派的材料和两个教派的材料同时并出两大类型，在每一大类型中，又以具体真文品种之不同而再分成若干不同的类别。

A 型，即只出某一教派材料者，有以下两种组合：

1. 敕告文和华盖宫文同出。如成都龙泉驿区北宋仁宗嘉祐前后田世用墓，敕告文和华盖宫文各出一件。又成都市考古队 1998 年发掘成都龙泉驿区洪河乡三桥村龙泉电力局变电站工地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宋兴仁墓，出土 A 型Ⅱ式华盖宫文和 B 型Ⅰ式敕告文各一件。敕告文除四方刻“朱雀辟非”等十六字外，中间方框内刻文“天帝𡩊圉下土五方旺气诸神赵公明等，今有故宋兴仁，生值清真之气，终存不死之灵，既瘞身𡩊宫冥乡，潜宁冲虚，辟斥诸忌，不得妄为祸害。当𡩊子孙荣庆，吉无不𡩊。（如）律令！”华盖宫文方框内周围画刻八卦，中间刻文曰：“华盖宫中王气诸神赵公明字子都，或有冢墓之中百禁诸忌，不得妄为祸害。当令故宋兴仁真魂安逸，南宫受𡩊，脱落北籍，𡩊𡩊𡩊女则备其四德，男乃文咏九功。急急如律令！”〔1〕

2. 只出炼度真文或消灾真文者。如元祐七年（1092）张确墓，就只出了炼度真文一种。成都西郊沙湾路四达房产公司商住楼基建工地南宋墓，只出消灾真文一种。

总的说来，成都地区宋代镇墓真文石刻，单独出土某一教派材料的较少，只出某一教派某一种材料的更少。只出一个教派一种真文的，主要是灵宝派的炼度真文和消灾真文两种情况。在川西宋墓中上清派的华盖宫文和敕告文，一般都是两石配套使用，无论生墓或尸墓，都是如此。在发掘过程中，单独只出其中一种者数量极少，可能原来葬入时本有两种，只是后来年深月久，红砂石易于朽坏，或者由于其他原因，出土时已损失一石。是否有当年就是单独使用，只葬入了其中一种的情况，还有待证实。无论怎样，即使有一石单独使用的，那也是少数。两种石刻的 A 型Ⅰ式的年代都比较早，也都只在北宋墓中发现而不在南宋墓中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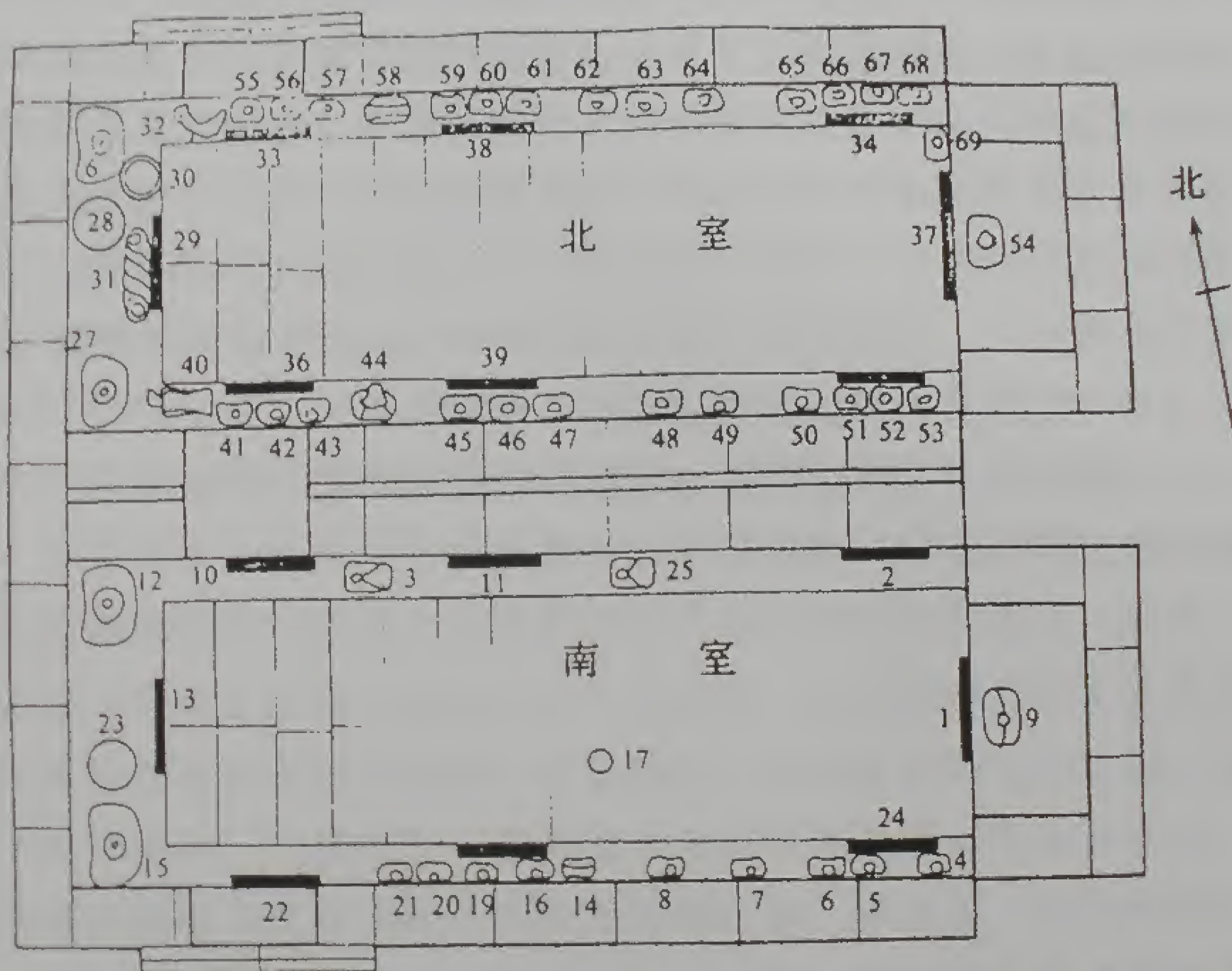
B 型，即两个教派的材料同时出土者，有以下三种不同的组合：

1. 敕告文、华盖宫文与炼度真文同出。如四川成都东郊龙泉驿北宋嘉祐七年（1062）田世中夫妇并室合葬墓；四川成都九眼桥招飞办治平三年

〔1〕 成都市考古队刘雨茂同志提供拓片复印本材料。

(1066) 房府君墓 (敕告文属 A 型 I 式)、成都市东北郊二仙桥南宋绍兴二十二年 (1152) 卫氏夫妇墓, 皆属此式。以 1999 年发掘的绍兴二十二年 (1152) 卫氏夫妇墓为例, 夫妇同坟异室券顶砖构, 两室之间共用一隔墙作墓壁, 壁上砌有过洞相通, 女室在北面, 男室在南面, 大小形制相同。每室长方形, 东西长 3.53 米, 南北宽 2.78 米, 券顶至墓底高 1.6 米, 设有棺床, 后壁带有壁龕。出土的买地券和三种真文石刻, 虽以个件而言部分已有残损, 但件数保存最为完整, 原来安放的位置未经移动, 报导附图也最为详细, 除买地券 2 方分别放在进入墓门不远处靠着棺台而外, 每室各出真文石刻 7 方。华盖宫文作 B 型 II 式, 在北壁正中。敕告文作 B 型 III 式, 在南壁正中与华盖宫文隔棺床相望。其余 5 方炼度真文, 东方一石放在南壁靠近后壁处靠着棺床, 南方一石放在南壁靠近墓门处, 西方一石放在北壁靠近墓门处与南方一石南北相对, 北方一石放在北壁靠近后壁处靠着北壁与东方一石南北相对, 中方一石放在后壁正中壁龕下面靠着后壁。诸石所在方位, 大体与刻文内容相合。无论买地券和镇墓真文, 也都竖放, 除买地券靠着棺台而外, 7 方镇墓真文也都靠着墓壁 (图版拾玖: 58)^{〔1〕}。炼度真文仅中方一石作 III 式, 有 16 字云篆真文和“黄中总气, 统摄无穷。镇星吐辉, 流炼神宫”的普通汉字, 其余四方皆作 I 式, 在 64 个云篆真文之外, 普通汉字仅有“某方某帝安灵真文”的题名。除买地券和镇墓真文石刻之外, 两室还出土其他铜镜、瓷碗、瓷罐等用品和各种陶俑。其中陶俑 49 件, 南室 15 件, 北室 34 件, 包括仰观、伏听、地轴 (双人头蛇身)、雷鼓、玄女 (人首鸟身) 生肖、玉犬等唐宋墓中常见的道教葬仪用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室后壁龕中各有一“墓主人像”。M1: 9 号男墓主人像, “头盘发髻, 顶呈六瓣瓜状, 整个身体蹲坐于圆形空心底座上, 身穿交领落地长衫, 双手抱握于胸, 两眼圆睁, 正视前方, 鼻高口宽, 面部微显瘦。通高 21 厘米、底径 14 厘米。”M1: 54 号女墓主人像, “头挽发髻, 整个身体蹲坐于圆形空心底座上, 身穿交领落地长袍, 双手抱握于胸, 面部丰满温和, 双耳直竖, 两眼正视前方, 略带微笑。通高 21 厘米、底径 14 厘米。”对照附图观察, 底座上的人像实际上只作出了上半身, 并非“蹲坐”。二像大小相同, 应当是同时一起制作的。根据我们的研究, 放在墓中后壁龕内这种形制的“墓主人像”, 应是道教在生墓建成时放入以祈墓主长生的“石真”。现存两室买地券, 北室

〔1〕《成都市二仙桥南宋墓发掘简报》,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考古发现 (1999)》213 页, 图二。



- 南室：1. 中方镇墓真文碑 2. 北方镇墓真文碑 3. 匍伏俑 4. 文俑 5、6、7、8. 文俑 9. 男墓主人像
 10. 西方镇墓真文券 11. 华盖宫文 12. 武士俑 13. 买地券 14. 陶鼓 15. 武士俑 16. 文俑 17.
 铜镜 18. 敕告文 19、20、21. 文俑 22. 南方镇墓真文券 23. 碗 24. 东方镇墓真文券 25. 匍伏俑
 北室：26. 武士俑 27. 武士俑 28. 碗 29. 买地券 30. 罐 31. 人首蛇身俑 32. 人首鸟身俑 33. 西方镇
 墓真文券 34. 北方镇墓真文券 35. 东方镇墓真文券 36. 南方镇墓真文券 37. 中方镇墓真文券 38.
 华盖宫文 39. 敕告文 40. 匍伏俑 41、42、43. 文俑 44. 狗俑 45、46、47. 文俑 48、49. 女侍俑
 50. 生肖俑 51、52、53. 文俑 54. 女墓主人像 55、56、57. 文俑 58. 陶鼓 59、60、61. 文俑
 62、63、64. 女侍俑 65、66、67、68、69. 文俑

卫氏女券墓主死葬于绍兴二十二年（1152）十二月，南室男券文字残缺太甚，墓主姓名和死葬年月无存，按照一般的规律，其去世应早于卫氏，生墓建成放入“石真”的时间更当在绍兴二十二年（1152）之前。镇墓真文的放入，应在墓主人葬之时。此墓材料，可以作为南宋时期川西地区这种类型几种真文配置使用情形的典型。

2. 敕告文、华盖宫文与消灾真文同出。如四川成都羊子山严世广及其妻乔氏合葬墓，即属其例。又四川成都东南郊得胜乡和平村绍兴年间墓，共有两块华盖宫文与一套五方消灾真文同出，两方华盖宫文，一方四周八卦画卦象，另一方书卦名而不画卦象，似在有意加以区别。一墓中上清派石刻未发现敕告文却同时出了两方华盖宫文，如此配置者仅见此一项，似非常例，或当别有取义。不知是否当年经办道士不了解敕告文和华盖宫文内容的区别，误将华盖宫文内容稍加改动当作了敕告文。

3. 敕告文、华盖宫文与八威真文同出。如四川成都市东门外九眼桥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邓世英墓，即属其例。

灵宝、上清两派材料同墓并出的情况最为普遍，而以敕告文、华盖宫文与炼度真文同出和敕告文、华盖宫文与八威真文同出者最多，敕告文、华盖宫文与消灾真文同出者较少。华盖宫文、敕告文和灵宝派五方真文同出一墓者，五方真文无论炼度真文还是八威真文、消灾真文，大体中方一石平放墓室中部靠后处，其余东、南、西、北四方各按本石方位靠着墓壁竖放。华盖宫文与敕告文侧靠墓壁，具体位置似不甚固定。真文石刻相同套型的件数虽然一样，但每墓所用的套数则时有不同。即使特殊如四川成都东郊跳蹬河南宋绍兴二年（1132）王宜人夫妇合葬双层墓亦不例外，在下室（棺室）“东、西两壁放有镇墓真文石三方和买地券、华盖宫旺气神各一方，后壁放镇墓真文石一方”。上室的“后壁中央置有镇墓真文石一方”。根据发表的石刻拓片图版材料看，所谓的“镇墓真文石”，就是“炼度真文”，亦与五方之数相合。所谓的“华盖宫旺气神”，即“华盖宫文”。所谓的“买地券”正如后来有人所指出，实为“敕告文”的误称。无论如何配置，一般都是一个墓室一套，但亦有少数例外。如四川成都羊子山南宋淳熙九年（1182）严世广及其妻乔氏同坟异藏合葬墓的情况便比较独特，华盖宫文、敕告文与消灾真文同出，二室所出上清派真文石刻共五件，计敕告文二件，华盖宫文三件，看来应残去敕告文一件，原来两种石刻应各有三件，正好配成三套。因为该墓最初是两室一次同时建成的生墓，然后两位墓主分两次先后入葬，生墓建成时放入一套，两室共用，以后每室墓主人葬时又分别各自放入一套。两室出土

五方“消灾真文”件数不全，报导不详，不知是一套还是两套。如果是一套，则应该是在生墓建成时和第一套华盖宫文与敕告文一起放入。如果是两套，则应是后来在墓主人葬时分别先后放入。

1957年发掘四川成都得胜乡南宋绍兴年间墓为平面呈长方形的小型单室砖墓，坐东向西，偏北15度，长1.45米，宽0.79米，左（南）右（北）二壁各有二小龕，真文石刻的位置是：入门正中放地券，南壁靠前壁龕与墓室交接处放西方真文，两龕之间放南方真文，后端和靠近后壁之壁龕与墓室交接处各放华盖宫文一块。北壁靠前壁龕与墓室交接处放北方真文，两龕之间放中方真文（一端伸向后壁龕与墓室交接处），靠后壁处放东方真文。除地券平放外，皆靠南北二壁竖放，中方真文不在墓室中轴线上，而靠近后壁中间与地券呈相对位置平放，与他墓放法不同，比较特殊，若无其他特别意义，则说明行仪道士对五方真文固定位置情形不是十分了解，时有违例之举。本墓为二次检骨葬，墓葬规模虽然不大，随葬器物却比较丰富，用小木匣盛尸骨，随葬陶俑及其他陶器十余件，铁钱百余枚。灵宝五符，所见仅只一件，未见公布发掘报告材料，出土情况不详。

第三章 综论

几种上清派和灵宝派真文石（砖）刻在墓葬中作为墓葬建材和随葬品出现，自梁代迄于唐宋，在不同的时期，无论种类、形制、用法、数量还是地理分布方面也都有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它们自身的一些内容特点，反映了它们在古代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活动方式、相互关系和地域范围的发展变化，有的与文献记载可以相互印证，有的在文献中语焉不详，可以起到补充的作用，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了解古代两个道派历史发展的许多问题。

第一节 关于随葬真文石刻墓葬的墓主身份问题

上述随葬各种道教真文石刻的墓葬，自与墓主的道教信仰有关，这是不成问题的。至于墓主的身份，可以从宗教身份和政治身份两个不同方面来加以考察。

一、宗教身份

从宗教身份方面讲，使用这些镇墓真文石刻的墓主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专业道士，另一种是一般信奉道教的俗人。总的说来，属后一种情况的例子居多，真正能够判为道士墓的只是少数。

唐代和唐代以前出土“天帝敕告文”、“炼度真文”的墓葬，江苏句容“玄武延躯”砖墓、河南安阳出土“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女道士李”石刻墓，叶昌炽提到的唐代“金仙公主墓”和另一端方旧藏文称“大洞弟子”的北方真文石刻，咸阳博物馆藏称“太上清信弟子怀道”“延陵镇墓石”石刻，墓主应为道士，比较明确，可惜未经科学发掘，材料不得详知。除此之外，如陕西富平县中宗定陵，陕西蒲城县睿宗帝后桥陵，西安武三思墓、顺天皇后先父酆王妃崔氏墓、扶沟赵洪达墓等，墓主都不是道士。《隋唐洛阳市北郊墓唐代墓葬的发掘》编者论及出土“五精石”安魂盒墓的墓主身份，曾根据刻石铭文有“大道”一词，加上石槽内有“丹药”，和墓地所在与唐代著名道观上清宫、下清宫位置相近的材料，判定“这两座墓葬为唐代中期或稍晚的道人墓。这是洛阳地区首次确定的唐代道人墓地”，并在两篇有关的论文中都将之径称为“道士墓”^{〔1〕}。我们认为，以“石盒”为与道教活动有关的遗存，是不成问题的，但到底是“道人”墓还是一般信奉道教的俗人墓，还不能肯定。我们并不完全排斥属于道人墓的可能，但缺乏有关的直接证据，

〔1〕 a 李德方、申建伟：《隋唐洛阳城北郊道士墓的初步考订》（《1995年中国古都学会年会论文》）打印稿，1995年。b 李德方、申建伟：《隋唐洛阳城北郊道士墓葬的初步考订》，《河洛春秋》1996年1期。b文未得原著参考，但从标题可以判断仍系主a文道士墓之说。

看来属于信道俗人采用了部分道教葬俗的可能性似乎更要大些。上述偃师天宝十三年(754)郑灵墓在出土这种五精石“安魂盒”的同时,还出土了一件完整的墓志,志文明确记载,郑灵的身份便只是一个一般的小官吏而不是道人(道士),就是很好的说明。

出土道教真文石刻数量最多的四川成都地区的宋墓,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发掘材料,以墓主自称“小兆臣”为标志,可以确定墓主是道士的只有三、四座。如前所述,四川成都龙泉驿区北宋嘉祐七年(1062)田世中墓室出土中方炼度真文一石祝文有“小兆臣田世中”之语;嘉祐七年前后田世用墓M6:3号敕告文称墓主为“……臣田世用”,“臣”前缺损之字,当作“囟囟臣田世用”;熙宁二年(1069)曹氏墓出土告文称墓主为“小兆臣曹氏”。除此之外,成都紫荆路北宋墓出土中方炼度真文残刻,石主身份姓名部分已缺失不存,从前面特别冠以“太上真元大道”一词推知,墓主也应当是道士,在残去的石主姓名部分,很可能也有“小兆臣某某”的文字。根据道书文献记载,“小兆臣”为尚未正式受箓的低级道士。宋代著名道士葆光子孙夷中著《三洞修道仪·初入道议》载:“凡初欲学道,男七岁号录生弟子,女十岁号南生弟子……自此后,不更婚嫁。如已成夫妇者,男称清真弟子,女称清信弟子,常依科斋戒,兼行黄赤交接之道……凡道士未受经法,通称小兆可也。”〔1〕是墓主田世中为已婚而未受经法的低级道士可知。又“小兆”或为道士自谓品级不高之谦称。在道书文献中记载道士所书章奏牒状文范本,多有自称“小兆臣”者,如宋《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书大法》卷十二《投坛传度誓状式》〔2〕、《保胎宜男断注奏式》〔3〕、《祈雨奏状》〔4〕、《投简表式》〔5〕、《奏圣母式》〔6〕等,文式之首书文道士皆自称“具位小兆臣某”或“具位小兆臣姓某”。但如同卷之《放幽魂符檄》〔7〕、《牒地府九幽都司》〔8〕等,则称“具法位姓某”或“具位姓某”,似亦有所区别。《道法会元》卷三十五《清微通明炼度文检·奏慈尊》亦载,道士书写奏文,首称“具位小兆

〔1〕《道藏》三十二册,166~167页。

〔2〕《道藏》二十八册,661页。

〔3〕《道藏》二十八册,664页。

〔4〕《道藏》二十八册,665页。

〔5〕《道藏》二十八册,667页。

〔6〕《道藏》二十八册,667页。

〔7〕《道藏》二十八册,666页。

〔8〕《道藏》二十八册,667页。

臣姓某诚惶诚恐稽首顿首再拜上言”，奏文纳入封套，再于封套外署名称“具位小兆臣姓某谨外封”。〔1〕

1998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四川成都东郊龙泉驿区十陵镇 M2 和 M6 两座北宋砖室墓，是目前已知四川地区出土真文石刻年代最早的墓葬，真文石刻出土的情况特别值得注意。M2 为同坟异藏双室并列合葬砖墓，左、右二室，男左女右，除两室中部各有壁龕相接外，两室结构相同，平面呈长方形。左室地券在人墓门不远处正中，北方真文在南壁与地券相望处，华盖宫文在南壁壁龕与墓室间，中方真文在后壁（东壁）壁龕正中略靠前与地券相对应位置，南方真文在北壁壁龕东侧与后壁之间，东方真文在北壁壁龕西侧与地券、北方真文相望在一直线上，敕告文在北壁龕与墓室相接处。M2 左：1 号买地券 39.7 厘米见方，厚 2.3 厘米，细线方栏内从左至右竖刻楷书十二行，在墓中字迹清晰，取出即破碎。券文云：

嘉祐七年□□岁次，八月乙亥塑（朔），二十二日丙申，故田府君地券。生居城邑，死安宅兆，卜筮叶从，相地咸吉。于此灵泉县强宗乡之原安厝，□□买地，其界东至青龙，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神武，中方勾陈，分掌四域。丘丞墓伯，封步界畔。道路将军，整齐阡陌。千秋万岁，永无阨咎。安厝□□□□□知见人□□□□□持□□□□气邪精，不得忤（忤）怵（犯）。□□□□□□□□违此约，分（吩）付地□□主吏，身□□□主人内外，存亡安吉。急急如□□使者女青律令！

五方炼度真文石刻大小形制相近，厚薄略有差异，券面均阴刻单栏，栏内有横、竖各一阴刻线，将券面分为上、下二区，下区又分左、右两部分。上区从左至右立书 16 行普通汉字，每行 4 字，共 64 字。左室出土券文，下区左部分别立书“东方炼度真文”、“南方炼度真文”、“西方炼度真文”、“北方炼度真文”六个普通汉字楷书。右部立书 8 行道教符书，每行 8 字，共 64 字。M2 左：7 号“西方炼度真文”，石高 43.7 厘米，宽 40.2 厘米，厚 1.6 厘米。M2 左：8 号“南方炼度真文”厚 2.5 厘米。右室出土的真文券的真文名和左室略有差异，其券面右部单栏内立书“某方某帝八天炼度镇墓真文”，如“北方黑帝八天炼度镇墓真文”者。本墓出土 M2 左：6 号华盖宫文，据

〔1〕《道藏》二十八册，876～877 页。

简报介绍“上右下左梯形各四字，分别是‘上宫辟非’、‘青龙秉□’、‘北武延躯’和‘虎啸八垂’。方框内从左至右立书汉字8行，其文作‘华盖宫王气神赵公明字子都冢墓之中百禁诸忌御五土之精转祸为福当使真魂安适弼谐受度南宫脱落北籍男即武备七德女乃文咏九功代代荣显与天地而无穷一如土下九天女青律令’。”观其图版，上方栏内四字已泐，当释作“田畋畋畋”。下方栏内“玄武延躯”作“北武延躯”，与他券“北”字作“玄”者不同。券面无八卦，石虽呈八角形，实为正方形截去四角而成，与由竖长方形截去四角而成者不同，当属A型Ⅰ式。M2左：9号天帝敕告文，“平面呈抹角方形，临边处刻六边形框栏，栏里从右至左立书七行汉字，楷书，满行14字。其文是：‘天地敕告土下冢中王气五方诸神赵公明等今有男弟子田世中行年四十七岁十一月生生值清清之气死归神宫瘞身冥乡不得妄为害气令精魂安适弼谐受度南宫脱落北籍然后子孙昌盛金玉满堂世世贵王与天地而无穷一中土下九天律令。’”“天地”当释“天地（帝）”；“一中土下九天律令”当作“一如土下九天律令”，以“如”为“中”，因未附拓本图版材料，不知原刻如此，抑为简报编者误识。此石如按文字图像内容看无八卦及“青龙秉气”等四方文字，当属A型Ⅱ式；但以石形而论，作方形画出六角线而未截角，则又当属B型，介乎A型与B型之间。左室出土器物除上述石刻之外，尚有四耳陶罐（多种）、碗、擂钵、砚台、香台、红砂石座形器等，与普通宋墓所出者大多相同，唯擂钵、砚台、香台与红砂石座形器为一般宋墓所不常见，可能与墓主之道士身份有关，或系书符作法醮祭所用法物。

右室为女室，破坏严重，镇墓券石“仅存华盖宫文券、敕告文券和炼度真文券等8件石刻”。其诸石平竖放置之方法与左室（男室）大抵相同，而每石所在位置则部分有所出入。右室入墓门不远处，正中放地券；右壁壁龕东侧，靠壁龕处放南方真文，靠后壁处放东方真文；左壁靠壁龕左侧处放华盖宫文，靠壁龕右侧处放西方炼度真文，靠后壁处放北方炼度真文；后壁（东壁）壁龕右侧放敕告文，正中略靠前与地券相对应位置放中方炼度真文。其中，买地券、中方炼度真文平放在棺台上，买地券字面向上，中方炼度真文字面向下，其余诸石竖立于棺台两侧，字面均向墓室。地券、真文石刻位置和放置方法与左室（男室）完全相同，皆属正规放置的典型。其中M2右：4号真文残石，“右侧为四行道教符书，每行4字，共16字。左侧从右至左五行汉字”，可识之字中，尚有“故女弟子冯氏，行年五……”可见，是右室为田世中妻冯氏墓室。此石应为中方炼度真文。田世中“行年四十七岁”，葬于嘉祐七年（1062），冯氏“行年五……”，死年已超过五十岁，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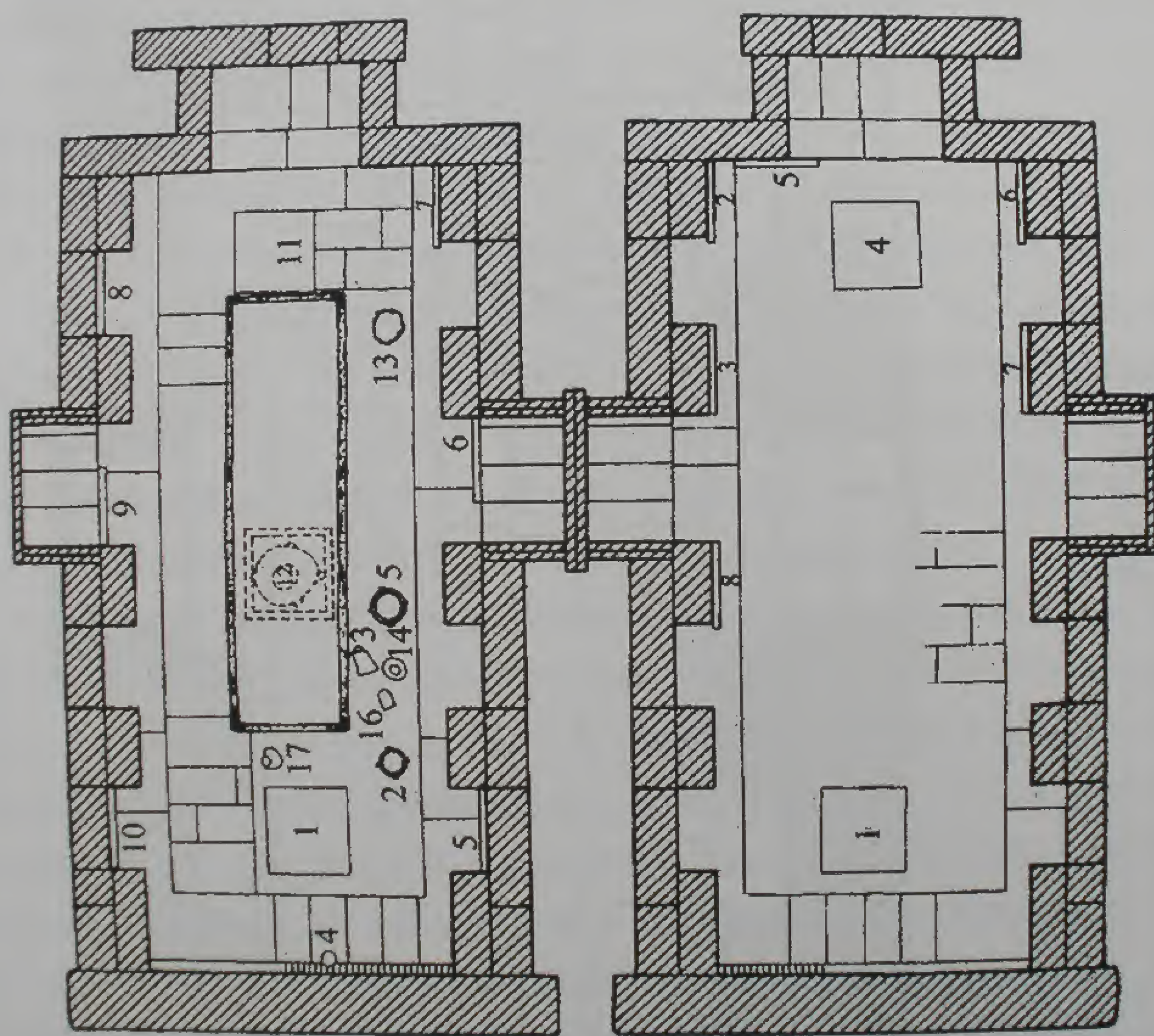
期当略晚于嘉祐七年（1062），已入英宗或神宗之世。冯氏称“故女弟子”而与田世中之称“小兆臣”者不同，除了性别方面的因素之外，当与宗教身份不同有关，冯氏乃一般的信道俗人而非受箓女道士可知。无论男室女室，皆上清派之华盖宫文与灵宝派之五方炼度真文共出。今附墓葬平面图（图版拾玖：59）^{〔1〕}，以供参考。

同时发掘的 M6 单室砖墓，“其结构及砖的砌法和 M2 左室基本相同”。平面呈长方形，由封门墙、甬道、墓室组成，全长 4.3 米，宽 2 米。除墓门中部之买地券和墓室东壁后部的华盖宫文、敕告文石刻之外，未发现其他随葬品。“该墓被严重扰乱，仅存石质买地券、华盖宫文、敕告文券各一方。”买地券放在入墓门不远处，敕告文和华盖宫文放在墓室东壁靠后部分，敕告文更靠近后壁，华盖宫文位置稍北（图版拾玖：60）^{〔2〕}。M6：2 号华盖宫文券，石略成正方形，仅在四角分别画出截角栏线而石不截角，四方梯形栏内分别刻写“朱雀辟非”、“真武延躯”、“虎啸八垂”和“圜圉秉气”。中间方框内刻：“华盖宫王气承（神）赵公明字子都，冢墓之中百禁百忌，害气之神，尽考□属，御五土之神精，转囹为福，当使者令子孙昌吉，禄祚遐长，千秋盛富，宜子宜孙，宜男宜女。急急如地下九天女青律令！”无他券之“当使真魂安适弼谐，受度南宫，脱落北籍，男即武备七德，女乃文咏九功，代代荣显，与天地而无穷”等语，颇为特别。M6：3 号敕告文石残去上部，左右二角尤甚。从残存部分看，石如华盖宫文券成正方形，四角刻线连成六角形，中间仍刻双栏线留出大方框，框内自左至右刻文七行（图版拾玖：12）^{〔3〕}。石文简报原释为：“□□□□王气五方诸神赵□□□□臣弟子田世用行年四□□□□月十六日生生值清真之□□□□宫□身溟乡潜宁冲□□□诸忌不得妄生害气当□□武备七德文咏九公（功）代□□□一如土下九天律令。”缺蚀之字未补，并间有字迹尚存而注泐者，亦未作句读。今参考他石材料，反复推敲前后文字，订补句读如下：“因囹圄王气五方诸神赵公明：因臣弟子田世用，行年四田□，三月十六日生。生值清真之□，死归圉宫，圉身溟（冥）乡，潜宁冲□，圉（？）禁诸忌，不得妄生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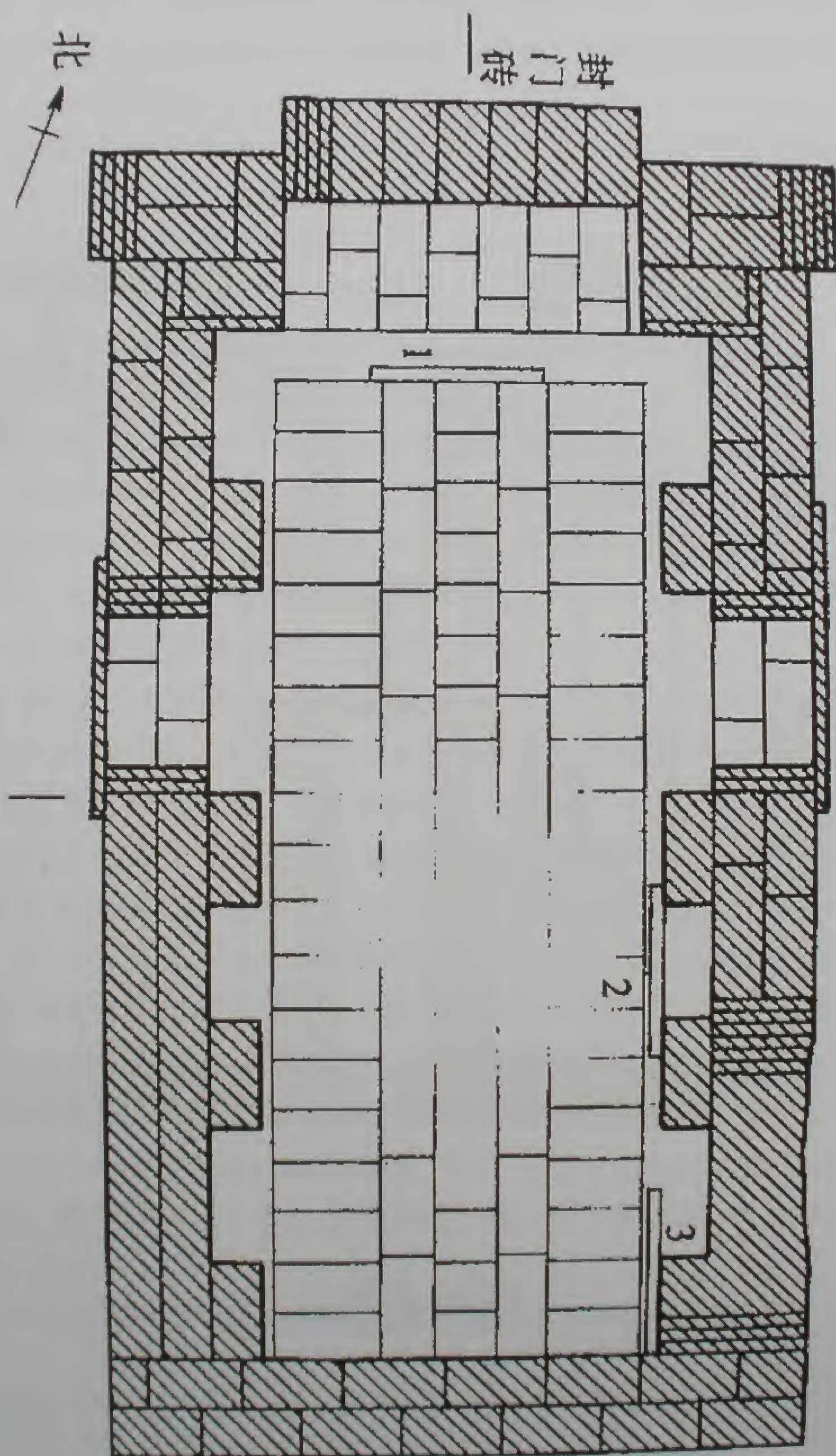
〔1〕《成都市龙泉驿区青龙村宋墓发掘简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1999），280 页，图一。

〔2〕《成都市龙泉驿区青龙村宋墓发掘简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1999），281 页，图二。

〔3〕《成都市龙泉驿区青龙村宋墓发掘简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1999），290 页，图一〇。



图版拾玖：59



图版拾玖: 60

气。当□□武备七德，文詠九公（功），代罔困穷。一如土下九天律令！”墓中出土另一华盖宫文石券，当为天帝敕告文券者甚明。文首泐蚀四字，按他墓出土天帝敕告文券之通例，当作“天帝敕告”；“赵”字后泐五字，前三字应为“公明等”；后二字紧接于“臣弟子田世用”之前，他券墓主姓名之前，一般均不加以“臣”称，准田世中券例，当作“小兆”无疑。田世用既称“小兆臣”，其身份当与田世中相同为低级道士，但其墓为单室而与田世中之左右并列双室夫妻合葬有所不同，是其为终身未婚之道士。如果说田世中墓为已婚男道士墓葬的例子，则田世用墓应属终身不婚男性道士墓葬之典型遗迹。田世用与田世中，显系兄弟关系，孰为兄孰为弟，则难于判断。不过，田世中死年四十七岁，田世用死年不超过四十一至四十九岁的范围，这是肯定的。田世用墓的年代，距嘉祐七年（1062）也不会前后太远。此墓经正式清理，可作为未受经法的已婚和终身不婚两种低级道士葬仪之典型遗迹。

田世中夫妇合葬墓和作为田世中之兄或弟的田世用墓，此二墓保存真文情况相对比较完整，年代较早，男墓主又为道士，可以作为道士葬仪使用真文石刻的实例，代表了两种不同组合的真文石刻在墓中的放置情况，是川西早期宋墓单纯随葬上清真文及上清、灵宝炼度真文并存两种不同葬俗的典型，对了解当时道士葬仪使用真文的情况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田世用墓出土的两件道教券石俱属上清派用品，而田世中墓出土7件道教券石，则两件属上清派，五件属灵宝派。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有以下两种可能：一是所奉道派不同，田世用专修上清派，而田世中则上清与灵宝兼修（如后所论属以灵宝派为主体而兼容融上清派的真元大道）。另一种可能是田世用墓葬的年代早于田世中墓，当时灵宝与上清二派尚泾渭分明，至稍晚之田世中墓，灵宝与上清二派已发生融合。仁宗之世，在川西地区是处于灵宝、上清二派开始发生融合的转变时期。自田世中下葬的嘉祐七年（1062）以后的川西宋墓真文材料，绝大多数也都是两种类型的石刻同时并出，也许正好说明了这样一种发展趋势。

前面述及四川成都东门外华阳县三圣乡上河村北宋熙宁二年（1069）曹氏墓出土敕告文刻石，亦称墓主为“小兆臣曹氏”，过去学所未逮，没有引起注意，我们在识读石文时，漏释“小”字，误作“兆臣曹氏”，以至影响到对遗迹材料特殊宗教意义的认识。该墓亦为平面呈长方形的券顶砖室墓，墓室用长34厘米、宽17厘米、厚3.5厘米的素砖砌成。墓室长2.48米，宽1.12米，中间棺台下有30厘米见方的腰坑，内置一陶瓶。买地券和真文石刻的放置情况是：墓门中央竖放买地券，字面向外。“后壁竖着两块敕告

文”，同时说明“敕告文2块，红砂石质，六角形，字迹的一面作合掌式，一块字迹已模糊不清”。字迹清晰的一块敕告文刻字已于前释录，根据已知大量材料，尚无一墓中只出敕告文而同时有两件的例子，由此判断模糊不清的一块“敕告文”当系华盖宫文无疑。该墓随葬品除了上述者外，尚有瓶、香炉、碗，四耳罐、双耳罐等陶器，皆为简陋之日常生活用品。整个墓葬形制和石刻种类情况，与上述田世用墓相近，不同的只是多了几件简陋的陶器。买地券文，据发表拓本照片图版释读如下：

唯熙宁二年岁次己酉，二月戊戌朔，九日丙午，故曹氏地券：
生居城邑，死安宅兆，卜筮叶从，相地咸吉，宜于此华阳县景福乡
福地之原安厝。其界东至青龙，西至白虎，南至朱雀，北至玄武，
中方勾陈，分掌四域。丘丞墓伯，道路将军，封步界畔，整齐阡
陌。千秋万岁，永保元吉。知见人岁月主者，保人今日、时值符，
故气邪精，不得忤（忤）怵（犯）。先有居者，回避万里。若违此
约，分（吩）付地府主吏，然后存亡安吉。急急如律令！

无论买地券或其文石刻，述及墓主皆称“曹氏”，称姓而不著名，准石刻通例，墓主当属女性，是曹氏墓为女道士墓。曹氏墓编号为M2，该墓东边0.5米处尚有形制完全相同的M3，墓葬结构与M2完全相同，除腰坑出土一大口四耳罐外，仅见买地券和另一件四耳罐。地券文字已残，有治平年号可见。两墓当为夫妻合葬，M2男墓年代较M3女墓略早，只是男墓文字材料保存不完整，不知其是否亦为道士。总的说来，两墓情况与前述四川成都龙泉驿十陵镇M2墓情况大抵相类。

以上两地三座北宋道士墓的材料，不论男女，从墓葬结构到买地券、真文石刻和其他随葬器物种类等情况看，与其他一般俗人奉道者的墓葬没有多少不同，田世中墓擂钵、砚台、香台与红砂石座形器虽似稍具特点，也并不显著。在诸墓地券文中，提及墓主时仍以“某府君”、“某氏”称之，连“奉道”、“弟子”这样的标志也没有，甚至和无真文石刻随葬的一般俗人的墓葬别无二致。墓主的道士身份，只在注明券主姓名身份的天帝敕告文和五方炼度真文中的中方真文所附祷祝文字中反映出来。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有关真文材料的具体刻写方式，同时也提示考古工作者在田野发掘和室内整理工作中对这两种材料应当特别予以关注。

二、政治身份

从考古发现随葬真文石刻墓主的政治身份考察，唐代陕西地区的墓主几乎都是一些帝王和皇亲贵戚高层统治者。河南地区的墓主情况则大不相同，除了道士之外，主要是一般的中下级官吏和普通百姓，少有发现与统治阶级上层人士有关的材料。出土天帝敕告文的河南洛阳市隋开皇二十年（600）马稚墓志，志前题名称其在隋代曾为“荡边将军、信州典义”。出土天帝敕告文的河南扶沟玄宗时期赵洪达墓，券文称墓主为“唐国许州扶沟县□川公赵洪达”，因无墓志文出土，具体历官情况不得而知，但“□川公”应为勋爵名称，大概是县公一级，级别也不高。出土五精石的偃师天宝十三年（754）郑炅墓，根据墓志刻文明确记载，墓主历官浚阳、彭城县尉，终于谷熟县丞，只不过是一个低级小官吏。至于其他没有同时出土说明墓主身份地位文字材料的墓葬，墓主无论其财产状况如何，也只能是一般的平民百姓。至于四川成都地区宋墓的情况，凡属随葬真文石刻的俗人信道者的墓葬，一般规模都不是很大家，根据真文石刻和墓志、买地券文字记载，墓主没有高门显贵，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的平民百姓，反映了当时蜀中道教信仰在中下层民众中是相当广泛的。就总的情况而言，因属相对边远的郡邑之地，不能和唐代的两都京畿相比，这一地区考古发现的大型宋墓本来就不多，不能说宋代这一地区的统治者信奉道教的人就不多。如成都东门外跳蹬河绍兴二年（1132）王宜人夫妇合葬墓出土敕告文称墓主为“先考知郡大夫钧君□、先妣宜人王氏”，男墓主官知郡大夫，女墓主封宜人，亦属官宦之家，也多少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第二节 唐宋灵宝、上清道派活动中心的转移、教派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他

古代墓葬出土镇墓文石刻，是古代人们从事道教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遗存，是研究古代道教发展历史最为可靠的重要材料。川西地区两宋墓出土的七种不同镇墓文石刻，分属两个不同教派的四种不同经系。其中的“天帝敕告文”、“华盖宫文”、“五精石”属于上清派，“天帝敕告文”与“华盖宫文”

皆源于梁代陶弘景的《真诰》一书。“五精石”大概也是根据《真诰》“华盖宫王气神赵子都冢墓百忌，害气之神，尽来属之，能制五土之精，转祸为福”中“制五土之精”的文字演化而来。其余四种，也都属于灵宝派材料。在四种灵宝派的镇墓文中，“炼度真文”出自《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八威真文”、“消灾真文”和“五方五帝灵宝真符”出自《元始洞玄灵宝玉（五）篇真文天书经》。如果我们把“太上真元大道”算作灵宝派中一个单独的支派，便应当是三个教派四个经系。这三个教派四个经系的镇墓文石刻，虽然除“真元大道”而外在陕西西安附近和河南境内的一些地区也有数量不同的材料出土，但从文字内容到使用方法也都不完全相同。这种现象，反映了道教发展史上存在的地区差异。

“五精石”和“华盖宫文”、“天帝敕告文”三种上清派的材料，无论河南扶沟赵洪达墓还是川西宋墓所出，也包括河南洛阳隋墓和江苏句容茅山南朝梁墓出土的有关片段砖、石文在内，全部都是用普通的真书汉字书写。而属于灵宝派的“八威真文”、“消灾真文”、“炼度真文”和“五方五帝灵宝真符”，以及陕西西安唐墓和川西宋墓所出石刻的主体，神符部分自不用说，连真文部分也都用云篆符书刻写。河南安阳唐墓出土李姓女道士西方炼度真文石刻虽然只有普通汉字而无云篆，但此普通汉字当系他石云篆真文所附的祝文而不是云篆真文的译文，如前推测，可能另外尚有一石刻云篆真文与之配合使用，不能作为炼度真文不用符书的证据。这一情况可以和文献记载相印证，说明灵宝派特别注重符篆，而上清派对于符篆的重视，则远不如灵宝一派。又起源于《真诰》的“天帝敕告文”和“华盖宫文”，从江苏南朝肖梁墓砖的“玄武延躯”到河南洛阳隋马稚夫妇墓志附刻的“天帝告冢中王气五方诸神赵子都等”，再到河南扶沟赵洪达墓之完全按《真诰》文字抄刻的一百余字的镇墓石，再到河南洛阳、偃师玄宗年间唐墓派生出“五精石”。最后在川西宋墓中，一方面进一步演变出多种不同形式的“敕告文”，新派生出了相关的“华盖宫文”，而另一方面又将“五精石”的内容合并于“天帝敕告文”和“华盖宫文”之中。这种情况，清楚地给我们展示了这种镇墓材料从简单到复杂的总趋势下，某些部分后来又有所省简的历史发展过程。

上清派的“玄武延躯”墓砖，隋代以前只在江苏茅山的梁墓中发现，从隋代开始在河南洛阳墓葬中出土，与文献记载上清派最初始兴于江南之说相合，并可说明随着南北分裂的结束，隋代统一以后，上清派的活动很快就已传到了北方中原的京都地区。从已经公布的资料看，江苏句容梁墓，河南洛阳隋墓，河南扶沟、安阳唐墓出土的四批镇墓文石刻，除了安阳女道士墓一

例之外，也都只有上清派“天帝敕告文”一种，而很少出灵宝派的材料。反之，陕西西安一带地区唐墓出土属于灵宝派的“炼度真文”数量不少，但却未见有“天帝敕告文”系统的材料。这一情况表明，至少在唐代中叶以前，上清派和灵宝派之间宗派观念还很强，彼此界限非常清楚。到了宋代以后，情况便不同了。从四川成都龙泉十陵镇北宋嘉祐七年（1062）墓开始，“华盖宫文”、“天帝敕告文”和“炼度真文”石刻就同时在一个墓中出现。例如四川成都九眼桥招飞办治平三年（1066）房府君墓，在随葬华盖宫文的同时还随葬了炼度真文石刻。四川成都跳蹬河南宋绍兴二年（1132）王宜人墓，上室后壁中央和下室东、西、北三壁共放炼度真文石刻五块，在下室东、西两壁同时又放有华盖宫文和天帝敕告文石刻各一块^{〔1〕}。四川成都羊子山南宋淳熙九年（1182）严世广妻乔氏墓，既出“消灾真文”，又出华盖宫文和天帝敕告文。四川大学西区淳熙十三年（1186）邓世英墓，一室四隅和中央放置五方八威真文，另一室腰坑扣合放置华盖宫文和天帝敕告文石刻各一方。这种情况表明，至少在川西地区北宋仁宗朝以后，灵宝、上清两派已呈融合的趋势，界限已不是那样明显了。这种变化，值得进一步研究。

宋代川西地区灵宝派和上清派的镇墓文石刻和北方唐墓的材料相比，无论种类和内容也都有所不同。以上清派材料而言，北方唐墓石刻在隋代仅刻有只言片语的基础上发展为完全按照早期道书文献记载录文制作的标准形制，并且只有天帝敕告文一种；而川西宋墓者则不仅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形制，同时还新增了华盖宫文的品种。属于灵宝派的材料，以灵宝五真文系统而言，北方唐墓出土数量很少，而且有迹象表明当时把全部五方真文按方全部抄刻纳入墓中，也未刻写普通汉字的题名和其他译文祝语，尚无按每方四段不同经德真文剔出单独组合使用者。而川西宋墓所出，则系按五方经德相同的段次剔出单独组合，选出其中与镇墓有直接关系的两组，加上普通汉字的真文译语、祝文和名称，形成专门的“八威真文”和“消灾真文”两种不同的镇墓文石刻。这两种镇墓文，迄今未见有同在一墓中共出的情况。与上述两种镇墓文同出于《元始洞玄灵宝玉篇真文天书经》的“五方五帝真符”石刻，唐代北方地区（见于早期文献记载曾用于建筑奠基仪式者除外）的墓葬中完全不见有实物出土，川西宋墓虽然出土不多，但也有材料发现，说明它作为一种镇墓文石刻使用，此时此地实际上是存在的。以出于《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的“炼度真文”而言，北方唐墓出土材料较多，除

〔1〕 傅汉良：《成都东门外跳蹬河发现宋代墓葬》，《考古通讯》1956年6期。

完全按照该书记载刻写云篆和普通汉字祝文并填写墓主姓名、墓址之外，概不加刻云篆之译文和其他说明材料。而川西宋墓所出者，除刻录云篆字形而外，另刻随事编撰之繁简不同说明文字，或附刻云篆译文，未有照录道经文献的长篇祝文祷语者。总的说来，两个派系的镇墓文石刻，到宋代川西地区，已经在唐代完全照录有关早期道书文字的基础上加以增损变化，发展出了更多的品种和类型。这种情况，和文献记载是一致的，反映了道教其后在民间更为广泛发展的过程中，在大的派别下又不断分化出若干小的流派和地区性的差异。学界认为，“隋唐五代上清派有茅山、天台二宗，分别由司马承祯两大弟子李含光、薛季昌传派。天台宗道士多居天台、衡山、青城、仙都等地，自司马承祯以下有薛季昌、田虚应、冯惟良、应美节、杜光庭等著名道士。”^{〔1〕}唐末杜光庭随僖宗入蜀以后即长期流寓西蜀，常住都江堰市青城山，深得前后蜀皇帝的宠倖，对四川道教发展的影响极大。四川成都东郊九眼桥与四川大学之间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邓世英墓出土上清道派系统的华盖宫文石刻，文字较他石更为简短，如“赵公明字子都”，“御五土之精，转祸为福”之类最常见的字句也都不见了，但在文末却特地加上了“一如天台律令”的话，表明其应属天台派遗迹无疑。这一材料，很可能和上述杜光庭在蜀中活动的影响有关，也给我们研究宋代道教天台派在川西地区活动的历史情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整个复杂多样的这类镇墓文石刻大量在墓葬中出现，则反映了炼尸学说的突出发展。

一般讲道教史的，大多认为上清派在整个唐代诸教派中居于主要地位，《唐书》所载受到皇帝宠幸的一些道教名师，差不多也都是上清派的人物；至于灵宝派则已经衰微。有人说：灵宝一派在隋唐时期，与天师道一样，默默无闻于世。直到北宋时候，才在江西清江县的阁皂山，出现了传授灵宝经篆的阁皂宗，再度兴盛起来。但是，考古发现材料所反映的情况与上述传统看法完全不同。从整个唐宋墓葬两个教派三个经系之七种镇墓文石（砖）刻的时代和地域分布上看，上清经《真诰》系统的材料，最初是南朝梁代陶弘景时首先在江南地区开始形成一种简单的形式，至隋代已发展流传到北方的中原地区，唐代玄宗年间在以东京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地区进一步复杂化发展成熟，流行起来。而灵宝派的材料在墓葬中开始出现的时代则相对较晚，最初是唐代睿宗和玄宗时期在京城长安及其附近地区流行，而且基本上都是属于讲究太阴炼形、追求尸解成仙的《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经系

〔1〕 王卡：《真元妙道与真元妙经图》，《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2期。

材料,《灵宝五真文》经系的遗存极为罕见。就在唐代的京城长安地区,自中宗以来,如中宗、睿宗皇帝夫妇、中宗韦皇后、武则天侄武三思、睿宗女金仙公主、玄宗孙女清源县主这样一些帝、后和皇亲贵戚上层统治者,在他们的墓中也都葬入了属于灵宝派的“五方炼度真文”石刻,而没有采用上清派的“天帝敕告文”材料,可见当时在西京地区的上层统治者中主要是信奉灵宝派,灵宝派的势力相当大。但在一般墓主社会地位不高的唐墓中,则少有属于灵宝派的镇墓真文石刻发现,似可说明当时这一道派在中下层人士中并不怎样流行,也许这正是文献记载材料不多,容易给人造成唐代灵宝派已衰微乃至默默无闻的错觉的主要原因。唐代灵宝派和上清派的活动流传,有相当明显的不同地域范围,灵宝派的活动中心是京城长安,西安和陕西境内其他地方,很少发现上清派的材料。在整个河南境内,灵宝派的材料不多,与西安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同一墓葬出土的镇墓文更是泾渭分明,出灵宝派材料的不出上清派材料,出上清派材料的则不出灵宝派材料,绝无在一个墓葬中同时出土两个不同教派材料之例。这两个道派活的昌盛,不仅与玄宗的崇道密切相关,实际上早在玄宗之前的睿宗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唐代两京地区流行上清、灵宝道派不同,可能和两个道派从江南传入中原地区时间先后有关,上清派早在隋代即已传至洛阳,经过唐初的发展形成了雄厚的基础,使得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地区成了主要是上清派的势力范围。大概到武周以后灵宝派才从南方传至中原,其时洛阳河南之地,上清派已成先入为主之势,自然难与争锋,只好另寻出路,以西京为主要据点进行活动。当然,这只不过是一种有待进一步证实的推测。

唐代中原地区的道教镇墓文石刻,无论属于灵宝派的“灵宝五真文”、“炼度真文”,还是属于上清派的“天帝敕告文”和“五精石”,到玄宗以后的材料出土不多,这无疑与安史之乱事件有关。玄宗被迫离开京城远走他乡,整个道教失去皇帝的有力支持,甚至遭到打击,势所难免。而宋代川西地区的有关道教石刻却大量出现,除“五精石”内容已融于“华盖宫文”石刻或简化蜕变为无文字之五色石或五色土之外,还发展出了几种新的品种。这一情况表明,至迟到北宋初年无论灵宝派或上清派活动的中心已由中原转移到了西蜀之地。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二,在叙述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十月十三日下诏诸路择官地建天庆道观时说:“先是,道教之行,时罕习尚,唯江西、剑南人素崇重。”^{〔1〕}南宋著名西蜀道士吕元素在

〔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635页。

嘉泰元年（1201）给门人吕太古《道门通教必用集》一书所作的序言中也说：“天师立教于西蜀，广成终老于益州，故蜀之人，奉道为盛，而仪注亦甚详”〔1〕，明确指出川西和江西地区，在宋初和宋初以前，道教一直比其他地区更为盛行。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所反映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江南地区，自魏晋以来道教一直相当发达，自不用说。宋初以来川西地区道教的特别发达，除了原来的传统基础之外，应当和以妄道著称的唐玄宗、僖宗入蜀，和宋代真宗、徽宗的大力扶持道教政策的推动有关。东汉张道陵创五斗米道（正一道）于蜀中，流传甚广，影响深远，人所共知。唐代以佞道著称的玄宗皇帝，正如我们在本卷《三件唐代道教石刻和唐代佛道之争》一文所论，早在开元年间，皇帝对西蜀道士、道观已经给予了特别重视，采取种种措施大力加以扶持。玄宗天宝奔蜀，对蜀中原已盛行的道教，自会起到一种推动作用。继玄宗之后，僖宗时黄巢起义占领长安，再次发生皇帝奔蜀事件，进一步促进了这种转化。如四川成都最有名的道观青羊宫，就是僖宗在滞留蜀土期间建立起来的。其后五代继之，王蜀崇道，形成传统。特别是唐末随僖宗入蜀最有名的道教学者广成先生杜光庭受到重用，对历代道教科仪进行了系统的清理，编纂成书，广为流传，为道众所遵行。镇墓文石刻是祈求鬼神祐护墓主尸魂安全，不受侵害，将来能够复生，炼尸成仙，生人亦得去祸来福的道教科仪用品。道教的葬埋科仪，属于黄箓斋的范畴。杜光庭对黄箓科仪极为重视，花了很大的工夫对有关的材料进行整理研究，编成五十八卷的巨著《太上黄箓斋仪》。该书卷五十七“八天真文”论述说：“黄箓斋拯救幽灵，迁拔飞爽，开度长夜，升济穷泉，固其大旨也。然祛灾致福，谢罪希恩，人天普修，家国兼利，功无不备矣。”〔2〕将度亡与生人的消灾求福都统统纳入黄箓斋仪之中，使度亡炼尸科仪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何将灵宝五真文与炼度真文用于包括葬埋（凶仪）在内的科仪，各有专卷论述，云篆、译文、祝语皆备。其灵宝五真文之“中央玉字”，主神仙图篆首段云篆四十字，而译文作“中央总灵，黄上天元。始生五老，中皇高尊。黄中总气，统摄无穷，镇星吐辉，流炼神穷。敕摄北席，遏塞鬼门。剪除不详，莫有当前”，共四十八字〔3〕。不仅与云篆字数不合，亦与《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洞玄灵宝授度仪》诸书文字不同。其“黄中总气，统摄无

〔1〕《道藏》三十二册，1页。

〔2〕《道藏》九册，371页。

〔3〕《道藏》九册，356页。

穷。镇星吐辉，流炼神宫”，句文皆为二书所无。同时，此十六字又被移作炼度真文中方云篆十六字的普通汉字译文^{〔1〕}。如前所说，中方炼度真文云篆，自《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以来皆未见正音译文，有之者自杜氏始。无论杜氏此说根据如何，是否出自杜撰，但川西宋墓出土实物皆与之相吻合，足以证明石刻材料与杜氏《太上黄箓斋仪》的直接渊源关系。杜氏此书，卷五十七“八天真文”，前有“天复元年辛酉十月五日癸未天姥峰羽衣杜光庭宾圣序”之语^{〔2〕}。唐昭宗天复元年（901），已在其随僖宗入蜀以后，《太上黄箓斋仪》乃杜氏著于蜀中之作。唐末五代，中原板荡，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书既于此时作于蜀中，加上杜光庭本人在道教史上的崇高地位，在川西地区广泛流传，发生巨大的影响，较他处为甚，这是很自然的事。宋代皇帝真宗、徽宗均以佞道著称，蜀中道教发展尤盛，而斋醮符箓，支派愈繁，趋于芜杂。至南宋孝宗、宁宗之际，西蜀著名道士吕元素、吕太古师徒有见于此，继广成之业，以“道门斋醮，简牒之设，古者止符篆朱章而已，其他表状文移之属，皆后世以人间礼兼考合经教而增益者，所在无定式。或得之详备而失简易之旨，使力所不逮者不可企及。或失之卤莽而使尽敬事天者无所考定，不惬其意。元素常窃患之，欲别为校定，使之适中，使略者不得隐，而繁者不得逾”，于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先由吕元素编成《道门定制》十卷^{〔3〕}。元素书乃据当时蜀中所见道书记载和实际行用的材料，加以剪裁取舍编辑而成。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宋代川西地区道教民俗材料的综合记录，反映了唐末五代至北宋末年这一段时间内蜀中道教的发展情况。同时，书成之后，对蜀中道教活动又起到了一定的范本作用。元素书成之后，门人吕太古又主要从过去元素未能得见而新从京城杭州运来的几百卷道书中选取部分材料，于嘉泰元年（1201）编成《道门通教必用集》九卷。此书对吕元素书的内容作了补充，可视为《道门定制》的补编或续集，虽然与在此之前蜀中所行道教实际情况关系不是很大，但它和《道门定制》也都反映了宋代（特别是南宋）蜀中道教活动的一些实际情况。因此，川西宋墓出土几种属于灵宝派的镇墓真文石刻，都可以从杜光庭和二吕的书中找到对应材料。特别是《道门制定》，不仅材料齐全，如五方炼度真文的名称，将八威真文之用于安坟的记载，与考古发现的材料也都完全一

〔1〕《道藏》九册，374页。

〔2〕《道藏》九册，371页。

〔3〕《道藏》三十一册，653页。

致。我们研究宋代川西地区的道教考古材料，杜光庭和二吕之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几种真文石刻，在正式发掘南宋以后的墓葬中突然不见了，但重庆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明代万历十八年（1590）黄杨氏砖刻镇墓券拓本，中间刻五十五数河图呈圆环形排列，环外自右至左刻字十五行，行间刻线为栏，下部文字多已漫漶莫辨。文首尚有“天帝告下冢中五方旺气：今有大明国四川平茶长囿司官□□□□黄门杨氏，本命丁未年八月十一日□时生，不幸于万历十八年八月□□亡，特告正寝襄事……”等字可见，带上了部分天帝敕告文内容，明显是上述唐宋葬俗的余波。这一材料说明，南宋中叶以后至明初，这种与道教有关的葬俗或许并未完全中绝，是否已经日趋简化而多用纸书真文焚化代替砖石刻随葬，值得进一步研究。

从道教的符书文字方面考察，石刻真文也都属于“云篆”一体。有关材料，虽然许多道书文献都有记载，但经过长时间多次辗转传抄，往往造成字形笔画不同程度的失真，正误之分很难判别。石刻书写年代较早，比较接近最初的写法，在研究道教文字和有关道书文献的校勘方面，也有重要的价值。

《灵书中篇》的符书字体为云篆。宁全真授、王契真纂《上清灵宝大法》卷十六，镇禳摄制门，三十二天灵章宝文，云：

三十二天玉字乃云篆，大梵之气，结空成文，即《元始灵书中篇》大梵隐语是也。^{〔1〕}

文献所载出自《灵宝五篇真文》的“八威真文”和“消灾真文”，墓葬出土的有关石刻材料，字体和《灵书中篇》相同，所以吕元素在《道门定制》卷四，将出自《诸天内音玉字经》的“炼度真文”和“消灾真文”符书也都列入“云篆符诰”一类中，并在五方的每方符书之后，分别加注“右云篆上告……”^{〔2〕}，说它们应属道教文字中的云篆一体，这是不成问题的。云篆的字形、来源，道书中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往往把它说得非常神奇玄妙。《云笈七签》卷七，三洞经教部，本文类，说三元八会六书之法，说：“篆者，撰也。撰集云书，谓之云篆。”实际上并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元初陈观吾在

〔1〕《道藏》三十册，803页。

〔2〕《道藏》三十一册，698～700页。

《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注》卷下“诸天中大梵隐语无量音”文下注引《天公经》云：“玉宸道君撰《元始灵书》三篇，凝云作篆，每字方广一丈，八角垂芒，以镇三十二天。”^{〔1〕}所谓“方广一丈，八角垂芒”云云，自系神化之词，但说是“凝云作篆”，却和实际情况比较接近。所谓“凝云作篆”，可以理解为仿天上云气之象，将小篆的字形加以变化，使其笔画更加圆转盘曲，行云流水，呈卷舒之势，这和云篆字形的特点是比较吻合的。不过，后来在长期抄写流传过程中，人们有意无意对最初的字形笔画加以改变，有的尚可依稀看出小篆的基本笔画，有的则完全摆脱小篆的骨架而根本无法识读了。同一云篆单字，不仅在不同的文献中有不同的写法，即使在同一书甚至同一篇云篆文字中，笔画也不完全一样。如《正统道藏》洞真部，神符类所收之《云篆度人经》，整个云篆的笔画都极为简单，与以《道门定制》为代表的常见道书云篆字形相比较，更是大不相同。陕西西安唐墓、川西宋墓出土石刻和《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等多数道书文献的云篆符书，总的说来字形虽然比较一致，但仔细对照发现，石刻和《五炼生尸妙经》一致的程度还不如《道门定制》。从成书年代讲《太上洞玄灵宝灭度五炼生尸妙经》比《道门定制》要早几百年，而字形失真的情况反而更为严重。由此可见，有时同一字形材料在写法上有出入，不能单纯根据成书年代之早晚来定其是非，这可以从考古材料上得到证明。这种情况的产生，可能和文献的抄刻时间、地域等方面的因素有关，很值得研究者的注意。至于如何对诸多考古发现的符书字形材料进行排比，与各种有关文献记载加以对照，从中找出发展变化规律，值得很好加以研究。

第三节 川西宋墓真文石刻与“太上真元大道”

前面讲到四川成都地区宋墓出土属于《五炼生尸妙经》系统的五方炼度真文石刻，中方一石普通汉字部分，除了刻写“黄中总气，统摄无穷。镇星吐辉，流炼神宫”的符书译文、墓主姓名和一般祝语之外，有的还有一些其他的特殊内容。最值得注意的是四川成都东郊龙泉驿区十陵镇 M2 北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八月田世中墓室出土中方一石刻文云：“中方炼度真文：

〔1〕《道藏》二册，432页。

太上真元大道五方炼度荐拔真文，今有剑南西川成都府华阳县宣阳坊居住小兆臣田世中，魂识葬于斯境。弟子忏悔生平，切恐三世宿缘，误有愆尤，希回巨福，保护真魂宁谧，托往净方，荫佑子孙兴隆昌泰，富贵大吉。急急如律令！”（图版拾玖：48）^{〔1〕} 又前面提到四川成都市高新区紫荆路 M3 北宋墓，西室出土“中方荐拔炼度真文”残石一方，残存部分尚有“太上真元大道五方真文……四川成都府广都县政务……真魂葬于斯境福邇……宿缘误有……净方”等字可见（图版拾玖：50）^{〔2〕}。简报整理者根据墓葬结构和镇石形制，判为“北宋中期”遗存，是可信的，其年代应与田世中墓大体同时或稍晚。残去部分文字，除墓主姓名与墓址所在地名而外，应与田世中一刻大抵相同。以上二石，与最为常见的其他墓葬所出中方一石刻文有所不同。如四川成都东郊圣灯乡元祐八年（1093）张确夫妇墓出土“中方八天荐拔真文”之“今有成都府犀浦市居故张确，行年七十一岁，四月八日生；并故杜氏，行年七十一岁，十月一日生。忏悔生前□宿缘，误有衍由，希回巨福，保护真魂安宁，抚（托）往净方，荫祐子孙，昌隆代代。一如五帝律令！”^{〔3〕} 四川成都龙泉驿区红河乡三桥村绍兴二十五年（1155）宋兴仁夫妇合葬墓出土“中央黄帝荐拔真文”之“元始赤书旧典八天五炼隐文，谨用荐资歿故程氏六娘子，伏愿仗八天之真诰，度品南宫，持大梵之隐文，超生胜境。一如五帝君符命！”^{〔4〕} 以及另一四川成都市郊宋墓出土一石“中方八天镇墓之真文，并用荐奉〔道〕亡过先妣张氏四娘子香魂，证品生界。仗此八天之秘录（箓），速生仙府，云祥自在，福荫见子孙昌盛，代代不绝。一如太上五帝命律令！”（图版拾玖：49）^{〔5〕}。它们都没有像上述二石那样，在“五方炼度荐拔真文”之前特地标出“太上真元大道”的字样，这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太上真元大道”，应当是一个道派名称。这一材料说明，“太上真元大道”至少在北宋中叶已经形成了一个正式的道派并在西蜀地区流传。

根据王卡在《真元妙道与真元妙经图》一文中的研究，《正统道藏》太

〔1〕《成都市龙泉驿区青龙村宋墓发掘简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1999），289页，图九。

〔2〕《成都市高新区紫荆路唐宋墓发掘简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1999），200页，图七。

〔3〕罗伟先等：《成都东郊北宋张确夫妇墓》，《文物》1990年3期，9页，图一八。

〔4〕发掘者提供石刻拓片复印资料。

〔5〕徐鹏章先生惠赠拓片。

平部收录《上方灵宝无极至道开化真经》三卷、《上方钧天演范真经》一卷，洞真部本文类收录《上方天尊说真元通仙道经》一卷^{〔1〕}，洞玄部灵图类收录《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品》一卷^{〔2〕}，统称为“上方四经”。此外，洞玄部灵图类收入《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图》一卷^{〔3〕}、《上方大洞真元阴阳陟降图书后解》一卷^{〔4〕}（以上二书实为一书而被《道藏》编者分割而来）、《上方大洞真元图书继说终篇》一卷^{〔5〕}，统称为“上方三图”。与以上诸书，均属道教真元派文献。“‘上方三图’大旨与‘上方四经’相同，皆以论述上方天尊‘大洞真元之道’为主要内容，其教义与宋元新道派儒道结合，符箓内丹双修的明显特征。”“上方真元派应为上清支派，很可能与司马承祯所传上清派天台宗有些渊源关系。”诸书“其说兼容上清大洞、灵宝度人经义。”从“‘上方四经’及‘上方三图’之内容来看，上方派所奉‘大洞真元之道’，的确承袭了六朝隋唐上清派的上清大洞经法和灵宝度人经义。”但是，以上诸书的时代甚晚，都是金元时期的作品。“《上方真元妙经品》及《上方真元妙经图》皆为金朝道士时雍及其门徒所造，而假托唐明皇和唐代道士司马承祯。实际该书问世不仅晚于北宋周敦颐撰《太极图说》，而且晚于南宋初朱震撰《汉上易说》。”除以上数书而外，包括王卡文中没有提到的洞真部灵图类之《真元妙道修真历验钞》（又称《修真历验钞图》）^{〔6〕}，洞神部象术类之《真元妙道要略》^{〔7〕}，以“真元妙道”名书，也应属于这一道派系统的文献，按照朱越利的意见，也是金元时书^{〔8〕}。虽然说者判断真元大道和上清派天台宗、灵宝度人经也都有渊源关系，但实际上认为真元派和上清派关系的密切程度远胜于灵宝，直接把它看作是上清派的一个支派，并且根据上述诸书的年代，进一步判定“上方真元道盖亦为时雍及其弟子顺应时代潮流而创之新道派”^{〔9〕}。

我们将“太上真元大道”和“上方真元妙道”材料作比较，发现二者之

〔1〕《道藏》一册，905页。

〔2〕《道藏》六册，704～706页。

〔3〕《道藏》六册，706～709页。

〔4〕《道藏》六册，709～713页。

〔5〕《道藏》六册，714～715页。

〔6〕《道藏》三册，110页。

〔7〕《道藏》十九册，291页。

〔8〕朱越利：《道藏书录解题》298、44～45、345页。

〔9〕王卡：《真元妙道与真元妙经图》，《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2期。

间一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共同点，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不完全是一回事，是很值得研究的现象。

二者的共同之处，首先从名称上看，“太上真元大道”与“上方真元妙道”虽有“太上”、“上方”之不同，但也都叫作“真元道”。“真元道”是两个道派名称的主体部分，在基本内容方面是相同的。

其次，从内容方面考察。如前所论，大量考古发现材料说明，四川成都地区宋墓随葬真文石刻不同于北方地区唐墓的最大特点，是灵宝派与上清派的材料共存。四川成都地区整个以道教真文随葬习俗从北宋中叶仁宗嘉祐年间最早出现时开始，虽然也有如田世用墓之只出上清派敕告文而不出灵宝经系材料的例子，但同时也发现有如田世中墓之既出敕告文而又出炼度真文的灵宝派上清派材料同时混存的例子，表现出两派相互融合的特点。以后的材料，更是多数如此。而川西宋墓出土镇墓真文石刻这种融合灵宝、上清二派内容为一的特点，也正是上方真元道派的特点。除此之外，如成都九眼桥与四川大学之间成都市二十九中侧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邓世英墓，墓中与敕告文、八威真文同时出土的华盖宫文石刻，文末有“一如天台律令”之语，说明宋代川西地区与灵宝相融而成“太上真元大道”的上清派主要是（或部分）是天台宗派，或者说在此与灵宝派相融混的上清派包含了天台宗的成份在内。融合灵宝派与天台宗上清派而成“太上真元大道”，更进一步增加了它和“上方真元妙道”内容的一致性，更加显示了川西宋墓“太上真元大道”材料和“上方真元妙道”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可以说，川西宋墓出土的“太上真元大道”与“上方真元妙道”二者之间，在基本内容方面有很大的共同之处。

根据以上两个方面的材料，我们认为“太上真元大道”和“上方真元妙道”二者应当同属真元道的道派系统。

除了二者之间共同的基本方面之外，我们再来考察它们各自不同的特点。它们之间的不同，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时代早晚不一，二是名称方面“太上”与“上方”的差异，三是在同时包含灵宝、上清两派内容的前提下各自的主体部分有所不同。

如前及说者所论，“上方真元妙道”的内容是以上清派为主，灵宝派为辅，以至被人看作上清支派。从川西宋墓出土华盖宫文和天帝敕告文末只称“如土下九天律令”，没有提到“太上真元大道”的内容，而真文石刻的“太上真元大道”，是作为副词直接加在“五方真文”或“五方炼度荐拔真文”之前，说明太上真元大道本身是以灵宝派为主，上清派为辅，或者可以说是

部分吸收上清派成份的一个灵宝派的一支派，至少它和灵宝派之间的关系比上清派更为密切。这也许正是它们一称“太上真元大道”，一称“上方真元妙道”，二者有所区别的一个因素。

从时代方面的差异考虑，“上方真元妙道”的出现是在金元时期，而田世中等两墓中方炼度真文石刻材料可以证明，“太上真元大道”这一道派至迟在北宋仁宗之前即已形成，有了正式的名称，并曾在四川西部成都地区流行。“太上真元大道”与“上方真元妙道”，两者在时间上恰好可以前后互相衔接。从这一意义上讲，如果说“上方真元妙道”是金元时期发展起来的一个新道派，很可能就是在北宋中叶西蜀地区形成的“太上真元大道”基础上北传后蜕变而来。“太上真元大道”是以灵宝派内容为主体汲取了一些上清派的成份，“上方真元妙道”则是增加上清派的内容减少灵宝派的成份，变成以上清派的内容为主体了。当然，这个“新”字，也包括汲取河图、洛书之类的新材料在内。“太上真元大道”是上方真元妙道”的前身，“上方真元妙道”是由“太上真元大道”发展而来，成都北宋仁宗嘉祐前后墓葬“五方真文”的“太上真元大道”材料，还保存了这种变化完成之前的早期形态。对于道教真元派的问题，由于文献存世不多，它的具体流传时间、地域范围和有关活动情况很不清楚。现在我们看到的七种“上方真元妙道”文献，其实际内容虽然是以上清派为主体，但其中四种却被《道藏》列入洞玄部，这一情况，也许就是真元道派由灵宝派转入上清派这一发展变化过程所留下的痕迹。在上述“上方真元妙道”诸书中，《上方大洞真元妙经品》书前有唐明皇御制序，或系假托，但如此假托，应当有它的理由，或可说明道教真元派北宋中叶在成都地区的发展，与天宝末年玄宗奔蜀一事多少有些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根据大量墓葬真文石刻文字考察，凡属俗人奉道者，对于所奉道派为何实际上不甚了了，也并不特别需要标出所奉道派名称，所以都只统称“奉道弟子”、“奉道男、女弟子”或“弟子”，绝无特别著明所奉道派具体名称的例子。由于田世中和紫荆路 M3 号夫妻合葬墓西室男墓主也都是道士，所以真文石刻要特地标出他们所奉的道派是“太上真元大道”。也就是说，只有在信奉“太上真元大道”的道士墓随葬真文石刻上，才有可能出现“太上真元大道”的道派名称。成都地区考古发现真正的宋代道士墓本来为数很少，只不过三、四例，绝大多数墓葬的墓主也都是俗人奉道者。那些为俗人信道者使用镇墓真文石刻葬墓的道士，应该有不少是真元派的信奉者。因此，北宋中叶成都地区墓葬出土“太上真元大道”的材料，目前我们看到发

表的虽然仅有两例，却反映了这一道派至迟在北宋中叶已经正式形成并在成都地区作为一个重要道派存在的事实。

考古发现成都地区北宋中叶的“太上真元大道”石刻，是文献上不见明确记载的古代道教史新资料，以上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算是一种推测，希望能够发掘更多的材料，很好地深入加以研究。

第四节 宋代“华盖宫文”和“天帝敕告文”的余波

南宋末年的墓葬，根据已经公布的正式发掘材料，用几种灵宝派和上清派石刻随葬的习俗似乎完全突然消失。实际上道士们的有关活动并未完全停止。


1987年合川县南屏乡明墓出土万历二年（1574）袁氏墓券一方，未经科学发掘出土，原石现存合川县文物管理所，34厘米见方，两面刻文，背面刻八卦九宫图。正面刻文七行，中间一行拓墨模糊，余文可释读如下：

赵公明子都守冢墓百禁诸忌，九宫八卦，主管坟墓，一切灵神……镇抚安宁，百无禁固。一枕来岗，各引旺气入穴，永镇墓内，大吉大利。^{〔1〕}

又1974年秀山县清溪发现明万历十八年（1590）杨氏石墓券一方，未经科学发掘出土，原石现存重庆秀山县文物管理所，高28厘米，宽27厘米，石面刻一大方框，框内中央一大圆环（太极图），环内与圆环平行刻五十五数的河图象数，环外刻十一竖栏，栏内刻字，按一行正一行倒相反方向刻写，字迹多较模糊，经仔细辨识，可释读如下：

天帝告下五方旺炁：今据大明国四川平茶长官司……本命□□八月□□日□□时□□于万历十八年八月十月巳时……凭白鹤仙于本宅国内扞取□□吉兆一所/作壬山丙向，□□□十八年十月初□日午时安厝，明星黄道，上下不呼。其地东至甲乙……皆系亡者承业，

〔1〕《西南石刻汇编·四川重庆卷》二册，20页。

龙虎抱卫，主客相迎……世代富贵……伏尸……俱是亡者……魍魎……妄行侵占……照依女青律令施行。所有天券符契，须至出给者。（图版拾：15）^{〔1〕}

虽然内容和宋代的材料不尽相同，加入了不少买地契约和其他前所未有的风水堪輿文字，但文首的“赵公明子都守冢墓百禁诸忌”、“天帝告下五方旺炁”，却是沿用了宋墓出土“华盖宫文”和“天帝敕告文”的内容，二者之间的渊源关系是非常清楚的。这种材料，反映宋代与上清派有关的道教活动在明代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可谓余波尚存。

四川地区元明时期上清派的材料，文献记载缺乏，情况不明，两件墓券和买地券虽然未经正式发掘出土，仍然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有关的线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我们相信，像这样的材料尚有不少埋藏于地下，希望今后的墓葬发掘者能够多多注意。

补记：最近得见中华书局 2004 年 7 月出版之赵君平编《芒洛碑志三百种》，书末附录一“南方赤帝镇神文”石刻一方，楷书题名“南方赤帝安灵镇神文”之右方刻写 64 字真文符书，此外别无其他普通汉字，云系“洛阳出土，曾归张氏”。此石为迄今正式公布河南地区出土仅有的一件唐代灵宝派炼度真文石刻材料。又据王育成口述线索，洛阳言面尚另有私家收藏本地唐墓出土灵宝派五方炼生尸经系统的镇墓真文石刻。最近至陕西考察，得见西安两批盛唐和唐代后期墓葬出土五方炼度真文石刻材料，发掘简报正整理中。这些考古新发现，都是研究唐代北方地区道教派别活动值得很好关注的新材料，进一步说明了唐代洛阳葬墓除流行上清派之五精石而外，亦有灵宝派材料之流传，表明唐代东京地区的道教系以上清派为主，但亦有灵宝派流传，只是其势似不如上清派之盛行。从西安近年出土材料看，情况则恰恰相反，唐代西京长安灵宝派盛行，但上清派亦稍有流传，可以补充本文的内容。我们希望收藏者能够早日公布发表，以供研究。

〔1〕《西南石刻汇编·四川重庆卷》一册，31 页。



ISBN 7-80106-382-1



9 787801 063823 >

ISBN 7-80106-382-1

定价 4680.00 元(全六册)